

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八辑

# 泥白高原

刘志丹与西北革命

姜永明◎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个投身大革命洪流的热血书生  
一个矢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黄埔军人  
一个为百姓舍身忘死谋福祉的群众领袖  
一个走出泥泞，没有走出战火的民族英雄



## 作者简介

姜永明 1962年12月出生于陕西省志丹县，副编审，本科毕业，省作协会员，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会员，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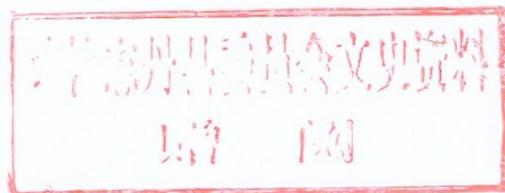
先后出版《高原那一片圣土》、《冬云》、《可爱的志丹》、《保安县志略》校注，《铁血岁月—毛泽东与刘志丹》、《志丹县地名志》、《今日志丹》、《志丹人物》、《播洒生命的阳光》等9部著作，约200余万字。在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作家》、《人民文学》、等荣获各种奖项30余次。

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八辑

# 浴血高原

刘志丹与西北革命

姜永明◎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编 委 会

编委主任：边志银

编委副主任：王生光 李俊海 任改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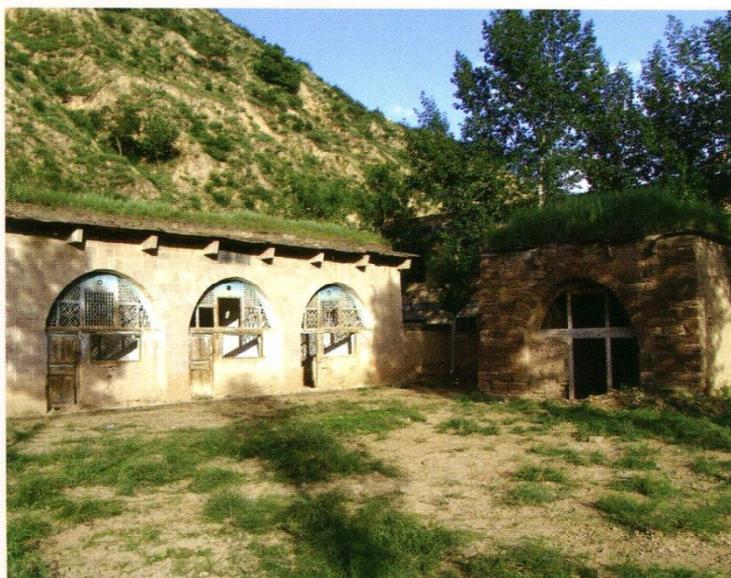
马志中

编委成员：贺建友 尚鹏荣 姜小明

高功强 常文华 单福荣

作 者：姜永明

文字校对：任东琳



刘志丹出生地——志丹县  
(原保安县)金汤镇小学堂



中学时代的刘志丹



1924年刘志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雖有文事  
必有武備

子丹

刘志丹常说：「虽有文事，必有武备」，深感革命必须要有武装力量



刘志丹在榆林“平民小学”和师生们合影（后排左七为刘志丹）



刘志丹在黄埔军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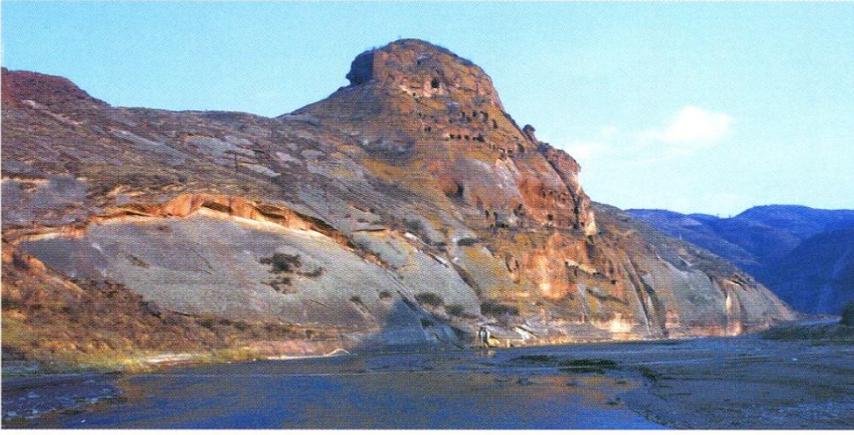
北伐战争中的  
刘志丹（前排中）



红26军、红27军与  
红25军在永坪镇组成  
红十五军团时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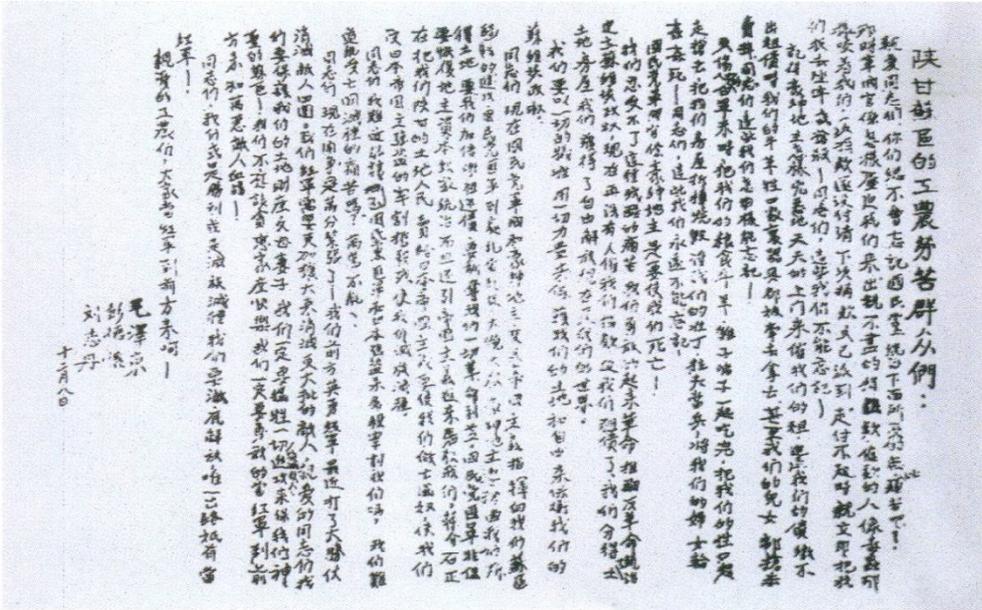
1928年5月，  
中共陕西省委决  
定在陕西渭南华  
县地区举行武装  
起义。这是起义  
中的群众大会。



1929年秋，刘志丹回到保安县（今志丹），在永宁山筹建了中共永宁山党支部，刘志丹任书记，曹力如任组织委员，王子宜任宣传委员。这是永宁山支部旧址



担任红42师师长的刘志丹



1935年毛泽东、彭德怀率中央红军到达瓦窑堡后，和刘志丹联合颁布的《告陕甘苏区工农书》



1936年4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东征，中间骑马者为刘志丹军长



1936年秋美国记者斯诺在保安（今志丹县）采访了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并为她和女儿刘力贞拍摄了这张照片



位于甘肃华池县荔园堡的南梁革命纪念馆，此址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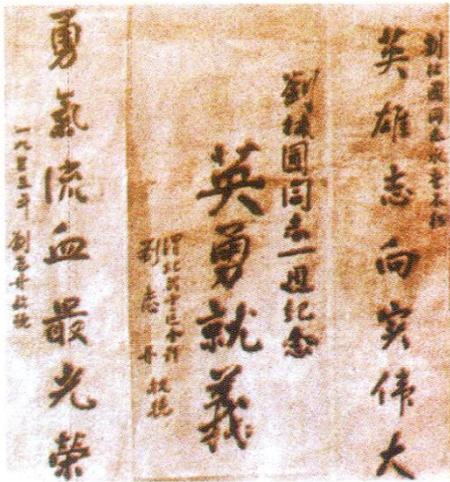


西北根据地部分负责干部合影：

- 前排左起：崔田夫、刘景范、刘约三、康建民、高朗亭、黄罗斌、×××、×××、王世泰  
 二排左起：高 岗、高维嵩、李仁杰、×××、×××、曹力如、×××、张文舟、张邦英、朱子休  
 三排左起：×××、刘懋功、×××、×××、张仲良、孔林甫、秦子杰、阎红彦、李合邦、李启明、×××  
 四排左起：张秀山、×××、×××、×××、×××、王聚德、王兆相、王文彩、王岱峰、唐洪澄、刘英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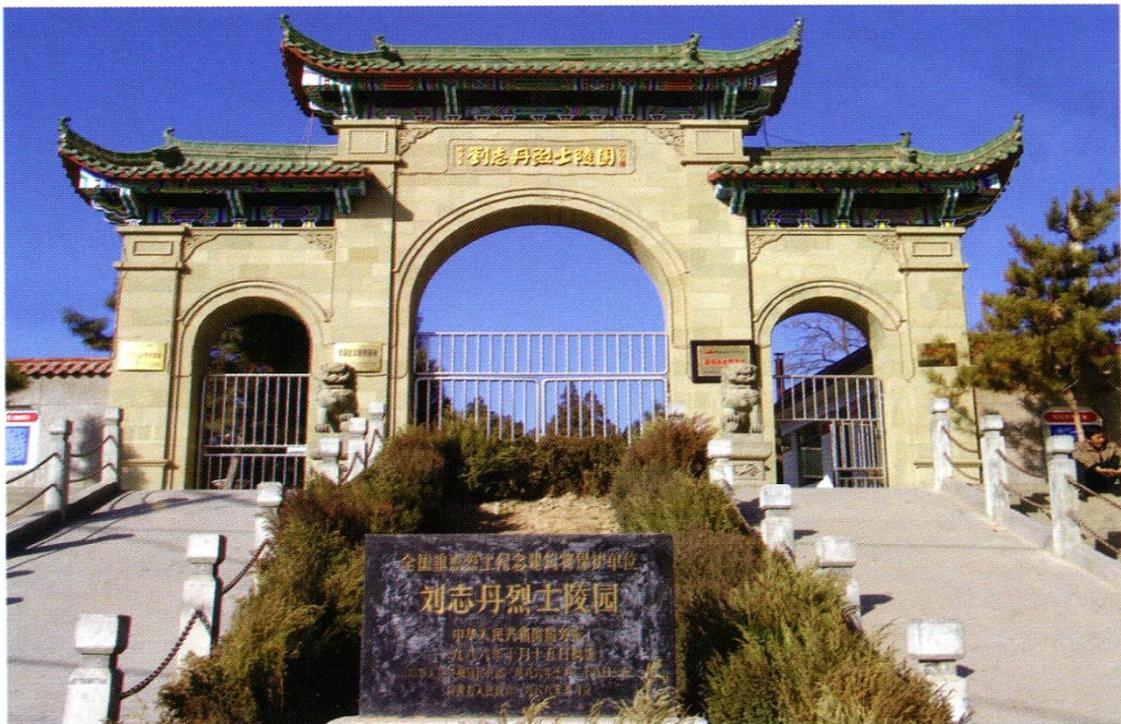
矗立于黄河畔上的刘志丹东征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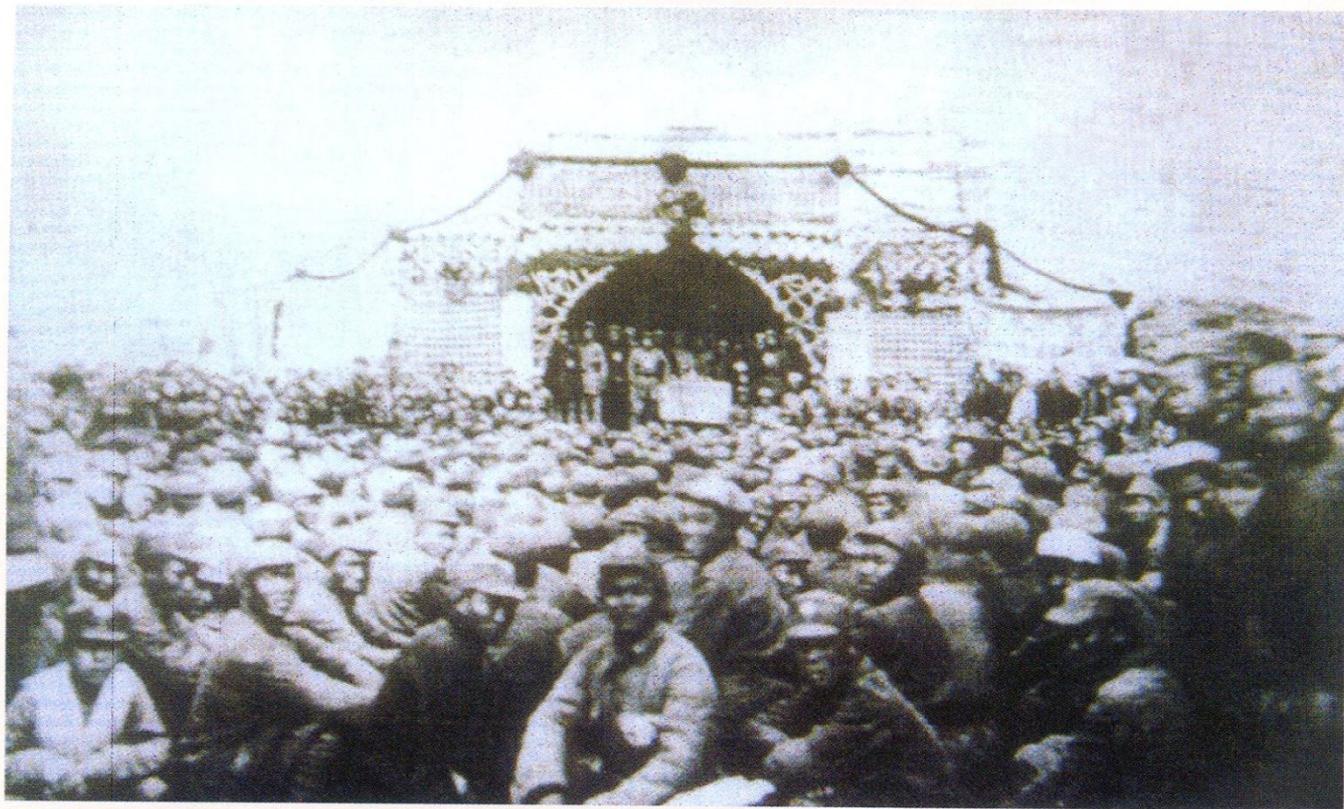
刘志丹为纪念刘林圃烈士牺牲一周年题写的挽联



刘志丹夫人同桂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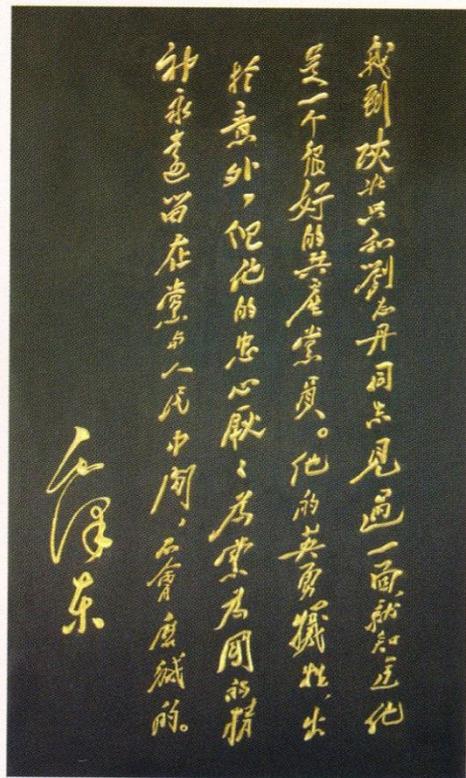
刘志丹烈士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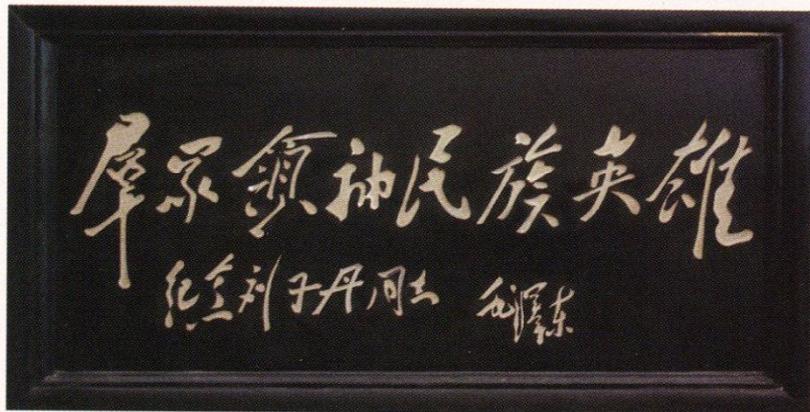
瓦窑堡刘志丹移灵公祭大会



朱德、任弼时在刘志丹移灵公祭大会上向灵柩致哀



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毛泽东



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 毛泽东



中央军委副主席曹刚川（右二）在北京召开纪念刘志丹座谈会上接见了刘力贞和张光

2001年5月习仲勋夫人齐心（左三）来志丹县拜谒了刘志丹烈士陵园



2007年9月26日美国海伦·斯诺研究会代表团来到志丹，进行学术研讨交流之后到刘志丹烈士陵园听取了关于将军的生平事迹介绍

在纪念刘志丹将军牺牲70周年活动中，刘志丹女儿刘力贞、女婿张光和县级领导合影



# 《浴血高原——刘志丹与西北革命》

姜永明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日目录

序

开篇 故乡与家园

第一章 榆中时光

第二章 黄埔岁月

第三章 渭华起义

第四章 三色兵运

第五章 太白枪声

第六章 彬县罹难

第七章 三嘉塬事件

第八章 照金血色

第九章 兵败终南山

第十章 包家寨会议

第十一章 陕甘边根据地

第十二章 瓦窑堡入狱

第十三章 三军会陕北

第十四章 东征殒命

结束语 民族英雄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刘志丹像赣东北的方志敏、海陆丰的澎湃、广西的韦拔群一样，在当地人民中具有崇高的声望和威信。……对党忠贞不二。在黄埔的时候，刘志丹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学员，我教过他……刘志丹在陕北人民中很得人心，确实是人民群众的领袖。我和他东征到清涧时，群众听说刘志丹来了，都来看望他。其中，有两个瞎子看不见，跑到窑洞里，摸他的手。这一点，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周恩来 1970 年 3 月 26 日在北京接见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

刘志丹是位很好的同志，陕北必须宣传刘志丹

——周恩来 1973 年 6 月陪越南领导人参观延安时的讲话

## 序

边志银

志丹县是刘志丹将军的故乡。我有幸生于斯，长于斯，现又在志丹县从事政协工作。当举国上下研究挖掘“红色文化”正风生水起的时候，志丹政协觉得关注挖掘刘志丹与西北红色革命的历史义不容辞，理所当然，我们志丹县有责任、也有义务向世人展示刘志丹将军鲜为人知、感人落泪的光辉历史，传奇经历。

上个世纪的 1903 年 10 月，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出生于陕西保安县的穷乡僻壤，少年时代在榆中求学，能诗善文，酷爱书

法。由于新思潮的影响，在校入团入党，成为一名投身大革命洪流的热血书生。1925年奔赴广州成为黄埔四期的学兵，在黄埔校园淬火加钢，终于成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铁血军人。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参与了著名的“渭华起义”。1928年重返陕北，踏上了在西北高原创建红色根据地的艰苦征程。在陕甘边进行“三色兵运”工作，屡仆屡起，愈挫愈勇，历尽艰辛。1930年10月在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打响了陕甘边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经过了倒水湾整编，组建南梁游击队，后又改为西北反帝同盟军、陕甘游击队，最后成立红26军，创建照金根据地。1933年南下失败，照金根据地丧失殆尽。是年冬，包家寨会议召开，成为陕甘边革命斗争的转折点，被誉为“陕甘边党史上的遵义会议”，陕甘边根据地随之建立。1935年2月周家硷陕甘边、陕北特委联席会议的召开，多次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提供了落脚点和出发点。刘志丹也在战火中成长为一名为百姓舍生忘死，浴血缔造西北根据地的群众领袖。1936年抗日东征牺牲后，党中央为纪念刘志丹，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毛泽东誉其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赞其为“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其为“红军模范”。正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评价：古圣贤豪杰多矣，有大同之理想且为其理想实践奋斗，如我志丹同志者不多见，古圣贤豪杰道者亦多矣，与大众为一体，自以其血滋养大众之解放事业者更不多见！近百年来，世运剧变，华胄英俊，前仆后继。然而如我志丹同志奋起边地，百折不回，遂而缔造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人类解放之基地，陕北一隅，成为全国与全世界所展望。奇功伟绩，实罕其伦。呜呼！非常之时产生非常之人，非常之人作非常之事。”

刘志丹的传奇人生和高尚情操，备受群众的褒扬。在艰苦的革命实践中，他在远离中央的情况下，独立思考，大胆实践，将马列主义的精髓具体应用于西北革命，在建党、建军、建政及领导西北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党内“左”“右”倾错误进行了艰苦卓绝、历尽磨难的斗争，累陷牢狱，但充满信心，只知有党不知

有身的优良品质，尤堪称道。他亲民爱民为民，时刻将群众的疾苦冷暖挂在心上，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咱们的老刘”。他对陕甘宁边区的山崩陡洼，乡野村庄十分稔熟，被称为“活地图”。他与士兵情同手足，时常将战马让给伤病员，还亲自抬担架。时常向战士群众宣讲革命道理，传授文化军事知识。他时常穿着千补百纳的粗布衣衫，脚蹬自己打的草鞋，东征牺牲时衣袋里仅有几份文件，几支香烟，其它一无所有。这就是一名共产党人的财富。所以有人评价，他是走出泥泞，但没有走出硝烟的民族英雄。还是毛泽东说的好啊！“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的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毛泽东的这段话，既是对刘志丹的最高褒奖，亦是对时人的告诫，发人深省。

将军永逝，英魂不绝如缕。在中国二十一世纪初的时间，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刘志丹，传唱刘志丹，说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民想念他，仍然需要他。

《浴血高原——刘志丹与西北革命》的作者是一个地道的志丹人，在志丹从事文史文学工作近30年，他曾参加过志丹县志、组织史、地名志等编纂工作，业余时间多次远赴刘志丹生活、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考察，又多次向志丹战友、家人亲属采访，曾查阅了大量有关的档案、回忆录、报刊图书搜集资料，带病历时数年，增删批改多次终于落成此书，现在问世了。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同时也希望姜永明笔耕不怠，不断创作出新的作品，为家乡文化建设增光添彩。

是为序

二〇一〇年十月

## 开篇 故乡与家园

在黄土高原的西北部，陕甘边的洛河流域，白于山与子午岭中间，蛰居着一座历史悠久的边塞山城——保安县，这就是刘志丹度过童年的地方。这是一片刀剑磨戛，血火浸泡的土地。杏河、周河、洛河由西北向东南纵贯全境。

史载：远古时代，先民就在这里，开疆拓土。商周时期属犬戎部落所有，春秋时代被白狄族占领。

公元前 282 年，秦昭公二十五年在洛河流域构筑秦长城，2007 年已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秦嬴政公元前 212 年至前 210 年又在洛河流域修秦直道百余公里。

汉唐迄，这里成为民族争雄、疆场逐鹿的广阔舞台。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 977 年），设保安军，属永兴路。

金大定十一年（公元 1171 年）废军置县，属延安府，后升为州，元降为县，明、清相沿不变。

保安县是陕甘宁的咽喉锁钥之地。襟山带水，岭岗重迭，古迹垒垒，瓦砾遍地，古战场遗迹随处可见。清顺治年县志云：“甲兵壮塞地，锁钥镇边楼”。

由于保安位居中原与边塞、农业与牧业、汉人与胡人、耕作与游牧、兵燹与和平的过渡带；安静与躁动、现实与浪漫、谦和恭顺与不安现状的过渡带；儒家循规蹈矩与多神崇拜、随遇而安的过渡带。地处文化板块的接缝处，文化的碰撞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质。一直是国家的边防要地，因此养成了保安县民风刚烈，尚武旷达的边牧文明与淳朴厚道吃苦耐劳，急公尚义的农业文明交融的性格特征。

刘志丹正是承续了家园边塞文化的骨血，在其坎坷漫长的人生中，以一腔热血，投笔从戎，以九死不悔，排除万难的豪情壮志，历经千

般磨难，万般痛苦，闯过无数枪林弹雨，跋涉过无数泥泞沼泽终于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潮流中铸就了生命的丰碑。

1903年10月4日（农历8月14日）正是“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季节，洛河川大刘氏西凤第十二代孙刘志丹出生在陕西省保安县宋代名城“金汤”古城的墟落。祖父刘世杰为他起名景桂、字子丹，乳名来生。中学时代，自己改名为志丹。

刘氏家族在保安可是名门旺族，主要生活在陕甘边的洛河流域。明永乐年间，先祖刘翼自河南义马齐集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辗转迁徙黄河西部的逶迤群山深腹，几经周折才于1416年落户于保安县罗坪川老庄塔，生凤东、凤安、凤琦、凤存四子，后裔以4兄弟名讳分成东、南、西、北“四大凤”。引自刘学文编著《志丹吴起大刘氏族谱》。

刘志丹的先祖出自西凤。他的太高祖刘勋祯的第四子为清朝嘉庆年的监生；曾祖刘存敏曾在私塾发蒙，粗通文墨。生二子，长子士杰，次子士哲。祖父刘士杰7岁时，因家贫无力读书，自愿到西塔沟村私塾当书童，后蒙私塾马先生扶掖，免费收入私塾。他勤奋苦读，17岁在延安府考中秀才，名列榜首，被点为拔贡，后在家乡金汤镇义学教书。

清光绪三年（1878年）刘士杰续弦宁夏固原人任氏。1879年任氏生下一子，刘士杰给儿子起名丕基，寓意大业永兴，后改名培基。即为刘志丹的父亲。

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2岁时，母亲任氏因食物中毒死亡。

刘培基7岁时，父亲又娶从外地来的冯氏寡妇为妻。刘培基童年时代饱受后母的虐待、毒打，过早地尝到了人世的冷暖。刘培基聪明过人，在父亲的教诲下，饱读诗书，14岁在延安府考中秀才，后选拔为廪生。保安县令爱其聪颖，欲收为义子，带到京师深造。但生性耿直，厌恶朝政腐败黑暗的刘士杰婉拒了县令的美意。只希望儿子学一门手艺，自食其力，安稳渡日。

刘培基遵从父命，拜金汤镇纸火匠王怀亮为师，专心学习纸火的制作方法，后娶师傅的女儿王茂女为妻。1920年王茂女病故，她生三男：景桂（刘志丹）、景范、景儒；五女：桂芬、桂兰、桂菊、桂叶、桂芳；续妻刘素清，生二男：景星、德润；四女：桂芝（又名刘荣），春梅（早夭），玉兰（又名刘耀），海燕（又名九娃）。②引自《刘志丹家史》（内部资料）。共有兄妹14人。

他纸火制作手艺学成后，悉心钻研，手艺臻于化境，纸火祭品工艺精妙，闻名远近，时常供不应求。数年后，他用做纸火积累的钱财与妻兄王丕章合伙开了一家粮草店，不久又开了一间杂货铺，两店合一，名“杰盛基”。一跃成金汤镇富户。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刘士杰日渐老迈，便辞去义学教职，携带儿男子孙返回楼子沟故居。仅留刘培基在镇上经营生意。清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刘培基参加过义和团攻打安边县小桥畔的洋教堂，在当地轰传一时。民国初年他被当地推举为保安县西上区绅士，民国十五年（1926年）为保境安民，当选为西上区民团团总。②

刘士杰还乡后，在楼子沟修缮房舍，购买牛羊，耕田种树，开辟果园。时序进入民国时，刘家除金汤镇有两片店铺，在楼子沟又拥有了大片山地，牛羊成群俨然富甲一方。

刘志丹5岁随母亲从金汤镇返回镇北30里地的楼子沟。7岁开始在爷爷办的私塾里发蒙。爷爷除教他《四书五经》外，还时常给他讲述中国历史和古代英雄豪杰，绿林侠盗的故事。刘志丹最爱听《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陕北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的事迹。

刘士杰早岁历经磨难，所以养成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秉性，一生从不仰人鼻息，趋炎附势。为桑梓教育事业默默奉献了大半生。他的这些高贵品质潜移默化地熏陶教育了刘志丹，使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坚忍不拔，威武不屈的性格。

民国八年（1919年），刘志丹到保安县永宁山高等小学学习，师从陈定邦、李子才，主要是补习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等课程。

刘志丹的同乡同窗王子宜回忆——

保安县高小就是当时开办的新学。它除了仍讲些八股文之类的课，还开设了算术、地理和世界历史。最受人们注意的是：新学是官办，读书不收学费。这样，有点跟潮流思想的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子弟送来就学。我们这些县城内的娃娃，首先成了这些新学的第一批学生。

学校开始办在县衙门对面的学堂里，后来搬到城外永宁山上，那儿有一座庙，早已断了香火，做了我们的校舍。地方不太大，学生也不多，只有一位老师，叫李子才，是从西安请来的大学生，很年轻，但见过大世面，课教得很好。

记得民国八年（1919年）的一天，我们高年级班的同学正坐在教室等老师来上课，只见李子才老师后边跟进来一个长得清瘦的少年。李老师说笑着：

“大家认识一下。他叫景桂，是本县芦子沟刘家人氏。”说到这儿，他提高了嗓音，喜悦地说：“刚才试过了，文章写得很好，真是难得……”

大家议论起来，我仔细打量着他：中等身材、白净面皮、稍宽的额头和直鼻梁，那双大大的眼睛格外深沉、文静。他面对大家的注视和议论，显得有些不安。

这时，李老师说：“就把他插到你们这一班吧！”

我身旁的座位正好空着，于是主动站起来邀请他。他笑了笑，走到桌前向我点点头，坐了下来。

我们从此经常在一起学习和玩耍，慢慢地我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

他从芦子沟来到永宁山县城，从只学过“八股文”到学算术、地理、历史等新课，而且插入的又是高年级。虽然文章作得好，但对从未接触过的新课，学习还是比较吃力的。

一天，他对我说：“崇义（我的字），帮下子忙吧，你的算术、地

理学得好，就当我的小先生吧。”

我听了很吃惊，也许是拿我开玩笑吧。我说：“算了吧！少拿我开心，谁不知道你的文章很有才华。”

他微笑着，沉思了一下，说：“光凭文章好就可以了吗？这样办吧，咱们互相帮助，我帮你国文，你帮我新课。”

当时我们的课都是由李老师一人教的。他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人，痛恨旧的封建专制，向往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政策，常常向我们灌输这些东西，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过了一年半，李老师突然回西安去了，学校停顿了。我们这些刚踏入新知识大门的学生，要中途辍学，而且要和思想兴趣相投的同学分手，很不甘心，总想找个出路。一天，刘志丹和我，还有曹力如、赵耀先、曹继之等聚在一起，谈到中国如此衰弱，我们都是热血青年，应该有所作为。有人说：“听说榆林府也有一所官办的新学，我们何不到那里去求学呢！”大家听了这个主意都叫好，刘志丹也很高兴，极力赞同。我们于是分别回家活动，取得家中同意，到榆林去上学。

谁知事与愿违，刘志丹的父亲对他外出求学极力反对。志丹很伤心，跑到我家对我说：“碰了大钉子”。因为父亲近几年操持家业，日见富裕，只是发愁人手少，盼儿子回家助他一臂之力，不愿意再放他出门求学。再说，榆林府离保安县几百里路，骑上毛驴儿也要走七八天，那儿又是大出处，“邪说怪论”不会少，怎能放心呢！他几次三番的商量，父亲都不答应，祖父虽然疼爱他，却没有为他帮什么忙。我听了这些话很失望，也没有什么主意，只好劝他耐心在家待着，等有了机会再说。

我和另外三个同学还算好，父母总算都同意了。我们临走那天，刘志丹特地赶来送行，大家心中十分难过。志丹说：

“你们四个人有幸，是我县第一批外出求学的青年，你们先走一步吧，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我是非去不可的！”

我拉着他的手说：“但愿能在榆林府见到你。”

他笑了笑说：“好啦，送君总有一别。请上路吧！”

我们在北门外挥泪而别。我和曹力如、赵耀先、曹继之四人，离开保安县。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志丹》中王子宜的《和刘志丹相处的日子》。

1921年5月，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刘志丹与保安县九嘴坡富裕农民同家的女儿同桂荣结为夫妻，刘志丹常常教她识字，向她宣讲反对封建礼教的道理。刘志丹报考榆中的愿望没有实现，拒绝父亲让他经商的要求，就在家中随同长工张万铭从事农业生产，精通了各种农活，明白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并暗自许下改变不合理社会的宏伟壮志。

祖父看到刘志丹是一个堪可造就的栋梁之材，便毅然决然地同意他去榆中求学，并赠送他三国时期文人王肃编纂的《孔子家语》中的一句语录做为人生箴言：

虽有文事，必有武备。

刘志丹诺诺受之，大喜过望。

## 第一章 榆中时光

### (1)

1921年刘志丹与同乡王子宜、曹力如晓行夜宿。经过七、八天的跋涉，行程500多里，赶赴边塞名城榆林，报考榆林中学。

在考试中，刘志丹面对国文试题，顾炎武《日知录》中的一句名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侃侃而谈，纵论天下，畅发自己的壮志豪

情，一挥而就。文章受到校长赏识，以第 5 名的优异成绩，进入榆林中学，被编入乙班。

刘志丹入学之际，将自己的名字由“子丹”改为“志丹”取自文天祥《过零丁洋》中“留取丹心照汗青”之意。

榆林中学是全陕北 23 个县的唯一一所中学。是陕北莘莘学子仰慕有加的高等学府。校长杜斌丞，是陕西省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人物。但学校却被陕北封建军阀镇守使井岳秀控制着。学校的课程多为儒学内容。孔孟之道统治着讲坛，代表人物就是学监杜斗魁。他们只管教死书，也要求学生背死书，不准接触社会，学生缺少自由，校园一片死气沉沉，特别压抑沉闷。刘志丹在诗文中都深深地流露出生命的苦闷。

### 《初识榆林》

城北一片黄沙梁，

城南堆堆黄土梁。

长夜寒歌多悲切，

但见月光冷又凉。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志丹纪念文集》。

这是刘志丹 1922 年入校不久创作的一首七绝，在摹景状物中流露出淡淡的哀愁，调子低沉凝重。

1923 年刘志丹以名字刘景桂在《榆中旬刊》发表散文《万恶的狂风》——

星期日的早晨，天气十分晴朗。我觉得校里烦闷，便出北门，独步寻景，见那软嫩的草儿和枝头的小叶儿，都用晚春甜蜜的露水，洗净它们底小脸，笑嘻嘻地立在朝阳之下，尽量地呼吸那新鲜的空气，以扩充它们底小肺量。一阵徐徐的晓风吹来了，它们都手拉手肩靠肩高高兴兴地舞着跳着，以锻炼它们底小身躯。那天真烂漫的鸟儿，在一旁唱着歌儿，以催促它们的跳舞；以恭贺它们的强健。这时我底灵

魂，也似乎加入它们的跳舞会了。

我任着脚儿，自在地走着。远远地望见那碧绿色的小海女儿，被晓风微微地荡漾着，仰望那金盆似的太阳，哗哗地笑个不休。用上伊带着的脸儿和柔媚的态度，招呼我同伊一起享受那惠风温日的大幸福！

我到了小海女儿的身边，见这蔚蓝色唯一的自然盖儿，反铺在小海女儿的底儿上。金盆似的太阳，也跳到水里去洗澡。许许多多的水鸟，浮在这蔚蓝色唯一的自然盖儿上；唱着自由歌儿翱翔着。许许多多的小鱼儿，忽浮忽沉，洋洋自得地作它们底泅水运动。这真是小鸟儿和小鱼儿，同场运动的一个极好的机会。

这时我一切一切的烦闷，都被这蔚蓝唯一的自然盖儿上所盛的水，洗的干干净净了！脑海中只充满了自然界中的趣味和人生的快乐！

呼噜噜的一阵狂风，卷扶着黄沙，吹迷了我底眼睛。耳鼓中只有咆哮的风声和沙沙的沙粒声。这时我进退不能，只得在这凶猛势重的风沙中，呆呆地站着。只觉得黑暗！只觉得愤恨！

停了一会，风声稍息。我勉强地睁开眼睛，往时金盆似的太阳，现在变作灰白色的孤星了！强健的小鱼儿不知被狂风飞沙吓的逃到那里去了！天真的小鸟儿，不知被狂风飞沙卷到那里去了！只留着软弱的小草儿和可怜的小树叶儿，连哭带跳地说：“苦呀！苦呀！我们底自由，我们底快乐！都被狂风飞沙剥夺罄尽了！”

我拿起精神，鼓励着它们说：“只管伤痛是无用的，盼望你们赶紧招集同伴，拿起百折不回的精神，拼命的与狂风飞沙相抵抗。上帝底清风使者，和和平的细雨神仙；将要来了。狂风虽凶，它能敌过上帝底清风使者吗？风沙虽猛，他能战胜和平的细雨神仙吗？到了这个时候，只有我们底自由！只有我们底光明，抵抗！快起来抵抗吧！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志丹纪念文集》。

作品中少年作者表达了对自然美景的热爱、眷恋，也流露出生命的沉重、压抑，青春的苦闷，以及反叛，非常珍贵。

2009年夏，刘志丹之女刘力贞在榆中一位老先生后人珍存的两份《榆林之花》刊物中竟意外地发现了刘志丹中学时期的散文《春天的榆林》和《我的母亲》，时间与《万恶的狂风》相同，均写于1923年前后，现增补于下，以飨读者——

### 春天的榆林

温和多情的日光，从窗缝里射进来，正照着我闷闷不乐的面上。似乎对我说：“你别闷了！现在你所处的社会，是春天的社会，一切残冬腐败的现象都会除去。你赶快努力罢！”

这一番的感触，使我的情绪格外兴奋。房间猛然闪开，我抬头一看，原来一位同学从门外跑进来，着急的说道：“你真是走了远路的人，摇铃你都没有听见吗？快上堂去！”说着带了讲义，飞也似的跑出去了。原来我是这天早上才由家里来的，身上虽觉得十分疲乏，看见人家对于功课的热心，我也就不禁的自愧起来！在功课表上一看，知道早餐后第二堂是王教员的语文课。我就急急的带了讲义，跑上堂去，看着讲义，已经讲过好几行了。我凝神一看全堂的同学，没有一个不注目于教员的，脸上都现出诚静而渴求的样子。

这天下午和几位同学，到城外散步。那温和的春风，吹在我们的衣襟上，似乎说：“趁这良好的时光，请你们快快进步吧！”抬起头来，见那在微风中的树枝儿，摇着！摆着！现出最得意的样子，似乎说：“你们看我们在春风当中，发旺的何等迅速呀！请你们的进步，也照这样子的迅速。”凝神再看，微风摆动的树枝上的鸟儿，唱着！舞着！也似乎说：“这么好的春光！请你们赶快努力！”……

一切活泼快乐最难以形容的光景，把我就看呆了！便想到这么好的春光，这么美的景致，我们一切的动作，都应该顺着春光景致的维新才好啦！为什么政治还是那样腐败？风俗还是那样固闭？正想中间，同学从肩上一拍说：“天快要黑了！回罢！”

### 我的母亲

从轻淡的薄雾中，露出淡红色的日光，照在一个乡村的院子里。清凉的风，吹个不休，红黄色的树叶儿，不住的从墙外飞到院子里。吱吱的蝉声，断断续续的从风中吹到耳边来，这晚秋的光景，实在令人爽快已极！我正背着臂儿，呆呆的望着一片金色的世界。小弟弟忽从身后跑来，喊着说：“二姐姐回去呢！二哥把牲口也备好了。你不送他吗？”——这是二弟弟教给三弟说的。

我回头一看，母亲和二姐，已经到了大门口了。我正要和二姐说话时，见母亲的眼帘中，现出许多泪痕，脸上却勉强的带一些微笑。

二姐走了，这时我完全注意在母亲身上了。我的心颤颤的动着，也无心与二姐送行了。只默默地想：“母亲向来是不悲痛的，不知今天为什么落泪？是祖母难为了她？还是父亲难为了她呢？”

忽觉得温柔的手儿，放在我的额角上。发出极慈爱的声音，问道：“儿子！你今天身上爽快吗？”我睁眼一看，原来母亲站在前面，一只手轻轻的放在小弟弟的颈子上，一只手却在我的额上，轻轻的抚着。脸上现出极慈爱而且惊异的神情，说道：“你的头晕吗？怪道你今天早晨没有吃饭！”我忙回答道：“妈妈你放心，我身上爽快，头也不晕！”但是她总不相信：说我哄她，登时她脸上现出了极端的愁苦和踌躇，站着动也不动。

这时候她的心，完全放在我的身上了。我受了这种刺激，几乎要哭出来，但是怕母亲难过，却又忍住了。又不忍使母亲踌躇，所以我连忙说：“我今早上吃的饭少，因为起的太迟了，身上并不难过。”然而她总是半信半疑，低着头儿，拉着小弟弟，到厨房去了。

不多一会，小弟从厨房门里跑出来，叫道：“哥哥！妈妈叫你吃饭呢！”这时我觉得十分不好意思——因为无故把母亲劳了一阵。

到了厨房里，见母亲煎下醋汤挂面，已经在桌上摆好了。她说：“你快吃些！妈妈给你煮下的。”这时我就不得不含着笑多吃一些，使母亲高兴。

母亲眼帘下的泪痕，已经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停了一了一会我问了母亲，她说：“并没有旁的原故，因为眼睛里进了一点灰尘，流出泪来。”我总不相信，但是再也问不出什么来。

这天下午，母亲忽然发起冷来，战栗个不休，面庞呈出灰白的颜色。停了一会又是焦热，鼻孔的呼吸非常沉重。我看了她的病势，知道来源已久，今天早上二姐起身的时候，她眼帘上的泪痕，原是因为这个的——恐怕她再见不上二姐——但是她不肯说出来，说出来怕我们难过。就是这时候她还勉强说：“儿呀！你们别着急了，这是今早晨受了一点凉，不要紧。”但是我哪里肯信，一定上城里找冉先生——他是我乡最有名的医生——我就不顾二和三飞也似的跑去。我家到城里有二十多里，赶到时，已经六点多钟了，恰好冉先生没有外出，但是他不在夜里走路，这却难住我了。呆了半会，便打定主意，上店里雇了一头驴子，给他骑着，我牵着，恨不得一步就跑到母亲面前。让先生把母亲的病，一下拾的撇了。不到两点钟，就到家里。我三步并成一步地跑到母亲房子里，看见母亲端端地坐在床上，说：“我的病好了，叫你白白地跑了半夜！”我虽有些喜气，仍忙招呼先生看脉。

看过了脉，先生便不言语，此时我就疑惑了，路上的希望失掉了吗？我只瞪着眼，张着嘴，也说不出什么来。魂灵儿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我和父亲催先生开了一个药方，买药煎好了，让母亲吃下去了，但是……病却一阵比一阵重了。然而她嘴里还说：“我的病不要紧，你快歇去罢！整整叫你跑了半夜！”这时我伤心的眼泪，便忍不住了。她病到这个地步，还为着我！

我呆呆地坐在她身边，注视她的面庞，却是一阵红一阵白，身上颤抖的不休。真是怕人。天呀！不长眼的天呀！为什么给我母亲这样重的病呢？……

她在晕迷中，还催了我几次，叫我快休息去。

喔喔的鸡声，带些悲哀的余韵！房子里明灭的灯光，一阵比一阵

暗了!我开门一望，东方既白。

我跑到医生所住的房子里，请他再来看脉，但希望与我母亲救命的人，已经走了!我气的哭。呆了一阵，把父亲吓出了声：“哎哟我的儿呀!”吓得我魂灵四散，周身软了!便不顾命的跑进去，母亲的四肢已经冰冷了!眼大睁着，嘴里还勉强地说：“玉生儿哪，让我看一看!”——玉生是二弟的名儿，昨天送二姐去了。我忙抱了母亲，昏昏沉沉!不知入了什么境地!

扑扑的一声，二弟飞也似的从门外跑进来，叫了两声：“妈妈!妈妈!”母亲抬起头来，深深地看了两眼，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眼也合着了!这时我的心里呜呜哭号，眼里却什么也看不见。我的魂灵，已经跳入茫茫的大海了。

父亲抱住了我，在我耳旁鼓力叫了几声，我才从半死中醒了地来。乃是一片哭声，母亲已经长眠去了!只留着我们兄弟姊妹和父亲祖母的痛哭……尤其是我……

回想平时，有了难过，她替我们难过!有了痛苦，她替我们痛苦!但是现在我们……

我母亲辞世已经三天了，今天要出殡呢，就是要和我们永别!阴沉沉的天，下着几点濛濛细雨，好像我母亲告别我们，流着告别的泪……

此时母亲的棺材，已经到了门口了!于杂乱的哭声中，似乎显出母亲的声音：“亲娃娃们!别哭了!虽然……我的灵魂却是常照应着你们的。”

这时我的灵魂儿，却伴着母亲去了!只呼呼地一阵响，睁眼看时，母亲棺材已经埋入黄土堆了!天宽地阔，无母亲的儿子!何处寄托呀!

回到家中，看见一切一切，都和平常不同。随处都会使我痛哭。

我无聊极了!又跑到坟院里，只见一堆黄土，却无母亲的影儿。只听秋蝉吟吟的叫着，一会儿凉风住了，瞑冥之中，见母亲依着小弟，

含着笑说道：“根生你今年四岁了，再过七年，也就像你哥哥现在那样大了。”我喜极了。睁眼一看，面前还是一堆黄土！

于是我就叫了：“天呀！神呀！我愿你保佑我，愿你保佑我常在梦里与我母亲相见相亲。”

悲痛的生活，流着热泪，过了一冬了，今天是我上榆林中学的前一天。我便回想起：去年我预备到省城里考学校的时候，父亲还怕经费困难，有些犹豫不决的意思。这时母亲便说：“你叫娃去，念书是好事情，咱们在家里殷勤些，俭省些，几十块钱的学费算什么呢！”

但是她背过我，却流了几次泪——怕我走远了，她要挂念呢！

后来闹土匪，路不通，终没得去，这可实在辜负了母亲的苦心了！想到这里，我就哭了，我的母亲呀！我慈爱而且有毅力的母亲呀！隐隐之中，听见好像母亲说道：“你放心去，念书是好事情……”

呀！母亲的灵魂真是时时照着咱们。爱着咱们。她越爱我！我越伤心！千古的伤心。

新发现的刘志丹两篇散文无论是写人记事，借景抒情都颇具寓意。写实意比较浓郁，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大自然、对黄土地的深情厚谊，而且很有人情味，殷殷的赤子情跃然纸上，读来令人怦然心动。

刘志丹为了逐散校园的沉闷，率先在班上成立读书会，利用课外时间读书看报，畅谈国家大事。在刘志丹的带动影响下，各班都成立读书会。通过读书看报，许多新思想，新知识，如一股清新的空气飘进学生的脑海里。通过读书，刘志丹他们的视野开阔了许多。但是如何改变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刘志丹的心里仍然不十分明朗。

这时候学校国文教师魏野畴成为他的革命启蒙人、引路人。魏野畴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曾负责过北方进步青年组织“共进社”。他发现刘志丹是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的血性男儿，而且极富领导才干。他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借给刘志丹阅读。当刘志丹通过许多个不眠之夜，伴一盏油灯阅读摘录完这些著作后，他又与

曹力如、王子宜等同学进行热烈讨论，不懂的地方又多次向魏老师请教。从此，马列主义开始进入他们的脑海，以前许多不明白的问题，顿时茅塞顿开。

在魏老师的积极推动下，刘志丹与许多进步学生向校方提出成立学生会的要求，在校长的支持下，学生会如期成立，刘志丹被公推为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会的许多活动中，刘志丹逐渐显露出自己过人的组织才能，赢得同学的拥戴。

学生会成立了戏班子，利用文艺的形式宣传革命思想。刘志丹带头参加《孔雀东南飞》演出，并自告奋勇扮演女主角刘兰芝，由于刘志丹的相貌、气质和对角色的把握，戏演得非常成功，轰动全校。许多同学都被刘志丹精彩的表演感动的潜然泪下。不久，刘志丹与同学又排演了由魏野畴创作的《爱国赋》，魏野畴亲自登台演出。使校内外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激发了广大观众对爱国者的崇敬对反动军阀的刻骨仇恨。

榆林中学的进步思潮，引起了陈腐势力的憎恨，他们大骂魏野畴把学生教坏了。以杜斗魁为首的旧势力向学校发难。正在校长杜斌丞左右为难时，魏野畴主动请辞。

刘志丹等同学眷眷不舍地送走魏野畴。

## (2)

榆中走了魏野畴，相继又来了李子洲、王懋廷、王森然、呼震东等年轻富有活力的教员，使榆林中学依然保持着新的气象。

李子洲是陕北绥德县人，毕业于北大哲学系，参加过“五四运动”，是西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他给榆中带来了许多马列著作和进步刊物。他在课堂上时常讲解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的文章，还向学生介绍高尔基、雪莱、歌德等外国文学家的作品。他很关心学生会工

作，支持各种研究会的活动。刘志丹等一大批进步学生被李子洲深深吸引。

刘志丹三天两头出现在李子洲的宿舍，向他借阅各种书刊，汇报学生会的工作，请教学习中的疑难问题。李子洲也非常喜欢刘志丹，有意识地向他灌输马列主义思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成为刘志丹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二位引路人。

由于李子洲在榆中的标新立异，宣传新思潮，被学校的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不断排斥他，李子洲只好愤然离去。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王懋廷受李子洲的派遣走进了榆中校门。王懋廷来后不久，就分别与刘志丹和学生会的骨干进行了谈话。1924年秋季，榆中党团支部成立。支部书记为张肇勤，刘志丹是支部委员，委员还有李登雷、汤登科、王子宜等人。

关于这一时期的刘志丹和榆林中学的校园生活，国文教员王森然有一段回忆：

1924年2月14日，我携带了简单的行装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革命与考茨基》、《两个策略》、及《社会科学研究初步》、《俄国革命史》、《向导》、《新青年》、《独秀文存》等书刊，从北京出发，途经石家庄、太原等地，渡过黄河，来到了陕北黄土高原。

到榆林中学后，我见到了比我早到的杜斌丞先生，他告诉我，学生会准备欢迎我。不几天开了欢迎会，主持欢迎会的是学生会主席刘景桂（即志丹）。他在欢迎词中，高声朗读了我当时在刊物上发表过的一首诗《杀！杀！杀！》。

我听了，不禁下泪，没想到我的诗会引起这些可爱的青年这样热情的传颂。刘志丹接着说：“王先生参加过‘五四’运动，是革命者，我们热烈欢迎他来教导我们！”

我的宿舍在学校的东屋，刘志丹向我谈了学生会的情况及他们学习的课程，谈陕西共产党创建人魏野畴老师、杜斌丞校长的为人，学

校的图书情况，谈满嘴孔孟之道的老师杜斗魁的笑话，谈那些仗势欺辱同学的纨绔子弟的恶迹，谈他自己演过的戏。让我讲“五四”运动，讲李大钊、胡适、陈独秀和北大的学生运动。反复向我询问“民主”、“科学”的问题。他使我的院子渐渐地成了他和同学们谈论社会、交流思想的地方。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志丹》中王森然著《忆榆林中学和刘志丹》。

每逢星期日，我领着学生常到榆林城内了解民情，进行社会调查。记得有一次我与避难榆林的杨虎城领着刘志丹等人参观了城南的惠济地毯厂，厂里许多幼小的童工，他们悲惨的童年对大家刺激很大。

回校后，我和杨虎城等人商量，组织了“平民学校”，由刘志丹、王子宜、李力果等同学作小先生。平民学校办起来了，起初星期六晚上在工厂讲一点钟课，到放了暑假，便改在榆中，由刘志丹等主要负责。李子洲、呼震东听说办了平民学校，非常高兴，对王子宜、刘志丹说：要把平民学校办好，要坚持下去。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志丹》中王森然著《忆榆林中学和刘志丹》。

刘志丹为办好平民学校假期都不回家，深入榆林的手工作坊、商店、饭铺以及穷人家中，动员他们及孩子来平民学校读书识字，教材由榆中的老师李子洲、王懋然他们编写，刘志丹自己亲自登台授课。

还是王森然回忆——

有一次我得了重病，志丹听我想吃小米，找来小米、红枣，煮成小米粥，日夜守着我。后来我不得不回京就医。临行时全体师生出城相送，志丹拿出他珍藏的怀素千字文拓片送给我，我在拓片的边缘写了“1924年11月在陕北榆林中学任教，学生会主席刘景桂所赠”，我一直保存到今天。我临走时志丹和同学们都流泪了，我感到我们相处的日日夜夜、结下了无比深厚的情谊。

志丹与青年文学会的同学送王森然老师回京时走了很远很远，大家一直恋恋不舍，分手时，师生还合影留念。刘志丹含着热泪，朗诵了自己的一首七绝抒情言志。

红石峡急流直下，  
镇北台狂风高旋。  
看长城内外破碎，  
重收拾有待吾辈。

.....

刘志丹自被同学推举为榆中学生会主席后更忙了。他从学生的吃住到学习都亲自过问，于是各种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学生伙食管理会也问世了。他还办起了小型浴室由学生会安排学生按时间有次序地进行洗澡。但是有个叫杜自生的学生，仗着他是杜斗魁的侄子，藐视学生会的规定，硬要先洗，他的无理要求被学生会断然拒绝后，他撕毁了学生会的章程，还动手殴打学生会干事。

刘志丹哪里容得他在这里撒野。学生会的人先是推推搡搡，杜自生急了，挥拳一个“冲天炮”，照刘志丹面门打来。刘志丹早料到他有这一招，敏捷地闪身躲过，然后右手轻轻一推，杜自生立足不稳，踉跄了几步，一头扑在地上，好半天才呻吟着爬起来，悻悻然跌跌撞撞地去了。

杜自生吃了这个大亏，却咽不下这口恶气，就去求告杜斗魁。杜斗魁早就对刘志丹耿耿于怀，便借机向警察局告状，说刘志丹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警察局与杜斗魁沆瀣一气，便要拘捕刘志丹。

杜自生得意洋洋，学生会也没有垂头丧气。榆林中学的学生们现在有了学生会的组织，已不再是散沙一盘。团结就是力量，为了和杜斗魁斗争，学生们罢课了。

罢课是学生的有力武器。杜斗魁自知自己无力应付，便请来省里的督学，以为让他对学生训斥恫吓一番，学生就会乖乖上课了。哪里想到，学生们现在是无所顾忌的。督学一到，刚刚沉下脸来训话，同学们的石头和棍棒就已到了。督学被这些武器“督”着落荒而逃，撇下杜斗魁一个人在校园里歇斯底里地大叫：“快去报告井大人，学生

造反了。”他不喊还好，他这一喊，学生们更是心头火起。想起他们逼走魏野畴老师等种种恶行，同学们气得一拥而上，围住杜斗魁，你拉他推，眨眼之间，他的眼镜被打破了，直呻吟着叫：“救命！”由于学生们誓不复课，杜斗魁最后只能以开除杜自生而平息这次运动。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更大的考验向刘志丹和他的学生会走来。

陕北军阀井岳秀娶了许多女人，可是只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长得十分难看，又矮又瘪，左眼大右眼小，像烂桃子一样经常流眼泪，满脸的蚕屎点子，大嘴巴一咧，比哭还难看。虽然如此，井岳秀却视他为掌上明珠，给他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井文龙。可老百姓都叫他“独眼龙”。这井文龙也在榆林中学读书。这一天，因为一件小事，井文龙和他父亲的马弁一起，将三名同学打得遍体鳞伤。刘志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和学生会研究，组织罢课开除井文龙。于是，榆林中学的第二次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就这样展开了。有了上次罢课的胜利，这一次同学们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井岳秀哪能容忍宝贝儿子在自己的地盘上被开除。他是信奉枪杆子的，于是派了一连军队把榆林中学围得水泄不通，大门、后门、旁门都站上了枪上膛、刀出鞘的士兵。一时之间，学校的空气十分紧张。刘志丹指挥同学们要团结起来，誓死保卫学校。刘志丹知道，面对荷枪实弹的匪兵，赤手空拳的学生们实在无力抗衡。但是，榆林中学的学生大都是陕北二十三个县的有钱人家的子弟，也有各县县太爷们的子女。井岳秀不会无所忌憚。果然，井岳秀派兵包围学校的事，很快传开了，可把家长们急坏了。有的发信抗议井岳秀的暴行，有的找他质问。不多时，井岳秀派兵包围榆林中学的事，就轰动了全陕北。这件事在北京、西安等地也广泛地传开了，各地声援的信件也纷纷寄来了。这一下把井岳秀弄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原以为那些十八九岁的学生娃娃一见大兵就复课了，谁知道却惹来这么多的麻烦。镇压吧，怕引起全陕北乃至全陕西、全国的公愤！不下手吧，这口气又难以下咽，处境十分难堪。

井岳秀正举棋不定，刘志丹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觉得是让井岳秀就范的时候了。于是，刘志丹提出，只要井岳秀不再干涉榆林

中学校务，把军队和他的宝贝儿子一同带走，学生就可以复课。如何把这个条件通知井岳秀呢？刘志丹经过考虑，认定最合适的人选是杜斌丞校长。一则，杜校长同情学生，不会亏待学生们；二则学校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如能复课，也算杜校长从中斡旋有功，也好向井岳秀交代；三则井岳秀处境狼狈，有杜校长圆场，正好有个台阶下。杜校长带着学生的条件见到井岳秀，对他晓以利害，但话说得很委婉。他对井岳秀说，以井司令的地位，公子在榆林中学读书太委屈了，如果不转到西安或北京这样的大地方去上学，恐怕会耽误了这个可造之材，于井家的事业前程大大有碍。井岳秀听得这话，颇为受用，便假惺惺地感谢杜校长善于识才育人，同意让井文龙到外地去接受更好的教育。就这样，榆林中学的第二次大罢课，胜利地降下了帷幕。

刘志丹虽只是一个学生，却指挥同学们和反动势力斗智斗勇，令那些老奸巨猾的反动头子们疲于应付，屡战屡败。这些经历和经验为他日后坚定不移地举起枪来闹革命打下了实践基础。

### (3)

1925年3月，刘志丹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榆林支部书记。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

6月，上海“五卅”惨案消息传到陕北后，刘志丹立即参与组织榆林中学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在榆林城街头巷尾进行热烈的演讲，愤怒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罪行，开展抵制日货，援沪募捐活动。

7月，刘志丹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三原县参加全省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这是全省学生的一次规模空前的联合盛会，刘志丹认为可以在会上接触许多各地同学，学到不少经验，的确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榆林地处陕北边塞，距离关中平原上的三原县1600多里，需要跋涉多日，方可抵达。那么这笔路费从何而来？刘志丹又

是如何赴关中开会的呢？

同学王子宜关于刘志丹巧筹川资，赴三原开会有一段非常生动的记述：

——当时，我们都是穷学生，组织上也没有经费，怎么办呢？

我说：“还是大家凑凑吧。”

于是这个摸摸身上，那个掏掏口袋，凑了几块钱，但这怎够呢！有人说：

“要是赶上刚开学时就好了，如今谁的钱也不多。”

“干脆，把我这件棉袍当了。”

“我还有些书，可以卖掉。”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唯独志丹在一旁沉思。我看他不言语，推他一下说：

“哎，你看到底咋办？”

他笑了笑，跳起来，把炕桌上大家凑的那几块钱，用手帕一包，提在手中，然后笑道：

“算了，再卖东西也卖不了几个子，都不必再破财了。我自有办法。这些钱够用了！”说完出门走了。

我们一时摸不着头脑。那几块钱在家坐炕头吗，倒是够吃一阵子的了，可这是出门千里到三原呀，来回再加上开几天会，少不得用十几块钱！

下午，只见刘志丹牵着一头白嘴小灰毛驴，一步一晃地走进了学校。

他笑咪咪地对我们讲：“这回全靠它了。”说着拍了拍那个畜牲。

有人不解的问：“你牵个毛驴干啥？”

“你们只管放心，有了它，保管饿不着我，还能完成任务。”

听他说的那么肯定，大家将信将疑，又没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只好由他了。过几天，刘志丹就吆着小毛驴上路了。

原来，刘志丹想了个办法。当时陕西省交通很不方便，尤其是陕北地区，从关中、西安来往陕北的行客、商人，大多靠一双脚，稍有条件的，就雇上个“赶脚”的。只要牵上个驴、骡就可以赶脚，不少穷老百姓没有地种，便干上这一行，长年累月在外奔波，挣几个血汗钱养家。说他是血汗钱，是因为赶脚这个营生，每天天不明就得爬起来，伺候了驴子，也就该起身了，赶到天黑才能住店；赶不上店铺，还得露宿野外。风里来雨里去，春夏秋冬在外面跑，当时流传一首歌谣：七十二行，赶驴人最忙，一年穿破三年的衣，三年才见父母妻儿的面。我们那儿毛驴的价钱较便宜，几块钱便可买一头。志丹用全部的钱买了一头毛驴，和几个来往榆林、西安的商人讲好，给他们赶脚运货，人家给脚钱，而且途中管饭。志丹就这样到了西安，和商人结了帐，拿了脚钱，就把毛驴牵到集市上卖了。这里是平原大去处，毛驴的价钱比榆林地区高。这笔钱不仅可以解决在三原开会时的费用，连回来的川资也不成问题了。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志丹》中王子宜《和刘志丹相处的日子》。

历时半个多月，刘志丹终于风尘仆仆地抵达三原，到渭北中学去报到，他以陕北代表的名义为大会题词：

——共进！共进！

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

不惜牺牲！杀开血路！

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志丹纪念文集》。

会上刘志丹与魏野畴老师再度相逢，非常高兴，并向老师讲述了榆林中学的罢课情况。刘志丹在会上被与会代表选入大会审查委员会，

负责审查关于社内事务的议案。

共进社第二次代表大会会期 6 天，同时还召开陕西省学联代表大会。魏野畴在代表会上作了报告。刘志丹受大会邀请，在会上介绍陕北地区共进社的活动情况，特别是他们团结一心，闹学潮，驱逐军阀井岳秀的儿子出榆中的经过时，赢得了代表的热烈鼓掌。

会后，刘志丹又随魏野畴首次踏进古城西安，向西安的学生介绍了榆中学生的斗争经验。

不久，刘志丹回到榆中后，立即向学生们畅述了三原大会的详细情况，以及他在途中思考的如何在当地开展工作的许多设想。

谈话间，他从口袋里摸出钱，又从身后拉过一个小包，对我们说：这钱是临走时你们大家给我的，现在交还组织；这小包里的书刊是我买来给大家阅读的。接着，他把如何赶着毛驴赶脚去开会的事讲了一遍，大家听了都笑个不停。

不久，他们在城南沙滩上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声势浩大的“驱吴（新田）大会”。在会上刘志丹大声疾呼，要大家团结起来，和军阀作殊死的斗争。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影响很大，打开了局面，各项工作更有组织的开展起来了。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志丹》中王森然著《忆榆林中学和刘志丹》。

## 第二章 黄埔岁月

### (1)

1925 年 11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第 62 号通告，使用暗语通知各级党组织，多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前往军校投考。并强调：此事关系重大，各级各地勿忽视。引自《中华传奇》总第一

七七期刊登汪幸福著《蒋介石与林彪师生之战》第二章第7页。陕西省党组织根据中央的通知，在陕北地区物色了一批党团员，刘志丹就在其中。刘志丹从三原开会回来不久，就接到中共组织派他、霍世杰、杨国栋三人去黄埔军校学习的通知。他非常高兴，兴奋地对同乡王子宜、曹力如说：

与武装的军阀斗争，要懂得军事，要有自己的武装，广州是个有革命传统的地方，那里云集许多杰出的革命家，我们到黄埔一定会眼界大开，受益多多，我决定投笔从戎，一定要学好军事，将来建立自己的军队，与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

去万里远的广州，还需要一笔资金，刘志丹在一个凉风习习的秋日，匆匆踏上回家的旅程。他心急如火，三天三夜跋涉500多里风尘仆仆地返回保安。

为了能筹到去黄埔求学的经费，他先踏进了金佛坪大姐刘桂芬家。姐弟相见分外高兴，先叙了一会亲热话，然后刘志丹将他要去黄埔军校学习的事告诉了大姐，并说了自己现在缺少盘缠。

大姐爽快地说：“等你姐夫夜里回来，我告他一声，给你预备就是了。”

大姐刘桂芬手脚麻利地给刘志丹做了一顿稍子面。刘志丹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饭，一边与大姐聊啦着家里的一些烦心的事，有些忧心忡忡。

大姐让他暂时别将上黄埔的事告诉家人，免的爷爷牵挂，父亲埋怨。

刘志丹想想叹口气，只好点头同意。但心里总觉得有些内疚。

大姐非常理解弟弟的心理，又出主意说：“我明日打发人去楼子沟告诉景范，让他来，与你见见面。另外，你也去白沟走一趟，见见你二姐，让桂兰也帮衬你一点盘缠，你在外面也宽裕点。”

刘志丹一一应诺。

隔几天，志丹从二姐桂兰家回到金佛坪。景范闻讯后，忙赶来大姐家与刘志丹相见。

景范说：“爹一听你要远走广州，气得跺脚，大发脾气。后悔说原就不该让你去榆中，现在倒好又要去广州，又跟我要钱，趁早死了那份心吧！”

景范说罢，从腰里掏出几个自己的贴身钱，送给刘志丹路上零用。接着又解开背上的包袱，取出嫂子同桂荣打理的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双新鞋。刘景范从鞋窟里掏出一个红布小包，说嫂子从娘家借来一笔盘缠……刘志丹不禁心头一热。

第二天一早，刘志丹穿上妻子做的新鞋，赶上大姐家的毛驴，带着行李和沉甸甸的盘费不日返回榆中，与一块同行的人相会。

深秋的一天，刘志丹、霍世杰、杨国栋踏上远去黄埔的征途。榆中的许多同学都来送行，学校无形中停了课，大家送了好几里路远，告别时，榆林同学慷慨激昂地朗诵起刘志丹的《爱国歌》：

黄河两岸，  
长城内外，  
炎黄子孙再也不能等待。  
挽弓持戈，驰骋疆场。  
快！  
内除国贼，  
外抗强权，

救我中华万万岁！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志丹纪念文集》第 656 页。

刘志丹和霍世杰、杨国栋三人晓行夜宿，风尘仆仆地渡过混浊湍急的黄河，穿越山西、河北数千里行程终于抵达古老的北平。并迅速

地与北平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经过北方党管军委的人在主持入学考试后，刘志丹的国文、代数、理科成绩优秀，三人被告知已被录取了。他们怀揣介绍信已无暇游览北平的各处古迹名胜，一颗追求真理，渴望投身于如火如荼的革命大潮中的年轻的心早已飞到充满瘴气的南中国了。他们步履匆匆抵达天津，乘船出海沿水路缓缓南下，历时数月，绕道转了半个中国，终于安全到达广州，闻名全国的中山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创建于1924年2月，位于广州东南，珠江南侧的长洲岛，由于此岛又名黄埔岛，岛上的军官学校就被后人称为黄埔军校。刘志丹抵达广州参加了入学考试。当时军校对考生的学历要求为旧制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考试则按旧制中学文化程度出题，并加口试。以观察考生对三民主义了解的程度和性质，推断其志趣、常识、能力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刘志丹顺利通过，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入伍生。仅从学制来看，早期的黄埔军校并不正规。当时中国正规的陆军军官学校一般学制在两年以上，外加半年到九个月的入伍生教育。但是黄埔军校是以快速训练下级军官为主，迅速扩充壮大中的革命军急待这些新生力量早日担当起军队的骨干。为了适应大革命的需要，学校只好大幅缩短学时，浓缩教程，军校的前两期学生学制仅六个月。与前两期不同的是，黄埔军校从第三期开始实行入伍生制度，新生入伍先接受数月的新兵教育，期满经甄别考试，合格者才能升为正式军官生。

在半年入伍生教育的严酷训练中，刘志丹与同学一块被剃成光头，一边参加对广东军事重地繁重的卫戍警戒任务，一边学习军事基础知识、典范令与工员、军中卫生、劈刺、体操、夜间教育等，是入伍生的必学教范，同时还得摸爬滚打，实习射击，行军，各种兵器操作和营级战斗教练，为成为一名合格军人打基础。

军校的生活紧张而有序。入伍生们编成三个团，每个团分成若干个连队。学生们通常二、三十人住一个寝室，睡的是竹搭的床铺。每天天未大亮，晨雾缭绕的校园里就响起了嘹亮的起床号声。按规定，学生们从起床到集合只有3分钟，吃饭10分钟。对过去是平民百姓

的学生们来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穿衣、打绑腿、漱洗、吃饭，并非易事，时常出错、闹笑话。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大家很快进入状态。每天清晨即起，环岛跑步外加早操，上午、下午出操两小时，学科各一小时，即所谓的“三操两讲”，晚上8点半晚点名，9点熄灯，一切作息按部就班。

1926年2月，入伍生进行甄别考试。按照考试成绩，合格升学的学生被分入不同的科系，步科编成了步兵军官生团和预备军官生团两个团，后来也称为一团和二团。顾名思义，这两个团有点提高班和普通班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团的考试成绩好点，二团的就差点。刘志丹编入第四期步科第一团第二连，后改为炮兵科，霍世杰编入政治科大队第三队，杨国栋编入政治科第二大队，三人分开各自进行正规化学习。而且黄埔四期名将林彪、张灵甫都分到二团的三、二连学习。1926年3月8日，黄埔军校举行第四期开学典礼。校长蒋介石照例对新生进行训话。并讲了半个小时的“革命基础”问题，教导学员要崇尚三民主义。不久就见到了令人钦佩的周恩来。周恩来刚从法国留学归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待人热情和蔼，学识渊博，思想敏锐，常常给学员们讲课，每听他讲一次课，刘志丹都觉得如缕缕温煦的和风拂过心田，他的心儿像一只矫健的燕子飞得更高更远。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叶的广州民主空气浓郁，革命气氛强烈，特别是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之后，这里更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在黄埔军校深造的日子里，除了紧张的军事课、政治课、三操两讲打野战外，晚上还有名目繁多的大会小会，各种社会活动也比较多。从小在陕北山沟沟里长大的刘志丹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十分新鲜、刺激，时常被感奋的夜不能眠，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等著名的共产党人的讲演，令他眼界大开，增加了许多真知灼见。他也时常与唐澍、陈赓等人促膝交谈，评古论今，憧憬美好诱人的人生未来。在黄埔与时任政治教官，过去曾在榆中给刘志丹当过老师的王懋廷意外重逢，欣喜不已。

黄埔军校的宗旨是培养能带兵打仗的军事人才，所以军事教学一

直是学校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

那时，校长蒋介石对学校的军事教学看得很重，抓得也很紧。有时，他还亲自到教学、训练现场观看学生的军事训练。

蒋介石还亲自动手，将清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曾国藩、胡林翼的一些兵书中有关治军方面的精辟论述，补入蔡锷编的《治兵语录》中，起名《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并亲笔作序。他在《序》中讲道：“曾胡之言，都是从自己丰富的阅历中总结出来的。而且都是我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其意切，其言简，不仅是治兵的至宝，也是治国的人应当遵守的好准则。”并将此书人手一册，发给所有教官学员。

那时军校的军事教材比较多，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刘志丹均很珍惜，废寝忘食地攻读。他对蒋介石编的《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学得格外认真，许多内容都能背诵下来。而这部兵书对刘志丹的为人、个性及用兵方法影响都非常明显。

不久毛泽东在广州主编出刊的《政治周报》，像磁石吸铁一样，吸住了成千上万追求真理的心。刘志丹很快成了它的热心读者。他读了发表在《政治周报》上的许多文章，时常兴奋的夜不能寐，独自浴着南国的溶溶月色在操场上随意散步，深深思索。翌年春天，毛泽东担任了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接着又在广州举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及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刘志丹利用课余闲暇不时光临农讲所，并通过他人借阅毛泽东编写的一些讲义。使他逐渐明白，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的这一伟大命题。加之，他从小生长在陕北农村，对农村、农民的生活现状有比较丰富的感受，所以，在他尔后的革命生涯中，历尽危难，痴心不改，终于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后来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有一天，他读完《政治周报》上的一篇署名“子任”的文章，钦佩不已地说：“子任的文章写的非常好，和毛泽东的文章一样观点鲜明，生动精辟，富有战斗力和感召力，我非常喜欢读毛泽东和子任写

的文章。”唐澍等人都开心的“哈哈”大笑起来，说：“子任就是毛泽东的笔名啊……”

大家在谈论毛泽东的文章后，唐澍让刘志丹“赶快返校”，说毕就拉着刘志丹匆忙离去。

按军校规定，学生每个周末可以放假进城，学校安排渡轮，由值勤官统一带队离开黄埔岛，下午4点再在城里规定地点集合返校。

途中唐澍严肃地悄然告诉刘志丹：“岛上出事了。”

“中山舰事件”暴发，3月18日下午，蒋介石假意调中山舰赴黄埔备用，可是等中山舰驶入码头，蒋介石诬陷海军局长共产党员李云龙擅自行动，准备阴谋暴动。蒋下令扣留了李云龙，解除了中山舰上的所有武装，还调兵包围了共产党机关、街道和省港罢工委员会住地。所以党组织通知所有党员做好应付事件的精神准备。

刘志丹闻讯后，心急如焚，匆促向校园奔去。途中又遇大雨，雨中飞奔，冒雨赶回学校浑身水湿，也顾不上换衣服，又与同学守待一夜，第二天下操后，晕倒在操场，不醒人事。同学们发现他身上发烧，烫得吓人，就七手八脚将他送进平岗医院急救。经医生诊断他除了感冒，还患有急性痢疾，连续数日高烧、昏迷，奄奄一息，差点送掉性命。但他凭借坚强的意志，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救治下，终于战胜了病魔，不断走向康复。

躺在医院病床上，他还挂念陕北的同学、亲人。给榆林中学的王子宜写信，建议他毕业后返乡，进行桑梓教育，发展有觉悟的青年加入组织，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来临。他还依据自己平日的了解，拟一份名单供王子宜参考，还给弟弟刘景范去信，报告自己平安。

6月份，刘志丹就能下地随意走动。这时，有重要消息从军校传来，国民政府马上要誓师北伐，四期学生可能要提前毕业，参加北伐。刘志丹一听到这个消息，再也无法安心在医院养病，未等彻底痊愈，就急着告别了医院。

## (2)

1926年7月9日，刘志丹带病参加了在广州东校场举行的北伐誓师大会。誓师大会的当天，刘志丹与同学一大早就全副武装在黄埔登船，学校安排学生乘搭广州内河上特有的大花艇，这些大花艇每三艘一队由一艘小火轮拖曳，每艘大花艇只能搭乘一个排。黄埔的两千名师生装满了二十艘小火轮与六十艘大花艇，浩浩荡荡驶向广州的天字码头。

学生登岸以后在炎炎夏日下足足跑步十公里才满头大汗抵达东校场，刘志丹带病参加坚持到底，随东路军出发。东路军一路北伐势如破竹，军阀孙传芳部被打的望风而逃。刘志丹尽管身体尚未痊愈，体虚的经常满身冒汗，但他带着两个连队的士兵行军作战，沿途宣传，忙成一团，早已忘了病情。

刘志丹身处的东路军北伐进展神速，在沿途农民的大力支援下，不日进入江西境内的吉安，突然刘志丹接到让他速回广州黄埔接受新派遣的命令。

10月初，刘志丹在黄埔军校参加毕业典礼。

这时，冯玉祥已从苏联回国，成立国民革命联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向黄埔军校要干部。所以，刚刚毕业的刘志丹与唐澍、王尚德等十余人被派往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工作。

据史载：1934年10月12日蒋介石第一次到西安督战时，对刘志丹领导的陕甘地区迅速发展的革命态势，大为震惊。他问张学良，刘志丹是怎样一个人？

张学良回答：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

蒋介石很快回忆起来了。问道：“是不是第四期毕业后分配到西

北的那个？”

站在旁侧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说：“正是他，原名叫刘景桂，在黄埔时就参加了共产党。”

蒋介石听后说：“志丹，这个名字改得一听就是赤化分子，这也是我的学生，没有教育好啊！”刘志丹在黄埔军校时就才华出众，蒋介石很赏识他。刘志丹在北伐时被派往冯玉祥部从事宣传工作。当时发北上旅费时，一般人员发 300 元，惟有刘志丹，蒋介石给了他 700 元。这是蒋介石对他的特殊关照。引自 2007 年 2 月 27 日《作家文摘》第 5 版何夫著《蒋介石悬赏捉拿刘志丹》。

刘志丹与十余名同学从广州水陆兼用赶赴遥远的五原县，被分配到总部政治部任组织科长，直接受共产党员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的领导。不久，被派往第 4 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不久，总部派刘志丹去宁夏督促马鸿逵参战。临行时冯玉祥授予刘志丹少军特使。刘志丹受命后策马宁夏固原马鸿逵部的驻地，对骑墙观望，迟迟不肯发兵的马鸿逵晓以民族大义，纵论天下大势，打消了马的投机心理，决心跟冯玉祥北伐。马鸿逵通过与刘志丹的交锋、交谈，大为佩服，并邀请刘志丹对他的部队进行整顿改造。刘志丹欣然同意。

马部多为回民，实行的是封建家长制，一说打仗，从上到下，都伸手要钱。但由于回民尚武，骑兵较多，这支部队还有一定的战斗力。刘志丹到任后，耐心地向马鸿逵进行说服工作，指出：参加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革命的行动。征得马鸿逵的同意，刘志丹在军、师、团、营逐级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制定新的军容风纪，开展了新式练兵。有一次刘志丹对调戏民女的马鸿逵妻弟进行严厉查办，全军震恐。回民战士和下级军官大都出身穷苦，进行革命教育后，觉悟迅速提高。这支部队在解围西安，东出潼关，会师中原的策应北伐战争中，行动迅速，作战有功，这与刘志丹所做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分不开的。11 月西安之围被解后，冯玉祥在庆祝大会上嘉奖第四军作战有功，马鸿逵感慨地说：还是刘志丹治军有方啊！

1927年2月，西安解围后，陕西的共产党组织为了为党培养军事人才，在西安创办了一所“中山军事学校”，由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教务主任，刘志丹被聘为军事教官，渡过一段短暂的校园生活。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5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联军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按照和共产党与武汉革命政府商定的军事计划，出潼关，兵进中原，继续北伐。

豫陕正处在革命高潮中，被赶出陕境的吴佩孚余孽刘镇华部，还盘踞豫西山区作乱。刘志丹奉命作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的代表，去豫西收编刘镇华的军队。刘镇华阴险狡猾，不愿接受改编，但又怕得罪冯玉祥，尔后对己不利，便企图以重金收买刘志丹，要其在冯玉祥面前替他说好话。刘志丹立场坚定，严词怒斥刘镇华的阴谋，使其狼狈不堪，不得不答应接受改编。刘志丹并下令让他将部队立即调离豫西山区。刘镇华部被顺利改编，消除了第二集团军腹背受敌的威胁。

### (3)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背叛革命。6月下旬，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在其军队和地方进行“清党”，将一批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他借“集训”为名，下令将刘志丹、宣侠父、方仲如、刘贯一等几十名在该部队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扣押于开封管驿街三道胡同第二中学，逐个进行“审查”。冯玉祥威逼共产党员“必须宣誓脱离共党，听国民党之领导，守国民党之规则”，否则要“查明枪决”。刘志丹等毫不畏惧，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7月中旬，冯玉祥下令将这批党员押送出境，拟借湖北反动派之手杀害之。刘志丹等20余人

被分别押进两节货车，送出武胜关，丢在湖北孝子店车站。这些共产党员在沿途地方农协会的帮助下，机警地躲过了反动派的暗算，设法到武汉找中共组织。到武汉后，他们始知武汉政府亦已叛变，他们许多人均在通缉之列，遂又辗转通过关系找到了党组织。按照中共组织的指示，大部分同志被派往苏联，一部分前往南昌准备参加武装起义，刘志丹被组织安排到武汉军校和湖北省委工作。此间，刘志丹与武汉市委书记罗章龙多有联系，互相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及白色恐怖下如何开展党的工作等问题。1927年冬，刘志丹离开湖北时，罗章龙曾赠七律诗一首以壮行色。

极目九天烽火惊，  
川原四塞渭河横。  
七盘鸟道通天府，  
百万雄关壮帝京。  
紫气东临延策士，  
凿空西句启先行，  
而念四海纷争亟，

可有男儿意不平。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中第20页。

返回陕西后，刘志丹担任陕西省委交通员，往返于上海和豫陕间，进行联络工作。1928年初，刘志丹初次来到上海，由于不习惯南方潮湿的气候，身上汗水整天不干，总觉得衣服潮湿粘乎，不知间生了一身疥疮，痒痒难忍，被党组织安排住院。不久，疥疮好后，党组织派人告诉他：“魏野畴同志在安徽阜阳地区，策划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第十军起义，党中央决定派你到安徽阜阳，协助魏野畴做好第十军的起义工作。”

刘志丹一听，非常高兴地说：“魏野畴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

老师和引路人，我们师生又要重逢了。”

过了几天，刘志丹乘火车离开上海，向安徽阜阳匆匆奔去。

他沿途怀着与魏野畴老师再度重逢，并肩战斗的喜悦急奔阜阳地区。赶到阜阳后才得悉，魏野畴组织的阜阳起义，由于第十军代理军委书记宋树勋叛变，起义计划和党员名单都落在敌人手里。同时，阜阳地区党内也出现叛徒，地方县长得到告密者的情报，皖北党的力量面临一网打尽的危险。紧急关头，尽管许多起义工作尚未完善，但魏野畴毅然决定提前起义。最后起义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魏野畴不幸倒在血泊中。

刘志丹得知魏野畴不幸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不时地回想起榆林中学时与魏老师的亲密相处的情景，魏野畴的教诲言犹在耳：“古今中外，凡革命没有不流血者，我们为了推翻黑暗的社会制度，就得有抛头颅洒热血的准备……”

刘志丹噙着热泪坚定地说：“魏老师，你的血不会白流，你所献身的事业，我们一定会继续下去，直到胜利！”

刘志丹当即决定重返上海，向党中央报告阜阳地区起义失败的情况。他到上海后，党组织已经获悉这一消息，并决定让他返回陕西工作。刘志丹受命后又踏上了迢迢征途。

### 第三章 渭华起义

#### (1)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各地发动群众，举行农民暴动和武装起义，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9月2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的决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和《军事运动决议案》等九项决议案。在《军事运动决议案》中指出：“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地，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在《农民斗争决议案》中指出：“我们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

10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发出第五号通告，指出：“要在农村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在战斗中夺取枪弹，武装自己。”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渭华党组织为恢复农协，发动农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组织工作。11月中旬，省委派李子健来东路视察，在韩良寨（洛王庙）小学召开华县县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指示，部署在渭华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

1928年1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改组，潘自力任书记。新省委成立后，接连发出党内通告，部署武装起义，并具体划分了陕西各地的暴动区域。

3月18日中央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指出：“党的总的政策——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无疑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陕西党部目前的任务则是要发动工农群众的革命高潮”，“在党的领导之下，使城市工人的势力和乡村农民割据的势力及革命士兵的响应互相联合衔接，以造成一县或数县的割据局面”。

3月下旬，潘自力等人参加“六大”归来，带回了党中央批准的陕西省委关于在渭华等地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和中央给许权中旅党组织的指示信，并转许旅党组织讨论。

许权中旅是共产党1927年7月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党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的成员为骨干组建的一支革命武装。为保存这支武装，党利用军阀的矛盾，几经辗转，暂寄李虎臣部下，驻扎洛南三要司。为了使许旅配合渭华农民暴动，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底、

1928年初，先后派刘志丹、唐澍、廉益民、吴浩然、谢子长、刘中向、周益山、李大德等人到许旅任职，加强党的领导力量。

刘志丹根据省委指示许旅进行整顿，他清除了一些不可靠的分子，撤换了一批不称职的指挥员，将许多忠实可靠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派到连队中去做领导工作。接着又派人到临潼、渭南等地，动员了一些青年学生参军，给许旅增添了新鲜血液。同时在连队建立了党的组织，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参加了共产党，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为了扩大影响，刘志丹和许权中、高克林等人研究后，抽调一些连排干部，组成了工农工作队，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斗争洛南县有名的大地主阮化生，公审了大豪绅何豹子。在群众的要求下，枪毙了两个土豪劣绅，并将他们的粮食财产分给了群众。

刘志丹完成三要司整军工作后，打算赴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临走时顺口占七绝一首《赠许唐》：

二五进军驻渭华，  
插旗暴动起高塘。  
相劝许唐结同心，

牢记当初志太行。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志丹纪念文集》第658页。

1928年2月28日，渭南县地主豪绅代表人物刘铭初与教育界败类景行之、李兰轩、薛明璋、王武轩、田宝丰等率暴徒四五十人，闯进宣化高小打伤学生，赶走教员，砸毁门窗、桌凳，捣毁宣化高小。2月29日晨，渭南县进步师生和县高小、东关小学的部分师生二、三百人和当地农民四、五百人包围了宣化观与反动分子发生械斗，将刘铭初、薛明璋当场打死，田宝丰致伤，将王武轩扔入井中。当日渭南县长明带军警包围渭南中学，逮捕校长王文中，教员冀月亭。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二·二九”宣化事件，它成了渭华起义的导火索。

为了加强党对陕北地区暴动斗争的领导，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陕西

区特委特派委员会，由省委常委秘书长刘继曾任特委书记。4月1日，在华县高塘江村附近的药王洞召开陕东特委成立大会，讨论通过《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大纲指出“这个计划是准备暴动工作的计划”，“是要在最短时间完全实现的”，“是为创造主观条件，使许旅出山，帮助农民暴动的计划”。

省委听了刘志丹关于许旅整顿、训练的情况后，马上将组织“渭华起义”的计划定了下来。这时，渭南、华县的一些地方、农民已经开始暴动了。省委当即决定让刘志丹先去渭华掌握情况，熟悉环境，组织农民武装，为许权中旅起义做好准备工作。

刘志丹受命后，迅速赶赴华县的高塘塬，与陕东特委接上关系。这时，正好去许旅受训的30名农民自卫队成员荷枪实弹从三要司回到高塘塬，农民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后，纷纷要求“踏团”，就是专门踏地方民团，收缴反动民团的枪支。踏团行动，一般都在晚上进行。刘志丹的七言诗《风雨夜》就生动地记述了踏团行动的动人场景：

雨刷刷，风呼呼，

今晚要杀孙敬福。

为除人民祸根子，

割掉人民害心子。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志丹纪念文集》第660页。

孙敬福是高塘塬的民团团总，平日无恶不作，所以刘志丹率农民军第一夜就踏了孙敬福民团，收缴了枪支，分了孙家的财产，铲除了罪大恶极的孙敬福。

刘志丹看到广大农民的斗争情绪日益高涨，与陕东特委研究决定，以从许旅回来的30名农民军为骨干成立陕东赤卫队，由李大德任队长，薛自爽任副队长，冯养浩为党支部书记，下辖三个分队和一个大队，成员由40余人发展到100余人。

渭华塬上的群众在赤卫队的支持下，把地主几十年的陈粮都挖出

来了，把地主的契约、陈帐搜查出来一火焚尽。群众纷纷起来，斗地主，分财产，成立苏维埃。

农民的革命斗争方兴未艾时，敌人的一个团突然来镇压，刘志丹指挥陕东赤卫队进行阻击，敌人袭击未果败走。刘志丹和陕东特委的同志，亲赴秦岭中的塔山观察地形。塔山是秦岭中靠近南边的一个地势异常险要的山峰，位居渭南、华县、洛南三县的结合部，是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刘志丹兴奋地说：“塔山地形很好，陕东赤卫军就驻扎在这里，构筑工事，设立枪械修理所，储备粮食，形成一个军事据点和后勤补给基地。”

刘志丹估计敌人还会再来进犯，便和特委给省委发出急信，要求许权中旅尽快起义，到渭华地区配合农民的革命斗争。省委同意这一要求后，刘志丹于4月上旬，派特委书记刘继曾亲赴洛南向许旅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和特委的要求，希望许旅扩大武装力量，尽快起义。

## (2)

1928年4月底，冯玉祥出陕与直军刘镇华混战，令驻陕的宋哲元赴豫参战。宋哲元率部东出潼关，冯玉祥在陕的军事力量空虚，盘踞在洛南的李虎臣遂联络原国民二军各部发动反冯战争。李虎臣一方面派丁增华部于5月14日包围了西安，一方面集军开赴潼关阻击冯军回陕。许旅亦在调赴潼关作战之列，部队即在洛南县灵口一带集中。

军阀混战为渭华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陕东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抓住时机立即部署举行渭华起义，中共陕西省委在决定发动渭华地区农民起义的同时，即指示许旅不去潼关参加军阀混战，准备参加渭华起义。许旅党委在讨论执行省委的指示时发生意见分歧，多数领导成员同意省委的指示，主张拒绝执行李虎臣的命令，部队不去潼关，不但可以阻止冯军回陕，而且还可以扩大起义地区和军力，然后利用

军阀混战再到渭华参加农民暴动。会议决定，派共产党员雷天祥、许维善（尚志）率教导营一百八十多人，先赴渭华，配合农民起义。许权中、刘景桂、唐澍率许旅主力于5月7日由灵口经巡检司，越秦岭，出嵩岔峪，开往潼关。狡猾的李虎臣，在攻打潼关的战斗中，把许旅加在中间，企图一箭双雕，一方面让许旅替他“火中取栗”，削弱革命势力；一方面阻止冯玉祥主力回陕。5月5日，李虎臣部与冯军激战于潼关南五、六里之北山，冯军不断增援，许旅伤亡甚大，下午三时李部被击败，当晚，唐澍、刘景桂、高文敏等经过商议未告知旅长许权中和杨晓初，即率领一部撤出战斗，沿秦岭北麓急行向渭华地区进发；许、杨发现部队撤离潼关，亦率二十余骑卫队，追赶部队向渭华而来。翌日清晨部队陆续抵达华县瓜坡镇，许旅党委召开会议，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宣布起义，摘掉了国民党军队的帽徽，举起了革命的红旗。即日，部队到达高塘镇。5月18日，地方党组织在高塘镇会馆戏楼前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陕东赤卫队、各村赤卫队、农协会员及各界群众参加的万人军民联欢大会，热烈庆祝工农革命军的诞生。中共陕东特委、中共华县县委、工农革命军的负责人及其他有影响的革命人士在会上讲了话。刘景桂在讲话中通俗地说明了社会上贫富不均的原因，指出：“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要想不受穷，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接着唐澍讲话，他说：镰刀斧头，是咱们的武器，用它、靠它，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团结起来，在工农革命军的配合下，就一定能把革命搞成功。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把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和“西北工农革命军”字样的红旗授予起义部队，宣布“西北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大会结束时，公开处决了散布反动谣言，阻止群众参加大会的王竹寿、王甲寅、姚忠静三名恶差坏分子。会后举行了武装示威游行和庆祝联欢活动。

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刘景桂

秘书长：许维善

委员：刘景桂刘继曾唐澍

吴浩然廉益民王泰吉

许维善（其他委员待查）。

西北工农革命军序列

总司令：唐澍

政委：刘继曾

参谋长：王泰吉

军党委书记：吴浩然

政治部主任：廉益民

经委主任：杨晓初

军总顾问：许权中

司令部赤卫队队长：张汉泉

第一大队大队长：赵雅生

第二大队大队长：武培谋

第三大队大队长：谢浩如

第四大队大队长：雷天祥

骑兵分队队长：许权中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后，立即张贴布告，公布政纲，号召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自己当家做主，建立苏维埃政权。布告全文如下：

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

土豪劣绅和财东，剥削穷人真个凶。

加一放帐驴打滚，卖儿卖女还不清。

要帐手提桃桃子，打人不分老和幼。  
如今穷人要翻身，大家团结来求生。  
西北工农革命军，他是咱的子弟兵。  
大家同心一齐干，铲除土豪和财东。  
贪官污吏都打倒，我们要做主人翁。  
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上好光景。

西北工农革命军

军委主席：刘景桂

前敌总指挥：唐澍

政治委员：刘继曾

中华民国十七年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渭华起义》第66-68页。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后，军委、司令部驻扎高塘镇东南的高塘小学，第一大队驻涧峪口一带，第二大队驻司令部南寺城关村及其附近，第三大队驻高塘镇以北及魏家原一带，第四大队及骑兵分队驻箭峪口、崇凝一带。西北工农革命军在陕东赤卫队的配合下，一面主动到外线出击，袭击县城、截夺敌军辎重、破坏敌交通及通讯设施、消灭小股敌军；一方面积极协助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摧毁国民党地方反动统治，把渭华起义推向高潮。起义军民并肩战斗，遂形成了以华县的高塘、渭南县的塔山为中心，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东，南依秦岭北麓沿山，北临豫陕大道，约二百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渭南大地到处传唱着：

不爱银子不爱财，  
光爱工农苏维埃。  
不爱金子不爱钱，  
光爱人民新政权。

.....

渭华塬上开红花，  
刘景桂主席到我家，  
盘上腿儿炕里头坐，  
和咱拉起家常话。  
瓷壶里倒水哗啦啦，  
刘主席说出咱心里话。  
穷苦人拧成一股绳，

勒死土豪咱当家。引自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赵建文、孙水法编选《渭华起义故事歌谣集》第 99 页、第 125 页。

### (3)

渭华地处豫陕交通要道，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共产党领导革命军民在这里发动起义，使敌人大为惊恐。

1928 年 5 月中旬，冯玉祥取得潼关战役胜利，又巩固了西安城防，军阀混战局面暂告结束，冯玉祥在陕西的统治地位重新巩固。6 月，冯玉祥在渭南、华县调集了田金凯、魏凤楼、孙连仲三师兵力，纠合渭华一带的警察及地主民团，对起义中心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6 月 8 日，敌一旅兵力，以渭南县保安团为前队，由渭南县城出发，沿龙尾坡向南，妄图攻占我塔山军事据点，陕东赤卫队与敌激战于龙尾坡南段家村附近，工农革命军第三大队闻讯在谢子长率领下急往增援，两面夹攻，猛打猛冲，来犯之敌落花流水，丢下许多尸体，仓惶溃逃。6 月 10 日，田金凯骑兵师从华县经瓜坡、大明寺，直驱

高塘镇，妄图袭击西北工农革命军司令部。敌从高塘东面到北面成扇形态势，向工农军司令部步步进逼围攻。在敌军此次进攻之前，工农革命军第二大队被派往赤水公路沿线进行游击活动，第三大队受命袭击华县县城。由于革命军对敌情侦察不够，防范疏忽，致使东面之敌一直冲到司令部所在地高塘小学东北三里多远的骆驼渠顶时，才被老百姓发觉报告。在此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第五中队队长周益三急率所部及二大队留守人员向敌冲击，激烈的枪声、冲锋号声、喊杀之声传到司令部，唐澍总司令即指派张汉泉率司令部赤卫队出击，与敌激战于骆驼渠顶。战斗中，张汉泉臂部受伤，参谋长王泰吉指挥部队继续战斗，将敌压于骆驼渠下。此时，高克林、谢子长、武培谋等率领外出执行任务的第三、第二大队归来，从敌背后发起攻击，愚蠢的敌人以为又中埋伏，惊慌失措丢下许多箱迫击炮弹，逃回华县县城。

在粉碎敌人两次进攻之后，刘景桂在高塘小学内的两棵古槐下主持召开了西北工农军军委扩大会议，分析对比了当时的敌我力量，讨论了革命军向何处发展的战略等问题。会议认为：一、目前陕西军阀统治相对稳定，必然会相互勾结向起义军发动进攻，敌人的两次进攻虽被粉碎，但是工农革命军枪弹来源缺乏，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二、渭华地区是豫陕两省的咽喉，地处交通要道，又距中心城市西安较近，是敌必争之地，三、渭华以南的秦岭山区，群众生活极端困苦，工农革命军如向那里发展，吃粮问题很难解决，且李虎臣盘踞商洛决不容革命力量向那发展。如上情况表明，工农革命军若继续坚持在渭华一带与敌硬拼，势必遭受巨大损失，对革命将十分不利。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把部队撤往陕北，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因为陕北远离中心城市西安，军阀统治比较薄弱，更为重要的是1927年10月又暴发过清涧起义，党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并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会后，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即到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并派军委秘书长许维善，中共陕东特委委员李大章去渭北筹备经费，购买弹药，勘察行军路线，准备部队北移。为了反击敌人再次进攻，司令部把起义军民武装力量重新作了部署，以便更好地歼灭敌人。同时，司令部由高塘小学移驻涧峪口南堡村。

6月19日，敌人又发动新的“围剿”，宋哲元亲自督阵，敌三师兵力分东、西、中三路，步步为营，向工农革命军军事、政治中心高塘及塔山据点进攻，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民。

由于敌进攻兵力过大，工农革命军转移陕北的道路已被切断。军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决定同敌人死拼硬打，准备将部队撤进南山，以保存革命力量。司令部也由涧峪口南堡村移到牛峪口龙山底村。

19日拂晓，东路敌人以田金凯的一师兵力，由逃亡地主孔宪文、薛宝官及民团作向导，从华县出发，经瓜坡镇、金惠原、金堆峪口向桥峪口进攻，企图切断西北工农革命军的退路并从南面形成包围。天刚亮，敌人即从东原冲了下来，在桥峪口，遭到工农军马子敬所部和丰原里十八村苏维埃赤卫队的英勇阻击。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起义军民被迫后退到桥峪口外的蕴空山。蕴空山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起义军凭借有利地形坚持战斗，直到主力部队撤退南山，才主动放弃这一阵地。

西路敌人一个师，由地主史明鉴、薛良臣作伴，从渭南县城出发，经崇凝镇直扑塔山。工农革命军第四大队骑兵分队和陕东赤卫队一部，在许权中、雷天祥、李大德的指挥下，与数十倍之敌展开激烈战斗。敌人疯狂地用迫击炮轰击塔山前沿阵地，由于起义军没有重型武器掩护，指挥部前沿阵地被敌捣平，所有营房、工事全被敌摧毁，起义军被迫撤退箭峪口。在箭峪口又与敌激战一夜，给敌以重大杀伤。在战斗中，陕东赤卫队第一中队长徐汉儒英勇牺牲。

中路的一师敌兵，由宋哲元亲自督阵指挥，恶霸地主李金戊、王佐、王振乾、牛振龙引路，分两路从赤水的东西两川向高塘、魏家原一带的起义军发动进攻。东川来的敌人在重炮掩护下轮番猛攻骆驼渠坡上起义军前沿阵地，军委主席刘景桂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三大队、第二大队一部顽强阻击，激战一天，形成敌人冲不上来，起义军也不能迫使敌军后撤的对峙局面。从西川进犯之敌，企图占领魏家原，进而夺取箭峪口，切断工农革命军司令部与塔山据点的联络，分而治之。

魏家原在高塘的西北面，素有“高塘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工农革命军二大队的一个中队和陕东赤卫队一部在唐澍总司令和薛自爽的指挥下，在这里修筑了工事，敌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的多次冲锋，都被起义军击退。后来，敌军一个营，换上便衣，从魏家原西侧向起义军侧后迂回。薛自爽带领数百武装农民包抄敌后，才使战局转危为安。中午，敌人由地主王振乾引路从侧面向起义军阵地围攻，发动新的冲锋，被起义军挫败。薛自爽带领陕东赤卫队、农民武装从侧后袭击敌人，打乱了敌人的阵角……敌我双方对峙激战一天，敌死亡甚众，魏家原阵地成为敌军不可逾越的屏障。

工农起义军给予敌人重大杀伤，胜利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傍晚，军委命令，西北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各部向涧峪口、牛峪口、箭峪口一带集结，准备退往洛南县两岔河。于是，以高塘、塔山为中心的起义区域全为敌军占领，当晚，工农起义军司令部命令第二大队六中队夜袭高塘敌军司令部，第五中队袭击占领魏家原的敌军，第三大队作为策应。由于敌人兵力强大，工农起义军无法歼灭负隅顽抗的敌军，这次袭击未取得大的战果。

6月20日，敌军又向涧峪口、牛峪口、箭峪口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各部发动进攻，战斗残酷而激烈，西线尤甚。许权中、雷天祥、李大德指挥所属部队，反复冲杀，打退了敌人在大炮掩护下的一个团的多次冲锋，给了敌人很大杀伤。敌人不断增援，许权中等仍坚持战斗，机动灵活地驰骋在箭峪口一带，和强大的敌人往返周旋。由于他们牵制了大量的敌军兵力，从而减少了敌军对起义军司令部的压力。在这次战斗中，西北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在牛峪口壮烈牺牲；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在箭峪口英勇捐躯。下午五时左右，工农革命军总司令部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许权中、杨晓初在周益山中队的掩护下率部撤出阵地，摆脱敌人，退至蓝田许家庙一带，雷天祥率第四大队由箭峪口当晚退至洛南县青岗坪，其余大部在刘景桂、唐澍等率领下越牛峪口由东、西涧峪口退入秦岭深山，于6月22日相继退到洛南县两岔河。

西北工农革命军和地方武装力量撤退到洛南两岔河时，还有三、四百人，当天，司令部即派第一大队大队长赵雅生率领该大队及第二大队之一部分约一百五、六十人进驻保安镇。因为在高塘的三次战斗中，赵雅生的一大队驻在涧峪口一带，与敌正面接触较少，部队伤亡小，部队建制比较完整，且战斗力较强。因此，司令部派赵雅生部进驻保安，与司令部形成犄角之势，一有敌情，以便相互策应，相互支援。另外保安两山夹道，是洛南通往两岔河（洛原）、蓝田一带咽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兵家必争之地，群众基础较好。守住了保安，就可为各部的休整、整编创造条件，赢得时间。赵雅生部进驻保安后，住在街中仓房和福音堂等处，在保安街周围张贴了“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杀了平日祸害百姓、为非作歹的吕长安，仓库的粮食除留一部分作军需外，其余全分给穷苦农民。同时，还给群众分了土豪杨太治、叶升律的粮食和财物。赵雅生率领战士们抓紧学习、训练、构筑工事，防敌来犯。

7月1日，趁起义军立足未稳，由地头蛇——陈彦策（反动武装民团团团长、红枪会头子）、王庆侗（伪保安镇镇长、红枪会头子）带领的民团为敌带路，敌李虎臣所部方少海、丁增华、赤亚武、牛××、何经纬共五旅之众，由洛南县向工农革命军进攻，分别从保安街东面、焦沟、辋峪、蒿坪东岭四面集中，将在保安的赵雅生部重重包围，赵雅生一面派人向司令部告急（但因侦察失误，错将敌七、八百人报为一百余人），一面命令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利用街道建筑和简易工事与敌激战，组织部队突围，但未成功。面对恶狼般的敌人，战士们英勇顽强，奋勇抗击。在工农革命军阵地前，敌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但更多的敌人如潮水般涌来，在强敌的轮番进攻下，革命军伤亡惨重。

司令部接到赵雅生被围的消息，唐澍司令遂带领第二大队、郑殿华六中队和第三大队一部分约百人急行军直奔保安增援解围。下午四、五点钟，到达保安镇西，战情紧急，不容多思，唐澍立即命令郑殿华中队迅速抢占保安镇北山头，掩护部队突围、撤退。郑殿华即刻带领该中队二十六名战士（因多次与敌战斗，部队伤亡很大，每个中队只

剩二、三十人左右）一鼓作气占领了镇北山头。此山当道，后有两条峪，一通桥峪，一通石头峪，为要冲之地，守住此山，方有退路。郑殿华占领此山后，敌即分兵一旅向其攻击，郑殿华一面指挥战士，居高临下与敌激战，坚守此山；一面焦急地等待着唐澍和赵雅生的消息，收容我军冲出来的战士。天黑后，又有一名战士来到郑殿华中队阵地，报告说：唐司令和赵雅生在雷家院与敌激战，壮烈牺牲，部队已被打散。听到这一消息，战士们悲痛万分。郑殿华遂带领该中队和收容的战士向石头峪退去，后见司令部派来的通讯员，即带队归队。

唐澍命郑殿华中队占领保安镇北山头后，指挥战士们杀开一条血路，在保安西河坝与赵雅生合兵一处，与敌激战数小时后，从敌兵力较弱的南面，冲出敌围，西折向革命军司令部两岔河方向边打边撤。天黑时撤到雷家院，敌发现我军意图后，令一旅在雷家院以西布防，截断起义军退路，并防起义军司令部援兵，另外三旅在雷家院将唐澍、赵雅生部团团包围。利用这一战斗空隙，唐澍和赵雅生一面令战士作好突围的准备，一面商议部队的行动。突然枪声骤起，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

趁着茫茫夜色，唐澍一声令下，和赵雅生带领战士们用手榴弹，排子枪杀开一条血路，向雷家院西北方向的碾子沟突围。敌人的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弹雨密集，在碾子沟口起义军十七、八名战士壮烈牺牲了。唐澍、赵雅生终于冲出了包围圈，这时他们只剩十余人，而且都挂了花。唐澍带许天洁、关凤林等从碾子沟底向后退去，赵雅生带数人上了金弹山（碾子沟东西两边山梁，西边的叫长虫岭，东边的叫金弹山）向后退去。枪声暂时平息了，但狡猾的敌人调集兵力以更大的包围圈，四面包围了此山，并一步一步紧缩包围圈。第二天拂晓，唐澍和赵雅生带人在“河南沟曹家洼”（碾子沟内地名）会了面。赵雅生由于伤重，流血过多牺牲在一棵柿树旁的土坎下的小水沟里，一名战士走失、一名战士负重伤不便行动，唐澍令人把他藏起来。这时，天已渐渐放亮，四面不断传来枪声和敌人的野兽般的吆喝声，唐澍带领战士们向西北方向冲去，然而，四面山上都出现了敌人，密集的子

弹像雨点般射来，唐澍和战友们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身负重伤，弹尽援绝，壮烈牺牲。这次战斗，工农革命军指战员，除少数趁天黑突围出去外，大部分都壮烈牺牲，仅雷家院、北湾、碾子沟就牺牲三十余人；陕东赤卫队大队长李大德负伤被俘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惨无人道的敌人和地主还乡团占领渭华暴动区后进行血腥屠杀，许多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及其亲属遭到杀戮，他们将薛自爽的尸体砍成肉块抛洒荒野，将唐澍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城门上……

秦皇逞凶强，百姓横遭殃。

老蒋欲称王，杀戮北伐将。

旗上烈士血，遗志岂能忘。

他日传捷报，祖国浴朝阳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志丹纪念文集》。

刘志丹在离开高唐时含泪高歌，直抒胸臆。

保安战斗结束后，去省委汇报工作的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军政委刘继曾回到两岔河，传达了省委的指示。随后和刘景桂等率部与许权中、杨晓初所部在蓝田县张家坪会合集中。7月，根据省委的指示，在张家坪由刘景桂、刘继曾主持召开了军委会议，许权中、赵葆华、杨晓初、谢浩如、雷天祥等参加了会议。刘志丹在总结失败原因时指出了以下几点：（1）光杆斗争；（2）军事冒险；（3）脱离群众；（4）烧杀政策。严肃指出这次起义中政策上的一些“左”的错误。会议决定：一、将红旗暂时收起来，不开展苏维埃运动；二、西北工农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身份公开的，转移各地进行地下工作；身份未公开的，仍留部队坚持斗争；三、部队由许权中指挥，并设法保存这支革命武装。接着，又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共二百余人），宣布军队由许权中指挥。会后，刘景桂、谢浩如等即离开军队，赴省委汇报工作，一部分人离开部队分散活动，部队由许权中率领，离陕赴河南确山地区，途中在邓县失利，全军覆没。

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暴发的一次农民运动和军队配合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它打击了国民党在陕西的反动势力，扩大和加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为志丹、子长等后来在陕甘、陕北领导武装斗争，创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 第四章 三色兵运

### (1)

震撼全国的渭华起义在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下终于失败了。刘志丹在白色恐怖中装扮成商人潜回西安，向省委详尽汇报了渭华起义失败的情况。省委根据“六大”精神，结合陕西省情，对以后的工作重新进行部署，派遣一批干部到军队中进行秘密工作，静待时机成熟，组织兵变，创建革命武装。刘志丹和谢子长被派回陕北从事军事活动，刘志丹被任命为陕北特委的军委书记，谢子长为军事委员。

刘志丹衔命北返时，消息外泄，西安城有大批军警进行严密布控盘查，大街小巷四处张贴着通缉令：“……活捉赤匪头子刘景桂，赏大洋五千元；打死赤匪头子刘景桂，赏大洋三千元……”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张俊彪著《血与火》。

刘志丹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乔妆打扮成去乡下富绅家看病的名医，巧妙骗过守城的兵丁，匆匆踏上还乡的征程。

炎炎夏日，刘志丹避开大道，穿行在弯弯山路上，不进城不住店，绕过耀县，避开潼关，穿过宜君梁直抵陕北地界。

途中在洛川县城的一家小饭店吃饭时与黄埔军校技工、国民党党

员叛徒张仲吕相遇，张仲吕与刘志丹打了个照面就急急去找人捉刘志丹。在处境危急时公安局长马锡五巧妙地将刘志丹接走。二人骑马狂奔，终于脱离危险。

刘志丹经富县，到甘泉，沿着洛河川一路向保安县急行。在烈日暴晒中来到甘泉下寺湾，身上的疥疮复发，疼痛难当，辛苦不堪。在下寺湾的同学张二家与曹力如巧遇，他乡遇故知，二人自是欢喜难当，彻夜长谈。

七月流火，酷热不堪。刘、曹二人徒步 80 余里，于日落西山，暮霭四合才抵达保安县驻地永宁山。

望着暮色中身姿峭拔的永宁山，刘志丹眼睛潮湿，心头激荡，嗓音低沉地说：“一别八年，时间过得真快啊！”

王子宜在《和刘志丹同志相处的日子里》回忆：

1928 年的一天，在永宁山我住的窑洞里，刚开完党小组碰头会，我就着微弱的灯光，打开炕席想把文件藏起来，只听一阵狗叫声，紧接着就有人小声敲门。

“崇义，开门。”

声音这样熟悉，是谁呢？我来不及细想，赤着脚跳下炕，打开了门。只见曹力如一步迈进来，我大吃一惊。他是在我之前从榆中毕业，去北京杨虎城国民二军办的无线电学校学习的。我一把拉住他说：

“你咋回来了？外边情况怎样？就你一个人回来？”

力如神秘地笑了笑说：“你别急，你看后边是谁？”

话音未落，一个身穿大褂的汉子一步迈了进来，将我肩膀一拍，哈哈大笑。嘿！正是日夜想念的刘志丹！我惊喜得一时说不出话，只是上下打量着他。他头戴一顶旧礼帽，身穿一件半旧的阴丹士林蓝大褂，清瘦的脸庞，看不出有什么倒过霉的地方……

我激动地说道：“做梦都没想到，你俩一起回来了，真是太好了。

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曹力如脱下鞋，一边往外倒沙土，一边说：“娃儿没娘，说来话长。我从无线电学校出来，听说魏野畴老师在陕西杨虎城部队当政治部主任，也赶到那里，经魏老师介绍，在杨虎城的第一师当政治部主任处长。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协助魏老师搞‘军运’。后来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部队开到安徽，我们搞了个‘皖北兵暴’，不幸失败了，魏野畴老师也牺牲了。”

我们听到这里都十分悲愤。志丹走向水缸，从缸里边舀了一勺水，一口气喝光。然后说道：

“蒋介石、国民党这笔帐一定要清算，咱们饶不了他们！”

大家又扯了一气，我才知道：志丹和力如并不是一起回来的，他俩事先谁也不知道对方的消息，只是走到下寺湾，住在一个店里才碰上的。真是太巧了。大家笑了一阵。力如说：

“我要进城去咧，景桂你走不走？”

志丹说：“你先走吧，我要在子宜这搭住几天，咋样？子宜，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我忙说：“那太好了，只管住下吧。我现在已经‘官拜’本县教育局的督学员了，没问题！”

“是啊，我听说你们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很不错，你们这些‘共党分子’都成了国民党县党部的‘要员’，连县政府开庭议事，你们不到场都不行。”他说着笑起来。

我告诉他们：“现在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是曹继之。”

力如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知道他现在咋样？”

志丹说：“在西安时，省委同志曾介绍过，说他是杜衡在西安发展入党后派回来的。”

我说：“是啊，他从西安带回组织关系，分在我们党小组。因为

他同时还带有国民党党证和省党部的介绍信，所以一回来就担任了县教育局和县党部书记，还把几个也带了进去，现在国民党的县党部基本上被我们掌握了。”（曹继之后来在革命艰苦时期叛变，让我们除掉了。）

力如听了非常高兴，说：“好呀，看来老家的条件还不错，咱们可以大干一场了。不过现在我要先回家一趟。”

力如走后，我关上门，随手又把烟筐箩端过来。志丹脱下大褂扔在一边，盘腿坐在炕上，又将那顶旧礼帽扔在桌子上说：“我从西安来，那帮狗日的一路上盯得真紧！”说着拿起烟袋，满满地按了一锅烟叶，就在灯上吸着，过了一会，说：“你知道，大革命失败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长沙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啊……”

“我到渭南、华县一带，和唐澍搞了个‘渭华暴动’，但失败了，牺牲了不少同志……”

他伸手接住我递过去的馍馍，从炕头上的泡菜缸里捞了一块酸菜，又喝了两碗剩小米稀饭，然后下了炕，走动起来。这时已近五更，添了几次的灯油又快熬干了，我们索兴吹熄灯，并肩躺在炕上谈起来。

志丹问：“县里，你们的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怎样？”

我向他汇报说：“去年在你的指示和组织的安排下，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又组织了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后来这些群众组织都垮掉了，但党团组织都保存完好。去年我到延安开会，特委派了一些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学生，让我带回来加强组织，安插在各区学校任教员，所以组织发展很快，现在咱县党团员除了赵耀先等人，又发展了几十人，如：王国桢、王其昌、王庭光、周玉杰、赵光前、曹世英、康从周、胡彦年、曹成业等，这你都是认识的。现在不但整个教育系统都为我们所掌握，就连公安局、税务局、民团里边都安插了我们的人，但是上级没有进一步的指示，我们只是窝着，没有什么活动。”

志丹听了十分兴奋，说：“这次大革命失败，除了蒋介石、汪精

卫背信弃义，还有我们党内有些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不让搞武装，对国民党一味退让，眼睁睁看着国民党反动派拿屠刀来割我们的头……看来，今后还是那句话：要搞武装，以革命的武装战胜反革命的武装。”

我问他：“现今你准备怎样干呢？”

他沉思了一下然后说：“还是要搞军队，只有枪在咱们手中才能有保障。这次省委派我担任陕北军委书记。省委书记潘自力曾对我讲过：陕北党如今几乎没有什么武装斗争。省委批示要整顿陕北党组织，开展军运，搞武装割据！”

“这武装割据，怎么个搞法呢？”

“你听说过秋收暴动吗？”他给我讲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

我感慨地说：“革命武装就要有个落脚地啊！”

“我们太年轻了，经验少啊！”他给我讲了渭华暴动的经过和教训，又说：不要紧，跌倒了再干，向井冈山学习。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恰如干柴遍地，一遇火种，就会烧塌天的！我们就要做火种，依靠人民群众，拉起武装，建立根据地，革命一定会蓬勃发展起来。

我们越谈越兴奋，不觉天已大亮。我起身把自己这半边老棉被推给志丹说：

“你路上辛苦了，又一夜没睡，快好好睡一觉。我出去安顿一下，回来咱再接着谈。”

志丹伸了腰说：“先不要让人们知道我回来了。”

我答应着出了门，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志丹在我的窑里住了三天三夜，给我讲了他出去这几年的经历和学习情况，尤其是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领会。他在黑暗中给我描绘了

一幅幅工农当家做主的壮丽图画。我向他提了许多问题，有些是具体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比较简单；也有当时革命斗争中的一些问题，比如中国革命为什么没有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依靠城市暴动而取得胜利……志丹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结合马列主义理论以及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给我详细的作了解答，并结合现实斗争的事例，使我懂得了不少事情。

第四天早起，志丹说：“我该回家了。”吃了饭，志丹正准备走，他的弟弟刘景范赶着毛驴来到了永宁山。原来他也是因为近来谣言多，心中不安，到县城打探消息，正巧碰上曹力如，告诉他志丹在永宁山我这儿，他就赶来接了。于是，他们兄弟俩一同下山回芦子沟去了。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刘志丹》第 240-246 页。

刘志丹自从 1925 年离开陕北，整整 4 年没有音讯，虽说刘志丹在黄埔军校曾寄过几封家书，但从去年 4 月以后，就再没有了音信，关于他在渭华起义的事也不时有风声传来，但都是一些不幸的消息，让家人心神不安，日日担忧。现在，刘志丹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家里，家人自然欢喜无限，合家老小一片唏嘘。大家四散忙碌起来，杀鸡、宰羊、推白面、做豆腐，准备好好地给刘志丹补补身子。刘志丹在家里休养了一个多月时间，期间，长工张万银在山上采了许多草药，用土偏方将刘志丹身上的疥疮治好。休养期间他还专门给陕北特委书记杨国栋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他回来后的情况，并对党在陕北的工作谈了一些意见，最后要求特委给他指示工作。

一月很快过去了，刘志丹就近在保安县各区开始了解情况。

王子宜回忆——

志丹走后，按照我们事先商量好的，我到教育局找到曹继之，告诉他刘景桂回来了，请他给安排作教育局的督学员，以便利用合法身份，借巡视教学为名在全县各处走动，进行工作。曹继之一口赞成，拉我跟他一起去见县长。

县长叫崔焕久，是国民党员，曾在榆林中学任过教，说来还是我

们的老师，是个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平时很能和我们说得上话，只是有些胆小、怕事。他听说刘志丹回来了，很高兴，把水烟袋一放，忙说：

“啊，刘景桂回来了？”

我说：“他回家了，让我们代他问候老师。”

崔县长听了，面露喜色，曹继之又把刘志丹夸了一番，说他如何有文才，这些年在外面又历练了不少武略，实在是少得之人才。崔县长不住地点头。曹继之趁机叫苦，说教育局摊子大，人才不济，流露出要请县长任用刘志丹到教育局的意思。

崔县长沉思着说：“景桂是个有抱负的青年，当有作为，如今咱们县上……”

我一看不好，崔焕久有意把志丹留在他身边，便连忙截住他的话头说：“教育是革命之本，如今咱们县上各区学校大多不成样子，万事莫若开头难。老师若是不反对，可否先让景桂到教育局任个督学，帮我们一把，待各区学校工作纳入正轨，再奉迎老师另任高职。”

曹继之也跟着说：“我已问过他本人，他说无不可。”

崔县长又抱起烟袋吸着，停了一会才说：“等他来时，我问问看，他愿意去教育局，我岂能从中作梗？”

后来志丹去见崔县长，没有多久他就担任了教育局督学员，紧接着他要曹力如到县高小任校长，并调整了本县各区的小学校长，成立了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支部设在永宁山，志丹兼任书记，曹力如任组织委员，我是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党的工作进一步开展了。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刘志丹》第 240-246 页。

时序匆匆，夏秋渐去，眨眼已是 11 月份，陕北进入初冬日子，刘志丹久久等不到特委的回信，心里十分着急，便决定到榆林去找特委，研究开展武装斗争的事。

陕北党团特委由中共陕西省委于1928年2月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领导陕北各县的工作。4月，陕北第一次党团代表大会在绥德西川（今子洲县）苗家坪南风寨古庙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杜衡、焦维炽、杨国栋、冯文江、李文芳、张蜀卿、师应三、苗仰实等十多人。会议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关于搞武装斗争的精神，通过了陕北政治形势与当前工作任务等决议，正式成立陕北党团特委。中共特委书记杜衡，团特委书记焦维炽。特委下辖榆林、神木、府谷、米脂、绥德、清涧、延安、延长等8个县委，安定（今子长）、保安（今志丹）、镇川3个直属区委，三边（定边、安边、靖边）3个直属支部，共有党团员800余人。特委的成立，使陕北党团组织归于统一，加强了党的领导。到8月，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080人。

1928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五日），陕北特委在米脂召开第二次党团代表大会被敌人发现。井岳秀从绥德调兵包围了县城，杜衡、焦维炽、贾拓夫、李文芳等四人被逮捕，会议被迫中止。史称米脂“中秋节事件”。贾、李两人被捕后因无证据，关押半月具保获释。杜、焦两人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于年底释放。杜衡出狱后即去了西安，特委书记由杨国栋代理。杨代理特委书记后，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连门也不敢出，终日消极等待，不敢领导群众进行斗争，更谈不上搞武装斗争。他钻头觅缝地和白军上层军官拉关系，寻找“保护伞”，以便到时候有个庇护处。听说刘志丹回陕北要搞武装斗争，更怕得要命。因此，他想方设法阻止刘志丹开展工作。先是想让刘在绥德或者榆林开个杂货铺子，暂时躲藏起来。后来又想让刘志丹到榆林中学当个教员，平时上街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就行了。是年，当刘志丹真的到榆林找上门来的时候，杨国栋一方面表现得有点手忙脚乱，一方面以他特委书记的身份训斥刘志丹搞武装斗争是“冒险”、“盲动”、“胡闹”、“找死”。当刘志丹向特委同志介绍中央“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成功、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时，杨国栋阴沉着脸反驳道：“井冈山斗争，那是南方的经验，在陕北乃至西北地区不适合，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当时，绝大多数特委委员对杨国栋的保守、右倾表示极大的不满，纷纷起来跟他作斗争。原特委委员冯文江回忆：“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不遵守纪律，生活腐化，行动不谨慎，做事武断……杨是一个‘凶徒’。一次机关内开会之前，他和同志为一句闲话，一脚把桌子踢翻。在清涧折家坪时，为一句话拿起火炉盖打同志。更严重的是组织观念淡薄，打击刘志丹，经常给刘志丹戴‘帽子’。”

1928年11月，刘志丹抵榆林后，第二日陕北特委召开会议，特委委员贾拓夫、刘澜涛、马文瑞、李力果、冯文江、马云泽、谢子长等出席了会议，刘志丹与大家相见分外亲切。此次会议就陕北特委在陕北地区如何开展武装斗争问题，特委书记与刘志丹发生严重分歧，杨国栋公开反对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刘志丹等人与杨国栋进行争执，由于刘志丹、谢子长的意见在委员中占了上分，特委书记搁挑子不愿再干，中途负气退会。杨国栋离去后，其余特委委员继续开会，并决定按照中央精神和省委决议办事，要抓枪杆子，进行武装斗争。并决定将杨国栋的情况报告省委，请求省委的决定。

## (2)

1929年2月，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今子洲县）张家岔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确定党在目前的工作任务是：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白军中去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

刘志丹由于受到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的排挤并设置障碍，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一直留在保安搞调查研究和农运工作。

4月，刘志丹赴榆林参加陕北特委在榆林召开的红石峡扩大会议。

红石峡会议的参加者胡颖民说：

1929年春，陕北特委杨国栋、白明善、刘澜涛、李力果等先后转移到榆林后，于农历三、四月间在榆林城北雄山寺（红石峡）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杨国栋、贾拓夫、白明善、李力果、刘澜涛、冯文江、乔乃文、常立德、刘秉钧、韩俊杰、胡颖民等20余人。会议内容主要是批判杨国栋右倾错误，对杨国栋的作风问题也进行了激烈批评，指出他家长式领导，大小事都是个人说了算；特别是米脂期间搞了所谓“凤仪亭”丑剧，给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由于会议和杨国栋错误斗争，一开始公推白明善主持会议。会议最后撤了杨国栋特委代理书记职务，派其到后九天搞军运工作，同时派白明善任府谷县委书记，后由志丹担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志丹》中胡颖民著《红石峡会议前后》第300页。

会议还着重讨论研究了武装斗争的问题。刘志丹与特委委员们一道对陕甘宁三省的武装力量进行分析归纳。

他将陕甘宁三省的武装力量大体上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国民党的正规军，他们反革命的立场最坚决，上边的军官一般都亲蒋，下边的士兵一般都反蒋。这一类国民党的正规军，目前在陕、甘、宁三省占主要力量，但大部分驻扎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上；第二类是许多小军阀的军队，他们反革命的立场也很坚决，但和蒋介石同床异梦，各霸一方，互相之间明争暗斗，争夺势力范围，矛盾很大。他们主要分布在陕、甘、宁三省的边界地区的一些中小城市里；第三类是各县的地主民团武装，他们数量不大，是地主阶级欺压、剥削人民的帮凶和爪牙。他们都驻扎在地主的庄院或山寨上；第四类是土匪武装，他们主要是被地主老财欺压、剥削的无法生活下的穷苦农民，利用山高地险这一有利因素拉杆子，占山为王当了土匪，平时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虽也有残害老百姓的，但大多数还是穷苦人，只有少数兵痞和坏人混在其中。

刘志丹认为，搞武装斗争有三种形式，可以有白色——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兵运工作；可以有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

的匪运工作；可以有红色的——直接组建工农红军武装。但应以白色的形式为主。这就是被后世称为著名的“三色兵运理论”。

在刘志丹的引导下，大家经过分析，思想上完全趋于一致，作出了结论：联合进步势力，通过上层，建立反蒋同盟；通过下层，培养干部，建立革命武装，派党团员深入旧军队做兵运工作，想方设法，大抓武装。

刘志丹说：“我们的政策是打进去，还要拉出来。对那些现在能抓过来的武装，就要坚决抓过来；对那些现在还不能抓过来的武装，就派人进去，做好下层士兵的工作，等条件成熟了，就举行起义。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以后，就能开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了。”

委员们都很高兴，有的报名要到军阀部队里去做兵运工作；有的推荐了一些有能力的党团员；有的讲了在一些旧军队里的关系。刘志丹听了大家的发言，十分高兴地说：“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大抓武装很有利，陕、甘、宁三省境内的一些小军阀，都在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势力，这正是我们打进去做兵运工作的好机会。比如宁夏的苏雨生，如今正在招兵买马，发展力量。”

谢子长插话说：“苏雨生的骑兵4师，是个杂牌军，被冯玉祥收编过，他的8旅里有两个团长是榆林中学的学生，一个还是共产党员。”

刘志丹接上说：“老谢是兵运工作的能手，在苏雨生那里也有一些社会关系，领导过清涧暴动，又参加过渭华起义，你就到苏雨生的骑兵4师搞兵运活动吧？”

谢子长说：“我同意打入苏雨生的骑兵4师里搞兵运活动。”

接着又有几个委员报名到旧军队里搞兵运，决心为党拉出武装力量来。

刘志丹高兴地又说：“我们要为党在西北搞起一支革命武装，不但要抓紧兵运工作，而且还要派人打入一些土匪武装里去，做好匪运

工作。我们同时搞好兵运和匪运这‘两运’工作，目前在陕甘边界地区，活动着许多土匪武装，他们虽然也干些残害老百姓的勾当，但他们斗争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地主阶级的。我们派人进去后，比较容易瓦解、争取他们，也完全可以把他们改造成革命的武装。”

委员们一致同意刘志丹“兵运”、“匪运”同时搞的意见，派出大批的党团员打入军阀部队和土匪武装里，开展“两运”活动。

特委会连着开了几天，对下一步的任务、工作方法及策略，一项项都讨论得十分清楚，大家对搞“兵运”、“匪运”，大抓武装的决定都十分满意，充满了信心。刘志丹最后又强调：“我们党在陕北的革命，即将由秘密的地下活动，转变为公开的武装斗争，为了适应这个转变，我们要在兵运活动中，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培养大批的军事干部，为将来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创建根据地，进行武装割据，在干部方面做好准备工作。”

委员们对刘志丹的这种高瞻远瞩的思想，都非常钦佩。

特委会后，刘志丹为了集中力量抓好军事活动，向省委写了报告，要求另派特委书记来，他专任军委书记。省委很快就批准了刘志丹的请求，立即派吉国祯来任特委书记。吉国祯传达了省委的意见，省委同意陕北特委关于开展“兵运”活动的工作安排。并告知特委，杨国栋已经叛变，投靠了国民党。特委机关要转移，防止敌人破坏。刘志丹向吉国祯交代了特委的工作后，就急匆匆返回保安。

刘志丹返回保安后在永宁山召开党支部会议。王子宜、曹力如等人参加，刘志丹传达了陕北特委红石峡会议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刘志丹深谋远虑地说：“陕北特委指示各地搞武装斗争可采取白色的、灰色的、红色的三种形式，而我们保安在陕甘两省的边界上，地方偏僻，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加上我们的社会关系多，地理又熟，这是开展工作的便利条件。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发展地方的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同时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夺取地方反动武装（民团），作为将来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

随后，大家经过反复讨论，一致同意刘志丹的意见——搞兵运工作首先把本县民团武装抓到手。

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永宁山改选团总的历史参与者、当事人王子宜讲述——

保安县原先在县川，依山面河，易攻不易守，为了防土匪搬到洛河川永宁山的寨子里。永宁山是洛河环绕下的一座石山，四周是石崖，只有一条路可以上去，县城搬来后，搭了个吊桥，就成了天然的城堡。县民团早年间叫团练，入了民国就叫民团，有几十个本县子弟，十几条枪。现任团总是本县的一个大爷，姓陆名登高，字仰之，没念过书，懂点武术，因每日除了抽大烟就是搓麻将牌，身子骨瘦弱，对团里的事很少管。他是个大地主，和本县大户多有联系，以势压人，连县长也得让他三分。

支部决定先从陆仰之身上开刀。党团员四出活动，没多久，全县都听到人们的议论：“陆仰之是个草包，连个驴也吆不走。除了认识麻将和牌九上的那些划划，斗大的字认不下一石。”“说是个团总，既没读过兵书，又没上过阵，就会派粮要捐。”“以前是山中没老虎，猴子充大王，现今刘景桂、曹力如这些出去上过武备学堂，当了军官的武举，又参加过‘扫北’（北伐），能文能武，真刀真枪领兵在沙场上打过仗，不比陆仰之强万分！”“是啊，为啥放着将才不用，倒用吃才。”这些话传到陆仰之耳中，他出去转了一圈，才大感头痛。

我们看看陆仰之坐不住了，条件已经成熟，就由曹继之、曹力如和我拿了有四乡父老签名的“条陈”，去见县长。

曹力如对县长说：“近来本县城内四乡关于民团有许多议论，县台想必早有所闻了吧？”

县长说：“我也听到一些，不过……”

曹力如立刻把“条陈”递了上去：“父老乡亲让我们代呈条陈，请县台过目。”

“怎么?还有……”县长很吃惊，忙带上眼镜，接过“条陈”边看嘴里边“嗯嗯”。

我也趁机说：“请老师三思，这可是关系到全城安全存亡的大事！况且……”

正说着，听差进来报告：“陆团总求见。”

县长还未开口，陆仰之已摇摇晃晃踱进来，见我们在这里，脸上立刻有些不自然，冲着县长一抱拳说：

“唐突了，蒙县台你厚爱，兄弟我在民团效力已有多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哩！谁知，近来却有些干不下去了！”说着又用眼狠狠地瞪着我们。

我看他如此嚣张，便说：“怎么，莫非团总近来手气不佳？”

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连县长和倒茶的听差也忍不住乐了。陆仰之顿时面如猪肝，刚想发作，曹力如站起来对县长说：

“陆团总找你有公干，我们还是暂且回避的好。这个条陈就留下，望老师仔细考虑。”

陆仰之把手一摇说：“不必走开，我正要当着县台的面向各位老师请教！”

县长说：“也好，有话当面谈清。”

我们几个相视一笑，便坐了下来。

“近来咱们县吵得乱七八糟，谁不知道，原因就在县上那些个学生孩，日他妈受人教唆，不专心念书，跑到街上胡说八道，飞机（非议）县政，挠（搅）乱民心，连我的民团都让他们快给弄垮了。你们这些学生如今做了老师，不知教学生守法循礼，放纵学生挠（搅）乱治安，还游说四乡绅士，拆、拆本团总的台……”

他一番话讲下来，已是满头油汗了，端起茶喝了个尽光，抹了抹嘴，正准备再讲下去，曹力如站起来说：

“学生乃国民一分子，更读书识字，非不学无术之辈可论。况且团政非县政，路不平有众人铲，民众议论团总不称职，怎能和非议县政相提并论呢？又怎能和搅乱民心、弄垮民团扯到一起去呢？”

曹力如一席话，气得陆仰之跃起身，拍着胸脯叫道：

“我陆仰之虽不才，也是本县父老乡亲推选，县台委派的，你们这些毛头小子倒想把我陆登高怎样？”

他恼羞成怒，指手划脚，口出脏话。曹力之对我使了个眼色，我便按志丹事先说定的，转身向县长抱拳说道：

“老师明镜高悬，陆仰之文不识丁，武不服众，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况玩忽职守，无所用心；乃至团练疲惫，民怨沸腾；以前因蜀中无大将，方至陆某长期位居团总，如今景桂等人多已归乡，有此将才，不可不用，否则值此兵荒马乱之年，怕是要遗误乡梓！”

县长听了这场辩论，再加上素来对陆仰之的骄横多有不满，如换上自己的学生当团总，也省得遇事受人挟持。于是问道：

“登高，你看如何？”

陆仰之一看县长不给自己撑腰，铁青着脸说：“只要县中父老认为陆某不如刘景桂这个洋学生，兄弟情愿让给他！”

县长连连点头，我们也齐声说好，于是当场决定：3天后由县长主持在县高小开场选举民团团总，请县里士绅、父老投票断之。

选举民团团总，这是件大事，不出一袋烟的工夫，已轰动了全县城。当晚我们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认为支部以前的部署一步步落实了，现在关键在选举了。

有人讲：“那些顽固士绅，财大气粗，又和陆仰之关系密切。”

志丹说：“他们之间也有矛盾呢，就看你的工作怎样做了。”

曹力如说：“困难算不了啥，我们大家可以利用各种关系，比如亲戚关系，捻香结拜拉关系，尽量多交结人马。”

曹继之说：“学校和民团也不能放松……”

大家纷纷出计献策。最后，志丹说：

“我们就这么办，但要特别注意掌握会场，陆仰之是个流氓，要防止他捣乱。”

他分派曹力如去民团活动，曹继之组织学生，我掌握会场。大家连夜分头进行工作。

刘志丹为了争取更多的群众支持自己的竞选团总和便于开展工作，他在保安县马头山参加哥老会，号称“西北堂刘大爷”。

选举的日子到了，我们在县高小学堂张灯结彩，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尊重选举”、“慎重考虑，请选刘志丹”、“请选曹力如”。几个学生又吹喇叭又打鼓，吸引了不少人，真是热闹。县长走来转了一圈，很满意，在正中大红票箱后面的太师椅上坐下。刘志丹和陆仰之分别坐在两旁稍后一点的木椅上，下边全是赶来投票的“选民”，有商铺店号的老板，有士绅，还有来凑数的农民。室内乌烟瘴气，一片嘈杂声。县长看人来的差不多了，正要吩咐开始选举，只见挤上来一个人，鬼头鬼脑地在陆仰之耳边叽咕几句，陆仰之马上得意起来，对县长说：

“外边又来了一批选民，请县长做主让他们进来。”

县长不耐烦地说：“那就让他们快点。”

一声令下，外边挤进来几十个人，有一半是弯腰驼背的老头子，还有几个满脸横肉的人，谁都认识那是陆家护院的家丁。这时志丹递给我一张纸条，上边用铅笔写着“学生”两字。我忙退出会场，向等在外边的曹继之一招手，他马上领来我们事先安排好的几十个学生，吵着也要参加投票。陆仰之一听急了，连忙表示反对。志丹笑而不语，看着县长。

县长对陆仰之说：“你让参加的人，景桂并无二言，如今这些学生，我看也可以参加。”

陆仰之说：“县台错矣，这些都是孩子，学未成、业未就，怎能参加选举，怕是受人雇佣来的。”

陆仰之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他自己花钱雇人来选举，反诬蔑我们。顿时全场大哗。

志丹说：“县长，大家都是一县人，谁不认识谁呢？到底谁雇人，大家心里明白。如果陆团总愿意，咱们可以查查到底谁雇人。”

陆仰之顿时变哑巴了。

志丹又说：“况且学生也已成年，都是本县一分子，此选举是全县大事，学生如何参加不得？”

县长见陆仰之已无话可讲，就宣布让学生参加。选举揭晓，刘志丹和曹力如的票最多，陆仰之落选了。县长宣布由刘志丹任民团团总，曹力如任民团副团总。在场的人都鼓起掌来。陆仰之气得不行，跳起来大嚷：

“选举不民主，肯定有人作鬼了！这不能算数！”

他的几个亲戚、家丁和雇来的人也跟着乱嚷，什么拥护陆团总呀，我们代表民团坚决反对呀。一些顽固士绅也说：我们都同意陆团总，为何只有那么点票？这说不过去，民团如果鼓噪起来，可不好办。我们反驳说：县长亲自监票，有什么鬼？每人一票，总数又对，怎么能不算数？陆仰之暴跳如雷，土财主议论纷纷，我们则高呼：选举有效！县长正感到不好办，只听外边一片号声、鼓声，原来是我们在民团的人带领团丁们全副武装，吹着洋号，打着洋鼓，列队向县高小走来，一路上不断高呼：“拥护新团总！”县长见此情况，胆子也壮了，拍着桌子说：

“列位，列位！这次选举是本县长亲自监选，既未查出有什么作弊之处，理应有效。不必再争吵了，以免让人家笑话。”

全场欢腾，在我们的哄笑声中，陆仰之他们灰溜溜地走掉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选举中是有名堂的。原来，我们的学生写完了选票，就主动帮那些不识字的老头们写，凡是选陆仰之的，他们都写了刘志丹的名字。有些糟老头子不识字，还数了数选票上面写的是3个字才放心，却忘了刘志丹也是3个字。大家听了笑得肚子痛。

选举结束后，陆仰之一直拖着不交权，理由是刘志丹是被通缉过的共党分子。我们则一方面用国民党县党部的牌子压他，一方面动员了一些士绅去县长那儿告他。他招架不住，只好溜走了。

我们掌握了民团，针对当时的形势，志丹和我们商量决定，要抓两个方面，一是利用眼前这一胜利，把全县教育系统的工作狠抓一下，以便有利于今后的斗争需要；二是针对民团这一合法工作，要抓紧改组民团的工作，使它能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又有合法地位的一支革命武装。根据这一决定，由曹力如抓整顿民团的工作，由我抓教育系统工作和县里的全面活动。当时保安县除了县民团，还有5个分团，分在各区。我们首先从各分团团总换起，逐步换上我们的人或是听我们的话的人。与此同时，我们还把一些进步同学派入民团。志丹与延安区委联系，从那里又抽调了一批党团员，分插到各区民团中。他们给各个分团带去了火种，改变了民团的成分，按照组织布置，在各个民团中积极活动，发展组织。如永宁山民团插进了党员杨可珍，成立了党小组。党的组织在民团的建立，对后来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志丹还在全县各地进行调查，开展活动，尽力把各地的群众秘密地组织起来，把各学校的组织健全起来。

这时谢子长又回到志丹家，准备按特委决定到甘肃去。那儿有个陇东民团军的司令叫谭世麟，为了扩大势力，正在招兵买马队伍，他准备去一趟。志丹问他：李力果到后九殿的情况怎样？谢子长说：他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已经有十来个党员，就是马上拉一部分人出来也可以。志丹又找到我和曹力如，向我们谈了这些情况，然后说：我们这里通过合法斗争，夺了民团的权，终归是个本钱吗。现在民团的工作大体就绪，有力如同志照管就成了，其它各项工作由子宜负责，我和子长一起走一趟，这是个好机会，子长在那边又有关系，对我们

搞武装很有利。我们知道这是特委早已决定的事儿，便同意了。

### (3)

1929年，保安县民团经过刘志丹一段时间的整顿，面貌一新，从此也不再苦害百姓了。刘志丹将保安县民团交由副团总曹力如管理，他即刻去了三边，向当地党团组织传达陕北特委开展“三色兵运”、进行武装斗争的指示，动员地下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牛化东、刘子贞、汪醒民、姜耀、朱广霁、贺寿卿、王国栋、刘世庵、孙怀明等人去宁夏苏雨生部第八旅十八团王子元团搞兵运工作，并成立了以中共党员张东皎为队长的学兵队，组织了30多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去学兵队学习，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

当时，包头土匪出身的苏雨生被冯玉祥委任为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驻平罗一带。苏乘机大肆扩军，不管什么人，只要去，都收编。同年秋，刘志丹、谢子长来到苏部，苏雨生委任刘志丹为八旅十六团副团长，委任谢子长为十一旅旅长，但未正式下委任状。与此同时，陕北特委先后又派共产党员张秀山、刘景范等五、六十人进入苏部。在刘、谢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争取士兵活动。

1930年春，苏雨生部被马鸿逵部打败，刘、谢难以在苏部立足，便于二、三月间离开宁夏，子长回安边，志丹回保安。

刘志丹回保安后，决定在保安一带建立自己的武装，恰在这时，甘肃陇东民团总司令谭世麟为了扩充势力，进行招兵买马，条件是谁能拉起一个连，就给个连长，拉起一个团，就给个团长，同时划给防地，发给军装、给养。

利用这个“合法”存在的名义，组织革命武装，这是刘志丹进行兵运的一个特点。

于是，刘志丹和永宁山支部负责人王子宜、曹力如等研究决定，

在谭部挂名建军。很快把陕北党团员和穷苦百姓组织起来，于农历四月间，在保安金汤镇建立起一个营，下编四个连。刘志丹取得了谭部第六营营长的职务。五、六月间，谢子长又将杨庚武部的周维奇营拉到保安，与刘志丹队伍会合。后经刘志丹与谭交涉，谢子长任谭部直属第三团团团长，下编两个营，刘志丹和周维奇分别担任营长，进驻三道川地区。

洛河川的土豪张廷芝，在保安、定边、安边、合水等陕甘边区一带都有一定势力。此时，他也在谭部领了头衔，带领数十人驻在其老巢豹梁寨子，自称团长。由于刘志丹、谢子长的革命势力在三道川的发展，直接威胁张的反革命统治，引起了他的惊恐。因而他便开始密谋扼杀这支刚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

在刘谢队伍中，周维奇营的武器最好，于是一场收缴周营枪支的阴谋开始实施了。第一次派蔺士耀，第二次派张杰儒，第三次派宗尚志去周营当说客，劝其缴枪均未遂。后来又派人去齐桥将周维奇请到豹梁寨子设宴招待。席间，张廷芝答应送给周维奇一匹蒙古大鬃马，并将其妹许给周为妻。周在张的软硬兼施和骏马、美女面前丧失了革命警惕，答应缴械，投靠了张廷芝。

张廷芝拉走周营后，妄图将刘、谢一网打尽。一天晚上偷袭了水泛台，谢子长突围脱险。随即张廷芝又派两个连到张家沟门，包围了志丹营的卢仲祥连。当卢仲祥听到枪声，将部队集合起来时，敌人已冲进院子。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全连大部分被迫缴械，卢仲祥带 10 余人突围到白豹川给二连和志丹送信，不料却被张廷芝抓捕，结果二连也被缴械，被捕的有马锡五、刘约三、刘兆庆等人。张廷芝又派蔺士昌带一营骑兵追捕刘志丹，刘志丹刚从庆阳返回，到九嘴坡（志丹妻家）时，得知部队受挫的消息，立刻奔向永宁山寨子。

一天傍晚，王子宜与曹力如在永宁山寨前的山路上散步，暗暗商量派谁到三边去打探消息。刘志丹突至，看见我们，翻身下马，叫道：“子宜，力如！”

我们一看，原来是志丹一行数人，个个满面风尘，浑身都被汗湿透了，几匹马上驮了些东西，都是气喘吁吁的。

志丹说：“出事了。咳！一言难尽，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让张廷芝这个狗日的给下了枪，还要把我们斩草除根。”

我们大吃一惊，深感问题严重，正想细问，志丹忙又说道：

“后面可能还有追兵，咱们还是进寨子里谈吧！”

大家立即起身进了永宁山寨子，吩咐团丁拉上吊桥，关了寨门。

来到教育局，坐下来听志丹谈事情的前因后果。

志丹说：“我和子长带着队伍到了甘肃，谭世麟根据我们的人数，把我们编成‘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分给我们地盘，让我们驻扎在三道川一带。最近我到庆阳谭世麟的司令部去参赞军务和催领军装给养，回来走到路上，听说张廷芝叛变了。此人过去是靖边的一个土匪头子，也在陇东民团军领了委任状带兵，他和阎红彦还拜过金兰兄弟。可是他突然翻了脸，把我们的人扣起来，把枪收了。我们的队伍中有很多党团员不愿意交枪，被他们打死或是扒了衣服赶走，听说我的军需官马锡五也让他们抓起来了。谢子长跑了。张廷芝要斩草除根，派人到路上截杀我，幸亏有人通知了我，才免遭他们的毒手，径直跑回来，也不知道详细情况怎么样。”

我们听了都十分痛心，好不容易搞起来的武装，却让张廷芝这个反动派给吃掉了。

志丹说：“这次我们失掉多少好同志！我把你的兄弟也没能带回来……”

我说：“他死不了还会找回来的（事后知道他牺牲了）。现在的问题是今后准备怎么办？”

志丹还未搭话，一个团丁闯进来报告：张廷芝派一营骑兵已到了寨墙下，吵着要进寨子抓人，让我们给挡住了，现在正吆喝着让县长

出去见他呢！

曹力如说：“我先去看看。”说着就跑出去了。

志丹和我商量一下，我便出门往县衙跑去，没走几步，迎面过来两盏灯笼，是崔焕久县长披着衣服跑来了。一见面，他就说：

“快找力如集合团丁，土匪围了寨子咧！”

我说：“不要紧，力如已上寨子了。咱也去看看再说。”

我拉着他上了寨门，向外一看，只见一片光亮，吊桥外边有百十名骑兵，一手高举松明火把，一手执缰，每人长短两件武器，为首一个，正在仰脖高喊：“少废话！快放吊桥、开城门，让我们进去抓逃犯！”城上民团中有人问道：“抓什么逃犯？”下边又是一片喝声：“刘志丹、谢子长，是不是都窝在里边，快交出来！”大家听了都吃一惊，曹力如喝道：“刘志丹是不是逃犯，我们不知道！是我们县人倒不错，可他如今不在，你们是什么人，到底要怎么样？！”那个看上去是个头头的粗大汉说：“我是陇东民团军的营长蔺士殿。我们是奉命行事，不让我们进去搜一搜，兄弟回去也不好交差呀！”

崔县长拉着我说：“他们既然不是土匪，景桂又未回来，就放他们进来，招待一下算了。这年头你能惹得起那个司令呀！”

我说：“老师，话虽是这样讲，但如今兵荒马乱的年头，黑更半夜，空口白话，谁敢担保他们进来不出事呢！”

崔县长揉了揉眼睛道：“真是荒唐，荒唐，是不能放他们进来。”

这时只听曹力如又喝道：“你们是陇东民团军，我们是陕西民团，各守地盘，谁也不认识谁，黑更半夜，如何肯让你们进来惊扰我百姓？你们如果懂事，就好好商量。我们也不是好欺侮的！”城下的人听了，顿时安静下来。那个汉子又喊到：“那就快让你们县长上来说话。”

县长一听就毛了，忙摇手说：“哎呀，你们应付了就是咧，不要攀我了。”

曹力如走过来说：“看来，这事非县长出面不成。你就出面唱个白脸吧，把他们安顿一下，天亮就好办了。”

县长只得来到前面，对城下说道：“兄弟是本县之主崔焕久，和你们素不相识，无论怎样，你们要黑夜进城是绝对不行的。不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列位既然来了，岂有不招待之理。暂请在城外委屈委屈，天亮本县亲自为你们接风洗尘就是。”

他们根本不买崔县长的帐，声言再不放他们进去就要攻寨子了。崔焕久浑身发抖，一个劲地问力如和我：“这可咋办咧？”我和力如正商量，是不是干脆来个先下手为强，和他们拚一下，志丹同志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轻蔑地说：

“呵！是藺士殿来了。张廷芝还挺看重我呢，来了一个营。”又对力如说：“要进，放藺士殿进来，队伍不能进。你带他来见我。”

他说完拉着腿肚子转了筋的崔县长下寨子走了。力如便冲着外边喊道：

“藺营长，你要进来可以，但队伍不能进来。”

他们在下边商量一番就答应了，藺士殿只带几个马弁、护兵进了寨子，由曹力如领着去见县太爷。过了很久，只见藺士殿垂头丧气地出去了。紧接着崔焕久满头冒汗地张罗着，给寨子外的那帮人送酒肉、粮草。看见我说：“没事了。真是吓死人咧！”我扭身往回走。曹力如送走藺士殿，从后边赶上我说：“志丹真了不起，把张廷芝骂了个狗血喷头，镇得藺士殿连一句硬话都没敢说，就回去了。”

我们走进县政府的窑洞，志丹看见我们，把放在桌子上的盒子枪往腰里一插，说：

“我刚教训了藺士殿一顿，让他转告张廷芝，他狗日的忘恩负义，将来我要和他算这笔帐！现在吗，也不能让崔焕久太为难了，我还是走吧！”

我说：“要走，还是早走为好。”

力如说：“我先去探探风，你再走。”

过了一阵，力如回来说：“景范兄弟派人来说，子长跑出来，现在在川口等着呢。咱走后崖下去成不成？”

志丹说：“就是马下不去。这样吧，马留给你们，那些军装、军旗，你们负责连夜给藏好，说不定将来能派用场呢！”

大家来到后山，用绳子把志丹他们吊下去，我和力如也跟下去，趁夜晚摸到十里路外的村子，力如到相识的人家给他们备了几匹马，眼看着他们乘月色奔延安去了……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刘志丹》第255-259页。

三道川第一次建军失败，使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苦心经营起来的一点革命武装丧失殆尽，然而也使他们从一系列失败的教训中清醒的认识到，要组建一支真正的独立的革命武装，不能只利用现成的军阀部队，更不能同像张廷芝那样的反动分子搞联合，而要准备条件单独干。

## 第五章 太白枪声

### (1)

1929年7月，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志丹为候补常委。1930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举行全体会议，志丹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

8月中旬，志丹和子长途中巧遇，遂联袂同行远赴绥德，在合龙山古庙参加了陕北特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伯平、刘澜涛、崔田夫、张德生、刘约三、冯文江等20余人。刘志丹刚抵绥德，就被国民党党部侯奇发现行踪，因此，刘志丹藏匿在地下党员马云泽

家中，没有到会。合龙山会议由从苏联莫斯科归来的高维翰（李杰夫）、孔祥祯（化名老吴）传达以左倾冒险为特征的工作部署，合并党团、工会、农会等组织，成立“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行动委员会书记，孔祥祯任军委书记，谢子长、刘志丹任正副总指挥。会议途中被敌人发现，只得转移至义合继续召开。会议期间，特委曾提议由刘志丹继续任军委书记，留守机关工作，刘志丹以基层武装斗争更重要为由，请求返回陕甘宁继续进行三色兵运，特委接受了他的请求，由北方局任命孔祥祯为军委书记。八、九月间，陕西省委任命吉国祯为陕北特委书记。

9月，刘志丹返回永宁山向党组织传达了特委的会议精神，研究扩大革命武装的计划。这时，从三道川脱险的卢仲祥、刘约三、马福吉等人陆续返回永宁山，还有贺彦龙、魏佑民等四、五人也分别从延安、宜川、瓦窑堡等地来永宁山寻找刘志丹。大伙正你一言我一语开会研究兵运工作的具体安排时，恰巧在陇东民团军司令部中曾和刘志丹一起搞“训练”工作的杨树荣也从庆阳来到永宁山寻找刘志丹。

杨树荣回忆：

谭世麟对三道川事件非常恼火，大骂张廷芝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白白使他损失了一个团的兵马……看来咱们在三道川准备起义的事，谭世麟仍然没有察觉。

谭还说：“你能不能把谢团长、刘营长请回来？”我说：“能行！”谭说“你就住几天，路上不好走，有危险。太白王营副在这里，我给安顿。”于是谭给王营副安顿说：“以后杨团副、谢团长、刘营长来了时，你们要好好招待。”我见了王营副，就从庆阳出发，路线是走合水旧县城。头一天在合水休息，第二晚在半山上高窑里休息，第三天顺着山到了太白，到了王营副的驻地。王营副给他们的黄营长把谭的话说了。他们给我说了去永宁山的路线。到了永宁山民团，见了团长曹力如（曹原是高小校长，接刘志丹任民团团长），曹说：“志丹正盼着你来呢，你就来了。”我见了志丹，把分手后见谭世麟的经过说了。

刘说：“他想利用咱，咱还想利用他呢，看谁利用谁呢！”引自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 322 页。

根据这个情况，刘志丹等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奇袭太白民团军，把武器较好且最反动的太白民团先吃掉，以铲除祸害，夺取武器，然后创建一支独立的工农武装。具体部署是：先派杨树荣去合水太白镇通知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骑兵第六营即将开赴太白镇，请他们预先筹集粮草，以此稳住敌人；然后，分头调集人马枪支，又让曹力如派人从苍沟哥老会大爷马海旺的崖窟中取回上次从庆阳驮回来的服装。大家一看，军衣、符号、臂章、官防印章一应俱全，只少一面杏黄旗。王子宜马上找来几位妇女赶制一面大旗，上书“陇东民团军骑兵第 6 营”。刘志丹从保安民团抽出部分人员和枪支、马匹，加上原骑兵第 6 营从三道川零星归来的人员，调集了 29 人，长短枪二十余枝，战马二十多匹，然后将队伍从永宁山带到白沙川密林中，进行了必要的训练和动员。

在经过充分的战斗准备后，1930 年 9 月 28 日，刘志丹骑着一匹铁青色的高头大马，穿戴着陇东民团军官制服，身后跟着副官卢仲祥，率领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旗号，身穿陇东民团军服装的 29 人的骑兵部队，从保安县永宁白沙川出发，溯葫芦河逶迤前行，当日下午抵达合水县太白镇。

## (2)

太白镇，地处陕甘交界，是葫芦河与苗村河的交汇处。这座破旧不堪的撮尔小镇，蛰居在子午岭群山的深腹，相传为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屯军戍边时所筑。

太白夺枪的亲历者杨树荣回忆：

经过商量，从永宁山民团抽了 10 人 10 枪，又另外搞了几条枪，借了几匹牲口，突然去，怕引起黄营的怀疑，叫我去给打个招呼。给了我一匹骡子，叫我和米脂一个民团团丁一块去，作为我的护兵。到太白，我说：“刘营长一两天就可以到，谢团长正召集部队，也马上要来，你们给筹办些粮秣。”我们这次共去了 30 来个人，他们叫我们驻到烧坊里。

烧坊位于镇东南，掌柜的名字叫李绪增，为人仗义，与刘志丹是旧识。因此，刘志丹的人马当天就宿营在烧坊里。当晚，在敌二十四营当兵的赵连壁，刘志丹的表弟以喝酒为名，来烧坊向刘志丹报告了二十四营的军情。刘志丹大体上知道了敌军的布防情况，二十四营共辖三个连，第一连驻在镇内一个骡马店，第二连驻在河东岸的黄家砭，第三连驻在离太白镇几十里处的林锦庙，兵力比较分散，便于各个击破。为了麻痹、迷惑敌人，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了解敌人情况，刘志丹命令部队在 29 日、30 日连续两天分头与民团军官兵开展官对官、兵对兵的“交朋友”活动。30 日晚，刘志丹与几个负责同志详细分析了几天来掌握的敌情，认为敌众我寡，宜斗智不宜斗力，宜速战不宜持久。决定分头行动，智取强敌。一面由刘志丹、杨树荣出面，以商筹粮草为由去找黄毓麟、王凤珠，伺机活捉，迫其令部队缴械，如若不成，就打死这两个反动军官；一面由卢仲祥负责带十余人与敌第一连官兵在烧酒坊“联欢”，伺机收抢，消灭敌人。刘约三和魏佑民在河边监视驻河东岸黄家砭敌第二连的动向。

10 月 1 日早晨，刘志丹、杨树荣按照作战计划，来到敌副营长王凤珠的住处“商借粮草”，王凤珠即刻派人请来黄毓麟商议此事。

杨树荣和刘志丹在王营副家里，他俩坐在炕边上，黄营长、王营副坐在对面一条长凳子上。我们的联络员，一个是志丹的营副赵子实，一个是王秀玉（保安人，志丹护兵的哥），他们在厦子门外几次给我俩使眼色，叫动手，但正说话哩，没有机会，联络员看到王营副的护兵把马备好了，背的枪，子弹也背得满满的，恐怕出去走漏消息；即使不漏消息，也把枪和马带走了，特别稀罕的是子弹。两个人就下了

那个护兵的枪，撕拉起来。黄营长、王营副听见窗外有动静，知道有事变，就撩衣服抽枪。我一看就一枪打了黄营长，志丹打了王营副，二人都从凳子上栽下去了，收了两支小枪是八响……这时，在李绪增烧酒作坊里，卢仲祥等已将敌第一连的官兵用酒“联欢”得东倒西歪，酩酊大醉。卢仲祥听到枪声，把酒壶一丢，大喊一声：“缴枪不杀！”战士们把枪口一齐对准了敌人。除敌连长企图顽抗被击毙外，其他官兵全部缴枪，当了俘虏。黄家砭的第二连，听到枪声，都冲出来向山上逃跑，卢仲祥、刘约三、魏佑民立即率领二十余名骑兵，勇猛追击，打垮了敌第二连，又俘获了一些马匹、枪支。中午时分，太白战斗胜利结束。刘志丹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布了黄毓麟、王凤珠及陇东民团二十四营的罪恶。广大群众听到平时骑在他们头上作福作威的匪军已被消灭，欣喜万分。刘志丹率部队准备撤离太白镇时，镇里的男女老幼欢天喜地齐来送行。谭世麟还编了个九营，大都是些土匪，这些人要求把他们的枪（都是些烂枪）还给他们，跟上咱们走哩。志丹应允他们跟上走，但没有给枪，这些人也没有跟上来。此后就回永宁山，刘约三前边走，听见马叫唤，在一个门口拴着，是马建有（马建有是谭世麟的独立连连长，以后给黄营编了一个连），在他身上一搜，搜出个折腰子枪。马连长驻在林锦庙，有 20 来条长枪。擒贼先擒王，捉住马后，给马说咱们一块干，马表示愿意跟上来。走到林锦庙下边，给我留了一部分人，占住去永宁山的路口，他们向西北到林锦庙，命令马建有把堡子门叫开，马说：“把枪给刘营长缴了！”缴了 20 来支枪。这次行动，前后共收了 30 多条枪，两匹马（王营副的 1 匹，马建有的 1 匹），太白和林锦庙的那些人没有跟我们来。

事情的结果是，刘志丹率部向林锦庙转移。途中又活捉了太白民团军二十四营驻林锦庙的第三连连长马建有。当晚二更时分，部队包围了林锦庙之敌，迫令敌第三连交出了全部枪支和马匹。至此，作恶多端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全部歼灭。

太白夺枪，打响了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公开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阀的第一枪，击毙了敌营长黄毓麟以下 10 余人，俘敌数十人，缴获长短

枪 50 余支，骡马 10 余匹。这次起义后，刘志丹很快组建起了一支 150 余人的革命武装，在合水、安塞、保安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揭开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

### (3)

太白夺枪后，回到永宁山，保安县长崔焕九突然接到延安驻军高双成的通知，说将派一营军队进驻保安，急令县府筹办粮秣。便将此消息透露给刘志丹，并说，“你们现在人数多，风声也大，这里离延安只 100 多里，你们不能常在这儿住了。”公安局长也笑骂道：“这些亡命之徒，去时两手空空，回来时一人拿两三条枪……”刘志丹认为陕甘交界地区北至定边，南至淳化、耀县的桥山山脉，是个“三不管”的地区，军阀统治比较薄弱，不少土匪搞几杆枪就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以在这里闹革命呢？

太白夺枪后，刘志丹利用缴获的武器在陕甘积极扩大队伍。他见赵连璧作战勇敢，且有活动和组织能力，便给了他一部分枪支弹药，委派他到太白一带组织队伍，扩大力量。不久，赵连璧便动员了几十名贫苦农民，并收编了太白民团军的残部和当地民团三、四十人，部队扩大到 100 多人，赵连璧就带着这个队伍在太白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同时，刘志丹又派同守孝带一部分人在南梁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壮大力量。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志丹带领大队人马转战于陕甘边的保安、安塞、合水、甘泉一带，打土豪劣绅，不断扩充实力，部队连续在安塞真武洞、镰刀湾打了几个胜仗，缴获了不少枪支，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前来参军，部队很快扩编到 200 多人。人马发展了，刘志丹又抓紧机会在永宁山南瓦子川石峁湾的深山密林里进行练兵。有民谣随风传唱：

日头出来端上端，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练兵石峁湾，  
要把世事颠倒颠。

由于刘志丹的队伍声势过于浩大，引起反动军阀的注意。陕甘军阀高双城派高玉亭营分兵二路，直扑刘志丹部队在保安的驻地，妄图将起义部队一举剿灭。

1931年2月15日，刘志丹接到延安地下党组织派人送来的情报后，决定避实就虚，转移合水，避开敌人“围剿”的锋芒，待机破敌。夜宿子午岭深腹，刘志丹豪情陡涨，脱口吟道：

二月十五夜不眠，  
满月陪我上高山，  
宝华山上红旗飘，

决心为民要共产。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刘志丹纪念文集》第661页。

2月16日是除夕，刘志丹让马锡五买肉置办年夜饭，部队会餐后，就冒着漫天风雪，向陇东连夜转移，经瓦子川、平定川、豹子川，18日到达合水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率领的队伍会合。这时，刘志丹在庆阳“训练”陇东民团军时结识的贾生财也闻讯从陇东民团军中拉出40多人参加起义军，部队一时增加到400余人。为了巩固起义部队，刘志丹将起义部队带到合水县固城川的麻峪村进行整编，史称“固城川整编”。部队共编为四个连，由刘志丹任总指挥，卢仲祥任第一连连长，魏佑民任第二连连长，赵连璧任第三连连长，贾生财任第四连连长，并在部队中建立了党支部，由杨树荣任党支部书记。刘志丹在全体军人大会上讲道：“大家要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坚决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地主武装斗争到底，部队应体察老百姓疾苦，决

不损害群众利益，拉出山林，打豪绅，解决给养，不断发展壮大。”这时，合水县瓦岗川民团团总唐清山闻讯率领 40 多人前来接受改编，刘志丹将精干人员插入各连，其余人员让唐清山带回合水县瓦岗川继续扩充。

经过两天休整后，部队向宁县转移。在转移途中，部队到达宁县盘克镇张皮家塬时遭到陇东军阀陈珪璋部队谢牛旅的突然袭击。

杨树荣回忆——

盘客原是陈珪璋的地盘，陈派骑兵从南边打来，卢连长猛得很，率部把敌人打跑了。敌人又从东包抄过来，我和王世泰等十几人与骑兵打，骑兵目标大，冲不过来，就把马压了用步兵上，志丹看前后都有敌人，就把步兵调回，这时敌人已冲到跟前。在此情况下，我们不敢向南去，就向东下了山，敌人尾追而来，我用短枪换了志丹护兵的长枪，打了几枪，敌人再未追赶，我们就上了东山，天也快黑了。志丹召集开会，志丹认为陈珪璋是土匪部队，并非是训练有素的，打了胜仗必然麻痹，晚上派人去摸一下最好。但一检查自己的武器，息壳的息壳，拉不动的拉不动，人也整整一天水米未进，后来也就未去摸。就向东撤，在芦宝梁，有很多窑洞，以前住过人，野核桃很多，我们拾的吃了些核桃，驻在这里。由于部队刚刚编组，未经训练，战斗力不强。在战斗中，部队损失惨重。一连连长卢仲祥阵亡，三、四连被打败，同守孝、赵连璧等又回到南梁、太白一带活动。刘志丹率 100 余人突出重围，到达宁县麻子掌一带。引自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 324 页。

## 第六章 彬县罹难

(1)

1931年初，大雪封山，弹尽粮绝，刘志丹和部队被困在深山老林的破窑洞里，冻饿交加，仅仅依靠拣拾野核桃充饥。身陷绝境中，刘志丹等负责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决定，派马锡五、陈鸿宾、贾生财以哥老会的身份，给中部县小石崖民团团总罗连城送去1匹骡子、200两大烟土，作为见面礼，与之建立统战关系，暂渡难关。在罗连城收留帮助下，部队暂住小石崖，并由罗连城救济、供应粮秣，补充弹药，安置伤员，休整20日。在此期间，失散的赵连璧找到小石崖，请示刘志丹怎么办？刘志丹即派贾生财、赵连璧重返南梁一带拉队伍，积蓄力量。随后，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刘志丹派马锡五、陈鸿宾通过警备骑兵旅副旅长、刘志丹榆中的老师谷莲舫与苏雨生谈判，接受其改编，以便休养生息，伺机再将部队拉出来。

4月，刘志丹率余部离开小石崖，罗连城将刘志丹送了几里路，才依依作别。志丹率部队冒着严寒，经石底子、关门子、马栏、刘家店等地，迤迤南下。开抵旬邑县职田镇，整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苏雨生部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杨树荣、陈鸿宾任团副，下辖2个连。

职田镇是旬邑县的一个富庶之地，交通也便利。这里居住着几十家地主老财，他们许多人除了占有大量田产外，还兼经商、兼做官，囤积居奇，势焰冲天。特别是旬邑有名的大地主刘日新，家有存粮上千石，儿子又在陕西省国民党党部任职，有钱有势，无恶不做，被群众称为“活阎王”。

贫苦的旬邑百姓，都要求刘志丹的部队，分这些地主老财的粮食和钱财。刘志丹召开干部会研究决定，由部队出面，组织群众，先礼后兵与地主老财谈判，让他们主动献粮。马家堡几十户地主人均50石粮食分给群众，刘日新出300石供部队食用。结果其他地主都如数交出，唯有刘日新拒交。在部队的支持下，群众纷起冲进刘家，打开粮仓装粮，还挖出了刘日新埋藏地下的金银财宝，而且团副陈鸿宾还扇了刘日新两耳光，刘日新连气带怕，上吊自尽。旬邑县许多地主老财、反动分子纷纷大造舆论，并联合具状向西安省党部状告刘志丹在旬邑造反作乱。

在职田镇驻防期间，刘志丹利用这一相对稳定的时间，领导部队抓紧军事训练，加强政治学习，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同时还积极做驻地附近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他不仅亲自去该部队做工作，还告诫其他干部多与该部下层青年军官接触搞好关系，争取该部的同情。

1931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高岗来职田镇，向部队传达了省委关于“利用补充团的名义，尽量扩大部队，积极准备红旗”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刘志丹抓紧筹集粮款、军械，整训和扩大部队，三个月时间，部队又扩充了200余人。刘志丹想休整、筹粮款告一段落后，将部队再带回陕甘边的梢山，占山为王，发展革命力量。但这时省委有人来并告知省委意见。省委认为蒋介石虽然把陕西交给了杨虎城，但对他并不放心，又派顾祝同的3个师，驻在潼关监视杨虎城。这等于在杨虎城喉咙里扎了一根刺，使杨虎城如鲠在喉，难以下咽。蒋杨冲突只在早晚。杨虎城与西北大小军阀也矛盾重重，各有打算。陕西省委根据这种情况，决定联合各派势力，建立西北反蒋大同盟，从中扩大革命力量。省委已派人赴各地方军阀那里去联络，省委初步计划，先搞5个旅。起事后，请杜斌丞挂帅，联合杨虎城，反对蒋介石。苏雨生也属争取对象，计划搞一个旅，省委指示刘志丹去彬县与苏雨生直接进行联合。

## (2)

苏雨生在彬县久等刘志丹未来晤面，心里也不禁有些犯疑，遂派副官持他的亲笔信件和红色请帖，带车去职田镇补充团，请刘志丹面见商谈。刘志丹为了完成省委的计划，决定去彬县与苏雨生晤面。临行时反复叮嘱：“古人云：虽有文事，必有武备。我此次能否商谈成功，这主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实力。我走后，你们一定要加紧扩充队伍，加强警戒，继续筹备粮款，准备进山。平原不可久留，莽莽梢山才是我们发展的根本……”

刘志丹乘车抵达彬县城郊，受到苏雨生的出城亲迎，并设宴由营以上军官作陪，盛情款待刘志丹，陪刘志丹游览了彬县名胜古迹大佛寺、花果山、水帘洞。而且出乎刘志丹意料的是商谈合作的事情也比较顺当，双方皆大欢喜。

在刘志丹离开彬县的头一夜，风云突变。苏雨生接到西安来的一道密令：扣留刘志丹，补充团全部缴械，并将刘志丹押赴西安……

苏雨生假装做难，哭丧着脸，假惺惺地说：“是职田镇逃到西安的绅士，联合向省里请愿，说你在职田打土豪闹共产逼死十七路军刘营长的父亲，省里让我剿灭你们。”

志丹一听心里明白了，便哈哈大笑：“为了一张委任状，就甘愿背信弃义，出卖友人……”

苏雨生心一横向外一招手，走进几名随从将刘志丹下入牢中，并砸上 12 斤重的铁镣。

白冠五在回忆中曾这样讲述过刘志丹彬县入狱的情况。

——到了彬县，我先问清楚了刘志丹是苏雨生的补充团团长，驻扎在旬邑县的职田镇，然后才去面见苏雨生，递交了刘天民的信件。苏看过信后，不热不冷地对我说道：“如今队伍缩编成了一个旅，下连带兵不行啦，还是在司令部当个参议吧！”我也只好同意，先站住脚再说。

有一次，我去副官处找王主任，见门口有 4 个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气氛和往常大不一样。因为副官处从来不设岗哨，今天加岗一定有重要事情。我一边猜想着，一边往里走。由于我平日和这位王主任来往较多，关系很好，士兵们认识我这个“参议”，所以到门口卫兵也不加阻拦。我走进大门，就看见王主任脸色阴沉地坐在桌子后边，一旁套间的门敞开着，里边有 3 个士兵正在给一位穿军大衣的人砸脚镣。王主任见我到来，便点头打招呼让坐。我漫不经心地随便问了一句：“你有事？”他只是“嗯”了一声，不打算多说。我心中很犯疑，

便有意追问：“什么案子？”“共产党！”他还是回答得很简单。我一听是与党有关的事，更需要了解清楚，就紧追不舍的又问道：“他是谁？”

“刘志丹！”听见这3个字，我简直被惊呆了，想不到偏是志丹出了问题。但此时此地我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话题岔到别的方面，和他闲扯。过了不大一会儿，里边的士兵出来了，王主任便站起身来，我有意坐着不动，他只好向我说：“你且少坐，我出去一下就回来。”把手一挥带着士兵们出去了。

这时，屋里已再无别人，我赶忙跨进套间的门，上前双手抱住志丹的肩头，急切地说道：“志丹同志，想不到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了！”他抬起头对着我瞅了一阵，然后平静地问道：“你是谁？”“我叫白冠五。”“从哪里来的？”“太原。”“是谁派你到这里来的？”“刘天民和杨怀英。现在司令部当参议。”

我看看外边没有人来，就急忙说：“这是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我好想办法救你出去！”志丹却镇定而又严肃地对我说：“事情回头你就会知道，现在你听我说：第一，你立即去补充团，找到马锡五、刘景范、刘约三他们接上关系，告诉他们要稳定全团情绪，安慰全体官兵，告诉大家，这个事件由我一人承担，和大家没有关系，要防止内部发生动乱；第二，要想办法向十七路军指挥部做工作，就说姓刘的那个豪绅是在军民纠纷中受了惊吓，加上年老有病，故而身亡，和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第三，这事宜迅速解决，不可拖的时间太长。千万不要让国民党的省党部插手。”

就在扣押志丹的同时，补充团也被缴了械。全团官兵被押回彬县，软禁在东门外的一座古庙里。第二天，我便以“参议”的身份进了庙门，找到了马锡五、刘景范、刘约三等同志，转达了志丹的指示，便开始研究营救的办法。人家认为，苏雨生的态度一时难以摸透，但副旅长谷莲舫是个性情温和、处事稳妥的人，比较同情革命，若请他在苏雨生面前替志丹说情是最合适的。十七路军总部拟请杜斌丞先生出面帮助。那个姓刘的营长指控志丹是共产党，只不过是情急乱说，他并无真凭实据，只要杜公出面说话，事情就好解决。我们再诡称志丹

病重，要求保外就医。只要获释，就可想办法脱离险境。为防备省党部插手，大家叫我多留意司令部的动向。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志丹》中白冠五著《烈士事迹片断》第 324-326 页。

刘志丹驻扎在田镇的补充团 400 余人的队伍，遭遇苏雨生的两个整团的部队包围，强行被缴了械，仅有一小部分突围出去，其余被编成运输队押回彬县。至此，太白夺枪后组建起来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再次被敌人打垮，革命再度受挫。马锡五、刘约三、王世泰、刘景范等人化装潜入彬县，设法到牢房里与刘志丹相见，并告诉他部队覆灭的命运。刘志丹语调沉重地说：“省委不了解下面的情况，指示欠周到。我们太天真，与狼同行，不拿一根棍棒势必会吃大亏……”他虽身受镣锁囹圄，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工作，毫不惧怠，令人感奋。

这时中共陕西省委得知刘志丹被囚，积极展开了营救工作。省委通过陕西省主席杨虎城的秘书长共产党员南汉宸和高级参议杜斌丞先生游说杨虎城，杨虎城也爱惜刘志丹的高才，冒险下令苏雨生释放刘志丹。

杜斌丞先生又恐中途生变，夜长梦多，借到彬县公干的机会，亲自到苏雨生部干预交涉此事。

同时，谷莲舫又力劝苏雨生，陈说利害。苏雨生勉强答应。接着大家又称志丹身患重病，请求保外就医。谷副旅长又愿具结作保，苏雨生只得顺水推舟，开狱放人，马锡五他们把志丹接出后，住进了后稷祠。

杜斌丞见到刚刚出狱的刘志丹后说：“本来杨虎城已命令苏雨生放人，但我不放心，假借检阅部队的名义亲自来了一趟。我本想留你在杨虎城的部队里干干，杨怕惹事，让我放你远走高飞。”

刘志丹惶愧地说：“校长，我们和敌人打交道，真是太愚蠢了，老是吃亏。”

杜斌丞神色严肃地说：“我看你们就是这样，刚搞起点力量，就

忘乎所以，跑到平原上来了。陕甘边有多少山大王，都能占地为王，就是你们老失败，站不住脚。”

志丹沉痛地说：“校长，你说得很对，我们太急于事功，太脱离实际。”

还是白冠五的回忆——

杜斌丞先生离开彬县时，又给志丹留下银币 50 元，手枪一支，鼓励他继续创业。

志丹虽获假释，但省党部的酒玉五还在频繁活动，危险并没有消除。为防意外，大家认为志丹宜早日离开这是非之地。到哪里去呢？正在商议之际，志丹的一位同乡李勤甫，却提出请志丹到平凉去。这李勤甫是当时甘肃警备第一路司令陈珪璋的副官处主任，他前几月因事来到谷莲舫处。驻防平凉的是陈珪璋的第二旅，其中陕北人很多，共产党员王世泰、参谋张本人和志丹也比较熟悉，所以志丹接受了这个提议。

过了几天，李勤甫找到了一辆商车，我们几个人便混在客商之中启程。半路上，趁客商歇息吃饭我单独和志丹在一起交谈了一阵。我当时写下了四句粗浅的诗句：“未曾识面早心知，难忘彬州罹难时，灵犀虽通咫尺远，囹圄抚肩恨见迟。”志丹看后，当时挥笔答我四句：“丹心绵绵欲诉君，五中耿耿千秋铭，西出阳关击螃蟹，旭日东升满地红。”

过了窑店的军警联合稽查站，终于顺利到达平凉，住进了刘宝堂的第二旅部。引自陕西出版社出版《刘志丹》中白冠五著《烈士事迹片断》第 324-326 页。

当时，陕西省委有个计划，即准备在甘肃搞 5 个旅的兵变。因此，派高岗、马志贞到彬县，指示刘志丹去平凉与陈珪璋谈判，将李培霄千余人的饥民武装收编为 1 个旅，归属陈部，站住脚后，再改造成自己的部队。于是，刘志丹一面派马锡五与刘兆庆、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联系，一面动身赴平凉。

1931 年 7 月，刘志丹由彬县到平凉，经陈珪璋部特务团团长刘宝堂引荐，与陈珪璋谈判，陈委任刘志丹为新编十三师直辖十一旅旅长，陈鸿宾（后为朱理凯）任参谋长，驻防宁县早胜一带；并派刘宝堂率 1 个步兵营同往，协助收编李培霄部队。刘志丹到宁县后，设立了办事处，收容张皮家塬、职田镇失散人员。王世泰闻知刘志丹的确切消息，也带在苏部运输队的部分队员前来归队，很快集中起四、五十人的队伍。在与李培霄谈判中，因满足不了李的条件，李拒绝收编。当时，陈珪璋部的谢牛、蒋云台两个旅也都在设法收编，结果收编不成，将李部打散了。

1984 年 1 月 10 日张秀山曾这样回忆“早胜事件”：

1931 年 4 月间，我从定西和高岗一块到了平凉，在新编十二师特务二团的团部第一次见到刘志丹，经高岗介绍与刘志丹接上组织关系，知道了他彬县入狱和被陈珪璋委任为十一旅旅长的情况。

陈珪璋为什么要委任刘志丹为旅长呢？这是因为当时甘肃各地小军阀割据，统治陇东 14 县的陈珪璋正在四面楚歌之中。彬县驻有包头土匪出身的苏雨生的骑兵旅（原骑兵第四师，此时被杨虎城收编为旅）；张廷芝在庆阳以东也想乘机霸占陈珪璋的一部分地盘；李培霄部队也在正宁一带活动。尤其是张应坤、杨万清、毕梅轩 3 个旅开始在镇原一带进攻。这 3 个旅原属甄寿山部，1930 年杨虎城从河南返回陕西后打垮了甄寿山部队，这 3 个旅逃跑到静宁、固原一带。1931 年春，杨万清部在固原消灭了小军阀黄德贵后，杨万清、张应坤、毕梅轩就联合起来进攻陈珪璋，想占领陇东地盘。陈珪璋处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委任刘志丹当旅长，想利用志丹收编李培霄，牵制张

廷芝和苏雨生，这样，陈部就得以集中兵力在北线作战，打垮张、杨、毕等部。

土军阀陈珪璋想利用刘志丹，我们也想利用陈珪璋给我们名义和防地，招兵买马成立我们的军队。志丹曾经不止一次说过：“我总要把陕北青年组成一支革命队伍”。当时十一旅旅部驻在宁县，志丹同志在宁县积极组建武装力量。他派人收编李培霄部（准备给编1个团），派人到南梁一带联络赵二娃、贾生财、杨培盛等旧部；并且接待收集各地方来的同志：在平凉就有从青海回来的曹华民、傅剑寒（都是湖北麻城县人，大革命失败后回到青海、甘肃等地活动）等。还有陕西、甘肃各地找刘志丹的一批同志。旅部成立后，志丹叫我当手枪队长，曹华民当书记官，陈鸿宾任参谋长，还有平凉人朱理凯等人也来到旅部，陈鸿宾被派回陕北活动后，朱理凯当参谋长。朱理凯家和平凉东关，他大革命时曾参加过党，这时已脱离党，但表示愿意革命，所以志丹叫他任参谋长（后来他在平凉给国民党干事了）。当时高岗在十一旅没有职务，他是陕西省委和刘志丹之间的联系人。记得我们在盘客原活动时，高岗和我曾在一个小庙里给陕西省委写过密信报告情况。因为志丹在旅部时身边还有非党员，所以要避开在小庙里草写。密信是先公开写几句问候的话，然后在背面用白矾水写报告，对方收到信以后，用碘酒一涂字就显出来了。

1931年7月间志丹在组织部队时，从宁县到平凉办事后，和刘宝堂等一同从平凉到宁县早胜镇和高广仁联络。这时高广仁又叛变当土匪了，把刘宝堂和志丹及我们缴械押起来，收缴了子弹和手枪、冲锋枪，步枪未收去。高广仁原是井岳秀部驻定边县的任和亭团的军官，他活动任团哗变出来到陇东投降陈珪璋，陈珪璋委任他为十三旅旅长。但高广仁匪性成惯，又叛变为匪，他的部队到了合水县店子原，打开北掌堡，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在我们被裹胁押解期间，沿途亲眼看见高部把西华池的几个青年妇女用骡马驮走，这些女人哭着离开了丈夫和儿女。后来，高匪窜到宁夏，被马鸿宾消灭。引自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

332-338 页。

1983 年 5 月 1 日，蒋云台讲述的“早胜事件”的内容是：

高广仁的叛变大约是那年西瓜长熟的时候。高广仁缴了刘志丹、刘宝堂及两个营的枪，并把二刘抓起来准备拉到陕北去。高叛变后的第 6 天，刘宝堂部下的连长尚生耀跑了出来，渡过马莲河到西峰向我报告，我才知道高叛变了。我立即向陈珪璋打电话，报告了高广仁叛变的情况，并建议把陈珪璋直接指挥的骑兵团、镇原七旅骑兵团和我旅驻合水的骑兵团调集起来，由我率领去撵高广仁。起初陈不同意，认为高叛变已经 6 天，可能跑远了，我们连调兵追赶就得十几天，那时高也许已经逃到了陕北。我认为，虽然高叛变已经 6 天，但仍未离开合水，正沿路打劫老百姓的堡子，我一定能截住他，况且他们是步兵，行军慢，骑兵一定能追得上。随后，陈就同意了我的建议。高部逃到（记不清是宁县还是合水的）安吉寨，把堡子打开，只留下十八九岁的一些女子驮在马上准备带走，其余的群众全杀了。陈珪璋的骑兵团和镇原七旅骑兵团来了之后，我即率他们前往合水。过了板桥、上了北原（庆阳东原），来到合水城的最高处葫芦把，看见骆驼巷有 1000 多人的队伍，乱七八糟地由南向北走，用望远镜一看，正是高广仁的部队。我当即命令陈珪璋的骑兵团和镇原七旅骑兵团冲下原去，从侧面攻击，我旅骑兵团由团长徐建勋率领，沿合水川向骆驼巷攻击，前后约 4 小时就将高广仁部全部打散。刘志丹和刘宝堂都跑了回来，我们对叛军残兵也没有追击。当天晚上我即派人到西峰向陈珪璋报告，第 2 天 3 个骑兵团各自返回驻地。当天晚上我和刘志丹谈话时，刘说他对不起陈珪璋，不愿回平凉，就回家去了。刘宝堂仍回平凉当了团长。早胜兵变是刘宝堂的责任，刘志丹没有责任。刘宝堂不但没有监视好高广仁，没有保护好刘志丹，反而让高广仁缴了枪。引自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 332-338 页。

但是张秀山回忆刘志丹“合水脱险”的经过更真实、更诡谲、更令人惊心动魄：

“高广仁派他手下一个姓马的团长押着我们到合水县东时，被陈珪璋的蒋云台旅（第五旅）打败。为了表示我们不是和高广仁一起叛变的，在火线上，刘宝堂就喊：“特务二团枪放下”！我们把没有子弹的枪支放下了，被蒋云台的士兵缴走。刘宝堂和我们又回到了陈珪璋的部队。但是蒋云台借口宁县失守要谋害刘志丹。实际上是因为争取收编李培霄的矛盾：蒋云台派人去收编李培霄部，李培霄知道蒋云台诡诈，不愿与他合作，要和刘志丹合作，蒋云台就妒嫉刘志丹。那天晚上我们驻在合水县城外的东关，刘宝堂进城见蒋云台谈早胜镇事变的经过，蒋云台对刘宝堂说宁县失守是刘志丹十一旅没有守住，要抓刘志丹。刘宝堂回到东关，把蒋云台的阴谋告诉了刘志丹，志丹只好出走。当时我和刘景范也要和他一起走，志丹说人多不方便，所以他只带了两个副官王璧成、李万才，冒着大雨走了（因为王璧成是哥老会的，在这一带熟悉，可以得到哥老会的保护）。

刘志丹离开合水时，指定张秀山负责部队党的工作，并委托张转告全体党员，留在陈珪璋部队积极创造条件，寻找机会搞兵变，为革命拉出武装。之后，部队编入刘宝堂部开赴平凉。

收编李培霄饥民武装，是刘志丹打着军阀旗号建军的第三次失败。

## 第七章 三嘉塬事件

### (1)

刘志丹冒雨溜出合水城后，在大雨淋漓的雨夜急急向南梁山中进发。不久，蒋云台亲自带人包围合水城东关客栈捉拿刘志丹。在东关客栈扑空后，疯狂地向城外追赶。刘志丹在山中一夜紧急跋涉，终于摆脱追捕，向合水蒿嘴堡奔去。途中遇见前来接应的马锡五大喜过望，途中与马锡五交谈中得悉了永宁山的情况。

马锡五轻叹道：“永宁山支部出事了，王子宜、曹力如、赵耀先等人都被井岳秀派兵以‘危害民国嫌疑罪’的名义，抓到榆林，下入大牢里。崔九焕县长也被撤职查办。”

刘志丹追问：“罪从何来？”

马锡五道：“你派刘兆庆去山西，枪买好后装入牛皮筒子运过黄河，藏在清涧一名共产党员家中，并给曹力如、王子宜去信，询问刘志丹的下落，信途经榆林被搜查机关查扣发现端倪，所以将刘兆庆等人抓捕，随后又电令延安高双成派人赴永宁山逮捕了王子宜、曹力如等人。”

刘志丹听后，心情沉重，半晌无语。永宁山支部的破坏，使逃难中的刘志丹更有一种雪上加霜的感觉。但他并没有被这一连串的失败和挫折吓倒，反而使他更加坚强。

在蒿嘴堡与贾生财相见双方分外亲热，贾生财正准备忙碌酒饭，招待刘志丹。刘志丹婉拒后警觉地说：“敌人不久便到，咱们还是到对面山上的庙里一叙吧。”

他们几个在庙外的树荫中坐下不久，山间小路上烟尘纷乱，一群骑兵突至蒿嘴堡。

贾生财惊叹道：“好险！多亏老刘机警，不然又会吃大亏……”

刘志丹说：“对敌斗争，一定要提高警惕，才能免受损失。”

他对贾生财说：“咱们就此别过，你快回堡子应付敌人，我们打算去夏家沟赵二娃那里，然后返回保安县。”

刘志丹一行连续翻越了几架大山，步行了几十里路，一天水米没打牙人困马乏，路过姚家园子村，巧遇姚姓人家请纸匠扎糊纸火，刘志丹顺手帮师傅画了几个金斗、银斗，受到主家的称赞，说刘志丹是“贵人遇难”，备饭留宿。

不日，刘志丹抵达夏家沟与赵二娃相见。刘志丹留马锡五帮赵二

娃整顿部队。他与王廷璧、李万才终于返回保安，探问刘兆庆、曹力如的情况。

1931年秋季，马锡五帮赵二娃整军月余后，离开夏家沟返回保安。这时，王廷璧、李万才也不愿再随刘志丹重入梢林，只剩刘志丹一人。马锡五自愿随刘志丹进行南梁考察的行程。

途中在榆树沟路遇刘志丹父亲派来的送信人纪脸子。父亲刘培基要刘志丹回家与张廷芝讲和妥协。刘志丹坚决拒绝，打发送信人走后，害怕行踪暴露，连夜赶路20余里。

南梁是横亘陕甘两省边界的一条大山脉，南北走向，南北长1千多里，东西宽约400余里，统称桥山山脉，境内群山迭嶂，沟壑连绵，森林密布，人烟稀少，是历代兵匪出没的地方，山上多筑防匪山寨，统称堡子，堡子座落山南，人们习惯将陕甘边方圆百里称为南梁堡。

南梁堡地区，包括甘肃境内的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二将川、林锦庙川、豹子川、大凤川、平定川、太白川、苗村川等地，陕西省保安县的义正川、吴堡川、脚扎川、白豹川、樊川、麻地台川、白沙川、瓦子川、三道川等地。以南梁堡为中心，周围有荔园堡，林锦庙、东华池、太白镇、油坊头、白沙川、白马庙、白石川八镇环绕，形成众星捧月之势，虎掌撑开之状。境内又有莲花寺、八卦寺、白云寺、青云寺、龙泉寺、双灵寺等18寺，像星星似的镶嵌其间。南梁两侧东有洛河，西有葫芦河，向西越过葫芦河，可直逼庆阳府；向东愈洛河可直抵延安府，向北可远眺内蒙古大草原，向南能俯瞰八百里秦川。

刘志丹和马锡五结伴偕行，翻山逾岭，走村入户，对南梁一带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进行详尽的考察，为形成以南梁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的思想奠定了基础。还是民歌唱得好——

陕甘高原千条路，

老刘走过每条路。

陕甘高原山连山，  
老刘爬过每座山。  
陕甘高原沟套沟，  
老刘钻过每条沟。  
村村户户记心上，  
山山水水了如掌。  
行军打仗不用图，  
地图绘在脑里头，  
大家亲切称老刘，  
真是一张活地图！

一个多月对南梁山区的实地考察使刘志丹深刻地认识到，从“三道川”事件、太白夺枪到早胜事件，三年的陕甘边兵运活动连续遭受挫折，创建红军的计划一再落空，血的教训使刘志丹对毛泽东的井冈山道路更加佩服，“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引自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95页。而“陕甘兵运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志丹》习仲勋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第4页。刘志丹决心改变创军方式，深入陕甘边的南梁地区，改造绿林武装，创建根据地。

南梁山区的考察结束后，刘志丹认为：南梁地处陕甘边界，地偏林密，反动力量统治薄弱，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大量集中在地主手里，穷苦百姓深受压迫剥削，有着极其强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愿望，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有利于屯兵养马，集蓄革命力量；山大沟深，森

林绵延数百里，有险可凭，回旋余地很大，有利于机动作战，开展游击战争。因此，南梁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各方面，都具备了发展武装割据的条件，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地。

刘志丹神采飞扬地对马锡五说：“锡五，南梁真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川，有沟，有梢林，又地处两省边界，敌人统治困难，我们活动方便。在这建一块根据地，再一步步向外扩展，就能把革命的红旗插遍西北高原……”

刘志丹偕马锡五急冲冲地向平定川走去，直奔葫芦河畔的倒水湾杨培盛兵马驻地。

途中在老场村的刘大妈家中歇脚，大妈看到老刘风洒雨耗，分外劳累，忙招呼他们上炕休息，让儿媳妇为老刘补衣服、补鞋，自己上到脑畔上，将八成熟的荞麦砍回来，用手揉搓下来，用碗支碎，用铧筛成面粉，为老刘他们做了一顿香喷喷的荞面饸饹。饭后刘志丹才知晓荞面的来历，大为感动，临行时悄悄在炕边给大妈塞了两块银元。

自张皮家塬失败和职田镇被缴械以后，赵连璧、同守孝先后回到南梁地区，聚集旧部，从头干起，这时已各自拉起一支队伍。同守孝被叛徒李庚姓打死，队伍与赵连璧合在一起，约 200 多人，在太白一带活动。杨培盛在平定川也拉起几十个人的饥民武装。1931 年 9 月，刘志丹来到平定川倒水湾杨培盛部驻地，并派人通知赵连璧、贾生财率部前来会合，再次进行整编。全队共 300 多人，分编为 3 个大队，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才分别任一、二、三大队队长，刘景范、白冠五分别任一、二大队副队长。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官。游击队当时未正式命名，群众通常称之为南梁游击队。

南梁游击队的核心是刘志丹、刘景范等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及党在几年兵运工作中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基本成份是受国民党反动派剥削压迫而破产的贫苦农民。这部分人如赵连璧、杨培盛等，当时被称为土匪；贾生财是民团团总。实际他们都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本人都曾经逃荒要饭，或者以拉长工、打短工、当店员为生，因为生活

过不下去上山落草，或吃粮当兵。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扶植豢养的土匪、民团有本质区别。他们的身世和革命道路大致如下：

赵连璧，乳名二娃，陕西保安白沙川人。家庭出身贫农，并当雇工 11 年，农闲即以打猎为生。1929 年为逃避地主逼债，到合水县太白镇民团当兵，后任班长。刘志丹太白收枪时曾作内应。太白收枪后，刘志丹见其勇敢，且有活动能力，给他 5 支枪，要他在太白一带拉队伍。不久，他便动员了数十名贫苦农民，并收编了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残部和当地民团三、四十人，部队扩大到 100 多人。麻峪村整编时，被编为三连。1931 年 2 月，宁县张皮家塬战斗突围后，与部队失去联系，只带几个人回到太白山区，很快又集合起失散人员四、五十人，十几支枪，后又缴获当地民团二、三十支枪，就地坚持游击。到当年夏天，部队又发展到百余人。刘志丹合水脱险后，由贾生财护送到他的驻地夏家沟，并留马锡五帮助他整顿部队。在刘志丹等人的帮助教育下，逐步树立起革命思想，表示坚决跟刘志丹为穷人打天下。陈珪璋曾以营长之职为诱饵收编，他说：“我宁愿跟着刘志丹当兵，也不给陈珪璋当营长。”

杨培盛，陕西米脂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店员。1930 年冬，讨保向镇川堡商人举债，在南梁山区收购皮货，被土匪陶老三抢劫一空，不敢回家，在白马庙川给人打短工度日。后经刘志丹启发教育，开始走上反压迫的道路。一次他徒手夺了赵富奎民团一团丁的枪，要跟上刘志丹闹革命，刘志丹见他忠厚老实，又有办法，就又给了他 1 支枪，要他去联络一批由陕北逃荒来南梁山区的难民，组织游击队。他很快动员几十个难民，拿着大刀长矛在平定川一带游击。以后又缴获旦八寨民团和张廷芝匪部的枪 30 多支，队伍很快发展到 100 多人。

贾生财，陕西横山人，家庭出身贫农，幼年随父逃荒到合水山区落户，靠给地主拉长工维持生活。他聪明能干，由于不堪忍受地主的剥削压迫，到驻合水城关的陇东民团军中当兵，以后当了班长、排长。1930 年夏，刘志丹在陇东民团军做兵运工作时，他曾与刘志丹有过交往，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麻峪村整编时，他拉出所在部队 40 多

人参加刘志丹游击队，任连长。张皮家塬战斗中，部队被打散，他带20多人突围回到合水山区，利用社会关系当上了合水东区民团团总，驻扎蒿嘴铺，作为权宜之计。刘志丹彬县出狱后，派马锡五到合水，住在他的团部做联络工作。早胜事件后，刘志丹从合水脱险，幸亏他的掩护，并把刘志丹护送到夏家沟，躲过了陈珪璋部第五旅的追捕，倒水湾改编时，他将蒿嘴铺民团50余人、30多支枪以及由他联络的五、六十人先后拉出参加改编，并出任大队长。谷聚山任副大队长。

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都是在刘志丹直接帮助教育下，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陕甘边区红军初创阶段的骨干。

刘志丹在倒水湾进行著名的“倒水湾整编”，是中共在陕甘边的革命斗争从“兵运”工作阶段向独立创造革命武装阶段过渡的转折点；“倒水湾整编”是共产党在陕甘边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尝试。如何在从未受到大革命风暴洗礼的陕甘边界偏僻山区将旧式的、成分复杂的、作风松懈纪律涣散的旧式农民武装，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这是在“倒水湾整编”前后刘志丹认真考虑并逐步解决的重大问题。几年的“兵运”工作挫折使刘志丹认识到，能否建设一支具有坚定的政治觉悟和严格的纪律观念的人民军队，是武装斗争成败的关键。因此，在“倒水湾整编”期间及其前后，刘志丹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工作。

第一，保证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使南梁游击队成为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力量。

刘志丹非常重视党对部队的领导工作。1931年8月“早胜事件”后，刘志丹不顾个人安危及时地保护了党的组织和从事“兵运”的党员干部。他在合水脱险前，委托同情革命的陈珪璋部警卫团长刘宝堂对共产党从事“兵运”工作的同志加以保护，并安排张秀山负责党的工作，魏佑民负责行政工作。这样不但避免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遭受损失，而且保持了与上级党委——中共陕西省委的联系。

由于刘志丹的精心安排，在三年“兵运”工作中锻炼成长起来的

一批坚强的党的军政干部在“倒水湾整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过“倒水湾整编”，共产党在南梁游击队中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保证了党在组织上对部队的政治领导，同时还使一批党员骨干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这些干部在后来的陕甘边革命斗争乃至西北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加强对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使其在政治素养上得到提高。

1930年10月，“太白起义”时，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等人就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起义部队。1931年2月，起义部队在张皮家塬被打散后，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等人返回南梁、合水一带拉起了三支农民武装约300余人。他们聚集在子午岭梢林，杀富济贫，反抗国民党反动官府及豪绅的压迫。8月，刘志丹奔走于这三支农民武装之间，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贾生财、赵连璧、杨培盛等人提高了思想认识，树立了革命信念。刘志丹这些改造农民武装的工作为“倒水湾整编”创造了有利条件，保证了“倒水湾整编”的顺利进行。经过整编以后，这三支农民武装力量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被整编成为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人民武装——南梁游击队，为陕甘边正规红军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彻底抛弃军阀部队的番号，向公开“打红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倒水湾整编”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尽管没有被正式命名（游击队经常活动于南梁一带，当地群众约定俗成地称之为“南梁游击队”，陕西省委称之为“陕甘边境游击队”）、没有公开打出红旗，但它毕竟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倒水湾整编”是中共在陕甘边第一次抛弃了一切反动军阀番号的建军行动。它向公开地“打红旗”迈出重要的一步，意义极为深远。

“倒水湾整编”揭开了陕甘边游击战争的新篇章。“倒水湾整编”后，南梁游击队依托南梁一带子午岭山区展开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

它的影响迅速地 在陕甘两省传播开来，使反动统治者极为震惊，慌忙调来军队向南梁游击队发起进攻。1931年10月，惯匪张廷芝的一个骑兵连由北向南直扑南梁二将川，与此相呼应，陇东军阀陈珪璋部的一个营及合水地主民团也乘机由南向北进犯南梁大凤川。很明显，敌人企图用南北夹击的战术，阴谋将刚诞生的红色武装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严重的敌情，刘志丹决心利用南梁一带的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他命令第一大队北上二将川诱歼张廷芝的骑兵连；第二、三大队迎击南线进犯之敌陈珪璋部及合水地主民团，以便粉碎敌人的罪恶阴谋。

在刘志丹的周密部署下，赵连璧率领的第一大队以出其不意的战术，首战二将川，旗开得胜，一举消灭张廷芝部骑兵连，缴枪20余支，战马40余匹。不久奋战在南线的二、三大队协同作战，彻底打垮了合水民团的进攻，并迫使陈珪璋部退出南梁地区。经过这次反围攻战斗，南梁游击队不仅在军事上站稳了脚跟，打开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使部队迅速扩大到400余人，而且还在政治上扩大了共产党在陕甘边的影响，从此，陕甘边的武装斗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有民歌传唱：

南梁山上插红旗，

映红陕甘山和水。

刘志丹山上喊一声，

遍地的穷人齐响应。

放羊娃娃揽工汉，

争相报名把军参。

红军是咱大救星，

要想翻身当红军。

## (2)

南梁游击队首战二将川和大凤川旗开得胜后，倒水湾军民都沉浸在欢乐之中，军需官马锡五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杀猪宰羊，安排宴席。这时，侦察员向刘志丹报告，晋西游击队由山西西渡黄河，在玉家湾又收编了几股商贩保运队，已经进抵保安县境，要到南梁与刘志丹会合。刘志丹一听这消息十分高兴，立即组织召开干部会，研究迎接晋西游击队到南梁会合的具体事宜。刘志丹在会上派刘景范前往保安联络，派马锡五到林锦庙一带动员群众，筹备粮草，做好部队会合的准备。随后刘志丹率领全队进军南梁山中，由于南梁山中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刘志丹将部队按支队分开活动，自己仅留少数队友在南梁深山活动。刘志丹走村入户向村民宣传革命道理，熟悉当地的人物风情，亲赴南梁堡、石嘴子，拜会哥老会龙头大爷郑德明，结交民间艺人朱子清等人，引导他们支持革命。在刘志丹的感召下，郑德明与南梁地区的哥老会都公开拥护共产党的主张，郑德明家逐渐成了游击队的联络点，朱子清更是利用说书的形式，逐村逐户宣传刘志丹闹革命的消息。

不久，刘景范返回南梁向刘志丹汇报了与晋西游击队的联系情况。

1931年10月下旬，陕北游击支队寻找刘志丹部队来到南梁，曾分驻于南梁堡、阎洼子等地。不久，又移驻东华池、太白。南梁游击队得到消息后，遂派刘景范去东华池与师储杰、杨重远等负责人接洽。随之，两支游击队在东华池、林锦庙一带会合，部队共约700人，重新开赴南梁荔园堡一带驻扎。

10月初，谢子长、高岗等受陕西省委指派，去平凉了解党在陇东陈珪璋部队的兵运工作情况。在此期间，会师部队派马云泽去平凉，谢子长从马云泽那里知道两支游击队已会师，于11月上旬与高岗等来到南梁，向部队传达了省委指示。因当时已入严冬，会师部队吃饭及冬装问题无法解决，遂决定将部队暂编归陈珪璋部，仍借用十一旅

的番号，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辖两个团，陕北游击支队编为第一团，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团。陈珪璋部划给防地，解决供给。由于刘志丹对省委的这一指示表示不理解，认为现在有 1000 余人的部队，应独立行动，打出红旗，创立根据地。再将部队编入军阀队伍中又会吃大亏……刘志丹要求派人去西安，向省委禀明情况，请示省委能否再研究一下，让他们自己去搞……谢子长表示同意。派高岗去西安，向陕西省委请示汇报工作。改编后，又派马云泽去平凉办理编制，领取军需印信等。在众多地方军阀环视的险恶环境中的陈珪璋爽快地接受了谢子长的收编条件，为南梁游击队拨冬衣鞋帽一千多套，军饷三千余元，修造枪械工具 15 驮，修械工人 20 余名，西药一驮，军医、护士两名。部队即开赴庆阳新堡、城壕川张家沟门一带驻扎，休息整训。

12 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荣子卿来部队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即有名的《陕西省委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

团委转诸同志：

省委听了××同志报告后，关于你们的工作有以下的指示，希望你们深刻讨论，坚决执行：

一、目前陕西正是几年灾荒中，农民群众受不了豪绅地主、国民党军阀政府的压榨剥削，反抗的斗争普遍的起来；士兵群众受不了生活的痛苦、官长的野蛮待遇，自发的哗变逃亡斗争，弥漫各部队。这些群众斗争，在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已经成立，红军胜利与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在陕西剧烈扩大情形之下，必然要更加迅速的发展前去。这一开展形势正需要我们党坚决领导农民革命的游击战争与革命的兵士哗变，才能推进斗争的发展与保障他的胜利，使正在开展的群众斗争，汇合到苏维埃的旗帜下来。这一客观的政治形势是非常有利于你们发展的条件。

二、在这一形势下面无疑的你们行动的方针，是应加紧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的各种工作，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区

域和方向应以关中道的三水、淳化、富平、三原、长武等为主要方向。因为这些地方党与群众是有相当的基础，尤其是在三原、富平一带，县农民斗争是高涨的区域。所以你们将来必须和这区域内的农民斗争配合起来。

三、为要实行这个行动方针，必须执行下列的具体工作：

(1) 发展群众斗争，组织群众。根据××同志的报告你们现在所住的区域，虽然人家稀少，但这些人都是最贫苦的贫农和中农，尤其是贫农，你们绝不应该因为人少即放弃这些贫农和中农的工作。相反你们必须在这些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得到这些农民热烈的拥护，才能有很好的发展前途，所以你们必须马上在这些农民中建立农民委员会、雇农苦力工会的群众组织。在这些群众组织领导之下，没收豪绅地主食粮分配给农民，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焚毁豪绅地主契约，反抗高利贷等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这些切身利益斗争中，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党的政治口号的宣传鼓动。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使群众对你们有相当的认识。起码要打破群众对你们是“好土匪”的认识，这样才能扩大到附近区域而得到更广大的群众的拥护。

(2) 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影响。你们现在所处的区域，因为交通的不便，文化的落后，大革命的影响非常微弱或者根本没有，苏维埃运动的影响自然更是听不着的。唯其因为如此，所以你们在行动的过程中，和群众组织中，首先要集中力量向群众解释苏维埃政府是什么？国民政府是什么？苏维埃区域内的群众生活和国民政府下的群众生活比较起来，而尤其主要的是把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法令、劳动法令，非常通俗的在广大群众中广泛的宣传，使群众根本认识只有推翻现在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有根本的办法和唯一的出路，以提高群众斗争勇气和决心，以提高群众政治认识。进行这一工作必须经常召集群众大会、讲演会，利用当地的通俗歌谣、小曲、书房、夜校等办法去扩大。但主要的是在群众组织中，在每个斗争过程中，给群众解释，才更容易使群众了解和扩大这一影响。

(3) 加强本部队政治教育，改变现有成份。你们现在的部队成份是非常不好，又不是从群众斗争中产生出来，大部分还是土匪成份，流氓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这样部队决不能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同时现在的土匪行动还是继续，这样无疑的是得不到群众的拥护的。因此，现在的唯一迫切工作是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工作，首先应找比较先进的份子成立干部训练队，每天规定几点钟课程，用讨论方式讨论游击战争中几个问题，使这些干部在政治上能够有坚定的认识，为游击战争中的中心领导骨干。对于一般群众亦应经常召集大会、小组会，公开报告和讨论党在游击战争中的各种策略问题，尤其是关于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历史与苏区中的各种实际情况。对于目前部队成份的改变，只有一方面加强政治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尽（大）量的吸收附近的贫农、雇农、苦力来参加，使逐渐转变到这些成份上面来。在每次行动中都应征调一些贫农、雇农、苦力进来。

(4) 加紧附近白军中的士兵工作。必须马上选择本部队中勇敢积极，认识比较好的群众，派遣打入附近的军队中去。在这些军队的士兵群众中建立兄弟会、士兵委员会等组织，领导士兵的（要）伙食、反抗官长的日常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加紧革命兵变的鼓动工作，给士兵群众中指出，只有举行革命兵变和农民配合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才是根本的出路。同时必须扩大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在这些士兵群众中的影响。在这些工作上面，组织革命兵变和你们的部队能够汇合起来。

(5) 健全党的组织，转变党的成份，树立铁的纪律。现在党的组织仅有其名而已，党的成份又很不好，党内流氓意识非常浓厚。目前党的工作仅是建立在一个同志的威信上面，这是非常危险的。使一切工作的进行形成为个人英雄式的领导，使党的政治领导绝对不能加强的。结果呢？一定根本脱离党的政治路线，而造成乱烧乱抢的土匪行动。因此你们必须首先健全党的组织，团委必须加强自己的工作；根据这个指示信拟定自己的工作计划，举行经常的会议定期检查一切工作进行成绩；发展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自我批评。应积极转变党的成份，党的组织要建立在雇农、贫农、苦力出身的群众上面。在地

方农民群众中、军队中普遍的建立起党的组织来；同时必须加强党内教育工作，举行党的训练班，以加强党员群众的无产阶级教育，以转变党的成份。支部中的铁的纪律亦必须建立起来，尤其是在成份不好的部队内更为重要。必须分配每个同志以具体工作，团委与支部书记经常检查，如果消极怠工，不执行党的决议时加以毫不客气的自我批评；如果教育再不能改正时，即严格的加以组织上的制裁，把党内的异己分子逐渐淘汰出去。引自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历史文献部分。

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示南梁游击队应该根据“九·一八”事件后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和西北革命形势的变化，将会师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南下关中地区创建平原根据地。信中还严厉指责南梁游击队林锦庙会师及在陇东活动是“单纯的军事投机”，断言南梁一带“完全是荒山，几年为土匪的骚扰，人口密度稀到极点，大革命的影响丝毫没有，行动上完全没有办法”。因此，他们要求部队先向陕西三水（即今旬邑）、淳化，甘肃正宁一带发展，然后，向陕西关中道移动，进军西安附近的平原地区，建立所谓的城市苏区。受这种思想的限制，会师部队不可能就地完成整顿和改编，并投入开创南梁根据地的斗争，这样就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开创工作整整延迟了两年多时间。

庆阳新堡整训期间，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内部围绕陕西省委关于部队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指示展开了争论，刘志丹认为陕甘边南梁一带地形较好，部队应留在这里开展活动，谢子长主张部队应无条件地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南下关中，建立根据地。这次争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1931年12月底，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离开新堡、悦乐，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沿子午岭西侧南下，击溃陈珪璋部两个连的阻击。1932年1月初，部队到达正宁县东北的柴桥子村驻扎。在这里，谢子长主持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会上，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宣布“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成立，谢子长任同盟军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

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荣子卿任委员。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由原陕北游击支队改编，支队长师储杰，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大队长杨鼎，副大队长吴岱峰），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钧，副大队长陈玉清），警卫队（队长白锡林）；第二支队，由原南梁游击队改编，支队长刘志丹，参谋长朱理凯，军需马锡五，亦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盛，副大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副大队长谷聚山），警卫队（队长刘丕杰）。两个支队共约 700 余人。

在两个支队中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以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大会上，举行了授旗仪式，由中共旬邑县特支书记第五伯昌授军旗。谢子长、刘志丹、荣子卿都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场群情振奋，掌声雷动。会后，西北反帝同盟军即向正宁三嘉塬转移，并在三嘉塬一带整训待命。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整训待命期间，以各种形式向贫苦农民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铲除封建剥削，摧毁封建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办事的军队等革命道理。加之西北反帝同盟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群众打成一片，这就使长期遭受兵匪残害和封建地主豪绅压迫的陇东人民对西北反帝同盟军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参加部队。正宁一带的农民还用民歌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热爱和对红色政权的向往之情：

中华民国二十年，

红军起首三嘉塬。

谢浩如，刘志丹，

打土豪，分田产，

一心给穷人把事办。

(3)

刘景范 1983 年 5 月 16 日在谈陕甘边早期革命武装斗争时讲到：“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三嘉塬期间军党委内部和领导者之间在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和整顿问题以及部队供给问题上发生争议。第一，在哪一带搞根据地？刘志丹主张在桥山北段的保安、庆阳、合水、甘泉好，这里敌人势力薄弱，活动范围大，党在这里搞了几年武装斗争，群众很拥护我们；谢子长、荣子卿认为关中影响大，号召力也大。群众、部队容易发展等。第二，整顿部队。同盟军是各方面汇集起来的，成份很复杂（一支队中有许多地痞流氓，大部分吸食大烟。二支队也混入吸大烟的地痞流氓）需要整顿，意见是一致的。如何整顿法？谢子长提出，对那些成份复杂不可靠的部队，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刘志丹不同意，主张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第三，部队发不发饷？子长提出，为了体现官兵一律平等，易于扩大部队，同盟军不论官兵每人每月发 20 个银元的饷；刘志丹不同意，说我们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靠打土豪筹款，只能解决吃饭问题，那有这么多的钱发饷。这三条争议在新堡没统一，部队就向南开了。

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柴桥子，部队编制完成后，志丹先后召集二支队的党支部（当时我是支部组织委员）和各大队领导开会，研究整顿工作。二支队整顿中清洗了混入部队的十几名地痞流氓，每人给 1 头毛驴让其回家。当时部队生活很困难，就决定打土豪，两个支队都打了，二支队派赵连璧到湘乐川打了一个土豪的寨子，没收了些现洋、大烟土，还有几口猪、几头骡子，过旧历年的三十日晚上，会了一顿饭，每人发了 2 元鞋袜费和零用钱。”②均引自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凤阁、任愚公《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调查资料部分）。

雷恩俊 1979 年 7 月 24 日回忆：

“——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谢子长在他的驻地召集反帝同盟军一支队大队长以上党员负责人开会，讨论群众纪律问题，荣子卿、杨重远、阎红彦、白锡龄、胡廷俊、我都参加了。师储杰未参加，怕走露消息，也没有通知刘志丹参加。会上，子长说赵二娃等人违犯群众纪律，把群众的辘辘故意丢下井，晚上出去抢人，抢老百姓的东西，搞得群众害怕我们，让大家讨论怎么办？参加会的同志都说我们不能脱离群众，改造不行，要采取坚决措施。最后决定用部队开拔集合讲话机会收二支队的枪，处决赵二娃。第二天（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早上，整个部队集合在三嘉塬一群众的打麦场上，子长站在场边一个粪堆上讲话，话一毕，白锡龄就一枪打死了赵二娃，并收了二支队的枪。②

南梁游击队员张占荣 1985 年 4 月 11 日这样回忆三嘉塬事件：

——1931 年古历腊月初上，我们从庆阳新堡城壕川起身，途经盘客的罗后、荏掌时还在那里宿过营，打败了赵润才民团，一支队还杀了荏掌堡子里面的 21 名群众，后来听说是强世清的陕北一支队里面的一个叫郭立本的战士带头干的事。当天晚上高岗在荏掌庙开会追查此事时，才知道郭在干了坏事后立即跑脱了。

北柴桥子改番号后，又转移到正宁的三嘉原（塬），这时已是腊月，眼看要过年了，部队穷得叮当响，队委会决定打土豪筹备年茶食，两个支队都去打土豪。听说赵二娃在打土豪过程中太过火，抢了永和集，在双佛堂一带连一般老百姓的猪肉吊子都提来了，群众告到谢浩如跟前，谢和刘志丹商量要整顿军纪。我记得大约是腊月二十八在细咀子一个大场里开的会，天爷还下了一鸡爪子厚的雪。会议一开始，先讲话。他讲话时站在场里的一个碌碡上，事前叫部队把枪放在场边架起来。在×××讲了一阵后，猛然提高声音说：“我们这个队伍太复杂了，有的人挂的羊头卖的狗肉。”这时，××暗没防抱住了赵二娃，×××立即掏出了手枪打死了赵二娃。部队马上有些动乱，谷聚

山质问，为什么要打人，不知是谁回答说：“他抢了人，是土匪。”谷聚山就这么一质问，当即也挨了一枪，被打死了。有个叫周毛牛的战士正要跑到场边摸枪，也被打伤了。在打倒了赵二娃以后，气氛很紧张，有的人吓呆了，有的人吓跑了，看热闹的群众满堆乱跑，都不知道为什么。气氛稍微平静后，我看到刘志丹蹲在场边的一个硬辕子车的辕上，情绪很低沉，连一句话都没说，一声没吭。快天黑的时候，我有意找借口打探刘志丹的情况，找来找去，我见刘志丹和马锡五两个人住在一群众家里，马锡五蹲在炕边上，刘志丹斜身躺在炕的另一边，盒子枪还在大挎着，不知两人在低声说什么，门上也没有站岗的。从这天以后，我就好久再没见到刘志丹，只听说他把白冠五送到西安看伤去了。引自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调查资料部分）。

杨培盛 1983 年 8 月 27 日回忆：

腊月，快过年了，各队抽人去打土豪，搞年茶食，共去了二、三十人。赵二娃领的人在永和抢了集，拉回来五六个毛驴。过了几天队伍要开，集合在一个场里，一支队向东，二支队向西，我和赵二娃并排站。赵二娃跟前站的阎红彦、白锡龄、强龙光等。部队站好后，×××讲话说：“赵二娃是老土匪，杨培盛是半年的土匪。一支队缴二支队的枪，”当即白锡龄开枪打死了赵二娃。谷聚山刚要反抗，不知谁从后面把谷打死了。白冠五（二大队指导员）也被打伤，子弹是从裤裆里打过去的。当时刘志丹并没有反抗，×××说要缴二支队的枪，刘志丹把枪扔给×××，×不要，又还给志丹了。我在场边树梢后面躲了一下，后又转回来。二支队从此就散伙了。师储杰带了些人投杨虎城去了。第三天，我去小石崖了。临行，谢还给了我路费，他只给干部，不给士兵。我去后一直在小石崖给人下苦，维持生活。刘志丹失败 3 次，赵二娃都跟着，赵二娃是被冤杀了。一支队也抢人，路过盘客原打开人家寨子，打死几十个人。这是咋说呢？引自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调查资料部分）。

正宁三嘉塬村民梁怀德 1985 年 9 月回忆三嘉塬事件：

谢浩如、刘志丹部队民国 20 年（1931 年）腊月初五来到三嘉塬，先驻后坡、锦章村，刘志丹驻细嘴子张有芳（张万有）家中，谢浩如驻锦章张积发家，指挥部设锦章村。正月，有部分部队驻索络南庄子村。部队驻防期间，赵营长（赵二娃）腊月二十四日带队伍抢了永和集，主要抢了些大烟土（那时做买卖的把大烟土摆在大街上卖）和布匹，抢集的人回到黄柏峴子时，未抢集的打了几枪，回到南庄子。以后刘志丹、谢浩如知道了，在腊月二十八日以开拔为名，把部队集合在一起，把枪架起放在场边，×××站在碌碡上讲了几句话，×手下的人把赵营长等 3 人打死了，打伤了 2 人。我们在场边看的约百人，枪一响，部队和群众都跑了。埋赵营长时，买了南庄子王自成（王保西之父）的黑油漆棺材。另一个买了武成信未油的棺材。有一个负伤的，部队叫我在车庄子派张积富、范存树、武有娃等 4 个人送到彬县水帘洞……②③引自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调查资料部分）。

正宁县三嘉东村党员武智学 1983 年 3 月谈三嘉塬事件：

1931 年腊月，陕甘游击队来三嘉塬，驻在后坡、细嘴子、锦章等村。二十四日，赵二娃抢了永和集，二十八日早饭后，部队到南庄子开会，把枪架在一边。总指挥×××站在碌碡上讲了几句话，就开了枪，当场打死了赵二娃和另一个人，杨培盛跑了，一个姓白的队长负伤后，我们在东庄派了 4 个人送到彬县治疗，每人得了两块钱工钱。南庄子村派人送了赵二娃的家属。埋这几个人时，赵二娃用了王保西父亲的黑油漆棺材，另一个人占用了武成信家的棺材②。

正宁县三嘉村民张积耀谈三嘉塬事件：

民国 20 年（1931 年）腊月初五，我给父母做棺材，正给棺材上颜色，谢浩如部队来了，木匠被吓跑了。当时，赵、杨二营长驻索络村，刘志丹驻细嘴子。后来部队上把 1 个战士打死了，用了我母亲的棺材，给了我 1 头毛驴，顶了棺材价。听说赵营长也被打死了③。

雷恩俊回忆：

三嘉塬事件中，收二支队的枪，师储杰心里有些害怕，加上部队宣布要进行整顿，严明纪律，过去干土匪的都觉得不大自由了，就暗地里活动师叛变。正月初三晚上，师派他侄儿来找我，说第七中队长马风银（我发展的党员，与我关系好）肚子痛，叫我去看看，我一进门，就被用4把盒子枪逼住下了枪。大队副程玉清也被扣押了。当时原准备把我俩及子长、红彦等都打死后再叛变，但马风银坚决反对，说：“你们不愿在这里干就走，但不能伤害1个人。”马的话师还是中听的。于是，这天晚上就把我和程两人押上偷偷地带上部队开到了南梁的阎洼子。到了南梁后，马劝我留下和他们一起干，我说我不当土匪，他们便把我俩放了，我就回了陕北。我们走后，听说张廷祥派了两个人收编未成，打了一仗，马风银被打死，师部受损后到西安投靠了杨虎城的孙苍浪团，师储杰放弃部队经商去了。

刘景范回忆三嘉塬事件的结尾：

收枪后，××宣布二支队解散，押了志丹，开除了二支队40多名干部，战士各自回家。当时二支队哭成一团，我后来给××说情，他给我和马锡五两人1头毛驴作路费，让我们回家。临走时我想见一面志丹，他们都不让，当时二支队干部只留了一个刘约三。

我到职田镇马家堡子碰见高岗从省委来，高岗到三嘉塬后放出了志丹。我在西安住了1个月，志丹来西安后就让我和白冠五一块到谷莲舫的部队搞兵运工作了。

收枪后的当天晚上，师储杰带上他的200多人跑了，当时七、八百人的部队，只剩下100多人。在这件事上，××是犯了严重错误。这个同志有时“左”得很。志丹到陕西省委汇报了这个情况，省委批评了××引自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调查资料部分）。

三嘉塬事件在陕甘边历史上影响很大，有人又称“三嘉塬缴枪”，它瓦解了第二支队，同时也引起了第一支队内部非党干部和部分战士

的恐慌。在当天晚上，第一支队队长师储杰即带领 100 余人连夜出走，不久投靠了杨虎城，削弱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力量，部队由 700 余人锐减为 200 余人。由于使用对整个部队缴械这种错误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和部队的争论，因而在党内和部队内部造成了隔阂，留下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隔阂和遗留下的问题，中共中央在时隔半个世纪后 1985 年 9 月 4 日至 10 日，专门邀请原在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工作的部分领导干部，对若干有争论的问题及如何处理进行了座谈。座谈内容由冯文彬、宋时轮整理起草了《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报告》对“三嘉塬事件”所作的结论中说：“队伍成份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志丹）、谢（子长）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杰出代表。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时的重要领导人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去追查个人责任。”

中央办公厅在印发冯文彬、宋时轮起草的《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的通知中指出：“今后对西北红军历史有关问题的提法，应以这个《报告》为准。”至此，“三嘉塬事件”这一历史悲剧才得以澄清，是非曲直才有了正确的判断标准。

## 第八章 照金血色

### (1)

在三嘉塬整训期间，谢子长曾试图通过与杨虎城谈判接受其改编。

他派人通过中共地下党员、时任杨虎城部警卫团长的张汉民了解杨虎城的态度，结果因杨虎城提出先缴械，后改编的主张，谢子长遂放弃接受其改编的计划。

此时，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到西北反帝同盟军传达省委的新指示：要求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在改编完成后立即南下渭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由于“三嘉塬事件”削弱了部队的力量，陕西省委又指示三原县武字区和旬邑地下党组织动员了 100 余名青年贫苦农民前来参军，充实部队。

1932 年 2 月 12 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村隆重召开。细嘴子的麦场上搭起了一座高台，台上悬挂着巨幅横标，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大会”。台子两旁镰刀斧头的红旗和各色旗交相辉映，随风飘扬。几百名战士都系着红带子，手中的枪刺银光闪闪，赤卫队的梭标红缨似火。正宁、旬邑一带的老百姓抬着猪、羊，吹着唢呐，前来庆贺，整个会场既显得威武雄壮，又显得热烈欢乐。在这威武而又热烈的气氛中，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宣布了游击队的编制和主要干部名单。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杨重远任参谋长。此时刘志丹已离开部队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因而未任职。陕甘红军游击队下辖两个大队，一个骑兵队，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政治委员杨重远兼，第二大队大队长吴岱峰，政治委员高岗，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政治委员胡廷俊，骑兵队队长强龙光，全军共 360 余人。同时，还成立了中共陕甘红军游击队委员会（简称“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在各大队也建立了党支部，并任命了政治工作人员。然后举行了授旗仪式，旬邑县委书记第五伯昌将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授给了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霎时间会场一片欢腾，数百人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等口号，口号声经久不息，震荡山川。接着，李杰夫、谢子长和农民代表黄子祥先后讲话，

这天的军人大会气氛热烈、群情激动，游击队员们颈系“牺牲带”，表示要为中国革命不怕流血牺牲，奋斗到底，人们向往已久的正式红军终于诞生了，陇东高原上第一次高高升起了工农革命的红旗，这怎能不叫人激动万分呢？

2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关于成立陕甘游击队给中央的报告，3月1日中央接到报告，内容如下——

中央：

现在陕西省有我们领导下的一部分军事力量，现在名义是反帝同盟军，党预备转变成为革命的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将经过情形及省委的指示与计划详细报告：

这个部队的中心力量，是过去山西的游击队，当红军廿四军行动向陕西发展时，山西即令这个游击队到陕西来，开发游击战争，帮助廿四军，但山西省委当时并没有给他们在政治上以丝毫的指示，只是令他们到陕北去，这是游击队军事负责同志绕到西安与陕西省委接头，当时省委谈及他们的行动时在政治上没有丝毫的了解，只有单独式的军事投机与土匪式的乱枪乱烧。当时常委即指出他（们）在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但他们的实际力量都已到陕北，人数一百余，枪五、六十支，在陕北单纯的军事上与井岳秀部大小十五战，解决井部军队压迫开到陕甘边境保安一带，这些区域完全是荒山，几年来为土匪的骚扰，人口密度稀到极点，给养人〔及〕大革命的影响，丝毫没有，行动上完全没有办法。当这个军事负责同志到部队中去时，省委指示他们向陕西关中道移动，首先在三水（栒邑）、淳化、甘肃正宁一带发展。当这个同志到部队中时已受甘肃小军阀陈珪璋收编，和其他土匪混合，共编入两团，人数六百余人，枪二百余支，机关枪二十余支，党的组织已成立团委。派同志向省委报告，当时即派军委负责同志去工作，不久，他们就将陈珪璋一连人解决，缴枪一百余支，名义改称反帝同盟军，成立总指挥部，编为两个支部〔队〕，设支队司令二人，发表对外宣言，总指挥即山西过来的那个负责同志，这完全是他们自己干

的，并不是根据省委指示。当时为什么要叫反帝同盟军，因各部队太复杂，都是过去的土匪，流氓无产阶级，充满到处乱枪乱烧，不敢揭出工农游击队和“红军”等名义，因为恐怕在群众中的政治信仰倒地，离开广大群众，因此即改此名义。执行省委指示向陕甘边境——三水、正宁开拔时，途中抢掠烧杀无所不为，即将我们同志最多、枪支战斗力最好的一个中心大队改为警卫队（即执法队）直属军事委员会，镇压土匪的抢掠行动完全没有了，变为公买共卖的好军队，游击战争纲领还是根本没有执行，这即他们的经过情形。

### 该部队的客观条件

目前该部队在陕甘边境的三水、正宁，各种条件，都是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发展：

A、群众方向[面]，这一带的农村阶级分化非常显[鲜]明尖锐，佃农占70%以上，全县土地几乎完全（掌）握在两、三个大豪绅手里，豪绅对农民生死予夺无所不为，苛捐杂税高利贷各种方式的剥削，都是特别严重，因此，农民对豪绅对抗形成极尖锐的形势，有些地方（三原、富平等）去年收成还是不好，冬荒时大多数群众，没有饭吃，春荒到来更是没有办法，因此在群众方面，只有这个部队能够坚决的执行游击战争纲领——分配食粮，烧毁一切契约，摧毁豪绅统治，分配土地等等，无疑的是获得成千成万农民群众热烈的拥护。

B、群众斗争与政治影响。这些区域内（三水、淳化、三原、富平、耀县、宜君、同官）群众斗争，自去年秋收后，斗争是非常普遍的。主要内容——反抗苛捐，反抗豪绅，抗债抗租，接二连三的起来。富平一县一月内农民有三次广泛起来抗捐税的事件，包围县城，火烧城门。三原方面除过反苛捐反抗豪绅斗争外，农民群众在党领导下的普遍反日运动已经起来，并且武装了大多数的中农贫农，赶走了区长（关于这些内容另报告）。经过了这些斗争后，农民的斗争情绪非常高涨，春荒斗争必然更要剧烈，政治影响在这些区域内比较深入，红军与苏维埃在三原、富平等地普遍深入，1927年大革命的影响也很

普遍的。三水在 1928 年在党领导下成立过苏维埃，固然这次（是）完全盲动主义干起来的，但到现在还是有相当影响。因此在群众斗争形势与政治影响方面，也是有利于游击战争条件的开展。

C、地方方面，更是有利的。政治区域是陕甘边境，在陕西甘肃小军阀的相互冲突和对立的形势下面，容易给他们各个击破，为保我们的优势发展，军事地形崎岖，大山接连着平原，于军事发展条件更有利。

D、党的领导，在这几个区域内，比较是要健全的，自去年秋收斗争后，党在群众中的领导，组织和数量上的发展也很迅速。尤其是党的成分改造上是绝大的进步，新党员成份完全是雇农贫农苦力中农。

在以上四个条件下，我们认为这（支）部队游击战争的客观条件是非常充分的。

#### 省委的计划与指示

在以上条件下，省委坚决指示他们，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开发革命的游击战争，开辟陕西的苏维埃区域，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实际工作布置如下：

（一）省委调大批军事的政治的干部到部队中去，建立党的领导骨干，已经计划派廿个干部去充任下级官长、政治员，同时派军委书记杰夫同志作省委巡视员实际去领导布置一切军事的政治的工作。

（二）关于内部的改造，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设立政治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树立党的领导骨干。关于组织在军事计划上有组织系统表，政治工作有详细条例，这次不能（带）来，下次可带来请审查！

（三）名义现在暂是陕西游击队，经过改造与整理后即改为“中国红军陕西游击队”，正式发宣言通电决议宣誓和（举行）阅兵等仪式。

（四）党的组织方面，成立游击指委为最高指导机关，队委书记

省委已指定由杰夫同志担任，其总的吸收士兵同志政治工作同志担任。队委下，以中队为中心，组织支部，暂时可成立一两个支部。

（五）对地方党部工作，省委已派一个比较得力同志负责地方党部书记，加强当地群众工作，以与这游击队的任务配合。

以上是大概情形，至于最近情形如何，执行程度如何？还未得到详细报告。

省委要求中央审查，并望给予关于游击战争的军事的政治的材料。

陕西省委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历史文献第 46 页。

陕甘游击队成立不久，刘志丹即离开部队赴西安向省委汇报情况，省委批评了谢子长的作法。随后刘志丹又到渭北高原去从事地方农运工作。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当晚即离开三嘉塬，第二天，进占旬邑职田镇，没收了国民党驻镇保安团的枪支，捣毁区公所。逮捕当地 8 名大豪绅，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宗旨，当众烧毁豪绅地主的帐债契约，组织农民分粮抗捐。2 月 15 日，在阳坡头打退杨虎城警卫团三营和彬县、淳化、旬邑 3 县民团 500 余人的进攻，毙伤俘敌七、八十人，活捉敌连排长各 1 人，缴枪 130 支，大获全胜。20 日，游击队到达香山寺，经四、五天的休整，再到衣食村，在煤矿工人中开展了宣传，并吸收六、七名工人参军。这时，富县、铜川、耀县 3 县民团来“围剿”，游击队对敌进行了抗击，并击溃了庙湾民团。游击队到宜君县焦家坪，收缴当地民团及国民党军队八十六师二五六旅左协中团 1 个连的枪七、八十支。在艾蒿洼，打退了左团 1 个营的进攻，俘敌连长 1 名，缴枪 20 余支。在这次战斗中，童子班荣立战功，遂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3 月初，游击队到达黄陵县上畛子。

3 月 6 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决议》中指

出：

.....

根据以上的客观形势估计与游击队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下的一切错误与弱点，省委特别指出游击队必须很迅速的执行以下的工作，在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实行彻底改造。①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毫不迟疑的向三原富平耀县以至西路去游击，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只有在这个游击过程中，才能使游击队壮大和发展起来，执行红军游击队的政治任务，坚决打破“关住门暂时休息”、“大家整顿”，不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以延缓了目前最迫切的任务。②立即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在游击区域内，马上没收豪绅地主寺院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决不能有丝毫的迟疑犹豫。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唯一前提。③开始执行建立新苏区的计划，目前在游击战争过程中，摧毁豪绅的统治及马上建立乡村或一区一镇的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执行没收和分配土地，逮捕豪绅，分配食粮，建立群众武装组织等任务，以树立新苏区的基础，以发展苏维埃运动。④加强红军苏维埃的政治鼓励工作，游击队所到的区域，必须召集群众大会，说明红军苏维埃是什么，苏维（埃）政纲是什么。红军游击队的纲领是什么，中国苏维埃发展状况等，给群众清楚的解释，使群众能够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进行这个鼓动工作，除群众大会外，应用各种方式去进行，使群众对红军苏维埃游击队能够彻底的认识。⑤建立当地各种群众组织——农民代表协会，雇农工会等，武装组织少年先锋队、赤卫队等，游击队应该积极帮助这些工作的建立后，再向别（的）地方游击。⑥游击（队）所到的区域，必须实现一切纲领后，再向另一个区域游击，必须坚决反对只是军事上行动而不执行游击战争纲领，这样是不能建立巩固的区域，使游击战争不能很迅速的开展起来。⑦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必须能够实际的建立起来，绝不能有名无实，政治委员必使群众中有威信的同担担任，政治工作条例，必须绝对服从，必须经常的召集士兵委员会，建立士兵委员会的领导，建立兵委的日常工作，召集各种的群众会议，解释党的政治策

略与游击战争纲领，使每个同志，每个战斗员，彻底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而战，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游击队的战斗力，把党的政治威信建立起来。⑧游击队的成份还须彻底改造，党应征调工人贫农苦力大批的到游击队中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一切小资产阶级土匪流氓意识作拼命地斗争，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在游击战争中吸收大批的贫农雇农苦力参加，绝对打破只靠省委和派迁〔遣〕人去改造成份的错误观点。⑨宣传工作应马上建立起来，首先要加强宣传队的组织，按军事编制，每个大队应设一宣传队，受政治员的指导，经常讨论宣传工作的方法，同时应有经常的工作计划，政治部和政治委员，要经常检查宣传工作的成绩和进行的程度。绝对要改正宣传工作只是临时抱佛脚，只是张贴标语传单，这样是不能使政治影响深入到群众中去的。⑩对白军的士兵工作，必须抓紧这些胜利的影响，派遣俘虏过来的白军士兵兄弟，回到白军中去，领导士兵斗争，组织士兵哗变，投到游击队中来。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的组织，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由队委直至支部必须有经常的工作计划，经常召集会议，有系统的讨论党的策略，一切游击队斗争中的一切工作问题，使党的工作能够经常有系统的进行。支部纪律，必须树立起来，发展自我批评，提高一般同志的政治水平与工作精神，党的组织应尽力发展到游击队中新进来的农民，或白军士兵中去，队委或支部必须按期检查，各支部都要经常开流动和短期训练班，培养新的积极干部。粮秣和经费问题，应该想各种办法去解决，应该利用鄂豫皖苏区的经验，发起打豪绅的竞赛，规定奖励办法，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等。最主要的还是配合军事政治条件，加强游击队中的鼓动工作，加强群众工作的建立，夺取几个城市，才能根本解决的这个问题。但是执行这一任务，绝对反对不经过准备工作，动员群众单独军事冒险。积极建立军事根据地，医院、军需、经济，都应存积在根据地，尤其军医院，更应很迅速的建立起来。建立各部的支部，各部都要有条例经常的计划和报告，革命军事委员会必须经常的检查和督促，绝对不能形成无组织的散漫状态，有名无实，使政治上军事上受莫大的损失。游击队要执行自己的任务，必须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拼命的与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立三

路线，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作坚决斗争。目前最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是），不执行土地革命，不扩大红军苏维埃运动，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关住门的整顿改造，只执行部分的游击战争纲领，不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攻，只是退守让步，实际工作的消极怠工，散漫不紧张，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右倾机会主义，实是目前最严重的敌人，必须集中火力去反对左倾派立三路线的主要表现是不相信群众力量，不□□群众，建立群众工作，脱离群众的单独军事冒险，不顾一切的盲动等。要克服这两个严重敌人，必须尽量发展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定期的工作检阅，实行个别的负责制，创造列宁主义的竞赛。只有这样才能使游击队在国际路线之下，和一个人一样的团结起来。

同志们！只有坚决的执行国际的正确路线，争取陕西革命的新胜利以至全国，与全国革命运动发展配合起来。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历史文献第 35 页。

3 月 7 日省委《关于红军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中又指示到——

.....

七、在这个形势下面，党的迫切任务无疑的是加强游击（队）领导，进行彻底的改造，尽量领导和开展群众斗争，把广泛地群众斗争，组织和汇合起来，开展游击战争，这样去冲破敌人“围剿”，建立新苏区。

八、为要执行这个任务，党的主要策略是：①游击队必须坚决的执行进攻的路线，要分两部分游击，向旬邑、三原、富平发展，配合正在开展的渭北农民斗争，在这些游击区内——立刻执行平均分配土地的任务，建立群众的组织，最主要的是要把当地农民武装起来，建立新苏维埃政权，开辟新苏区，坚决反对“上山”、“退避”的右倾观念，只有这样才能迎击敌人接二连三的“围剿”，争取胜利和发展。②游击队必须坚持执行省委对游击队的决议，进行彻底改造，加强游

击队在政治上与战斗上的力量。③党要集中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渭北农民斗争，立即开始农民和灾民自动的分配豪绅地主食粮，焚毁一切契约帐簿，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豪绅地主的国民党政府剥削的迫切斗争，普遍建立或加强各种群众组织，（如同心会、穷人会、分粮会等），建立农民和灾民的武装组织，夺取豪绅的地主的武装，武装自己。至于三原反日救国会的纠察队，更应加强党的领导，搜集武装武器，这些一切工作和扩大游击队的影响，抓住两次胜利，加紧农民群众中的鼓励工作联系起来，召集农民群众大会，庆祝游击队的胜利，反对“围剿”游击队，组织慰劳队、募捐队、宣传队等等组织，实际的帮助红军游击队。游击队新到的地方，党要动员农民起来，召集欢迎或慰劳大会，组织担挑队、做饭队、缝衣队、洗衣队等等，以提高游击队战斗员勇气和决心，以开展农民斗争。立即号召广大农民参加游击队，以扩大或加强游击队的力量。④西路和渭北灾区中灾民斗争，党必须立即设法去领导，建立灾民团、吃大户团、分粮队、灾民自救队会等等群众组织，经过这些组织坚决自动的分配豪绅地主食粮，包围赈济机关，向国民党政府要饭吃等等斗争，在这些斗争过程中，尽量扩大红军游击队的宣传鼓励，指出只有这样和游击队配合起来，才能根本解决了灾荒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号召农民群众到游击队中去，游击队必须注意到灾区内的的发展，尽可能的到灾区去游击。⑤加紧几个中心部队中士兵工作，尽量领导士兵的要饷、分伙食、反对官长打骂等日常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马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兄弟会等组织。党经过这些组织，扩大拥护红军游击队的鼓动，使每个士兵群众都要认识只有“打死官长投红军游击队去！”“不打红军游击队”，“创造陕西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样去组织几个部队内尤其是中心部队中的革命兵变，以与游击战争配合，以瓦解敌人的部队……

省委

1932年3月7日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历史文献第41页。

3月8日省委又颁发了《陕西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纲领中讲到

.....

#### （四）游击战争的任务与行动

（7）扩大红军与苏维埃的影响，建立部分的苏维埃政权，执行苏维埃中央政府一切法令。

（8）执行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中农和贫农。

（9）没收豪绅的粮食和财产，分配给贫农雇农和苦力。

（10）摧毁豪绅在乡村一切政权机关。

（11）宣布一切高利贷无效，焚毁一切奴役和剥削农民的契约。

（12）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的税收，加重负担与〔予〕富农身上（或临时征收也照同样原则）。

（13）建立革命委员会，由此准备建（立）苏（维埃）政府。

（14）解决豪绅地主的武装，武装各地的农民，组织赤卫队、少先队。

（15）援助农民暴动或兵士哗变，帮助贫农雇农对富农的一切斗争，不损坏〔害〕中农的利益。

（16）陷城市之后首先拘捕豪绅，以便制止其他豪绅武装力量之进攻，然后交给群众大会审判。

（17）游击队努力建立自己政治上的力量与军事上的根据地。

（18）游击队有计划的经常扰乱的交通网、后方宿营粮秣军械储藏等等。

（19）游击队本身须有铁的纪律，严密的组织政治教育工作，反对一切错误倾向及无意的烧杀等，组织宣传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20) 尽量吸收贫农、雇农、苦力成份参加。

(21) 对农民的原始组织如红枪会等：(一)在政治上号召他(们)，争取他们的同情，分化他们揭破首领的罪恶。(二)派去作〔做〕工作。(三)尽量避免军事上的冲突。

(22) 对附近各地士兵应有计划的派人工作去。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历史文献第 44 页。

3 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由黄陵上畛子开抵正宁县月明原，一边打土豪筹集粮款，一边了解农民斗争情况。先后打了南邑西头秦慎德、永和赵元亨家的土豪，并抓了秦慎德的儿子秦善玉和赵元亨做人质。

当时正值陕军十七师孙蔚如部与甘宁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在陇东火併。陈部溃败后，其残部在陇东各地索粮派款，横征暴敛。正宁驻陈残部百余人，向四乡摊派粮款多达 10 万余元。农民不堪重负，组织起民团抗粮抗款，湫头原就有上五社、中五社、北八社 3 个民团。县府以南原群众想造反为由，扬言要血洗南原。各民团齐集苟仁寺商量对策。听说月明原来了红军游击队，便派巩世信、范西魁 2 人去联系。在此情况下，游击队决定就地组织群众，配合攻打山河城，开辟革命根据地。派出骑兵到南原联络，约定时间，军民联合攻城。

山河镇是国民党正宁县府所在地，驻有陈珪璋残部警卫团的 1 个排，由连长刘湘林率领；公安局所属警察 3 个班；另有保安队队部武装 10 余人，总兵力不足百人。此外，还有陈珪璋部混成旅 1 个营，步骑各一部分，由谢牛率领驻宁县早胜镇；警卫团 2 个排，由团副刘明发率领下，准备哗变内应，约定 3 月 19 日拂晓以拍手为号，开启东城门，放游击队进城。

18 日晚，湫头原各民团四、五百人在苟仁寺集合，游击队派人参加并作了动员。各民团在杜兴邦率领下连夜出发，次日晨赶到山河城西柑柏树、移风一带。三嘉塬 10 多个村子的民团也在张彦升的率领下赶来参加。同时，游击队主力从月明原向山河城东急行，欲与群众配合摆成两面夹击之势。不料因向导迷路，发现方向不对，急速返

回，到达山河城东关时，已错过约定攻城时间，只得仓促投入战斗，攻城一日无结果。城内内应的警察也因错过约定时间，未敢开启城门。但秘密暴露，为首者窦××被捕杀，余被缴械。城西各民团群众在张圈沟塬与县保安队对斗一阵，砍伤了保安队长肖恩多，后因城上开枪射击，自行散去。第一次围攻山河城遂告失败。

第一次攻城失败后，陕甘游击队退驻西坡四疙瘩，召开队委会，重新讨论行动计划。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确定：到南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豪绅地主的破坏；组织发动群众，将群众自发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立即实现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创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根据地。

会后，游击队开抵寺村原，部队分驻新庄子、西城、年庄子等村。乘着自发的群众斗争方兴未艾，即在苟仁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将原有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赤卫军总指挥部，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绰号张聋子）任副总指挥。大会宣布了反动豪绅赵元亨的罪状，处决了赵元亨及其走狗巩得功。游击队到各村张贴标语，广泛发动群众，以村为单位成立赤卫军小队、贫农团、农民联合会村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反剥削反压迫，同地主豪绅作斗争。组织群众没收并分配了赵元亨家的粮食和牛羊。为筹备粮饷，扩大政治影响，游击队还到彬县的永乐、北极和旬邑的底庙等地打土豪。

经过 10 多天的准备，陕甘游击队决定第二次攻打山河城。3 月 31 日晚，谢子长、杜兴邦分别率领游击队和赤卫军、群众千余人从寺村原出发，到达山河城东的路家崖窑和杨、巩二畔。赤卫军及群众主要任务是给游击队“壮营”，送水送饭，故再未前进。游击队继续向山河城靠近，到达东关财神庙周围。游击队从城东、北面同时发起进攻。战斗打响后，敌钻入城内，凭借着坚固的城防工事向游击队还击，双方对峙一日。2 日，游击队继续攻城。下午，敌驻早胜骑兵来援，绕城北向游击队猛扑，游击队迅即组织撤退，隐蔽在城东数里之西坡坳。敌骑冲过去，被游击队伏击，当场毙伤四、五十人，锐气大

减，急调头撤退。游击队反败为胜，一鼓作气将敌赶入城内。因敌依托坚城对抗，终不能克。当晚，游击队、赤卫军等陆续返回寺村原。此战，游击队牺牲 10 余人。

## (2)

习仲勋 1943 年 1 月曾说过：1932 年，革命运动继续高涨，3 月间新正一区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织了地方赤卫军和少先队，在五顷塬一带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给贫苦农民……引自习仲勋著《关于党史简述 1943 年 1 月 8 日》。

1932 年 3 月 20 日，陕甘游击队队委向陕西省委送达《关于游击活动情况的报告》并详细汇报了（一）三嘉塬整编情况，游击计划；（二）职田镇游击始末；（三）退入香山寺，又焦家坪、宜君失利，返回陕西山河；（四）三合〔山河〕游击之行动及失利原因。

3 月 21 日，省委关于游击队的情况给中央的信中讲道——

省委认为：

红军游击队迅速向三原发展，配合三千农民武装（已经组织好，完全是党的领导），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已准备的）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最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很快的进攻泾阳，高陵、咸阳、沿渭河流域截断渭河交通，开辟西北上一片苏维埃区域……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陕甘边根据地》历史文献部分第 46 页。

4 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原新庄子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宣布党和工农红军的斗争纲领，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由游击队政委李杰夫兼任主席，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等委员会。刘志丹受省委派遣重返陕甘游击队。

4 月 12 日游击队撤离寺村原，进入旬邑县境开展游击活动。4 月

18 日，在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励君）指责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于旬邑冯家堡宣布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派往甘肃靖远搞兵运工作；又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中共队委会也随之解体，原来的 4 个大队编为第三、第五两个支队，三支队队长刘志丹，五支队队长阎红彦。

三、五支队进入西路、渭北地区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多路“追剿”堵截。5 月 10 日，陕西省委指示两支队在旬邑清水原集结，统一指挥，刘志丹任命为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兼队委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部队发展到 500 多人。在刘志丹指挥下，游击队转战富县、洛川、黄陵、宜君等地，半个月历经大小 9 次战斗，8 胜 1 负，至 5 月底打破了敌人“围剿”。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指示。

——在积极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红军，并批准陕西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陕甘边根据地》历史文献部分第 62 页。

5 月底，陕西省委命令游击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结果遭强敌进攻，受到很大损失，遂辗转回到陕甘边区。6 月下旬，刘志丹率主力 200 多人来到宁县麻子掌。由于连战失利，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领导层在行动方向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为此，在麻子掌召开队委会。

吴岱峰 1985 年 8 月 1 日谈麻子掌、梁掌堡会议：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韩城县境作战失利的情况下，当时一些人思想上产生了动摇情绪，农历五月下旬游击队返回到陇东宁县麻子掌时，部队剩下 200 多人，大部分是党团员骨干。即召开队委（党委）会，政治部主任黄子文、政委李杰夫、队委委员杨森等提出意见，这样长期行军作战得不到休息，怎能受得了！要把部队拉到三原县新武字区，采取“昼伏夜出”

打游击。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等多数同志指出，新武字区是平原地区，离三原县城近，东有高陵，西有淳化，都驻有敌人，三面受敌，离敌人统治中心近，平原人马不易隐蔽。并说哪里也能去活动，新武字区打伏击战，是死路一条。又说北上桥山中断南梁地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区辽阔，回旋余地大，东去陕北，西进陇东，便于开展游击。同时又能扩大骑兵，利于步骑配合作战。两种意见争论不休，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又提出愿意南下者南下，愿意北上者北上，队委作了这样的决定。中午在大树下召开的军人大会上，刘志丹让我讲话，我说“不同意分散游击”，但黄子文等不顾大家的反对，非分不可，在分开时，南下的六、七十人站出去了，愿北上的100多人站着没有动，阎润平等人手提着手枪，为了争人争枪争马几乎火并，部队分开后各驻一村，准备各自行动。

在韩城香山时，队委会决定由阎红彦、杨琪率少先队百余人，深入黄龙山区，开展游击，建立根据地，作为后方向外发展。阎、杨二人率队进入山区到石铺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扩大部队。正在这时，听到百姓说，总指挥刘志丹率部队西进回陇东的消息。因此，阎、杨即率部队赶回陇东到宁县麻子掌南原时，听百姓传说，红军闹不团结，部队分开了。他们听到十分震惊，这时阎红彦立即给总指挥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写信报告他们回来了。这时南北双方都派人去说服阎红彦、杨琪，争取到各自一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政委李杰夫二人，亲自见阎红彦，没等他们把话说完，阎红彦直接了当的指责黄子文说：“你这样做，是分裂共产党，瓦解红军，是革命历史上的罪人”。又批评李杰夫说：“你是省委派来的党代表，又是游击队的政委，把这个问题不能适当处理，如果把部队分开搞垮了，看你向省委怎样交待？”当时李、黄二人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他又说：“我主张哪里也不去，就地游击，建议双方人员都不要走，明天开会讨论讨论。”

第二天部队到梁掌堡集合，队委召开扩大的队委会，阎红彦讲了部队不能分开的道理，参加会议的同志听后，一致认为阎红彦同志党

性强，觉悟高，站得高，看得远。在这关键时刻，挽救了部队，避免了分裂，有功。同志们一致推选阎红彦同志担任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政委李杰夫借口向省委汇报，即离开部队回西安去了。

阎红彦到梁掌堡，见了志丹同志，痛心地说，你是总指挥，不同意把部队分开，他黄子文有什么办法。引自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调查资料部分。

刘景范 1985 年 4 月 13 日谈麻子掌、梁掌堡会议时讲道：

“……1932 年刘志丹到了韩城，才知道地下力量不是那么好，在什么地方打了一仗（地名现在记不起来了），部队遭受损失，韩城站不住脚，又撤回来了。撤到宁县麻子掌时，部队思想比较混乱，有人提出要南下，有人提出要北上，刘志丹主张以桥山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战争。桥山是老游击区了，刘志丹的意见明显看来是正确的。当时要下三原，要回陕北的意见是谁提出来的，这要查一查。查出来还要研究，现在知道这件事的人可能没有了。有个材料说是黄子文提出来的，黄子文是三原人，提出来南下有可能。黄子文这个人讲实际的，当时他提的一些意见，现在看来是比较正确的，他不可能结把子、搞分裂的事。以后有人说黄子文的坏话，实际上黄子文是个诚实人，讲实际的人。当时部队陕北人不少，有些陕北人提出回陕北。南下、北上的意见，究竟是谁提出来的？要研究。意见分歧，思想混乱，这是主要的。最后会议取得了就地开展游击，伺机向三原、陕北发展的结论，也是容易一致的。因为那时部队打了多次仗，跑了很多路，人也少了，需要补充、休整，就地搞游击，扩大力量，也是能够接受的，梁掌堡会议容易成功的原因也在这里。②引自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调查资料部分。

师建章谈麻子掌会议：陕甘游击队撤离韩城以后，到了麻子掌，在个山坡上开会，有人吵着要向南，有人要求北上。有个干部名叫吕子成（旬邑人）。他说：“还是不分开好！”刘志丹就站起来给大家讲

话：“革命是长期的、曲折的。不要因为打了一两次败仗就闹情绪，我们还是应当行动一致，开到山区去整顿。以准备再战。”这时已把大家说服了，意见统一了。之后阎红彦才松松散散的来了。后来，我听说，阎红彦讲有个南北分家，是他解决的。我很生气。那时我才十五、六岁，记得最清楚，我常给指挥部办些零碎事，刘志丹他们说什么话我都听见了。②

会上，李杰夫等提出南下把部队拉到三原武字区去打游击，说那里条件好，工作好开展。也有人提出北上。刘志丹等主张依托桥山，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其理由是：①桥山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②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可东去陕北，西进陇东；③能扩大骑兵，步骑配合作战。双方争执不下，作出了分开行动的决定。刘志丹一再表示：我们不要因为打了一两次败仗就闹情绪，还是要行动一致，开到山区去整顿，以准备再战。但刘志丹的意见未被采纳。会后，要南下的 70 余人和北上的 130 余人各驻 1 村，准备分开行动。

正在这焦急关头，阎红彦、杨琪率少先队 100 余人由黄龙山区来到麻子掌附近的梁掌堡，从群众中了解到红军游击队将要分开活动的消息，即分别找刘志丹、李杰夫做工作。阎红彦支持刘志丹的正确意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就地开展游击活动。原来主张分家的干部也考虑到党的利益，认识到分开的弊端。于是，再次在梁掌堡召开队委会。由于阎红彦会前分别做了工作，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作出了以桥山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发展的决定。会议还推选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总指挥。梁掌堡会议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对陕甘游击队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梁掌堡会议后，李杰夫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陕甘游击队到盘窑原进行了短期休整，并进行了整编，将原两个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 1 个骑兵大队。高山保、刘志丹分别任步兵大队队长，强龙光任骑兵大队队长，黄子文、刘志丹（兼任）任步兵大队政委，吴岱峰任第二步兵大队副队长。

陕甘游击队在湫头、五顷原活动期间，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艮来游击队巡视，李艮宣称他来游击队的任务是“为了实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北方新地区的历史任务，彻底转变陕甘游击队与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造陕甘新苏区与廿六军，而直接的任务就是解决机会主义领导的问题。”这一做法表现了陕西省委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和对陕甘游击队党委的不信任。李艮到游击队主要做了3件事：第一，不顾大敌当前，在正宁南邑连续召开7天干部会议，空谈创造“新苏区与廿六军”问题，批判游击队的所谓“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问题；第二，派出战士在五顷原分配土地，并限期20天内分配完毕。建立了3个村庄的临时革命政权；第三，为向“反革命阴谋分子”作斗争，又在游击队队委会之外组织了“秘密队委”。

正在游击队连续开会争执和分配土地期间，国民党部队驻山河的晁团乘机进占从湫头到寺村原周围的村庄要道，切断了交通，加固了王郎坡寨子，完成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而游击队的指挥机关则泡在会议无休止的争吵中，全然不顾敌人进剿的现实，未做任何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李艮在敌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才认识到五顷原、寺村原有丧失的危险，而把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又理解为军事上的死守和强攻硬拼，在这种错误指导下，连打三次败仗：

第一仗，强攻王郎坡寨子。王郎坡是一个东、北、西三面临沟的土围子，寨内驻敌六、七十个，枪械弹药充足，外围且有援兵。在没有准备、毫无胜利把握的情况下，李艮却让游击队强攻这个敌据点。游击队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勇猛冲锋，搭的云梯够不着，扔上城墙的手榴弹炸不响，却遭敌密集火力扫射，攻坚两天不下，伤亡五、六十人，只好撤出战斗，转移到三嘉塬。

第二仗，死守五顷原。游击队撤到三嘉塬后，如果绕到外线，本可以摆脱敌人。但李艮在死守思想支配下，又转回五顷原，立足未稳，尾追之敌骑兵已经赶到，游击队被迫应战，由于敌强我弱，抵敌不住，只好边打边撤。在战斗中，游击队广大指战员利用有利地形给敌以大量杀伤，歼敌百余，游击队也牺牲30多人，损失骡子10余匹，只好

东撤到高凤坡。

第三仗，三嘉塬突围。游击队到高凤坡，当晚再次转移到三嘉塬，驻前马原、狼牙洼、秦曲。次日晨，敌步兵又从南庄子、细嘴子包围上来。游击队边打边退，从秦曲打到狼牙洼，又从狼牙洼打到前马原。9 时许，退到菜头湾山巅上。不料从雕翎关方向追来的敌骑兵已到山下，堵死了游击队退路。在腹背受敌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游击队利用沟壑山梁上大雾骤起、能见度极小这一天赐良机奋力突围，才得脱险。当游击队撤到马栏时，只剩下 200 多人。

这次游击队在湫头、五顷原活动一月多时间，由于指挥上的错误，再次遭到严重挫折。部队在马栏休整时，广大指战员无法容忍李良的错误，甚至有人提出要处死李良。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李良只得离队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游击队休整后，分散游击 10 余日，又集中起来在照金地区活动。8 月下旬，陕西省委重新任命谢子长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9 月初，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来到宁县盘客原。队委会研究，在子午岭山区活动一段后，仍回三嘉塬、寺村原一带。但到了太白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北上奔袭保安县城，解决装备和给养问题。攻打保安县城时，因守敌防守严密而失利；接着，又在瓦子川、墩儿梁打了两仗。最后，不得不退到南梁地区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由于连战失利，士气低落；且伤寒病流行，伤病员大增，而医药又奇缺。这时天气渐冷，部队住在破窑洞里，衣服单薄，缺铺少盖，吃粮也难以解决，处境非常困难。面对重重困难，队委会研究决定，部队分 3 股外出游击，度过难关。刘志丹带领 1 个大队 70 多人到合水拓儿原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领 60 多人到三原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重远带领骑兵队到照金一带活动。谢子长、吴岱峰留守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照看 60 多名伤病员和少先队员。刘志丹部以拓儿原段家庄为中心，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除将没收来的财物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外，为游击队筹备了不少给养。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分兵游击，到 12 月中旬，各路游击队陆续返回，在黑木原会合。由于筹集到不少粮款和

物资，从而克服了严重困难，度过了难关。广大指战员再次经受严峻考验，士气大振。之后，谢子长、刘志丹率游击队南下照金一带，开展新的斗争。

### (3)

1932年5月10日至6月底，刘志丹、黄子文联名发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第号，内容如下：

为布告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经过晋陕甘数省，与国民党军阀血战数十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到之地，白军闻风披靡。帮助正宁、山水、淳化农民建立革命委员会，组织赤卫队；帮助三原、富平、邠州、醴泉、宜君、中部等数十县工农，分配豪绅地主的食粮财产数百万。劳苦群众和红军游击队团结一致，根本动摇西北国民党军阀统治，推进西北革命迅速向前发展，使扩[广]大劳苦工农及白军士兵同志起来为打倒国民党军阀剥削与压迫而斗争，为解放自己而斗争，来参加红军游击队，拥护红军游击队起见，特宣布本军根本任务于左：

一、本军是贫苦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国民党军阀作必死的斗争，绝不与任何统治势力相妥协。

二、本军所到区域，对于国民党军阀统治机关——县政府、区公所、民团局、里正等——一律铲除。

三、□□国民党军阀给予工农劳苦群众一切苛捐杂税、摊派勒索，概[概]作无效。

四、帮助穷苦工农、白军士兵，起来分配豪绅地主的食粮财产和土地。

五、一切文字的口头的高利贷、账债、契约，宣告无效。

六、缴收白军、民团、警察的武装，武装农民赤卫队，保护自己的利益。

七、建立陕甘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八、创造西北工农红军。

以上为本军之根本任务，望各地劳苦工农及白军士兵同志深刻认识，并迅速协同本军努力执行，以期早日实现，是为至要，此布。

总指挥刘志丹

政治主任黄子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年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陕甘边根据地》中历史文献部分第 67 页。

6 月初，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提出了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三大任务。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六省委代表会议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决议》，强调北方党的基本任务是创造与发展陕甘新苏区，正式组建红二十六军并锻炼成为一支强有力的红军。

7 月，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袭击耀县照金获胜，击毙富平、同官（今铜川城郊区）、耀县 3 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歼敌 400 余人。并派习仲勋、李妙斋等到照金芋园一带活动，发动群众。

8 月 25 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创造陕甘新苏区的决议》，要求创造红二十六军，并立即建立一个团。

11 月，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再回照金，并在芋园、高山槐一带组建了一批农民联合会和游击队。

12 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派新改任省委常委的杜衡来到陕甘游

击队驻地，负责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王世泰在《回忆我的红军生涯》中讲道：

——1932年12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命令陕甘游击队开到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待命。接着，杜衡以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书记（杜本人说的，后得知当时他已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身份，由渭北游击队护送来到陕甘游击队。

12月22日，杜衡以省委书记和即将上任的红二十六军政委名义，召开党员大会。会上，杜衡首先宣布党中央、陕西省委关于改变陕甘游击队的指令，接着大讲一通“全国大好形势”，最后声色俱厉地陈述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的所谓错误，扣上“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省委正确路线”等等大帽子。言称，必须彻底改组领导班子，当场宣布撤销刘、谢、阎的职务，强令他们离队赴上海中央局受训。

对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正规红军，指战员无不衷心拥护。但是，硬要给志丹、子长、红彦等强加罪名，撤职调离，大家无论如何想不通。特别是多年跟随志丹、子长的老战士，在峥嵘的岁月里，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深知志丹、子长等对党绝无二心。一时，全队议论纷纷，对杜衡表示强烈不满。不少战士偷偷地找志丹、子长诉说。志丹、子长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顾全大局，对战士晓之以理，让大伙服从党的决定，教育我们千万不能闹事，稳定了部队的情绪。

12月24日，部队开到宜君县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民主选举团长，举行改编仪式。选举团长，共进行两次，一次是在党内选举，一次是由军人大会选举。党内选举，提两个候选人，有曹胜荣（中队长，连级干部）和我（班长），我当选；军人大会选举，结果我又当选。接着，杜衡正式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当场拿出由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署名的红军番号任命书。与此同时，杜衡以军政委名义任命红二团各级领导，据回忆：

团长：王世泰

团政委：杜衡（兼）

团参谋长：郑毅

团参谋处长：杨重远

团经理处长：刘约三

团管理处长：杨琪

共青团委书记：师克寿

骑兵连连长：曹胜荣

指导员：张秀山

步兵连连长：李亚夫

指导员：李秉荣

少年先锋队队长：王有福

指导员：魏武

全团共计 200 余人，枪支弹药齐备。

这样的改编，广大指战员迷惑不解，但敢怒而不敢言。部分战士表示要离开部队回家。志丹、子长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队，表示服从省委的决定。子长还从党的利益和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建议把志丹留下。而我则闹得更凶，表示坚决不当团长，提出两条理由：一是，我虽在军队中干了好几年，一直是个普通的战士、班长，冲锋陷阵打仗可以，不会也没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本领和经验；二是，我的理论水平不高，缺乏掌握全盘，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杜衡听了大为光火，不容分辩地说：“这是党的命令。”

我说：“不管党的命令不命令，反正干不了！”

杜衡给我作了好一阵思想工作，说：“你的团长是党委研究的，民主选举的，不干怎么能行？”

作为一个党员，不执行党的决定，这是党性所不允许的。所以，我最后要求道：“要我干也行，得把志丹、子长这两个老司令留下一个才行。”

杜衡不懂军事指挥，也怕军心不稳，部队不好掌握，思索了一会儿，问我：“你看留下谁合适？”

我说：“留志丹。”因为子长提出过留志丹。

杜衡最后同意把志丹留下来，但不让志丹管军事，给了个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

找了杜衡，我又找志丹谈。自从 1930 年跟志丹参加武装斗争以来，我最钦佩他、尊重他，他对我也很信任，有些问题，我想不通，就愿意找他谈，即是挨一顿批评，也心甘情愿。我对志丹说：“你了解我，打仗行，带部队不行。让我当团长，不是那块料。”

志丹笑着说：“边干，边学嘛！”接着又说：“你打了几年仗，总还是个老兵吧！我要不走，会帮你的。”

随后，谢子长、阎红彦被迫离开部队，去了上海。

红二团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红二团的任务有两条：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二团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路地区发展。

照金，位于耀县境内，是桥山山脉南端的一个突出地带，与淳化、旬邑、宜君、同官 4 县交界。它北迄子午岭中段，南接渭北平原，东临咸榆公路。这里丛林密布，山峦迭嶂，沟壑纵横，地形比较复杂。土地多为耀县几家大地主和香山寺占有，无地农民多达 60%。除此而外，连年灾荒，山东、河南、四川等地逃荒饥民纷纷而至，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广大农民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曾不断发生自发的斗争。

从军事角度讲，照金进可攻，退可守，机动性很大。向东，经宜君、同官可截断咸榆公路；向南，经富平、三原、泾阳可出击渭北平原之敌；向西，过淳化、旬邑、永寿、彬县可扼守西兰交通要道；向北，退守子午岭密林可与敌周旋。是个得天独厚的游击战争活动区。省委选择照金作为革命根据地和游击队战争的总后方，是不无道理的。

但是，这里也有不利的条件：离敌人的统治中心地区太近，受强敌威胁大；人烟稀少，土地贫瘠，部队兵源不足，吃粮困难。因而，对于红军的扩大和开展活动，带来一定的困难。

为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拔除照金地区的敌人据点，打开新局面，我红二团首先对周围敌情作了分析。照金周围据点，除陕甘游击队时期摧毁的以外，尚有焦坪、瑶曲、庙湾、柳林、马栏、照金、香山、高山槐等据点。这些据点中，焦坪、马栏属宜君民团占据，余皆为夏玉山（外号夏老么）匪属民团。为了鼓舞士气，打好建军的第一仗，我们坚决定首战焦家坪较弱之敌。

焦坪民团，害怕我军袭击，平时防范森严，在我军驻守的杨家店子方向山梁上，设有监视哨卡。志丹纵观敌情，向我提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麻痹敌人，后攻其不备。接着，我们制定出作战计划。

12月25日下午，我命令部队向马栏川反焦家坪方向进军，故作打马栏的姿态，造成敌人的错觉。果然，敌人上当，撤走山梁上的哨卡。而我军则仅行60余里，就地宿营。

26日夜，我军突然挥师焦坪，急行军80余里，拂晓到达，发起攻击。便衣队先行接火，骑兵连一个马冲锋，打得敌人乱了阵脚，敌团总仓惶逃窜。我军一举将敌全歼，俘敌60多名，缴枪60余支。

战后，我们迅速撤离焦家坪，经衣食村到香山寺附近。

香山寺，位于照金东北笔架山，建立于唐朝中期。寺内，广厦千间，建筑宏伟，雕梁画栋，精巧别致，回廊曲折，幽静古朴。四周，苍松翠柏覆盖，怪石突兀峭立，山径崎岖蜿蜒，地形险峻独特。是陕

甘两省边界闻名遐迩的古迹。寺中有和尚千人，尼姑数十，寺产达十几万亩之多，贮有大批的粮食和物资。

时值灾年，四方逃难饥民近万人，流落此地，嗷嗷待哺，见红军路过，同声呼救。红军指战员，面对这一惨景，无不心焦如焚。基于救灾于水火之中，经团党委研究，决意进占香山寺，开仓放粮。

红军进入香山寺后，杜衡提出，香山寺距照金只有 30 余里，是照金的要隘，在军事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被敌人占据，会对根据地造成极大的威胁，建议焚毁。大家没有表示异议。后又在万人饥民大会上征求意见，并举手通过焚寺的决定。

烧寺是由红军负责的，分粮，是由渭北游击队组织群众进行的，香山寺的粮食可真多，大约二、三千石，饥民们分到粮食，无不感谢红军和游击队的恩德……但千年古刹却毁于一旦……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王世泰著《陕甘边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随着斗争的胜利，1933 年 3 月 8 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兔儿梁成立，特委书记金理科，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李妙斋、师克寿等为特委委员，习仲勋兼任团特委书记。3 月中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成立，李妙斋、黄子文、吴岱峰先后任总指挥，习仲勋、张秀山先后任政委，加强了对边区 20 余支游击队的整顿领导，并大力进行武装群众工作，在各区、乡、村普遍组建了农民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

一天，照金的党组织召集群众开大会，宣传红军打胜仗及开辟照金苏区的决定，李妙斋、金理科、习仲勋等几位负责人来请刘志丹讲话。当刘志丹来到会场上，全场群众春雷似的掌声久经不息。刘志丹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石台子，两千多人的会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群众都在等着听老刘讲话哩。

刘志丹面带笑容，看了看到会的人群，亲切地说：“乡亲们，从去年以来，陕甘游击队到照金地区来过几次，但是每次来，打了土豪，

给大家分了粮食、财物，没住几天就走了。红军这次来要驻扎在这里不走啦！要在照金地区百十里地方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的政权，实行土地革命！”顿时，会场上欢呼声，掌声，口号声汇成声浪。刘志丹接着说：“穷人要当家做主，过自由幸福的生活，就要依靠共产党，依靠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打垮反动派。要打败反动派，就得首先扩大红军，没有红军，反动派来了就要杀人放火、抢东西。我们要扩大红二十六军，还要组织地方游击队，希望青年人参加红军。只要老百姓、红军、共产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就能打出劳动人民的天下！”

群情沸腾，欢声雷动，青年农民纷纷报名当红军。

红二十六军在刘志丹的精心协助和建议下，东出同官（今铜川）打下金锁关，歼灭民团 30 余人，缴枪 30 多支；南击淳化攻下柳林镇，缴枪百余支；西出旬邑消灭旬邑县民团一部，缴枪一百多支，同时东打西扫，消灭了许多反动民团，红军区域日渐扩大。红军还协助各地建立了游击队，如旬邑游击队、照金游击队、香山游击队、宜君游击队、雨园游击队等七、八支游击队。在此同时，各地群众也都组建了游击队，不到一个月时间，在照金地区就组织了十几支游击队。另外各村还成立了一些游击小组。1933 年 4 月 5 日，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东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按照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规定的办法，颁布了各种法令：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还出了布告：戒烟、戒赌、破除迷信，号召妇女剪头放脚。群众看到这些法令和布告，欢天喜地，赞扬人民政府为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事。为了安全起见，革命委员会由照金搬到了 15 公里路外的薛家寨办公。薛家寨是一座石山，地势十分险要，和保安县的永宁山差不多。山寨上有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还办起了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干部都能深入群众，做细致的调查研究，解决群众的困难，肃清了敌特，铲除了保甲，在照金地区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妇女会等革命组织。到 5 月间，照金苏区已经开辟了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至

香山，西抵淳化，北至马栏，南到高山槐，东西宽 60 余里，南北长近百里的照金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成为红 26 军战斗中的一个依托点。

这期间，红二十六军由于在刘志丹的精心协助下，以及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战，在杜衡疯狂推行“左”倾路线的逆境中，部队仍然打了许多胜仗，队伍扩大到 500 余人，为创建照金根据地和推动渭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作出卓越的贡献，并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陕甘一带的反动统治，推动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发展。

## 第九章 兵败终南山

### (1)

照金时期，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仍很薄弱，刘志丹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中间势力，壮大自己的队伍，刘志丹主动派人与根据地周围的一些民团建立了暂时的统战关系。例如中部县建庄何世兴民团、小石崖罗连城民团、庙湾夏玉山民团都和红军关系友好，为红军掩护伤员，代购弹药物资为红军提供过巨大的帮助，但居位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却不要统一战线，主张打倒一切，对白军、民团、土匪不加区别，一律反对。

王世泰回忆：

——在根据地逐渐发展的有利形势下，杜衡头脑开始发热，又把他那一套“左”倾盲动理论搬出来，大讲利用大好形势，打大仗，创造红军的战绩，加快建立根据地的步子，提出“集中力量，一鼓作气地消灭根据地周围的豪绅地主武装”。极力主张红二团攻打庙湾民团。刘志丹和杨重远等人，主张暂时不打庙湾，并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庙湾是夏老么的指挥总部，团丁多是惯匪、地痞出身的亡命之徒，占据

着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碉堡，目前我们无力吃掉他；二是，夏老么过去和我们有过来往，与游击队保持着互不侵犯、互通敌情的关系，曾给我们卖过物资和弹药。如果硬打，势必破坏这种统战关系，给红军活动带来困难，给根据地老百姓带来危害。

这些，杜衡根本听不进去，凭借军政委的权力，强行下令攻打庙湾。我们虽然反对这次行动，但作为指挥员又不能不执行命令。为了争取把仗打好，部队少受损失，志丹和我们制定出作战计划：由志丹、杜衡、郑毅带领主力走捷路，拂晓发动突然袭击，我带骑兵连绕道走庙湾下川隐蔽起来，堵截逃跑敌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

1933年1月17日晚，我军分两路向庙湾行动。由于事先对山路距离估计不足，步兵虽先行出发，拂晓前却未能到达庙湾后山，而骑兵已按时进入阵地。时至早8点左右，战斗还未打响，显然偷袭已失掉机会。突然一声清脆枪声（可能是敌人走火），划破了清晨的寂静，骑兵连误认为我军已与敌接火，立即发起攻击。

我们的战士，个个都久经战火锤炼，十分勇敢，一个马冲锋便进到庙湾街里。骑兵连长曹胜荣、指导员张秀山更是身先士卒，直接冲向敌人碉堡。敌人见我们攻势凶猛，立即龟缩进3个碉堡里，居高临下，阻击我军。此时，志丹带领主力军从山上压下来，投入激战。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炮，缺乏攻坚能力，虽经多次强攻，终未奏效，部队受到伤亡。骑兵连长曹胜荣英勇牺牲，张秀山身负重伤，还有几个很好的班、排长也牺牲了。

下午，战斗仍在继续。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本应立即撤出战斗，但郑毅不让撤，又重新组织突击队，反复冲锋四、五次，结果每次都被敌人用手榴弹压了下来。下午4时，部队被迫撤出。

庙湾一战，打得不好，不但没有拔掉据点，反而伤亡二、三十个同志。干部战士对杜衡、郑毅意见很大，纷纷要求检讨失利的原因。战斗失利，本出于决策者杜衡“打倒一切”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导，但他为了平息众怒，硬是把错误责任推在参谋长郑毅身上，将郑

撤职。郑毅曾在冯玉祥部当过营长，喜欢打大仗，不懂游击战术，错误的估计我军力量，使部队受到损失，理应负一定的责任。对此，我身为团长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杜衡集错误于一人，采取“丢卒保车”的伎俩，品质之劣惊人。

撤了郑毅之后，指战员坚决要求志丹当参谋长。我也公开表示，如果不任命志丹为参谋长，我就辞职。最后，杜衡迫于指战员的压力，不得不任命志丹为参谋长。郑毅随即被任命为第一连连长，后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这是杜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第一次碰壁。

庙湾战斗后，红二团返回照金休整。照金地区，连年灾荒，群众生活很艰难，一下子要解决这么多红军的粮秣就更困难。所以，我们经过短期的休整后，决定步兵留下配合游击队组织发动群众，开始建政的准备工作，骑兵连单独向宜君方向活动，伺机消灭敌人，搞些粮食和物资。此时，骑兵连长已由强世清接任，为了加强骑兵连的领导，又委派团参谋处长杨重远兼任指导员。

1月27日，骑兵连离开照金向北开拔，夜间宿营衣食村半山洼里。半夜，夏老么带民团突然袭击了这里。枪响之后，战士们仓促应战，战马狂奔乱叫，无法展开，只得向后山梁撤退，等部队摆脱敌人，战马已损失过半。骑兵连绕道宁县、正宁返回照金。

骑兵连遭袭击，主要是指指挥员轻敌麻痹，选择了不利骑兵战斗的宿营地。如果他们当晚把部队向北再拉出几十里，完全可以摆脱敌人。对此，志丹和我没有追究他们个人的责任，只是强调要总结教训。但是，强世清同志，却引以为咎，坚决要求辞职离开部队，经再三劝阻无效，最后我和志丹同意他回安定县老家打游击。骑兵连长由杨琪继任。

红二团连续出击，促进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迅速扩大，地方游击队相继成立，并主动配合红军作战，威胁着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在这里的势力。他们先后调动骑兵团、警卫团、特务团配合当地民团，

以孙辅臣为总指挥，向红二团发动围剿。面对十倍于我之敌，究竟应该怎么打，团党委存在着分歧。以志丹为首的，主张避开敌人的锋芒，跳出照金，到外线寻机作战，调动敌人撤离我根据地，这样可以争取主动；杜衡的意见是，坚守根据地，打防御战。最后，杜衡否定志丹等人的正确意见，执意把部队拉到芋园，待敌进攻。结果，坐失良机，致使红二团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2月4日，敌骑兵团、特务团各一营，协同庙湾民团，分三路包围红二团驻地上芋园和下芋园。红二团被迫进行抗击。敌人火力很强，步枪、机枪、迫击炮弹，像雨点似的射来，眼看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我们当即决定边打边向山上撤退。不料后路又被夏老么民团截断，形势相当危急。幸好，渭北游击队赶到，及时阻击夏老么部队，使红二团顺利地跳出合围。

这次战斗，我们伤亡了一些战士，丢掉了4门“榆木大炮”。“榆木大炮”，是志丹的发明。他看部队没有重型武器，震慑不住敌人，让用榆木做了4门大炮的炮型，外边用红布套上，行军时由骡子驮运。群众看见后，高兴地说：“红军有大炮哩！看狗日的民团还猖狂不？”为我们造舆论。当要攻击据点时，就抬出来支着，迷惑敌人，以助军威，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次突围丢了，暴露了“秘密”，还真有些可惜。不过，敌人抢“大炮”时，被我们的火力杀伤不少。芋园战斗，是杜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第二次碰壁。

这次战斗，不仅使我们红二团失掉了作战的主动权，而且使根据地蒙受损失。但是，根据地的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反动气焰所吓倒。他们在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骚扰袭击敌人，搞得敌人昼夜不宁，不久便撤离根据地。

3月3日，红二团返回照金，杜衡离开部队回了省委机关。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王世泰著《陕甘边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因树敌太多，苏区的地盘越来越小，最后仅剩下一个孤零零的薛

家寨，还处于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伤员无法安排，粮食无法补给，红军主力在照金一带的活动陷入困境。

3月下旬，红二团转入外线，主动向东出击，打下同官县金锁关，消灭民团30余人，截断咸榆公路。随后进军三原县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会合。刘志丹派战士佯装失败，诱骗山字区北原敌一个骑兵排上钩，红军夹路伏击，全歼敌骑兵排。

4月5日，红二团南下泾阳一带活动。从情报得知，杨虎城要陪美国水利工程师安立森到泾惠渠吊儿咀参观，并有一连人护卫。

4月6日，王世泰带人在吊儿咀水闸前抓获安立森，刘志丹带大部队在西凤山下集结，当晚返回驻地，将安立森交给了泾阳游击队。第二天敌人出动一个团的兵力来抢安立森，晨雾中，两军交战，由于红军早有准备，敌人只好罢兵返回。接着，刘志丹又率部队在淳化、旬邑、彬县消灭了几股民团。

5月上旬，部队进入宜君县上畛子稍事休整。期间，强世清带12个人、3条枪、7匹马来找刘志丹，大家相见非常亲热。强世清向刘志丹汇报了自己返回安定联络人，拉起游击一支队，伏击敌县长的事情。刘志丹听后，非常高兴，对他的工作作了指示，并对一支队进行了武装补充，派杨重远任一支队政委，马佩勋任副支队长，派一支队继续回陕北进行活动。

5月中旬，敌人调集4个团和6个县民团，分四路进攻照金根据地。杜衡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提出“死守照金”的口号，结果连打了两个败仗。这时，中共陕甘边特委决定，让游击队在内线坚持斗争，红二团转到外线作战。随后，红二团收编了国民党军两个连的兵变部队，并相继消灭了一些民团，部队扩大到近500人。5月20日，红二团回到照金苏区。这时，杜衡被敌人的“围剿”所吓倒，开始动摇起来，他悲观地认为：“敌人力量大了，后方失了，群众跑光了，没有粮食了，创造不了根据地，扩大不了红军。”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他先提出“北上打通国际路线”，但遭到红军战士反对和陕

西省委的制止。6月中旬，杜衡从省委返回照金，17日在照金北梁召开边区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会上他又主张南下渭华，说“渭华党的基础强……群众条件好，人口稠密，物资丰富，地形险要。转移既可与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配合，又可切断敌人交通，威逼西安。”并宣称，南下渭华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针”。实际上，陕南的红二十九军在1933年4月已经失败，红二十六军南下只会陷于孤军深入的险地。杜衡的南下方针遭到了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刘志丹等认为，渭华暴动失败后，党组织受到破坏，群众遭到残酷镇压，情绪低落，红军到那里不易立足；照金苏区建立不易，不能轻易放弃。红军若脱离根据地会困难很多，危险很大。但杜衡对刘志丹等人的意见横加指责，给他们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刘志丹怅然道：省委不来想省委，省委来了怕省委。

6月下旬，杜衡无视客观实际，拒绝刘志丹等人的正确主张，并不顾省委、边区特委及三原中心县委的反对，专断指挥，强令红二十六军离开照金根据地，踏上南下的迢迢路途……

## (2)

关于陕甘红军南下的经过，红二团团团长王世泰这样回忆：

——6月21日清晨，我们召开全团大会，杜衡和刘志丹在会上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饭后，部队由北梁出发，挥师南下。

其实北梁会后，刘志丹给我传达会议精神，他神情严肃，用低沉的语调说：“会议决定红二团南下建立渭华根据地。”

听到要南下，我也不解，就凭我们几百号人，几百条枪，进入敌人腹地，能行吗？但同样说不出个道道来。接着志丹问我：“你的看法呢？”

我当时还很幼稚，想着只要有志丹撑腰，到哪里都一样为革命打

仗。顺口说道：“你对那一带熟悉，现在会议已经决定了，我只有服从。反正在军事上靠你就行。”

志丹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说：“是呀！组织的决定，只能服从，尽力把仗打好。”

其实，志丹那时心情非常沉重，他既为红二团的命运担忧，又为当时所作的错误决定而揪心，只是不便公开说出来罢了。

为了确保南下，部队作了必要的调整，把一些伤病员和身体较弱的战士留下来，把多余的武器留给地方。全团指战员共有 300 余人，七、八十匹战马，几十匹骡子，枪枝弹药比较充足。

下午，部队到达桃曲原。桃曲原村西有条小河叫桃曲河，村南有座土寨子，无人居住，团部驻扎在村里。

大约下午 4 点多钟，部队正在开饭，突然枪声大作，敌人偷偷占领村南土寨，向我军猛烈开火。我听见枪声，一个箭步冲出窑洞，命令司号员康健民用号声调各连反击。志丹随后也冲了出来，一边打一边命令一边冲锋。一个急冲锋，把敌人从寨子里压到桃曲河沟，骑兵连又从原上俯冲下去，截断敌人的退路，共消灭敌人 80 多人，缴获大批枪支。这股敌人，是淳化县的保安队，有 100 人。大概因为他们的“情报”不准，错把我军当成小游击队，企图来个偷袭一网打尽。其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丢下几十具尸体，狼狈逃窜。天黑时，我们清扫了战场，把枪枝弹药交给当地游击队，把俘虏交给地方干部，让他们处理。

翌日，红二团由桃曲原出发，经凤凰山从爷台山和方里镇之间直插下去，行军 100 多里，到达三原县二台，与黄子祥、张秀山领导的渭北游击队汇合。在这里，二团党委和游击队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杜衡继续奢谈红二团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渭北游击队的领导人，对此表示异议，劝阻不要冒此风险。杜衡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劝阻，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

6月23日拂晓部队出发，下午到达长坳。在长坳，我们配合渭北游击队打了富平张德润民团。这个民团，是当地豪绅从富平请来，专门弹压游击队的。他们来后，无恶不作，抓走我苏维埃主席孙平章等人，群众无不痛恨。长坳，地形险要，寨子两边都是深沟，易守不易攻。战斗打响后，少部分游击队员和步兵一连两个排从正面攻击，吸引敌人；骑兵连绕道敌侧后助战，部分游击队员从后沟压下去营救被捕同志。结果，敌人把孙平章等人转移了，没有营救出来，二团又急于执行南渡渭河的命令，黄昏时撤出战斗。部队来到寇家庄，没有进村，在庄外场上休息吃饭，饭后，我们准备出发时，杜衡突然提出，他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声称待汇报完工作后，再沿大路追赶部队。志丹和我感到意外：刚刚南下，怎么就要离开部队？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得表示同意。于是，把部队集合起来，由杜衡讲话。杜衡向大家重新说了一遍他要回西安的理由，当场宣布，在他离队期间由汪锋代理红二团政委。杜衡走时，从经理处长刘约三那里，要了一头毛驴和一些钱，只身离队。事后得知，杜衡并没有直接去西安，而是到了三原县境内。

省委听到红二团南下的消息后，非常着急，认为南下不仅错误，而且会将红二团断送到渭华一带，立刻派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县阻止部队南下。袁到三原正巧碰见杜衡，遂在三原县民众教育馆与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赵伯平、刘映胜召开紧急会议。

参会者赵伯平讲述：

——会议由省委书记袁岳栋主持召开，参加者有我、黄子文、杨声（刘映胜）、杜衡共5人。时因杜衡在红二十六军极力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所谓的“梢山主义”、“富农路线”等，做出了红二十六军二团过渭河南下的错误决定。并不等省委同意，就令红二团南下。省委当时不同意杜衡的这一错误主张。正当红二团6月间南下经过三原时，省委书记袁岳栋赶到三原找到我，经研究决定，才在民教馆召开批评杜衡的会议。会议开始时，杜衡态度不好，经过斗争，杜衡勉强承认他“有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会议决定，红二团停止

南下，仍回照金根据地，由黄子文追赶红二团传达这一决定；同时立即通知高陵县委在渭河畔阻挡红二团。但为时已晚，黄追到渭河边，红二团已过渭河；高陵县委也未能将二团拦住。黄最后虽追上部队，但红二团已经失败，因而未能挽救杜衡给革命力量带来的损失。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赵伯平著《红二团南下情况》550页。

王世泰继续回忆：

——部队离开寇家庄，在地下党的向导下，向高陵方向夜行军。高陵县位于渭河北岸，地势平坦，无遮无掩，水渠纵横，行军困难，这里住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如果不趁夜间偷越，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天黑极了，战士们拉成一行队列，深一脚浅一脚地穿麦田、绕渠埂行进。绕来绕去，我带的部队和志丹带的人马失去联络。当东方出现鱼肚色时，我们才刚从高陵县南城墙根穿过，抬头望去，城上敌人清楚可见，敌人不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不敢贸然开枪，我们急于行军，也未予理睬。等我们行至高陵县城东古塔跟前，才与志丹一路汇合。原来，志丹他们是从城北穿过来的。

6月24日早晨九点多钟，部队至达渭河渭桥渡口，渭桥渡口，是通往西安的一个主要渡口。渡口高崖上修有一座炮楼，河边驻守20多个武装团丁，盘查过往行人。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出现在面前，所以，当一个团丁从大门出来被我们捉住时，还在莫明其妙。随后，我们逼团丁骗开他们的大门，一枪未放，缴敌十几条枪，夺下渡口。

夏天的渭河，水大浪急，几百人渡河非同小可。岸边有两条船，部队全靠船摆渡，很难在短时间内渡过，况且这里距高陵县城不远，一旦被敌人发现，将迫我于背水一战的绝境，大家非常焦急。

正在这时，河对岸一只小船载着几个人摆渡过来，其中一人身着长袍，头戴礼帽，斜背一把盒子枪，趾高气扬地站在船头。这个人以为渡口边都是他的人，毫无防备。船刚刚靠岸，“干什么的！”我们战

士大声喊道。“我是团总，薛兆兰。”随着来人的回答声，几个战士扑上去缴了他的枪，捆绑起来。这个薛团总，后来被我们枪毙在渭河南岸的洪庆镇，到死他也没闹明白，红军怎么会突然降临的。

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积极寻找船工，一方面组织骑兵连乘马渡河，占领河南阵地，掩护部队过河。当骑兵连全部渡过之后，大部队和驮骡依次过河。大约用了将近两个小时，全团顺利渡过渭河。临走时我们送给船工们两匹骡子，作为酬谢。

部队过河经耿镇，径直向南行军。中午，在灞桥附近村子里，碰上四、五十个全副武装的敌人，正在吃午饭，我骑兵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包围起来，迫使敌人乖乖缴械。敌人看我骑兵连穿的是西北军服装（缴获长武晔变那个连的），误认是王泰吉骑兵团的人，连骂带闹，声言要到西安杨虎城主任跟前打官司。战士们厉声说道“我们是红军”。敌人才像泄了气的皮球，不再言语了。沿途，我们又拦截了由东边开过来的 13 辆拉百货的汽车，缴获部分急用物资，并令其原路返回，以防走露消息。部队继续向东骊山方向前进。

两天一夜急行军 200 多华里，人困马乏，战士们疲惫不堪。眼下又临险境，右有西安方向重兵扼守，后有渭河天堑挡道，左有临潼方向的敌人封锁，大家预感前途渺茫，无不痛恨杜衡。

志丹对我说：“杜衡这个坏家伙，把我们搞到这里来，硬是要我们自己把自己的部队搞垮呵！”

我说：“怎么办？干脆咱们带部队原路返回。”我认为原路返回，虽然要受很大损失，但总归比坐以待毙强。

志丹摇摇头说：“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前进，冲出包围，继续向预定的方向进军。”

黄昏，部队来到东骊山山脚下宿营。这里离西安约 50 华里，距临潼 20 华里，随时可能遭到敌人合围，但是战士们一天一夜没有吃饭，连饿带累，实在无法继续夜行军了。大概因为天太黑的缘故，敌

人摸不清我们行动的方向，没有夜袭，所以，我们总算度过了危险的一夜。

当晚，志丹、汪锋和我临时决定召开团党委紧急扩大会议，研究下步行动计划。会上，有人主张前进，有人主张后退，争论不一。关键时刻，志丹表现出持重和远见。他考虑：进亦险恶，退亦险恶。进，尚可与敌周旋；退，唯有与敌决一死战。再以党内是非而论，中途返回，胜败都难以分清曲直。最后，他陈述了败于进，而不败于退的利弊，说服大家统一认识，作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思想准备，竭尽全力继续完成南下任务。

7月2日，一场恶战开始了。拂晓，部队一鼓作气登上东骊山。与此同时，敌警备一旅唐嗣桐部和临潼敌保安团，从另一座山上山。我军战士奋不顾身，先敌数分钟抢占高山头，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向秦岭山区进发。敌人拚命进攻，紧紧咬住我们不放。为了迅速摆脱敌人合围，志丹、汪锋带大部队先行撤出阵地向羊毛山前进，我带骑兵连掩护撤退。沿途，部队又碰到几股民团堵截，我指战员精神抖擞，连续冲锋，杀开一条血路，翻越两座大山，日经5战，行军100余华里，于下午4时多，到达兰田县的流峪口。我军原计划由流峪口进山向商洛方向突围，但因山口地势险要，有敌许家庙民团把守，无法进山，后改道抵厚子镇穆家原宿营。尾追的敌人，当夜在距我军10余华里的地方宿营。

穆家原距厚子镇不远，那里驻守民团大约七、八十人。为了防备敌人偷袭，政委汪锋（兰田县人），利用旧有的关系，派人与民团交涉，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为部队争取到稍事休息的时间。

7月3日，我军鉴于翻越秦岭南下受阻，拟东进箭峪口。清晨，部队刚刚行进不到10华里，中了当地民团的埋伏。我一连立即反击，打死打伤十几个民团团丁，敌余部逃窜。

部队拉成行军队形，先头部队由随营学校学员和少年先锋队担任，后卫由我带领骑兵连阻击尾追之敌，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大约行至

30 多华里的地方，突然与一股民团遭遇。顿时，枪声四起，弹如飞蝗，部队前进受阻。志丹当即命令先头部队迅速抢占右方一个山头，打通隘口。此时，敌人已由山头的另一侧向上爬去。这里地形于我十分不利，右有悬崖，左为峭壁，前后受敌，处境万分险恶。“狭路相逢勇者胜”，我英雄的红二团战士，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发扬勇猛顽强的作风，和敌人展开了血战。随营学校的学员，本是一批干部的后备力量，个个都是经过战火锤炼的英雄，在这关键时刻，班长黄罗斌带领全班战士，硬是凭借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对敌的仇恨，抢先占领制高点，打退扼守隘口的敌人，先头部队趁机冲锋，打得民团仓惶逃窜。我军转锋向东，经周楚庙、桥南至箭峪口宿营。

夜宿箭峪口，并未脱离险境。敌唐部离我们不到 20 华里，另据群众反映，渭南守敌韩石本警备师距我们也只有 20 多华里，华阴、华县、潼关又驻扎着冯钦哉的部队。加之，这一带民团实力较强，敌情仍然十分严重。

7 月 4 日凌晨，我军进入箭峪沟。箭峪沟长达 60 余华里，沟中石头很多，骡马行走困难，所以部队前进速度很慢。中午，敌人追了上来与我后卫部队接火，战斗十分激烈。好在沟里狭窄，敌人无法展开，我军边打边走。下午 4 点多钟，当我们进入到一段开阔地带，敌人加强了攻势，迫击炮、重机枪铺天盖地而来。为了掩护志丹、汪锋带主力继续前进，我带步兵一连阻击敌人。敌人越攻越猛，我军节节后退，最后强行退至沟右的一座山头。山大沟陡，战士们几乎是爬着上去的。敌人分两路追击我们，一路追击主力队，一路向山上进攻，就这样一直战斗到夜幕降临。等我们摆脱敌人追击之后，便与主力失去了联络。三日后，我两股部队才在青岗坪附近汇合。

至此，红二团离开照金已整整一周。一周内，找不上地下党组织，联系不上群众，在敌人连日围追堵截下，孤军作战，全力苦撑。连续作战缴获敌人的 200 多支枪，反成了包袱，无可奈何，只得将多余的枪枝，在箭峪口一火焚之。

部队在青岗坪休整一天，9日继续南进，大约四、五天之后，到达坝龙庙附近。事先，志丹曾派人给坝龙庙团总李凌云送去一封亲笔信，提出让他保持中立，帮助我们购买些粮食和物资。所以，我们到坝龙庙没有受到阻击。在这里，我们召开了群众大会，筹集了一些粮秣。

秦岭山区的地形十分复杂，悬崖陡峭，道路崎岖，森林茂密，荆棘丛生，部队翻山越岭，穿林涉水，不少战士累垮了，战马驮骡磨坏马掌，得不到更换，成了跛腿马。秦岭山区的气候，瞬息万变，时风时雨，时冷时热，几乎天天有暴雨。暴雨一发，洪水遍地，战士们无处藏身，任凭雨水浇淋，夜间露宿，任凭寒风侵袭。特别是群众对我们不了解，见了我们就跑。进山以后，我们好象鱼儿离开水，搁浅在沙滩上一样，耳目闭塞，消息不灵，甚至连个向导都找不到。这样恶劣的环境，行军已是万分艰难，更何况要时刻准备与围追的敌人搏斗。所以，我们研究把部队于7月15日带到张家坪，准备另辟蹊径，摆脱敌人。

张家坪在西安至商县的交通要道上，四面环山，梢林密布，东西方向有一条小河流经，公路两旁地势较为平坦的地方住着十几户人家。当晚，部队宿营在这里。

第二天清晨，山中大雾弥漫，村庄道路一片模糊。早饭后，团党委在村内一个大客店里，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行动计划。会上，大家分析了当前形势，讨论了以后的行动方向，认为向北向西都是平原和平坝地区，孤军撤离，根本不行；向东有敌人重兵把守，要冲出重围，敌众我寡，力所不及。最后，大家意见，向南突围到柞水县，再设法与红二十九军靠拢（实际上红二十九军已不复存在了）。

会议还没有结束，村外就响起激烈的枪声，敌唐旅和地方民团，趁大雾从东北沟里突然打进村庄。听见枪声，干部们立刻冲出店外，回连队组织部队反击。雾实在太大了，等我们冲到公路，什么也看不清楚，慌忙中，我带领吴岱峰、高锦纯的二连和其他连队100多人，

迅速抢占西北面的一座山坡，以树林为依托集中火力，抗击敌人，掩护部队突围。志丹带一部分人沿公路向西突围，汪锋带一部分人向南突围：突围时，志丹看骡马来不及撤退，曾下令开枪打马，战士们没有执行命令。要他们亲手打死与自己朝夕相处的战马，战士们实在不忍心啊！敌人看见狂奔的战马，蜂拥而至，争抢马匹和军用物资。骑兵连长杨琪有匹大白马，平时最为爱惜，每到一地，人不吃饭，先要喂马。这匹马也很奇特，只认杨琪，不认别人，特别是生人近身，它又咬又踢。一个敌兵想捉大白马，被马咬断一只胳膊，结果这匹马被敌人开枪打死了。

我和吴岱峰、高锦纯带领战士们居高临下，拚命阻击敌人，击退敌人多次强攻，争取了时间，使志丹、汪锋带的部队，分别在上午都突围了出去，但我们却一下从北山上撤不下来。战斗在继续，直打到天黑。敌人夜宿张家坪，我们退至半山露营，等候突围部队的消息。

第二天八、九点钟，敌人组织大约两营的兵力，向我们占据的山头再次发动猛烈进攻。敌重机枪疯狂扫射，迫击炮弹在阵地上接连爆炸，战场上大火熊熊，硝烟弥漫，枪炮声、喊杀声，混成一片。我军被迫沿大台子山、瓦房沟节节撤退，最后从坝龙庙南山向东穿插，抵洛南县两岔河一带，才算脱离敌人。

事后得知，汪锋带六、七十名战士从界牌沟突围，翻越北沟、新店子、鸭峪到达窄峪川的卡房。后因敌人追来，转由半沟向野竹坪、葛牌镇行动。途中，多次与地方民团遭遇，战士伤亡很大。当他们突围至甘家坪时，只留下随营学校队长赵启明等六、七个人。最后，汪锋也负了伤，留在当地养伤，其他人化装成农民，分散出山。

志丹带领部队沿公路突围几公里后，调头上南山，到兰桥一带，又由兰桥向北辗转于深山密林之中。志丹牵挂着失散的同志，几乎每天都派人外出联络，结果只有派出的，没有回来的。是这些战士不忠诚、变节了吗？不是，因为我们的战士多是陕甘边区的人，对这里地理极为不熟。加之，部队整日流动，没有固定的地方可找。就这样，

他们在密林坚持了 20 多天。

一天，志丹把战士们叫到一起，说：“看来，一时也找不上其他同志，现在我们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再继续下去恐怕都得困死在这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每个战士都是一颗革命的种子，我们要想法分散出山，回照金重整旗鼓，再搞革命。听了志丹的一番话，大家都不愿意离开，说要死死在一起，要活活在一块。志丹好说歹说，才把大家说通，让大家埋了长枪，带短枪分散出山，这时志丹身边只有十几个人了。随后，为了行动方便，志丹又让姜兆莹带走七、八个战士，他决意留下继续寻找失落的战友。

志丹带骑兵连指导员惠泽仁、一连二排长贺彦龙等七、八个人，在山中转了好几天，来到箭峪口东边的石头峪，准备从这里突围出山找地下党。当晚，他们住在一个草庵子内，半夜遭到敌民团偷袭。贺彦龙为了掩护志丹，壮烈牺牲，惠泽仁等人与志丹失散，志丹只身躲进深山。后来志丹在山中遇到少年先锋队副队长蒲永胜，两人结伴一直流落在山里。

面对这无情而又严酷的现实，我同吴岱峰、高锦纯、杨文谟商议，准备让部队压枪（埋枪）分散出山回照金。于是，我们便把战士们集合起来，宣布决定。会上，我说：“这次失败，是我们领导上的路线错误，让大家吃尽苦头，现在如果继续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藏山中，将会全部冻死饿死在这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分散回照金，再树大旗。接着，我又讲了如何出山，如何过封锁线的具体意见。

听了我的讲话，在场战士全哭了。患难与共的战友，情深意长，谁愿意离开战斗的集体？但是，不分散出山又有什么良策？大部分战士不得不挥泪而别。我身边只留下吴岱峰、高锦纯、杨文谟、曹士荣、马宜超等 18 位同志。我们把战士们留下的枪枝，分两个地方埋入地下，为了防止敌人挖枪，将枪身和枪栓埋入异地。

随后，我们一行沿石头峪方向，继续寻找志丹、汪锋。我当时设想：志丹、汪锋肯定没有被敌人捉住，捉了敌人会大造舆论的；也不

可能遇难，遇难了风声会更大的。

在石头峪后山，我们整整转了四、五天。一天，我们在后沟两户人家正做饭吃，哨兵急急忙忙跑来报告说，北面山豁口有人影活动。我随即派1个班长带2个战士前去侦察。对面山上的人看见我们的侦察，不答话也不躲藏。侦察员便高声喊道：“你们是什么人？”但对方仍不回答。

“我们是王世泰的人，是自己人你们就下来。”侦察同志看对方只有两个人，想着可能是流落的战士，大胆地再次喊道。

那两个人听说是我带的人，连忙向山下走了几步，说：“如果是王世泰的人，请王世泰出来答话。”

此时，我已来到半山坡，当即向对面喊话，并用望远镜观察。一看，真是喜出望外，原来是志丹。

志丹听见是我的声音向山下走，我和其他同志向山上迎，战友重逢，个个激动的热泪盈眶。这泪水，包含着心酸，包含着喜悦。大家回想起一个好端端的红二团，如今只剩下这么几个人，谁能不心酸！但是，不幸中之万幸，总算找到了志丹。

在老乡家，大家给志丹他们搞了些包谷糊糊吃。我怕把志丹吃坏，直叫少吃些、少吃些，真是“饥不择食”，志丹一顿吃了几大碗，最后几乎连路都走不成。志丹身患疾病，辗转深山老林中，身体完全垮了。在山中多亏蒲永胜找吃、找喝，搀扶行动，他才一直坚持到同我们不期相遇。所以，志丹指着小蒲对我们说。“我能活下来，全凭这个娃娃。”我向志丹详细汇报了埋藏枪支，分散战士出山的问题，志丹说：“我也是这样做的。”他认为，这种做法没有错。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王世泰著《陕甘边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找到刘志丹，大伙又牵挂汪锋，不知他下落如何？经研究，大家认为汪锋率部突围的方向与我们相背，一时恐怕联络不上，但汪锋是当地人，地熟人熟，脱险比较容易。因此，刘志丹决定我们先行返回

照金。

在刘志丹的向导下，两天后到达华阴庙的南山梁豁口。后又转回坝龙庙北山头，在终南山辗转浪迹两个多月，在箭峪后沟东坡一位60多岁的老人帮助下，与奉省委和渭南县委指示来寻找刘志丹和王世泰的地下党员相遇。在地下党的营救下抵达黄辘口。

渭南地下党员王杰回忆：

——不久，红二团就失败了，很长时间与地方组织联系不上……当时负责和地方联系的是省委派来的黄子文，住在姚明辉家的瓜庵子内。找不见红二十六军我们心里很着急，就在李凌云家里商量，认为光在峪口一带找是不行的，因薛增平给刘志丹等说外边敌人很多，不敢出山联系。后来我们进山找，才见了刘志丹、王世泰、曹士荣、芮四、魏武等。我们一块儿在山里转，刘志丹给我们讲哪里可以打仗，怎么个打法。有时迷了路，他就分析一会儿，东西南北就清楚了。晚上迷了路，他就向树上看一看，就能辨清方向。碰到崖，他先拿块石头试试深浅，能不能走，就判断出来了。那时山里晚上很冷，又常下雨，大家都穿着单衣。志丹迟早都拿件夹衣，还取笑说：“谁和我好，我给谁穿。”饿了，我们在山里烧玉米棒子吃。刘志丹等人在华县隐蔽时，派王世泰等人打了劣绅宋宗武，为地方除了一害。之后，刘志丹等人转移到赤水，王世泰在我家住了一天，刘志丹住在王奎家，以后王货郎（渭华县委书记赵应奎）来了，才一块过河。黄子文的老婆在赤水杨春学和李毓璋家住过。走时他从杨春学家来，有4枝短枪，1支八音枪。当时考虑带上还是给渭南留下，后来，认为带走好。本来枪是不少的，出山时，刘志丹让把枪栓和枪分开隐藏起来，后来栓都生锈了，还给赤水带来了些枪栓。过河是由共产党员田彦英渡船的，田以渡船为生，渡河没有出啥问题。

刘志丹等过河后，就住在白思堂家里。农历七月二十几，国民党某部有两船面粉搁浅在河里，没办法走，刘志丹等组织群众把船上的面粉分了。后来敌人把参加分面粉的白思堂等好几个人抓走杀害了。

敌人知道刘志丹等过了河，到处张贴告示，要抓刘志丹。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回忆录部分王杰著《营救红二团南下的人员的经过》第 558 页。

回照金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近路，从蒲城、富平、耀县走；一条是远路，经蒲城、白水、洛川、富县、甘泉、保安、合水、宁县、正宁、耀县 10 县，绕道回去。走近道，因敌人刚刚打过王泰吉起义部队，沿途哨卡林立，封锁严密，穿行困难；走远路，虽然路途遥远，耗时费力，但沿途均有关系，比较安全。最后，决定舍近求远，绕回照金。并根据各人情况分工，白水以南由黄子文负责，洛川以上由王世泰负责，保安以西由刘志丹负责。

经蒲城宿兴市镇，第二天抵刘丁镇，沿途以货郎担行商为掩护。第三天到白水县窑禾镇宿一晚，过洛河，翻黄龙山，两天后入洛川县境，晚宿王世泰的家乡黄连河。几日后进甘泉县城夜宿杨家砭。过保安县在永宁苍沟受到哥老会龙头大爷马海旺的款待，经曹家沟，经大凤川两天后抵达合水县包家寨，由包家寨出发，穿越子午岭，途经五亭子、芦宝梁、艾蒿店、马栏川、老爷岭，于 1933 年 10 月 4 日（阴历八月十五日晚）顺利抵达照金的薛家寨。

八月十五对中国人来讲可是一个吉祥如意的好日子，它象征着团圆。南下苦苦跋涉厮杀四个多月，历经无数坎坷，刘志丹与战友终于又回到朝思暮想的照金根据地。

——刘志丹回来了！

——志丹回来了……

这激动人心的声音，顷刻传遍照金的山山水水。根据地的领导和红军临时指挥部的负责人王泰吉、习仲勋、张秀山、高岗、黄子祥、杨森都迎了出来……

游击队的负责人强世清、李妙斋、张仲良、张邦英、陈学鼎等也迎了出来……

南下突围返回照金的红二团指战员吴岱峰、高锦纯、黄罗斌、刘约三等与刘志丹一行人相拥相泣，百感交集。

红四团、抗日义勇军、游击队的无数战士簇拥着刘志丹，泪湿睫毛，欣喜万千……

### (3)

1933年6月13日，陕甘边特委在获悉红二十六军南下覆没的惨痛消息后，立即在三原县武字区将地方红军武装渭北游击队扩大后编为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辖第一连、第二连、先锋连，共120余人，80余支枪。红四团成立后，担负起主力红军部队的职责。

7月21日，驻防耀县的国民党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率部起义，建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之后，王泰吉任司令，杨声任党代表，谈国帆任参谋长，赵宝山（后龚逢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六个大队，共1200余人，迫击炮四门。之后起义部队在三原辘轳把与敌遭遇受挫，王泰吉遂率余部退入照金。与此同时，中共耀县县委组建的耀县游击队（队长陈学鼎，党代表兼指导员张邦英）和由渭北游击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也进入照金。这3支革命武装的到来，壮大了苏区的力量，缓解了危急局面，增强了根据地群众斗争的信心。

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开会时，被特务盯梢，陕西省委书记杜衡、袁岳栋等人被捕。杜衡被捕后，立刻叛敌，公开登报自首，出卖了所知道的所有党组织和党员，使陕甘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先后被破坏，许多党员革命群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杜衡等人还可耻地充当奸细，带领密探特务，冒充我地下工作人员，在西安大街上盯梢捕人。在杜衡的出卖下，敌人很快就逮捕了前来西安汇报工作的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及中央交通员冯鸣玉、省委技术科长

刘政远等重要干部。此后，新任的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再次来到西安寻找上级党组织，结果被捕。陕甘边特委与上级党组织及中央失掉了组织联系。

在照金苏区处于岌岌可危的时候，陕西省委派高岗来照金开展恢复红二十六军的工作。但此刻在陕甘边党内对于革命形势的认识出现了分歧。一种是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一部分干部由于看到红二十六军主力第二团南下失败，陕西省委被破坏，耀县起义被镇压，红四团也退到了照金苏区，因而感到革命没有出路了，主张“埋枪”搞秘密工作，把红四团带到渭北，分散游击，反对集中领导。另一种意见是继续坚持革命的主张，认为我们还有红军，根据地和红军也能够巩固和发展，因此，红军和游击队应集中领导，成立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扩大和创造陕甘边根据地。为了统一思想，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耀县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正确分析形势，摆事实，讲道理，会议纠正了部分干部中产生的右倾悲观情绪和分散红军的错误主张。接着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陕北一支队及各路游击队等革命武装力量，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统一领导红四团、耀县三支队（原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会后，新组建的红军主力锋芒首指让牛村、庙湾，歼灭雷天一、夏玉山（夏老么）民团各一部，然后乘胜袭击了柳林民团。

国民党军队多次围攻陕甘边苏区的失败，引起国民党最高当局震惊，蒋介石数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限期攻克薛家寨。9月下旬，西安绥靖公署纠集耀县、淳化、旬邑、宜君、同官等县民团千余人，再次“围剿”苏区。当时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游击队主力在照金老爷岭、绣房沟一带同敌作战，薛家寨仅有边区革委会保卫队留守，兵单势弱。在战斗激烈时，修械所、被服厂、红军医院的干部、工人纷纷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正在危急时刻，李妙斋、张秀山率游击队主力从绣房沟赶回，猛烈反击，取得薛家寨第一次保卫战的胜

利。李妙斋在战斗中中弹身亡。

9月中旬，陕甘边红军主力在外线作战时，途中与强世清率领的陕北游击队的一部相遇一起活动。在国民党大军“围剿”薛家寨时，红军于9月25日在彬县底庙歼敌旬邑民团一部，继又智取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击毙民团团总，处决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和一批恶绅，次日返回照金。

10月上旬，刘志丹、王世泰、杨林、曹士荣、黄子文、吴岱峰、高锦纯、刘约三、朱子休、王兆相、康建民、黄罗斌、牛钢、王有福、谭生彬、韩志成、王安民、赵清杰、魏武、芮四、赵铁娃、师八牛等20多名南下幸存的指战员，历经千难万险，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回来后任命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部队群情大振。

刘志丹总结了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教训，对习仲勋等人说：“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习仲勋汇报了陈家坡会议的情况，刘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纠正了错误观点，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就是光明的。”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志丹》中习仲勋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第8页。

10月上旬，总指挥部决定主力红军转外线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刘志丹在返回照金途经合水县城时获悉城内驻杨志恒部赵文治团1个连，加上县保安队，总兵力不足300人，且防守不严，遂决定奔袭合水县城。10月12日，部队由照金出发，15日到达合水黑木原，当即封锁消息，赶做云梯。17日晚，部队冒雨出发，经30多里急行军，来到合水城东。鉴于红军缺乏攻坚武器，采取偷袭的办法，挑选20多名机智勇敢的指战员组成攻城突击队，以骑兵团二连和陕北游击一支队担任主攻，王世泰担任攻城总指挥。18日拂晓开始攻城，在城墙高云梯短无法攀登的情况下，宁县籍战士柴正祥用刺刀扎着第一个攀上城头，突击队员分头行动，出其不意缴了驻

“葫芦把”敌人1个班的枪枝，又缴了东城门楼守敌1个排的枪，接着用驳壳枪打开城门铁锁，放进大部队。主攻部队按预定部署攻占敌连部、保安队队部和县政府，不到半小时即结束战斗，共毙、伤、俘敌1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红军打开监狱，解救了被关押的80多名“犯人”，其中有被敌折磨致残的原西北反帝同盟军大队长杨培盛。国民党合水县公安局长李彦率部起义，县长康磷等少数人弃城逃跑。战斗结束后，红军部队开仓分粮，赈济群众，并张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同时，处决了民愤较大的杜家传、盐税局长李德胜，其余俘虏教育释放，有的参加了红军。当晚，部队离开合水县城，宿营包家寨。

在陕甘边红军主力向北出征时，国民党杨虎城部队大举进攻照金苏区，孙友仁特务团配合耀县民团从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边界开始向照金苏区的大规模“围剿”。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率少数游击队及后勤人员200余人从13日到16日进行浴血奋战，终因众寡难敌，弃寨突围。15日，敌军由叛徒陈克敏带路，乘夜从后山嶮岭旁边的一条石缝攀登上薛家寨，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边区党、政军领导果断作出保存实力，分路突围的决策：一路由张秀山、吴岱峰率领，向党家山方向突围；一路由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带领，从黑田峪方向撤退。10月16日，照金苏区陷落在血泊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革委会委员王满堂、王万亮和不少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10月19日，北上到达宁县盘客原，与主力红军会合。面对照金苏区丧失的实际，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将后方机关暂时迁驻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

习仲勋后来总结照金根据地失败的教训时，认为照金根据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没有充分利用有利地理环境，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和根据地，而把自己株守在一个很小的苏区内；第二，距离国民党统治中心——西安很近，受敌威胁影响，这里的群众力量不大，群众基础不够坚强；第三，红二十六军南下的全部失败，在军事上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助长了敌人进攻苏区的气焰。

这些见解无疑是正确的。

合水战斗，国民党丢了一座县城，大为震惊，于是派赵文治团 800 余人尾追红军不放。红军主力部队在王泰吉、刘志丹的率领下，对尾追之敌采取疲劳战术，牵着兜圈子，选择有利时机予以打击。10 月下旬，红军在城壕川消灭了当地 1 个民团。26 日下午，在庆阳三十里铺，消灭谭世麟部民团 40 余人，缴枪 30 余支，打开天主教堂，没收了一些药品器材，拉了两个外国神甫，然后东进。这时，赵文治团由庆阳尾追而来，谭世麟部也从悦乐、元城方向堵截。27 日，红军宿营于庆阳县毛沟门村。毛沟门是两山夹一沟的山村，住户分散在沟底和沟北半坡上。28 日早晨，敌赵文治团突然追来，向红军发起突袭，并有数十人冲进村子。红军发现敌情，立即组织反击，把敌人赶出村。但此时敌大部队已经赶到。面对优势之敌，总指挥王泰吉命令红军向河东山上转移。骄横的敌人仗着人多势重，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半山腰，王泰吉命令停止撤退，准备反击，并作了战场动员。待敌靠近，一声令下，枪弹、手榴弹一齐开火，追敌顿时乱作一团。红军趁着有利时机，发起反冲锋，300 多名战士犹如猛虎下山，一口气把敌军压下沟底。在红军战士凌厉的攻势面前，敌溃不成军，狼狈而逃。这次战斗，共击毙、俘敌 200 多名，缴枪 200 余支，弹药不计其数。这时，谭世麟正在东北面山岭上观望，见状只好悄然离去。赵文治经此一战，一蹶不振，再未能恢复其团的建制。毛沟门战斗后，红军主力部队即开赴合水县包家寨，进行短期休整。

## 第十章 包家寨会议

### (1)

从 1933 年 6 月至 10 月，陕甘宁边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革命迭

遭挫折：

——6、7 月间，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兵败终南山，在敌军重重围剿下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

——7 月下旬，共产党员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被镇压失败；8 月初王泰吉率百余人退入照金。

——8 月杜衡等人在西安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敌破坏，陕甘一些党的基层组织也受到很大的损失。

——10 月照金根据地陷落，陕甘边党政机关北撤，此外，与陕甘边斗争遥相呼应的陕南红二十九军及渭北游击根据地全部丧失，革命的形势极度恶化，刘志丹与红军进入革命最艰难的时期。

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面临着一个失去上级领导和无处立足的困难处境。在哪里建立根据地，这个始终未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又摆在刘志丹与广大红军指战员的面前。实际上，省委机关被破坏，戏剧性地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的统治；照金根据地的陷落，促使刘志丹等人在无后方的情况下进行游击，这严峻的形势也逼迫刘志丹他们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刘志丹从陕甘边的斗争实际出发，认真总结回顾了几年来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教训，也清醒地看到必须在南梁这样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形复杂，山大林密，进退自如，回旋地大的地区创建根据地，这也是刘志丹心里萌发多年的愿望。

1933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采纳刘志丹的建议，并决定由刘志丹主持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战略方针转移的问题。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等人参加会议。会议以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总结了几年来开展游击战争和创造苏区的经验教训，排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统一了思想认识，做出正确的决策：

(1) 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四十二师；

(2) 建立三路游击区：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

(3) 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

三项决议相辅相成，浑然一体，其核心就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新的革命根据地。

包家寨会议的历史作用是：确定了陕甘边革命的重点为南梁地区，并为陕甘边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格局勾画了蓝图。

首先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深刻地认识到：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11月7日，王泰吉把部队带到葫芦河北岸平定川口的莲花寺。8日，王泰吉、刘志丹在合水莲花寺小镇将部队进行整编，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红四十二师辖红三团，约200人，由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骑兵团约100余人，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为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师、团、连分别建立了党委和支部。同时，师党委决定派张策为42师党委特派员，到南梁一带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并决定让在小石崖罗连成处养病的习仲勋病好后也到南梁一带开展群众工作。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南梁中心区域的开辟；其次包家寨会议决定将根据地放在南梁地区。这是由南梁地理环境，群众基础等条件决定的，同时也解决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核心问题；其三，采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建立多个游击区，各游击区遥相呼应，但三路游击区又均以南梁为中心。

包家寨会议标志着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包家寨会议所制定的战略决策，迅速推动陕甘边革命。所以，说包家寨会议从危机中挽救了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并确定了陕甘边地区革命斗争的战略重点和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格局，它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因此，被誉为陕甘边党史上的一次

“遵义会议”。

莲花寺整编后，红四十二师党委在东华池举行欢送大会，欢送陕北游击一支队重返陕北扩大根据地，刘志丹还从主力部队中选派惠泽仁、魏武、康健民等到一支队，加强一支队的领导力量，陕北一支队在陕甘边经过月余战斗，人员已由 70 多人发展到 100 余人，为开辟第一路游击区奠定基础。

红四十二师成立不久，即挥师南下，为创建三路游击区作准备。11 月中旬的一天傍晚，部队到达宜君县杨家店子，骑兵团驻在镇子里，师部和红三团驻在下川。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一团左协中部 1 个连获得消息，由焦家坪方向偷袭红军。早晨 9 时左右，向骑兵团发起进攻。骑兵团战士听到枪声，仓促应战，向镇外冲锋，无奈敌已占据有利地形，猛烈的火力封住街道，不得不边打边退撤出镇子。师部得知敌只有 1 个连，且无后续部队时，当即命令红三团投入战斗，消灭该敌。敌见红三团向其接近，遂退守后山。下午 1 时许，红军部队发起攻击，广大指战员冒着枪林弹雨，最后终于攻上山头，夺下敌阵地，并与迂回部队合围，全歼敌 120 余人，击毙敌连长。

杨家店战斗后，红四十二师回到南梁地区。为了迅速打开创造苏区的局面，决定红三团东去洛河川活动，骑兵团在南梁一带扫除地方反动势力。当时，荔园堡寨子驻国民党警备骑兵团张廷芝部 1 个新兵营，戒备懈怠，寨墙破损，易于攻取。骑兵团侦知敌情，一个猛冲，20 多名敌兵全部做了俘虏。当天，骑兵团捣毁了寨子，处决了营副梁邦栋，遣散了全部俘虏。

12 月初，骑兵团在城壕川活动。一天上午，部队在川道里西行，杨森政委带一连一班作尖兵队，在川口附近的阳台上，与谭世麟所率四、五百民团军遭遇。敌人正在开饭，双方都很突然。面对敌情，杨森果断命令一班长宋飞率全班猛冲敌群。12 名红军战士如弓箭离弦，边射击边冲锋。敌人措手不及，被打得晕头转向，立刻四散逃命。红军一直把逃敌追上香山原。当敌人发现红军只有 10 余骑时，便组织

反攻，把红军又压下山来。正在这时，骑兵团后续部队赶到，遂合兵一处，再次反冲过来，敌大败溃逃。这次战斗俘敌 10 余名，并缴获谭的坐骑。此战狠狠打击了谭世麟积极配合国民党部队“围剿”红军的气焰。

在此前后，刘志丹还率骑兵团消灭了城壕、赵沟门、阎洼子的地主武装，拔掉了敌人的一些据点，为建立苏区奠定了基础。

12 月，刘志丹和红四十二师部回到南梁，趁战斗间隙，配合地方工作干部，广泛开展群众工作。他们以连排为单位，分别到平定川、豹子川、太白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等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激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帮助组建二路游击队。同时，在南梁一带建立红四十二师后方留守分队，把伤病员安置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治疗、休养。在红军部队的帮助下，荔园堡、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等地的农民联合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相继建立，南梁还建立了乡村苏维埃政权。

1934 年 1 月 8 日，刘志丹和王泰吉率领红军主力四十二师，南下淳耀帮助第三路游击队作战后，凯旋返回南梁山区的廉家砭，这时，王泰吉一再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师党委决定由刘志丹任红四十二师师长，同时，由杨森接替高岗师政委职务。王泰吉后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于西安。

刘志丹任师长后，亲自编写了《军事教育大纲》，进一步加强红二十六军的政治和军事建设。同时二路游击指挥杨琪给红二十六军输送优秀战士 200 名，战马 70 余匹，使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扩编为 3 个连，战马 300 余匹。

1934 年 1 月，刘志丹率军在南梁南部的大凤川扫荡土匪，路过刘家园时村民非常害怕，弃家逃往山林中藏匿。在寒冷的季节里村民面对秋毫无犯，歌声嘹亮的部队疑惑顿释，闻知是刘志丹的部队，纷纷返回家中，刘志丹与张木匠热情攀谈，并将张木匠家中详情一一道出，张木匠十分惊喜，紧握着刘志丹的手，半晌道不出话来。继而，

四处张罗村民接待红军战士。这时，一位年愈七旬的李大爷听说村里来了红军，就将炕洞里藏的十几颗鸡蛋提上，拄着棍来到红军四十二师的师部，对一个忙着拿洗脸盆，招呼人洗漱的红军说：“你是伺候刘师长的勤务员吗？你领我去看看刘师长！”

刘志丹忙扶住李大爷，笑着说：“老大爷，刘志丹不用人伺候，我是伺候大家的！”

大伙看着李大爷都“扑哧”发笑，李大爷迷惑不解地问：“小兄弟，你们笑什么？”

那个小战士指着刘志丹笑着说：“这就是我们的师长！”

李大爷打量着刘志丹感慨地说：“红军首领这么朴素，穿的与士兵一个样，怪不得红军这么受穷人喜爱……”

刘志丹面对许多村民动情地说：

“乡亲们，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们打富济贫，让农民有地种，工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让受苦人都过上好光景。”

刘大爷拉住刘志丹的手满含热泪地说：

——你真是一个清官啊……

从此，陕甘边穷苦百姓人人传唱——

正月里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上队伍上横山（即子午岭）

一心要共产……

红旗飘扬满山岗，  
跟着老刘上南梁。  
长枪短枪机关枪，  
满山人马闹嚷嚷。  
军号声声震天响，  
人欢马叫势力壮。  
老刘山上喊一声，  
千军万马齐响应……

1933年冬到1934年春，刘志丹依照包家寨会议精神率红二十六军倾心竭力组建二路、三路游击指挥部及众多的地方游击队，随着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红二十六军又得到大量的兵员补充。红三团、骑兵团不断壮大，刘志丹又相继建立红二团、红一团，并成功地改编西北抗日义勇军，部队达到5个团的建制，总兵力达200余人，为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立下赫赫战功。

包家寨会议确定建立二路游击总指挥部，1934年1月，任命杨琪为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于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小河沟成立庆阳游击队，杨培盛任队长，习仲勋、惠子俊先后任指导员。成立之初仅有8个人、3支枪，经杨培盛的动员串联，10天时间就发展到30余人，主要在二将川、东华池、太白一带活动，杨培盛曾带领队员，勇闯二将川、刘坪堡，收缴民团枪30余支，手榴弹70多枚。

同月，在南梁成立合水游击队，张振东任队长，孙铭章任政治指导员。由6人起家，张振东利用东华池民团团总是他义父的关系，乘敌不防，迫其下令缴枪25支，队员很快发展到20余人，在合水一带游击。

12月，在二将川杨台村成立保安游击队，编3个班，由刘约三任队长，王英任政治指导员。在南梁附近活动，曾收缴王洼子、南梁寨子、义正川高台寨子、樊家川寨子、洛河川旦八寨子等民团的枪支。1934年2月，发展到60余人，扩编为2个中队。4月，在南梁玉皇庙与刘景范带领的60多名青年农民会合，合编为保安游击支队，刘景范任支队长，扩编为3个中队，并在洛河川、麻台川活动开辟新苏区。此外，还成立安塞游击队，由王志昌任队长，王士贵任政委，同时还成立一个特务班，专门为南梁根据地后方工作委员会看管从各地押回的土豪劣绅，护理伤病员。习仲勋从小石崖病愈返回南梁，从事根据地建设工作。

四路游击队在二路游击指挥部领导下，忽聚忽散，遥相呼应，协同作战，仅几个月时间，就拔除了东华池、林锦庙、刘坪堡、阎家洼子、南梁堡、王洼子、义正川高台寨子等据点，收缴枪支270余条，为创建南梁苏区奠定基础。

在刘志丹的帮助下，1934年2月三路游击指挥部成立，张明吾（后为王安民、陈国栋）任总指挥，黄子文（后为张仲良）任政治委员，下辖特务队、正宁四支队（平子游击队）、正宁五支队、八支队、十六支队（回民游击队）、宁县三支队、一支队及淳耀、中宜、富甘、旬邑等游击队，共100余人，在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中部、宜君一带活动。

1934年2月至4月，在南梁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刘志丹率领红军与国民党部队展开了“围剿”与“反围剿”的殊死搏斗。国民党当局得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的建立，立即部署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命令王子义团、仇良明团及谭世麟的民团军从正面进攻，驻耀县干部团、特务团、旬邑何高侯团、洛川冯钦哉部1个团以及延安张瑞卢团陈兵堵截。当时，刘志丹与红军反“围剿”的部署是：三路游击队牵制、扰乱、袭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在二路游击队的配合下，打击与消灭正面进攻之敌。3月，红军主力部队从耀县出发，相继在姚曲、石板、五里镇、店头、蔺家砭、崖窑打了几仗，消灭大量敌人，接着

在陇东地区，展开更加壮阔的战斗。

3月27日晚，红军在崖窑侦知国民党庆阳县第四自治区区长高明山次日要给其父过周年，有几个地主也将去送礼。红军派了几个侦察员化装成“要饭”的，混入高家，控制了3处大门。大部队来时，侦察员们掏出手枪堵住大门，未费一枪一弹，便抓获了高明山等5个豪绅地主。高家所备丰盛的酒席成了红军的午餐。

红军在高桥拉豪绅后，接着到达元城，消灭了驻守元城寨子的谭世麟部民团，缴获步枪10余支及其它物资。随即沿川南下。当时，谭世麟的民团军司令部驻刘家堡子，堡子由岩石砌成非常坚固。隔河相望，赵梁子驻谭部1个骑兵连。红军决定消灭这股骑兵。首先派部队包围了刘家堡子，断其援兵。红军骑兵团直趋赵梁子，发起凌厉的攻势，将该骑兵连全歼，击毙敌连长郭××，缴获战马40余匹、枪数十支。

新调庆阳的王子义团是这次“围剿”的主力部队，从未与红军交过手，十分骄横，四处追寻红军，带着很多绳子准备捉拿红军请赏，4月2日，王子义团的两个营及1个机枪连共700余人，在一名团副的率领下追至西华池。

西华池镇处在东西两侧临沟、南北狭长的原面上。当王子义团到西华池附近时，即被二路游击队发现，红四十二师师长刘志丹与红三团团长王世泰一起登城瞭望，见敌在500米以外，排成两路纵队扑来。刘志丹根据敌情和地形特点，立即部署战斗。命令红三团正面迎击，骑兵团侧面迂回。红三团两个步兵连隐蔽在北门外一条横向壕坎下，先锋队压在北城墙上，准备掩护主力冲锋。骄横的敌人直到离红军阵地200米远才散开队形向红军开火，红三团立即还击。此时，骑兵团大部分下沟饮马尚未上原。一连一排长李守成见情况紧急，率全排战士冲向敌阵，但由于敌火力太猛，冲锋未能奏效，李守成阵亡。红军冲锋受阻，敌军就狂呼乱叫着向前扑。骑兵全体集合后，迂回敌侧后，切断敌之退路；二路游击队从东沟畔向敌攻击，红三团也发起冲锋。

敌在红军部队三面夹击之下，失去指挥，乱了阵脚，迫击炮还未及从马身上卸下来，重机枪也未及架起，就被压迫到西北角的沟里，人马自相践踏，鬼哭狼嚎。整个战斗只 1 个多小时就结束了。除敌团副带少数人逃跑外，共毙俘敌 600 余人，缴获德国造马克沁重机枪 2 挺，八二迫击炮 2 门，炮弹数十箱，长短枪 600 余支，骡马 50 余匹。红军仅伤亡数人。这一仗，红军歼敌之多，缴获之丰，都是空前的，是红四十二师成立以来的一次大胜利。

刘志丹领导红军连续打胜仗，不断扩大根据地，习仲勋、张策领导后方工作人员，深入南梁地区的广大农村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农民联合会、贫农团、雇农会等组织在各地相继成立，并在小河沟、二将川、东华池、白马庙川、玉皇庙川建立 5 个赤卫军大队，共 1000 多人，使根据地日益巩固。随着刘志丹领导的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也迅速扩大，北至吴堡川，南至固城川，西至柔远川，东至大东沟，方圆 200 多余里的地方完全成了巩固的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经初具规模。继四合台乡村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小河沟川、豹子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平定川、吴堡川、义正川、樊川、麻地台川等都建立了乡村苏维埃政权。1934 年 2 月，在白马庙村建立了南梁地区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有党员 4 人，支部书记张志德。

在群众组织普遍建立的基础上，1934 年 2 月 25 日，习仲勋、张策在南梁四合台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委员会主席，白天章（后为贾生秀）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张步清、牛永清、杨玉亭、呼志禄、贾生秀、边金山分别任委员长。同时成立保卫队，郭锡山任队长。

国民党当局 1934 年 4 月“围剿”失败以后，紧接着于 5 月又部署了新的“围剿”。其兵力部署是：杨志恒部仇良明团的骑兵营配合谭世麟民团军由庆阳出发向南梁一带进击，冯钦哉部 1 个团由富县直罗镇、黑水寺及杨家店、转角镇方向拦截，张子英团向西，邢团向马栏、转角方向进攻，何高侯团由淳化、土桥出击，并调马弘章骑兵团驻山河封锁西路，总兵力 8 个团约 1 万余人。兵分五路进剿南梁根据地，企图一举歼灭陕甘红军。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刘志丹在照金召开 42 师党委会，研究决定迅速北上回师南梁根据地，并命令三路游击队尽力牵制何高侯和冯钦哉的行动步伐。红四十二师部队南下三路游击区，在耀县打下黄堡寨子，筹到一大笔经费。在十里原、马家山活动期间，获悉敌何高侯的两个连从土桥去淳化，即将路过三里原，遂决定消灭这股敌人。骑兵团三路游击队从三里原由两侧包围敌人，红三团从马家山跑步投入战斗。当敌发现被红军包围时，已无法逃跑，遂龟缩进甘家嘴村一个场院里负隅顽抗。红军战士经过奋勇冲杀，终于占领敌阵地，全歼敌两个连。这次红军也伤亡三、四十人，杨森政委带头冲锋，也负了伤。

5 月，刘志丹在外线相机作战时，将行动目标瞄准王郎坡寨子赵世坤民团。刘志丹率骑兵团为拔掉这颗钉子，采取了引蛇出洞的办法。首先派骑兵埋伏在由湫头去三嘉塬的要道——石炭沟口；同时，派几名战士潜入湫头镇周大海家药铺，假装行劫，拿走一些零碎东西，又拉了另一家毛驴。然后，让周大海去王郎坡找赵世坤“报案”，纵容赵率队前往追捕。不可一世的赵世坤果然上钩，立即率民团全部出动，沿路向三嘉塬方向追击。追至石炭沟口，被预伏红军全歼。赵世坤被活捉，处决于三嘉塬狼牙洼。

红四十二师从三里原战斗缴获的文件中了解到敌欲围歼红军于小关中的企图后，紧急命令部队转移北上，迅速跳出合围圈。部队从淳化马家山出发，向石底子前进。红三团为前锋，负责打开北上通路，骑兵团断后，掩护突围。走不多远，部队就被马弘章团骑兵咬住，紧追不舍。红军边打边撤，一夜行军 100 多华里，次日晨到达南邑。刚

停下休息，准备造饭，尾追之敌已赶到。骑兵团且战且退，混乱中与敌骑兵混在一起，冲乱了步兵队形，致步兵火力难以展开。红三团团团长王世泰领 1 个排在五顷原西侧山岭阻击，掩护大部队转移。在弹药将尽的情况下，钻进茂密的森林，摆脱了敌人。红三团先锋队在高凤坡阻击敌人，打得英勇顽强，终因众寡悬殊而后撤。大部队撤到雕翎关，又遇敌人堵截而激战 1 天。这次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红军部队受到很大损失，阵亡 30 多人。其中先锋队牺牲人数最多，有的重伤员钻进梢林无人救护而死去，有 20 多名红军被俘，残暴的敌人竟将他们活埋在山河城老爷庙里。红军仅有的迫击炮、重机枪也丢掉了。战后，红军部队在五顷原、石底子、上畛子等地边休整边收容失散人员，到了和尚塬，基本集齐。刘志丹总结了教训，整顿队伍毅然北返南梁。5 月中旬，转入外线作战。

红四十二师在五顷园与敌骑兵团苦战的同时，西线仇良明、谭世麟率 1000 余人于 5 月 9 日攻占南梁，四处搜捕群众，驱赶牛羊，焚烧房窑，砸烂锅碗水缸，大肆抢劫财物，无恶不作。霎时间，南梁山区浓烟四起，血雨腥风。5 月 13 日夜，仇、谭匪军将共产党员、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席白杨珍，土地委员会干部曹思忠，红军修械厂工人李青山等 6 人杀害，并在阎洼子等地活埋革命干部群众、伤病员 42 人。烧毁民房 40 余间，毁坏窑洞数百孔。小河沟、老庄河一带群众的牲畜羊只全被赶走，财物被抢劫一空。

5 月 14 日，仇、谭匪军窜进刘志丹的老家保安县楼子沟，准备捕杀刘志丹的家人。但在群众的帮助下，刘志丹的家属已躲入大山梢林中，仇、谭二人便下令火烧刘志丹家的房舍，把门窗、家俱全部砸毁，粮食、牛羊全都抢光，仍不解恨，又下令士兵挖坟掘墓，将刘志丹爷爷、母亲的尸首进行挫骨扬灰，并在坟头拉屎洒尿，还从河中抓了一只鳖，埋在刘志丹家的老坟里，简直是坏事干尽，令人发指。

面对敌人的残暴，刘志丹率领苏区人民团结一心，坚贞不屈，采取各种办法困扰敌人，保护物资、干部，并进行英勇的反围剿斗争。

由于包家寨会议后，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去西安寻找省委，被杜衡诱捕。特委工作一直处于瘫痪。随着苏区的不断扩大，武装力量的发展，特委工作的恢复刻不容缓，成立军事领导机关也迫在眉睫。为此，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史称（南梁会议），决定健全中共陕甘边特委组织，设立机构，恢复工作，任命张秀山为特委书记，刘志丹、习仲勋、张邦英、张策、惠子俊、蔡子伟、龚逢春等为特委委员；成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志丹为军委主席，边金山任副主席，吴岱峰任参谋长，王世泰、杨森、张秀山、高岗、吴岱峰为军委委员；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

南梁会议之后，刘志丹率红三团到达保安县马子川。一天清晨，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六旅张子英团高玉亭营和保安县民团，趁大雾向红军突袭。红三团因一时敌情不清，遂一边还击，一边向十里山梁撤退。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4时，始终未能摆脱敌人。敌欲以正面进攻拖住红军，另组织了百余人的“敢死队”，从红军侧后迂回，企图截断红军退路。面对严重敌情，刘志丹、王世泰决定，控制山头，先打“敢死队”。连续打退敌三次冲锋，当敌发动第四次进攻时，红军组织了反冲锋，一、二连从左右两侧突然出击，少年先锋队从正面压下去，成束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敢死队”顿时土崩瓦解。此战红军共打死打伤敌四、五十人，缴获枪支一批。红军打垮了号称“铁军”的高玉亭营，在陕甘边区树立了声威。

1934年7月中旬，根据南梁会议精神，张秀山与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张邦英等聚齐开会，分析了斗争形势，决定由张秀山写出边区特委下一步的工作任务，后经特委开会通过，下发陕甘边区党政军的党组织。这就是《陕甘边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1941年延安整风时，这个文件收入到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上）一书中。

在《陕甘边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即“七月决议”）中，刘志丹他们对革命形势的分析是：在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投降

帝国主义的条件下，引起了民族战争的开展与红军运动的普遍扩大，从而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这样的形势下，加强了我們创造陕甘新苏区的任务。但党的领导太薄弱，地方的党组织，仅仅华池苏区内有三个不健全的支部；部队中的党，主要是脱离群众、党内斗争不深入、不起核心作用。这些问题，形成了西北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

特委根据目前的革命形势与领导力量，对边区党的任务作出决议与布置：

### 1 党的工作：

加强华池苏区的领导。在最短期间，必须把现有的三个支部充实起来，并成立一个区委，以巩固苏区的各种群众组织，形成苏区核心。

恢复保安等各地党的组织，建立农民支部……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吸收最勇敢的、最坚决的、最忠实的雇农、贫农分子大批入党。地方党的支部，必须十倍扩大党的组织，部队内的党必须发展一倍党员。

42 师及各路游击队的党，应纠正过去的错误，彻底转变部队的领导，使党真正地成为群众的核心。

每个区委和各队委在加强领导的过程中，必须选择一个中心支部。特委成立训练班，各部队也尽可能的成立短期训练班，以培养干部，指示领导方法。一切领导须深入下基层，倾听群众的意见，密切党的关系，严密党的组织，以最大的努力发展团员同志，成立团工作委员会。

### 2 政权问题：

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立即成立革委党团，以加强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颁布法令，规定实施方针，以巩固苏区。发展农联会、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组织，扩大五个政治保卫队，分配土地，正式成立苏维埃政权，即以华池苏区为陕甘边的中心苏区，向四处开

展。

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建议 42 师帮助陕甘游击队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部队和各路游击队配合地方党的力量，把陕北苏区、照金苏区打通（由三原的武字区起一直到绥远的边境），彻底解除国民党、地主的反动武装，以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

### 3 为扩大与巩固部队而斗争：

责成二、三路游击队于两个月内完成（组建）一团铁的红军的任务，建议 42 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一师红军的任务。同时要扩大 42 师为一个军的号召。要扩大部队，必须巩固部队。巩固部队的办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按照政治课程去教育，组织列宁室、识字班、政治研究会等，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训练大批的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

### 4 普遍的开展游击运动：

要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发动一切斗争，以开展游击战争。坚决地反对过去招兵买马的组织游击队，各游击队必须根据特委制定的游击队行动纲领去行动。

### 5 深入土地革命：

实行土地革命是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除了分配苏区的土地以外，必须向四周去开展，在各游击队区域内，群众斗争高涨的地方，立即开始分配土地。

### 6 开展民族革命战争：

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必须联系到反帝斗争，如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等事件，在广大劳苦群众面前作广泛的宣传与鼓动，以引起群众的反对与仇恨。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义勇军、反帝同盟军等，开展民族革命战争。

## 7 群众工作：

我们过去政治工作不够深入，在我们目前的任务之下，再不能有丝毫的忽视了，各部队转变的关键也在这里。

特委并对工人、农民、士兵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8 肃清欺骗群众与出卖群众斗争的右派，严防右派混入党内捣乱。

9 为了实现以上的任务，必须深入两条战线的斗争，使党的路线正确的执行，顺利地完成任务。

最后，特委希望全党同志必须深入到支部作彻底的讨论，百分之百地去执行，并把执行的程序告知特委。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第 69-72 页。

# 第十一章 陕甘边根据地

## (1)

南梁会议后，红三团在马子川活动的同时，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骑兵团北上陕北，与谢子长领导的陕北游击队会合，杨森介绍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形势，并给陕北游击队送去一批军用物资。同陕北游击队一起活动一段时间后回兵陕甘边。在回兵途中，智取了高桥。安塞县境的高桥山寨建在陡峭的山崖上，崖下是深深的壕沟，寨门吊桥平时高高吊起。安塞县民团驻守在寨子里，依仗地形险要，工事坚固，处处与红军为敌，骑兵团获悉延安民团团总杨××要往高桥视察，这位杨团总安塞县民团尚无人见过，遂决定智取。挑选了 13 名精明强悍的干部战士，由身材魁梧的二连一排长柴正祥扮“杨团总”，身穿兰大褂，头戴礼帽，架一副墨镜，带着提牛皮公文包的“师爷”和斜

背驳壳枪的“护兵”，10名“团丁”全都荷枪实弹。上午10时，“杨团总”一行13人大摇大摆来到高桥寨下。安塞民团看到杨团总提前来视察的“介绍信”，立划放下吊桥，列队出迎。“杨团总”一行进了寨门，突然枪声大作，看守寨门的哨兵被打死，吊桥被拉起，寨门被关闭，敌民团全部暴露在山寨门外。顷刻，预伏在山寨周围的骑兵团战士一齐冲出，寨内寨外一齐动手，迅速解决了战斗。这一仗，打死打伤敌30多人，全歼安塞县民团，活捉躲在山寨的大土豪3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战后，骑兵团烧毁了山寨，押着土豪，驮着缴获的物资，浩浩荡荡地离开安塞。

1934年夏末，师长杨森率骑兵团路经洛川北交道镇。镇上驻有国民党四十二师1个步兵连，约90余人。杨森决定消灭这股敌人。中午，骑兵团到了镇子附近，敌人还未察觉。经骑兵团一个猛冲，敌仓惶四散逃命。红军四处追击，毙伤俘敌甚多。战后，把三、四十名俘虏全部释放，换下了俘虏的军装备用。

根据南梁会议的决定，刘志丹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留在后方指挥陕甘边的军事工作；刘志丹在会议结束后就准备动身赴各地巡视工作，摸清情况，全面筹划根据地的工作，这时，习仲勋笑吟吟地跑来说：“老刘，先别忙着走，快回家看看吧！”

刘志丹不解地说：“不回去了，家早被仇良民和谭世麟抄了，还有什么看的？”

“刘家伯父和刘嫂子都到了南梁，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就等你去见面。”习仲勋说。

原来，刘志丹的家被抄后，家属四处躲藏，习仲勋派人在大山里好不容易找到刘志丹父母和妻女并将他们带到南梁，妥善安排好，现在才告知刘志丹本人。

刘志丹与父亲刘培基，后母刘素清，妻子同桂荣，女儿贞娃依次相见。刘培基高兴地说：景桂，你总算闹成气候了。

刘志丹笑着说：是陕甘边的百姓都想闹革命翻身得解放，过上好光景呀……

刘志丹还将女儿贞娃抱在怀里，亲了又亲，亲人相见分外高兴，家人叙谈后，一阵喜，一阵悲，对仇良民、谭世麟抄家，屠杀亲属，挖祖坟挫骨的恶行进行咒诅。刘志丹讥讽地说：

反动派打不过我们，就拿死人出气，也太卑鄙、太无耻了……

几日的天伦之乐后，刘志丹又匆匆踏上了巡视边区的路途，他在白马庙川、玉皇庙川、林锦庙川等地走村过户，嘘寒问暖，访贫问苦，掌握了许多民情民意。一天，刘志丹带一连战士穿行在华池县的豹子川，准备夜宿杨庄。刘志丹与先锋队战士田兴旺并肩向庄里行走，转过一个山嘴，路旁的树林里突然扑出一头野兽，刘志丹向左一闪，野兽前身直立欲扑，田兴旺见景大喊：刘主席，快打，是一只豹子！说着向豹子背部用刀一砍，豹子回头向田兴旺扑去，刘志丹急抽枪向豹子头上一枪，豹子应声倒地。

刘志丹从紧张中喘过气来，才用手电细瞧，大惊失色：不好啦，这下违犯群众纪律啦！

大家忙问：打死一只豹子违犯什么纪律？

刘志丹有点难受地说：不是豹子，是老百姓的看羊狗。

队伍进村后在硷畔上集合，刘志丹走到队伍前说：“同志们，今天行军，我盲目开枪打死老乡家的看羊狗，违犯了群众纪律，请大家给我处分！”

田兴旺争着说：应处分我，是我将狗认成了豹子，错误都是我造成的……

乡亲们听说队伍进村了，忙将战士迎进家门，热情款待。

刘志丹察问清楚，狗是李大伯的，就亲自上门向李大伯道歉，并将一块银元递给李大伯，李大伯坚决不收，最后，刘志丹硬将银元塞

入李大伯手中。

然后又向战士宣布，按红军的纪律办事，自罚三天勤务。

一天，刘志丹与习仲勋在义正川检查工作结束后，返回寨子湾，收到陕北特委派人送来的信。得悉，谢子长带领陕北游击队不日抵达南梁。

1934年7月，谢子长、郭洪涛率陕北游击队抵达南梁。战友相见分外亲切。

谢子长是1932年12月被杜衡赶出了陕甘游击队后，他到河北等地进行兵运工作。1933年底，受北方代表（北方局已撤消）领导机关的同志委派回到陕北工作。郭洪涛先后在太原、北平做地下工作，1934年2月回到陕北，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

在此之前，陕甘边特委与陕北特委有些联系，但是因受敌人包围和阻隔，来往不多。两个特委又分别属于两个上级机构领导，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归党中央直接领导；而陕北特委归中共北方局，其后为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

这时，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革命形势非常喜人。

陕北根据地，在以马明方为代表的陕北特委的领导下，1934年上半年之前，新创造了游击第四支队，扩大了第二、第三支队，整顿了第一支队，领导了去年反民团斗争（佳县），将民团的武装拿来武装了自己，杀死了团总。领导了清涧五、六百群众武装抗粮的斗争，解除了店子沟民团的武装，武装了自己，领导神木群众十几次分粮斗争。工作区域比过去增加了三倍，一般农民对于我们党和红军的威信有了深刻认识。四支游击队总计已发展到110人，枪支计有90支。这年7月8日，陕北特委决定将部分游击队组建成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郭洪涛为政委，贺晋年为参谋长。不久，谢子长、郭洪涛便带着陕北游击队的战士来到陕甘边根据地。

7月底，在阎家洼子召开了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陕甘边游

击队总指挥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领导人员，陕甘边方面：军委主席刘志丹、特委书记张秀山、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红 42 师师长杨森、政委高岗、陕甘边特委委员张邦英、张策、红 42 师团长、政委王世泰、赵国卿等及红二十六军连以上的干部；陕北方面：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及游击队支队长以上的干部。

联席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应陕北特委的要求，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地区帮助打开陕北游击战争的局面，以及两个根据地武装力量协调行动的问题。

会议先由杨森代表红 42 师党委，讲了红二十六军建立以来部队发展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以及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针。

谢子长在会上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信中对红二十六军的战略转移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

郭洪涛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从国际讲到国内，从无产阶级发展讲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讲到陕甘边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红二十六军不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重复了北方代表指示信中那“五项大帽子”。

张秀山回忆——

我们听了他们的传达和报告，都感到很惊奇：一是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这些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与事实根本不相符合。二是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信，是什么时候送到陕北特委的？能送到陕北特委，为什么不能送到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三是谢子长、郭洪涛把信带到陕甘边，为什么不交给红二十六军或陕甘边特委先去讨论执行，而是在联席会议上当众传达？四是老谢在红 2 团成立时，杜衡打击他和刘志丹，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梢山逃跑

主义”，现在他回来了，怎么又把这些说法加到我们身上呢？

大家有些议论，但考虑到他们是由兄弟党组织陕北特委派来的，觉得他们是在重复北方代表指示信中的内容，不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没有展开议论。

当会议提出高岗不能担任红 42 师政委的问题时，大家议论了一番。有同志问，那谁来当？郭洪涛说让谢子长当。当时刘志丹因 1932 年“三嘉塬缴枪”事件发生的嫌隙，在会上没有说什么。我和一些同志觉得老谢是陕北的老同志，没有什么不可以当的。会议最后同意由谢子长代理师政委一职。

杨森、张策等人对会议的情况很不满意，找我和志丹说：怎么陕北管起陕甘边的事了？

张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那时虽然不大晓得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我知道，自从 1933 年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一直没有上级党的领导，而且这期间，中央和北方局都没有派人来这里检查过工作，就是我们的邻居陕北特委，也没有派人来过这里。那么这些批评到底来自何人何地呢？这不能不使人奇怪。虽然受到了一大堆批评指责，陕甘边特委的领导同志还是本着革命友谊赠送了许多枪支经费，特别是把红 42 师政委的位置让了出来，由谢子长暂时代理，并派红 42 师的部分主力红 3 团到陕北协助作战。”

会后，郭洪涛拿走了龚逢春做的会议记录。龚逢春是红 42 师的宣传科长，开会时担任会议记录。回去后，郭洪涛写了《26 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上报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并刊登在陕北特委的刊物《西北斗争》上。

《26 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中说。红二十六军“一贯的拘泥于逃跑主义与窜梢林主义”，把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失败的责任，加到后来的陕甘边特委领导头上；把红四团在狭窄的平原地区，在与敌人绝对优势兵力进攻下，退出渭北苏区（约二、三十里的三原武字区），说是“逃跑主义”，对王泰吉领导的骑兵团起义说成“纯粹是革命高

潮下的投机”；把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极端不利条件下退出照金根据地，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对红二十六军在华池、关中、安定、保安一带所建立的游击队，说是“招兵买马拉拢土匪流氓的发展”；还说“陕甘边区游击运动，在富农路线的脱离群众的领导下，断送了边区的游击运动”；陕甘边特委“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不足和一贯右倾”等等。

阎家洼子会议，加强了陕北和陕甘边两特委，以及两方面红军和游击队的联系，并派出红三团北上作战，对陕北根据地有一定帮助。郭洪涛后来也说：会议“决定红二十六军 42 师北上，同陕北游击队一起活动……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采取这一果断的战略措施，仅依靠陕北的武装力量去粉碎敌人的‘围剿’，确实是有困难的”。会议的负面影响是“左”倾机会主义伸入到陕甘根据地。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 75—76 页。

8 月 5 日，刘志丹从苏区反“围剿”斗争的大局出发，调拨步枪 100 支、银元数百块，支援陕北游击队，并决定派王世泰、黄罗斌率红二十六军主力第三团从南梁出发，随谢子长去陕北，与陕北游击队共同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军事“围剿”。

这时，陕北军阀井岳秀部一个师配合地方民团，正在向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8 月 17 日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到达安定县金吴塌，这时井岳秀部一个连在此“清剿”。

18 日拂晓，红军向该敌发动进攻，红三团担任主攻，陕北游击队配合，经过激烈战斗，全歼敌 1 个连 100 多人。

8 月 23 日，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以优势兵力对张家圪台之敌发动猛烈进攻，全歼敌两个排，并占领张家圪台。国民党军队见张家圪台失守，急调驻薛家峁守敌 1 个连前来增援，又被红军击退。张家圪台之战，前后共歼敌七、八十人，并缴获一批枪支。

河口镇驻国民党军队 1 个连，是清涧、延川守敌的战略支撑点，对红军游击队活动妨碍极大。应清涧地下党组织之要求，红军决定攻打河口镇。8 月 26 日拂晓，部队在谢子长的指挥下，偷袭河口镇，红三团担任主攻，从山顶直扑敌阵；陕北游击队控制黄河渡口，断敌退路，从东西两面发动攻击，敌见红军攻势凌厉，慌忙退守四、五个高碉堡及村边工事。由于红军缺乏攻坚武器，虽多次进攻，终未奏效。谢子长见攻坚不克，到前沿阵地察看地形，胸部中弹负伤。当日，天下大雨，道路泥泞，给部队行动造成很大困难，鉴于短时间难以攻克，遂撤出战斗。河口守敌怕红军再来进攻，不久亦东渡黄河绕道逃回清涧县城。河口镇遂告解放，成为苏区。红军部队从清涧返安定途中，在咸榆公路上消灭押送壮丁的国民党军队二、三十人，解救释放壮丁 200 多人。

红三团北上陕北，与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三战歼敌数百人，缴枪数百支，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军事“围剿”，9 月离开安定，回到南梁地区。

## (2)

1934 年 8 月，趁红三团北上陕北作战、驻保安之敌高玉亭部仓惶调防之机，刘志丹令刘约三带领合水游击队，深夜冒雨奔袭旦八寨民团。他们架起云梯，猛打猛攻，一举攻破了这个最反动、最顽固的反革命据点，歼敌数十人，曹俊章率领残部狼狈逃窜。这伙恶霸地主搜刮人民群众的大量财物和百余匹骡马，遂被合水游击队缴获，满载而归。

接着，在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庆阳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部队，向西出击，歼灭了恶霸地主韩俊卿一个营的地主武装，相继拔除了刘沟、李沟门、悦乐堡等民团据点，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在柔远川、乔河川、杜家河、李良子、夏沟等地先后建立了 5 个农民

联合总会和十多个分会，建立了贫农团、雇农工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成立了杜家河、武家河、城壕川等 3 个党的支部，开辟了与南梁相连的百余里的庆北新苏区。

同时，第二路游击队加强对洛河川之敌的攻势，拔掉了刘老庄、虎头坡等民团据点，扫清了南梁根据地大门口的障碍，开辟了方圆 60 余里的甘洛新苏区。此后，各路游击队继续向洛河川、延河川、甘泉、富县、宜川、劳山等地区发展，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牛羊，建立乡村革命政权，扩大游击队的武装力量。

在扩大新苏区的战斗中，第二路游击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除原来的保安、合水、庆阳、安塞四支游击队外，又组建起庆北、华池、元城、悦乐、靖边、甘泉、延安、瓦子川、富县等游击队，以及陕甘游击队五、六、七、八等支队，扩大到 1000 多人。各村都建立了赤卫军，每户人家的大人娃娃都参加了革命组织。大人参加赤卫军，娃娃参加少年先锋队，整个根据地，人人参加闹革命，个个都是革命军，根据地就像天罗地网一般，任何敌人在根据地都无法存身。

在此同时，关中地区的革命斗争也迅速发展，第三路游击队在“七月决议”的鼓舞下，又建立了宁县三支队、平子四支队、正宁五支队、湫头八支队、龙咀子十六支队和中宜、旬邑、淳化、耀县、照金、渭北、建庄、彬县等 14 个游击队及总指挥部直属特分队，共达 1000 余人的武装力量。在红军游击队胜利发展的影响下，先后有耀县民团 70 多人，泾阳永乐镇民团 60 余人，国民党军的一个侦察排 40 多人，起义参加了红军游击队。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游击区域扩大到 14 个县，建立了以宜君小石崖为中心，包括正宁、宁县、旬邑、淳化、耀县等 8 个县各一部的比较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使南梁根据地和关中苏区连成了一片。

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扩大到东至洛河川，西至元城川，北至宁条梁，南达耀县的广大地区，解放了庆阳、合水、保安、靖边、安塞、甘泉、富县和正宁、宁县、旬邑、耀县、淳化，宜

君等 20 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扫荡了敌人的反动据点，摧毁了反动的保甲制度，建立了乡村苏维埃政权和农民联合会、贫农会、雇农工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在此基础上，除华池苏区直接由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领导外，先后建立了赤安县革命委员会、甘洛县革命委员会、庆北县革命委员会、合水县革命委员会、安塞县革命委员会、靖边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正宁、宁县、旬邑等县的工作委员会，领导人民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热潮，为陕甘边临时革命政权转变为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根据陕甘边特委的“七月决议”，及时扩充了红军主力部队。9 月 19 日，以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的特务队、平子游击队为基础，抽调正宁五支队、宁县三支队部分游击队员，在正宁湫头整编建立了红二十六军 42 师第一团，由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下辖两个连，共 200 余人。10 月 10 日，又以第二路游击队的庆阳、保安、安塞游击队为基础，在南梁阎洼子整编建立了红二十六军 42 师第二团，由刘景范任团长，胡彦英任政委，下辖两个步兵连，一个少年先锋连，共 180 余人。同时，还建立了步兵营和保卫营。这样，红二十六军 42 师就发展壮大到拥有 4 个团和两个直属营的兵力的一支强大红军。这时，由于谢子长伤势日益恶化，已经无法继续担任红 42 师政委，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陕甘边特委军事委员遂任命张秀山接任红 42 师政委职务。

支援陕北苏区进行武装斗争的红 3 团，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后，陕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形势向前迅速发展。在陕北特委的领导下，红 3 团协助陕北游击队，在粉碎敌人的“围剿”后，又连续取得了攻打横山崖家寺、再度袭击安定县城等战斗的胜利。1934 年 9 月 18 日，在安定县崔窑沟，以陕北游击队一支队为基础，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第一团，由贺晋年任团长，马佩勋任政委，在革命武装斗争的暴风骤雨中诞生了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支红军部队。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安定、清涧、吴堡、佳县、神木等县的临时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土地革命深入开展。

为了配合和支援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斗争，10月初，杨森、王世泰、黄罗斌再次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转战陕北。10月5日，红三团配合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在清涧折家坪全歼敌军1个连。10月7日，红三团与陕北独立一团联合出击，击溃安定县长蛇湾敌军1个连，歼灭过半，接着两支部队联袂向安定县玉家湾挺进，敌高双城部1个炮兵营望风逃窜。杨森、王世泰、黄罗斌遂率红三团再返南梁。

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根据地日益扩大、巩固。为了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更好地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生产、经济、文化、教育活动，陕甘边特委决定在11月1日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同时决定在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这一天召开群众大会，庆祝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为了筹备好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工作，刘志丹和习仲勋、马文瑞、吴岱峰、蔡子伟等党政军领导人，亲自动手做了大量筹备工作。刘志丹日夜奋战，亲手为代表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还协助蔡子伟等为代表大会起草了《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以及其它文件，准备提交大会通过后付诸实施。

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办法，是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按照各方面人数的多少确定代表名额，由群众民主推选。工人、农民、军队、妇女等各界均有代表，照顾到各个方面。在当时紧张复杂的战争环境里，比较充分地发扬了民主。

经过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的日夜奋战，代表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筹备结束，11月4日至6日荔园堡镇中心的一座关帝庙里，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了。

从陕甘边界贫苦农民、工人、游击队、赤卫军和红二十六军中选出的100多名代表，欢聚一堂。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杨森、张秀山、马文瑞、张邦英、蔡子伟、张策、吴岱峰、黄子文等领导人，以普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上，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向代表们介绍了全国革命斗争、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和中央苏区政权建

设的情况，总结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工作，并分别作了关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的报告和讲话。这些祖祖辈辈深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代表，尤其是久居深山老林，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最甚的南梁地区的代表，听着刘志丹、习仲勋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推翻三座大山，劳苦大众坐天下”等革命道理，听着关于巩固、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大政方针，高兴得热泪盈眶，连连称好。他们怀着翻身作主人的喜悦心情，和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等领导人一起，认真商讨了有关陕甘边根据地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大决策。

接着，代表们充分酝酿讨论了选举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有关事宜和人选，推举出了自己满意的候选人。在此基础上，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民主选举。阎洼子村苏维埃代表武海潮提出先写上刘志丹的名字时，刘志丹很诚恳地说：“先写上你最满意的同志吧！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勋。”直到武海潮把自己要选的其他人都提完了，再三坚持要选刘志丹，他才在选票的最末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在这种充分发扬民主的气氛中，经过代表们投票选举，选出习仲勋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和边金山为副主席；政府下设土地、劳动、粮食、财政、肃反、文化、内务、工农检查、经济建设和妇女等委员会。由李生华任土地委员长，张廷贤任劳动委员长，胡志录任粮食委员长，杨玉亭任财政委员长，郝文明任肃反委员长，蔡子伟任文化委员长兼政府秘书长，王子宜任内务委员长，惠子俊任工农检查委员长，马锡五任经济委员长，张景文任妇女委员长。在这开天辟地第一回由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权中，南梁山区的贫苦农民竟占了政府组成人员的半数。这样的政府，人民群众怎能不衷心的拥护呢？从此，陕甘边的苏维埃政权在南梁山区诞生了。这标志着陕甘边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并建立了华池县苏维埃政府，将保安县改为赤安县建

立了赤安县苏维埃政府。

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主席，张秀山、杨森、杨琪、吴岱峰、杨载泉、张庆孚、张邦英、王世泰、黄罗斌、赵国卿、高锦纯、刘景范、胡彦英、陈国栋、张仲良等为委员，统一领导陕甘边的革命武装斗争。

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由朱子清任总指挥，郑德明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根据地的赤卫军。朱子清、郑德明这两个在南梁山区为首组织哥老会、扇子会的会道门头目，经过刘志丹的引导教育，由赞助革命直至投身革命，生动地证明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正确。

1934年11月7日（农历10月1日），是南梁山区一个前所未有的盛大节日。这天，在荔园堡河西的川台上，隆重举行了庆祝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除参加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外，还有从陕甘边根据地四面八方前来参加庆祝大会的贫苦农民和红军指战员，庆阳、合水、保安、安塞、靖边等各路游击队和18个赤卫军大队，以及从游击区赶来的农民群众，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大戏台上，悬挂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红色巨幅横标；会场四周，镰刀斧头红旗和各色彩旗交相辉映，迎风飘扬。

庆祝大会在震惊山林的鸣枪、鸣炮和锣鼓声中隆重举行。在热烈的掌声中，刘志丹首先讲话。讲话末尾，刘志丹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喜悦，当场吟哦七言绝句《荔园堡阅兵》一首：

陕北儿女有豪气，

赤手空拳争权利。

今日武器扛肩上，

列队阵阵成铜墙。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志丹纪念文集》第663页。

当宣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时，会场上一片欢腾，数千人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

万岁!”“推翻三座大山，劳苦大众坐天下”等口号。口号声经久不息，震荡山川。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和赤卫军的步枪、大刀、红缨枪，随着声声口号起落，举起时密密麻麻，银光闪闪，红缨如火；落地时“轰隆隆”、“轰隆隆”作响，犹如惊雷动地。在这种威武壮观而又热烈的气氛中，习仲勋主席接着讲了话，肃反委员长郝文明和工农兵各界代表都发了言。大会号召，要把这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迅速传达下去，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土地革命推向新高潮，争取更大的胜利！

接着还举行了威武雄壮的阅兵仪式。在一杆杆迎风飘扬的红旗下，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各路游击队、18个赤卫军大队，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阅兵台前。这些英姿勃勃、精神抖擞的人民子弟兵，以无比壮观的阵容，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战无不胜的磅礴气概。

这天晚上，还举行了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文艺晚会。那精彩的“红军舞”，雄壮的“红旗颂”，还有自编自演的新戏，张秀山回忆“龚逢春唱京剧，用纸条作胡子，白焕章扭秧歌，李登瀛也是好演员……”使南梁军民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他们深切地体会到，革命确实是劳苦大众最盛大的节日！

习仲勋 1945 年 7 月 11 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区的创建中回忆：

——陕甘边苏区实施的几个主要政策：（一）土地政策：早在 1932 年我们就开始了分土地，这时就有一些经验，其主要内容为：①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②分川地不分山地，这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 1 年休息 1 年；③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这因为边境区的群众自己的牛羊都不保，还要什么土地，而边境区因苏区的扩大而变成中心区时，仍进行分土地；④田、苗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苗，若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的情绪；⑤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地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⑥阶级划分是依该户的主要生活资料

的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的；⑦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⑧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二）财经粮食政策：①发行苏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②成立集市便利交易，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建立了集市，群众大感方便；③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④对农民则是鼓励其生产，使之发展；⑤成立牧场、养猪喂羊；⑥粮食政策的中心是保证军粮，保证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靠收买军粮供给军队；⑦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豪绅、地主，并有计划的向敌人夺取。（三）军事政策：①在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的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在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②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③自愿的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成排连的编到红军里去；④对死亡战士有抚恤费与埋葬费规定；⑤赤卫队参战死后也有抚恤费与埋葬费；⑥奖励群众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则特别奖励，收缴下的武器归私人使用；⑦在赤少队的基础上广泛的成立游击小组；⑧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部队上的军政干部。（四）对土匪的政策：土匪为陕甘边苏区的内患，我们的具体政策：①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则彻底消灭；②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无法争取，如杨谋子之类也采取彻底消灭；③此外的一些土匪，我们是采取一切办法来争取与改造他们，例如对郭宝珊、梁占奎、贾德功等土匪就是采取改造的政策；（五）对民团的政策：①对同情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相关系，或互不侵犯，如对罗连城、何子新、艾老五等就是这样；②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赵老五、梁保定等；③对那种不反动也不接近我们的民团，是在实际中教育他们，使之体验到我们的好处，向我们靠拢。（六）各种社会政策：①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因苏区哥老会的人很多，大多讲义气 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要发动群众去清除，不要直接出面干涉。②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豆、软扇等会道门组织，则采取争取政策，这里各种会道门在苏区内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都带有反抗统治阶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能改造他们；③颁布禁烟、禁

赌、放足等条例，并向群众宣传不要赌，不吸烟，好好参加生产；④在劳资政策上，开始我们要求给雇农发单衣、棉衣、手巾等物，多偏重于雇农方面，而有些雇农则好吃懒做，以后我们规定凡是雇农一定要劳动；⑤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废，均实行救济。（七）肃反政策：①对敌探及有确实证据的反革命分子（如苏区内敌人的坐探）则采取杀掉的办法，若群众愿保，不杀亦无损于革命，可以保释予以感化；②对犯人分主犯与从犯；③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杀掉的办法，反之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④每当处决犯人时经过群众大会决定，决不偷杀犯人。（八）对知识分子政策：我们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分配给适当的工作培养他们。（九）对白军的俘虏则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的政策，不随便杀掉。以后红二十六军里的排连长很多都是从白军中来的。（十）最后是在文化教育上是注意到了，办了些列宁小学，学生很多都是自愿的。引自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资料调查部分”。第407—410页。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党政军领导机关认真总结过去的斗争经验，参照中央苏区实施的政策、法令，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以及改善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颁布了著名的“十大政策”。

集中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 （一）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

陕甘边区土地比较集中，一些大豪绅地主田连阡陌，而广大贫苦农民只能以租佃求生。土地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土地革命斗争早在陕甘游击队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初期只限于分浮财。1932年3月下旬，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原活动期间，就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发动当地贫苦农民，没收了西城村土豪刘西坤、于家庄土豪赵元亨、琴宅土豪赵秉义等户的牛羊牲畜、粮食和浮财，除部分留作军用外，其余分给了贫苦农民。同年七、八月，在五顷原开展分配土

地的斗争。但是，出于当时尚未建立起稳固的政权，群众也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结果失败了。此后，红军、游击队曾在陕甘边区各县多次打土豪、分财产，解决军需民用。

1934年，陕甘边苏区随着农民联合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的普遍建立，打土豪、分财产的同时，开始了有组织的分配土地。南梁苏区中心区域荔园堡、庆北的柔远等地分配土地较早。荔园堡一带土地绝大部分是庆阳城“八大家”恒义成、裕茂隆的土地较多，每人可分川地10亩，山地则要多少给多少。柔远城子没收了4户出租的土地，全部分给了门客，谁种归谁。三路游击区也在五顷原、孟家河等地，没收了赵老八等4户出租土地198亩，分给何正兴等10多户佃农。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及其以后的苏维埃政府，都专设土地委员会，各县区也都相应设有土地工作部门，其职责就是组织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1934年冬季，陕甘边区特委、苏维埃政府根据当地实际，参照中央苏区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制定了土地革命政策。确定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庄宅和其它财产，没收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财产，分配给贫雇农或缺少土地、牲畜的中农；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也留给其能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川台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山地根据需求和耕种能力按户划块。土地以区为单位平衡，调剂余缺。土地和青苗一起分配。红军家属有分得好地的优先权；凡家在苏区的红军战士，都分配给土地。白军士兵暂不分地，应分部分留作公田。苏区中心区域分配土地，边缘地区暂不分地，随苏区的发展逐步扩大分配区域。

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巩固和扩大苏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二）减轻农民负担，予民生息

陕甘边区长期以来经济落后，广大农民极其贫困。边区政府采取予民生息的方针，决定对农民不征粮，不派款。党政军的开支，主要

向豪绅地主索取，依靠打土豪作为主要财政来源。政府机关及红军、游击队等所有公职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从指挥员到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所有费用都由财政委员会统一筹措，统一安排使用。政府在各地设立了收购站，按市价收购粮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备。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牛羊和其它财产，除分配给贫苦农民外，留一部分作为党政机关、红军、游击队的公粮和公畜，保存在农村。1934年6月，庆阳游击队没收了紫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申家粮食500石、牛100多头、羊2000余只、白洋1000块，就是一部分留作军用，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秋季，庆阳游击队打开“恒义和”在悦乐上堡子的租粮仓库，就地分粮2000余石、烟叶子1000多斤，并分配牲畜700多头、羊800余只。政府还办了一些小型牧场，把留作公用的牲畜、羊只集中放养，以备食用。华池县各区乡当时差不多都有这样的小牧场。这样以来，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政府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保证民生，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还教育改造那些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参加生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发展，昔日食不果腹的农民，不少人都积攒了余粮，拿到市场上出售。

### （三）采取有效措施，活跃农村经济

在根据地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边区政府在荔园堡首先设立了集市，确定农历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为当地农民提供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每逢集日，荔园堡方圆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卖余粮的，卖吃食的，生意兴隆，一派生机。边区政府迁驻洛河川后，又在胡皮头村设立了集市，逢五为集，每月3次。习仲勋等边区领导经常到集市上了解情况，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活跃经济。边区政府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来苏区做生意，并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些商人将苏区的山货、羊畜运出去，又将苏区短缺的布匹和其它物资运进来。由于采取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逐渐与一批开明商人建立了合作关系，边区政府保证这些商人有利可图，这些商人也越来

越同情革命，千方百计为苏区运送货物。有的为了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采取行贿收买的办法，拉拢国民党稽查关卡人员，疏通了苏区与外地的物资流通渠道。

边区政府为了促进生产的发展，还在华池县各区试办合作社，制订了计划。红三团曾为合作社捐款 60 余元。合作社组织群众养蜂、养鸡、养猪，发展农副业生产。由于国民党军队“围剿”未能完全实现。到了洛河川，又先后在下寺湾、石门子集股兴办了合作社。

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 1934 年 11 月印制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苏币”（群众称之为“苏票”），造印厂设在小河沟老庄河邵风麟家中。采用木刻版，印在白平布上，涂以桐油。票面分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 4 种。“苏币”与银元等值。为取信于民，解除群众和商人的顾虑，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苏币”银元兑换处，使“苏币”得到了很高的信誉。边区政府迁到洛河川后，又继续发行货币，方便交换。

由于边区政府采取了设立集市、发行“苏币”，办合作社等一些切实的措施，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促进了苏区的经济发展。

#### （四）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边区政府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文化教育工作。过去，南梁地区没有 1 所学校。边区政府成立后，习仲勋、蔡子伟等领导人亲自发动群众创办学校。首先在荔园堡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小学，郝建德、张静文（女）任教员，在校学生六、七十名。校舍是没收地主的房子，师生们自力更生，架木板当桌子，垒土台当凳子，用石板当黑板，扫锅黑当墨汁，设备因陋就简。教材是自编的油印本或手抄本。边区政府文化委员长蔡子伟亲自为学生编教材。这些教材通俗易懂，完全是新革命内容，多采用顺口溜的形式，朗朗上口，好学易记，既是文化课，又是政治课。以后，又在太白、葫芦河、荔园堡川口以及洛河川的桥扶峪、阎家沟、下寺湾、王家坪、杏子沟门等地陆续办起列宁小学，使世代文盲的山区农民后代有了受教育的权利。

边区政府还十分注意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同时，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设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条例，并制定了反对封建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法规，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人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引导他们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为了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人民，陕甘边区特委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塞维克的生活》，作为特委机关报，由龚逢春负责。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办了不定期刊物《红色西北》。这个刊物发表的文章和消息，以红军战报和经济建设等为多，特委和边区政府的决议及一些带号召性的文件也经常刊载。这两个油印小报，到洛河川后仍坚持发行，为苏区的党政军建设及发展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苏区不断扩大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部队和地方都需要大量干部。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陕甘边区特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4年10月在南梁开办红军干部学校。开始，校址设在荔园堡，后迁往豹子川张岔、安塞。校长由刘志丹兼任，政委由习仲勋兼任，吴岱峰任军事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曾兼任教员。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层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教学内容主要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政治课包括“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怎样分配土地）、“六大决定”（十大纲领、革命性质等）；军事课包括“制式教练”（基本动作）、“尖兵活动”、“游击战术”等。刘志丹亲自担任军事课教员。由于学员文化程度较低，文化课主要以扫盲为主。红军干部学校在荔园堡举办第一期，1月时间。边区政府成立后，校址迁到张岔办了第二期，70多天。迁安塞办了第三期，3个月。前后共培训干部200余人。这些学员结业后，多数回到了原单位。红军干部学校对于提高广大军政干部的政治和军事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3)

在创建陕甘边苏区的峥嵘岁月，身为陕甘边军委主席的刘志丹与干部群众休戚与共、肝胆相照、亲如一家。被乡亲们亲切的称为“老刘”，有民歌最为动人——

半夜来叫门，  
问你哪部分。  
一听是老刘的人，  
赶快迎进门，  
端来大红枣，  
抱来大西瓜，  
老刘爱吃荞面，  
赶快压饴饹……

南梁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使这里成为天下百姓向往的地方，四面八方不堪忍受反动统治者压迫、剥削的穷苦百姓都纷纷奔向南梁，一些有识志士、热血青年也千里迢迢奔赴南梁，在通往南梁根据地的大路小径上人们热烈地传唱：

长枪短枪马拐枪，  
跟上哥哥上南梁，  
你骑骡子我骑马，  
剩下毛驴驮娃娃……

同时，在严格执行刘志丹为红二十六军制定的“临阵脱逃者处死刑，破坏武器者处死刑，缴获胜利品不归公者处死刑”等 18 条纪律的基础上，又根据刘志丹的提议制定廉洁法规，“凡一切党政军干部

如有贪污 10 元以上者枪毙”，严明了党政军纪，确保了群众利益秋毫无犯，受到根据地百姓的拥护，陕甘边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无论职位高低，一律实行供给制，从吃、穿、用到办公用品都由政府财政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配发。

刘志丹妻子同桂荣在南梁从事后勤工作，一天到晚为红军做军需品，一日她听到刘志丹说他胳膊痛，晚上询问得知刘志丹已经患上风湿病，关节时常发痛，她熬了几夜给刘志丹精心做了一件棉袄。刘志丹一瞧这件由无数种布条布片做成的棉袄笑说“百岁衣”。

谁知第二天棉袄就被送给战士，老刘回家时，同桂荣心疼不过，又将自己身上的毛衣脱下，让刘志丹穿上……

南梁山区居住的人口，由刘志丹创建根据地前的 600 多户，迅速骤增为 1000 多户，6000 多人，繁荣空前。

刘志丹率领陕甘边军民在 1934 年夏季浴血奋战粉碎了国民党的夏季“围剿”后，国民党当局于 10 月至 11 月又部署了冬季“围剿”。这次“围剿”采取分兵蚕食的办法，逐步向中心区域推进。投入的兵力有：三十五师骑兵团、陕西警备骑兵旅二、三团，二五六旅五二二团，甘肃警备二旅六团。这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主力骑兵在吴堡川，打了敌人一个伏击战。

随后，在二路游击队的配合下，长途奔袭曲子镇。

曲子镇是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城内驻环县民团百余人，另有县保安队 20 余人。民团团总李恒泰、保安队长崇敬义极其反动，他们加紧训练，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陕甘边区军委了解到上述敌情，决定派骑兵团与庆阳游击队配合，长途奔袭曲子镇。骑兵团于 11 月 15 日由南梁出发，在悦乐附近与庆阳游击队第三、四中队会合，共有步骑兵近 300 人。骑兵团长赵国卿、政委高锦纯及庆阳游击队负责人张秀山等在悦乐召开了军事会议，制订了具体作战方案。红军部队连夜出发，途中消灭了庆阳县孙家湾子民团，缴枪五、六支。骑兵团一连一排在排长柴正祥的带领下，提前到达曲子，压马

后化装进城。大部队 16 日拂晓前赶到曲子，天亮发起猛攻，预伏红军也拔出手枪，投入战斗。敌民团保安队有的还在熟睡，突遭袭击，乱作一团，稍事抵抗就四散逃走。团总李恒泰被堵在群众家中活捉，保安队 20 多人逃到曲子镇北打瓜洼山上，被红军包围俘获，战斗进行半个多小时即胜利结束。这次战斗，击毙了国民党曲子区长朱文成，俘敌李恒泰、崇敬义手下近百人，缴获战马 10 多匹，长短枪五、六十枝，子弹及其它物资一批，红军无一伤亡。战斗中国民党环县县长郑致中等要员化装逃跑。战斗结束后，红军在曲子镇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李恒泰、崇敬义等 3 人。缴获的粮食和衣物，一部分分给了当地群众，抽出部分武器弹药武装了庆阳游击队。当晚，红军部队撤离曲子镇，回到南梁。

不久，刘志丹率红二团、骑兵团又兵进保安县，攻打楼坊坪。

楼坊坪在白豹川口，驻守着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团第二团张廷芝部 200 多人，装备精良，有许多好枪好马，且很能打仗。红四十二师决定派红二团、骑兵团在二路游击队的配合下围攻该敌。11 月的一天早晨，红军部队包围了敌驻地，并把敌人压在窑洞里。由于红军装备很差，子弹很少，杀伤力不大，不能给敌以歼灭性打击。敌欺红军火力不足，凭借精良的武器弹药，冲出窑洞。红军顶不住退了下来，一直撤出二、三十里，才摆脱敌人。这一仗，红军伤亡四、五人。战后，在黑老虎塌洼总结教训，刘志丹在全体军人大会上承担了指挥不当的责任。

在冬季反“围剿”斗争中，刘志丹执行正确的统战政策，使一些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占山为王的“大王”率众弃暗投明，走上革命道路。1934 年 11 月中旬，曾占据陕北黄龙山的土匪武装梁占魁部郭宝珊营，经过刘志丹艰苦复杂的争取，由郭宝珊率领 120 余人于庆阳县的新堡（分属华池县）宣布起义。

郭宝珊，出身贫苦，自幼逃荒要饭，拉过长工，当过矿工。因国民党当局的剥削压迫，家破人亡，走投无路，被“逼上梁山”，当了

山大王，其部自称义勇军。自1931年后，郭宝珊就受到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影响，刘志丹曾多次给他写信、捎话做工作，争取他弃暗投明。所以，郭宝珊开始首先做到不伤害红军，以后进而掩护红军伤病员。1934年夏，刘志丹派黄罗斌去黄龙山，再次动员郭宝珊参加革命。郭宝珊此时一方面向往革命，同时又怕蹈杨谋子覆辙，犹豫不决。

1934年夏秋，国民党十七路军的杨志恒部威逼利诱贾德功、梁占奎。10月，贾、梁率部2000余人开往庆阳，接受杨志恒收编，郭宝珊营同行。途经合水太白时，陕甘边区军委派人与郭宝珊联系，并送去补给品以示慰问。在红军的感召下，郭便通过哥老会关系给红军捎信，表示愿接受改编。当这支部队到合水城关时，刘志丹又派军委供给部长马锡五前往接头，送去马匹和其它礼物。贾德功、梁占奎部队到达庆阳，杨志恒部队已撤离陇东。国民党军队六十一师杨步飞部、三十五师马鸿宾部派3个旅的兵力，将庆阳包围，迫其接受改编。在这种情况下，郭宝珊率本部1个连于11月26日起义，绕道环县兴隆山进入庆北苏区，驻扎柔远城子。庆北苏区党组织负责人马仰西亲自去接头，并派人去南梁汇报。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红三团、骑兵团到柔远城以南接应掩护。12月16日，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在荔园堡召开欢迎大会，并宣布将郭宝珊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派任浪华（后为黄罗斌、马佩勋）任政委。西北抗日义勇军编3个大队，归红四十二师指挥，但初期的军事行动、行政管理和后勤供给曾经是独立的。大会上刘志丹曾亲手把鲜红的军旗授予郭宝珊。

西北抗日义勇军改编后，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该部做政治工作，帮助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并给指战员戒烟治病。边区政府发动群众送猪、羊、瓜、菜，进行慰问，对他们鼓舞很大。刘志丹等领导人对他们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使他们逐渐消除了疑虑，取得了相互信任。在刘志丹的教育指挥下，郭宝珊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东杀西战，战功赫赫，名震陕甘边。

## 第十二章 瓦窑堡入狱

### (1)

1934年隆冬，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派人冒雪赴豹子川的张岔红军干部学校通知正在授课的刘志丹赶回寨子湾。惠子俊告诉他，陕北特委派来的通讯员已到几日，并将陕北特委书记马明方给刘志丹的信递给他。

马明方在信中讲道：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孔原派巡视员黄翰来陕北，指示统一陕北、陕甘两个地区的武装力量及改编陕甘游击队问题，决定调刘志丹负责西北军委工作。此外，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将陕北各县游击队整编为红27军，应对国民党政府可能对陕北发动的第二次“围剿”。

马明方在信中还附黄翰致刘志丹的亲笔短信，表示这是上级党组织的决定。

刘志丹阅信后说：“既然上级已经决定，那就坚决执行。我考虑你也应该一同去陕北，在那里召开一个陕甘、陕北联席会议，以便决定两地统一领导的问题。”

惠子俊说：“我同意你的意见，那么赴陕北前先将陕甘边的事情妥善安排一下，再动身……”

第二天，刘志丹召开陕甘边党政军干部会议，宣布了他率红2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赴陕北的军事决定，同时，还研究决定由习仲勋全权负责陕甘边的工作，刘景范暂时负责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1934年12月底，刘志丹冒着刺骨严寒，踏着皑皑白雪，率军下了南梁，穿过封冰的洛河，向陕北浩荡而来，沿途顺便消灭了一些反动民团，收缴了许多枪支，经过七、八天的艰苦跋涉，刘志丹于1935年1月初，顺利抵达陕北苏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安定县的水晶沟。

陕北特委向刘志丹介绍了陕北的情况。陕北根据地在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剿”后，革命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迅猛发展。在陕北红军独立第一团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陕北红军独立第三团（由王兆相任团长，杨文谟任政委）、独立第二团（白雪山任团长、马万里任政委），红军主力部队兵力增加到近千人；陕北游击队由8个支队扩大到30多个支队，约计2000余人。这期间，按照阎洼子会议确定的方针和谢子长的意图，陕甘边特委和军委，于1934年11月中旬派出杨琪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巡视员的身份，来到陕北根据地，积极协助开展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经过广大陕北军民的奋战，使绥（德）米（脂）葭（县）吴（堡）边、绥（德）清（涧）延（川）边和安定三块分割的苏区，逐渐联为一片，先后在十多个县组建了中共县委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陕北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刘志丹十分高兴。他对如何统一陕甘和陕北两地的领导，怎样统一两支红军的指挥，有许多设想，1935年1月他决定到灯盏湾看望养伤的老战友谢子长，和谢子长交换意见。

谢子长自1934年8月26日在河口战斗中负伤后，由于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医治，致使伤口日益恶化，先后在水晶沟、柳沟等地群众家里养伤，最近又移到灯盏湾。

刘志丹在马明方等人陪同下，走进灯盏湾。有人迎上来告诉说，为了安全，老乡们把谢子长藏在山上的一个山窑子里，说着就引着刘志丹一行向山上爬去。大家在山路上拐来弯去，走了好长时间才到了山窑子。这里四面都是山岭，离村子又远，是个安全的地方。刘志丹在院子里站了一下，才轻轻地推开门，一股热气迎面扑来。进去一看，见谢子长正在昏睡。马明方上前要叫醒，刘志丹摇了摇手，示意不要

惊动。他走到炕边，轻轻坐下，端详着谢子长的脸，原来的细长脸现在更长了，没有一点血色，身躯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刘志丹看着亲密战友成了这个样子，不由长叹一声，眼睛发酸，泪水夺眶而出。

刘志丹的叹息，惊醒了谢子长，他觉得身边有人，抬眼一看，发现刘志丹坐在身边，亲切地叫了一声：“志丹……”

刘志丹往跟前坐了坐，谢子长伸出干枯的手指，把刘志丹的手紧紧握住，含着泪说：“可把你盼来了，你来了就好了！”说着就要挣扎起来。

刘志丹赶忙把谢子长扶起来，把枕头和被子轻轻地垫在身边，等谢子长坐好后，关切地问道：“你的伤好点了吗，”

谢子长满脸泪水，长叹一声说：“伤口发炎、胃病也发作，伤病搅在一起，日夜咳嗽得喘不过气，弄得一天不如一天了。”他咳嗽着，“我真想见你呀！”说着，泪珠簌簌落下。

刘志丹给谢子长拭去泪水，安慰道：“你要安心静养，我们设法请医生给你治疗。”他顺手摸摸被褥，“这么薄，又这么旧，应该给你搞床新的呀！”

“不用了，这土窑洞暖，薄点也不觉得凉。”谢子长咳嗽了一阵，接着说，“我自伤病缠身睡倒之后，想了许多，有的事情反复地想，越想越觉得你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个人地位、个人待遇，处处以大局为重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你不仅是一位军事领导者，而且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领导者。如果没有人破坏、干扰，咱们早就把西北闹红了！”

刘志丹沉思着说：“那时我们比较幼稚，还不成熟，把个别领导看成党的化身，把他的话当成‘圣旨’，结果使革命受到了损失。”

“我还想，个别领导虽然垮台了，但他执行的那条路线并没有垮台。”谢子长说着又咳嗽起来。

刘志丹急忙扶了扶谢子长，说道：“老谢，你不要多虑，这些事

情也不必再提了，你现在主要是养伤，陕北人民还在等着你指挥大家战斗哩！”

谢子长吃力地摆了摆手，深情地说：“你今后在斗争中要警惕！”

刘志丹感激地说：“你真是我的好同志，好战友，你是一个品质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又安慰道，“老谢，过去的事不要再想了，想多了是会伤身子的。眼前最要紧的是给你治病，只要你心放宽点，病情就会好转的。你需要什么药，想吃点什么，我来想办法给你弄。”

谢子长感激地笑着说：“我的病事情小，粉碎敌人的‘围剿’事情大。你这一来，就好了。有你指挥，我就放心了。”他喘息了一会儿，看着刘志丹，说道：“北方来了个黄翰同志，你知道不？”

“知道了，明方对我说了。老黄也给我来过信。既然是组织决定了，我只有服从。你的病好了，咱们一块干，现在先给你弄个名义。”

谢子长赶忙摆着手说：“快别给我增加精神负担了，你政治上军事上都比我强，有你统一指挥，我一百个放心。”

两位亲密战友就当时形势、党的斗争策略、军事上的战略战术、陕甘陕北和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军委主席人选等问题交谈了很久，气氛融洽，看法一致。当谈到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人选时，互相推让起来。

谢子长说：“老刘，这次你再不能推让了，过去多少次部队改编，干部调配，你总是把应该担负的重要职务让给了别人，自己干职务低的实际工作，从不计较职务的高低，我每当想起这些事，就更加敬佩你。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说什么我也不能承担，看样子我是不行了，陕甘和陕北的军事斗争重担全落在你的肩上了，也只有你能担起这副担子。”

刘志丹听到这里，又难受又感动，流着眼泪说：“老谢，不要这么说，你的伤病能好，你应当有勇气活下去。党和人民需要你，我们离不开你，你的伤一定能好，一定能治好！”

两位亲密战友感人肺腑的谈话，将在场的人都感动地流下眼泪，哭泣着说不出话来。要分别了，刘志丹又一次摸着谢子长的被子说：“被子太薄了，要换床新的。你这人，尽是为别人着想，总不关心自己。”

谢子长笑着说：“被子薄没关系，只要伤能好，能为革命继续工作就好了。”

临别，刘志丹再三叮嘱他要多多保重，安心静养。两位亲密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

1935年春，蒋介石调陕西、河南、山西、宁夏、甘肃5省军阀部队4万余人，对陕甘边、陕北苏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其兵力部署是：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的3个旅（加上甘肃警二旅六团）共7个团分别进驻曲子、庆阳、合水，布成新月形战线，向南梁地区推进；胡宗南部第六十一师6个团分别进驻旬邑、宁县、正宁一带，楔入南梁、照金之间待机；杨虎城部四十二师4个团摆在宜君、中部、洛川、富县、甘泉一线，固守咸（阳）延（安）大道，作为战略警戒。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以3个团进攻神府苏区。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以4个团进驻绥德，集中于绥德、清涧、延川、延长、安定、延安一线，重点是进攻安定苏区。

刘志丹到达陕北苏区后，虽然日夜操劳，工作十分繁忙，但多次前去看望谢子长，就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问题，两人进行了多次交谈，在各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后，刘志丹受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的委托，于1935年2月5日，在陕北苏区赤源县的周家硷（今属子长县），主持召开了陕甘边、陕北两个特委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惠子俊、高岗、马明方、郭洪涛等。白坚作会议记录。

会议在刘志丹的主持下，首先研究了军事问题。到会同志一致认为：要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必须统一两支红军的领导，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推选出刘志丹、谢子长、高岗、杨森、杨琪、张秀山等为军委委员。在研究主席和副主席人选时，谢

子长委托杨琪提议刘志丹担任主席，而刘志丹却提出让谢子长任主席，他任副主席。最后，与会人员经反复研究，认为谢子长病重，不能到职，无法领导红军的反“围剿”斗争。所以，一致通过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子长、高岗为副主席，（另一说法：谢子长为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朱子休为参谋长，白坚任政治部主任兼秘书长。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又产生了归谁领导的问题，经讨论，一致同意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经过研究，又一致同意由工人出身的惠子俊任书记，郭洪涛任组织部长，张秀山任宣传部长，崔田夫任秘书长，习仲勋、刘志丹、马明方、杨森、杨琪、张达志等人为执行委员。从而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党的领导。西北工委成立后，原陕北特委所领导的各县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所属各县仍由陕甘边特委领导。同时，决定陕甘边特委书记由李生华接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刘景范接任，红 26 军 42 师 2 团团团长由孔林甫接任。

中共西北工委先后领导 26 个党的县委（工委），其中 15 个是 2 月至 9 月新建的，即：延长、红泉、宜川、延安、肤甘、肤施、神木东、神木西、神木北、米西、子长、新正、靖边、淳耀县委和安塞工委。关于政权组织，中共西北工委于 1935 年 7 月提出建立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但未建立起来，而是在西北工委领导下，继续由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分别领导陕北、陕甘边地区的县苏维埃政权。先后设有陕甘边南区、东区和 31 个苏维埃县，其中 13 个县是 2 月至 9 月新建的，即：府谷、子长、米西、延长、红泉、宜川（赤川）、定边、西靖边、东靖边（靖边）、肤甘、肤施、延安、淳耀县。主力红军是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和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总兵力 3000 多人。地方武装有新的发展，陕北苏区新建了 8 个游击支队，陕甘边苏区新组建了第二路游击师、新编西北抗日义勇军和一些县游击队。全根据地共有大大小小 40 多支游击武装，共约 3000 多人。此时的群众组织主要是共青团、工会和妇女会。原由中共陕北特委领导

的共青团陕北特委未撤销，在中共西北工委领导下负责指导全根据地团的工作，书记慕纯农，到9月先后辖团陕甘边特委和18个团县委（工委）。陕西省工会筹委会是1935年7月正式成立的，主任高长久，领导6个县工会。清涧、绥德、赤源、秀延、子长、延安、红泉县设有妇女会。不少乡、村设有贫农团。

中共西北工委成立后，继续开展土地革命，基本结束了分配土地的工作。

周家硷会议还讨论通过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计划，决定集中红二十六军、陕北红军主力，打击侵入安定、绥德、清涧、延川、延长之敌。会议同时还讨论了打通陕北和陕甘边，把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问题及打通神府苏区的问题。

周家硷会议后，为了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又成立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

1935年2月7日，刘志丹在安定县的冯家梢嫣主持召开了西北军委第一次会议，宣布西北军委开始办公，并公布了西北军委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人。西北军委开始办公的第一件事，就是刘志丹亲自起草了一个题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

2月18日，《动员令》就发送到全军、各县。《动员令》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着重说明：敌人此次“围剿”规模虽大，但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弱点很多。蒋介石的嫡系摆在二线，一线的非嫡系部队又各心怀鬼胎：陕军杨虎城时刻提防蒋介石的吞并，他在其陕南尚被红二十五军钳制的情况下，不会贸然向不属他势力范围的陕北大举进犯；马鸿逵虽派出大量部队进攻南梁，但其主要目的是保住自己的甘宁地盘，亦不会向陕境作更进一步的深入；井岳秀在屡遭打击之后，已采取保守战略，盘据在主要城镇和交通线上，不愿轻易出动；唯有高桂滋甘当马前卒，是敌人“围剿”的主力。

基于这种分析，《动员令》决定，置蒋介石嫡系和马、杨不顾，

集中兵力对付高、井。鉴于井虽为弱敌，但若先进攻，高必来援。高虽为劲旅、但攻高，井不会对他援助。便决定先灭高、后攻井，这是取得此次反“围剿”胜利的关键。具体兵力部署是：红 42 师主力第 3 团和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红 84 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机动作战；红 42 师第 1 团进攻耀县柳林地区，监视钳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同时开展三淳耀宜地区的游击战争；红 42 师第 2 团完成阻击马家军任务后进到顺宁开辟定边环县新区；骑兵团进到黑水寺地区相机东进开辟宜川新区，并积极向韩城合阳一带游击，扩大政治影响；红 42 师主力转到外线后，地方游击队坚持南梁内线斗争；陕甘边后方机关转移到洛河川；神府独立团在本地坚持斗争，扩大根据地。

《动员令》特别强调了加强红军纪律的重要，要求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反对散漫现象和游击习气，指出这是大兵团作战中，实现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获得胜利的保障。《动员令》还对建立供应、补给、修械和医院等方面的工作做了妥善安排，决定在清涧和下寺湾两地建立军委办事处负责战争勤务。

《动员令》是刘志丹多年来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他所提出的这套打法，不仅将军事上集中兵力与政治上利用矛盾巧妙地结合起来，而且把粉碎敌人“围剿”与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联合成一个整体，为战争的胜利和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刘志丹根据陕北的实际情况，分析了敌我力量，准确地选择了战场和打击的对象，周密地制定了作战计划，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各个击破和消灭敌人。

周家硷会议的召开是适时的，成功的。会议统一了两个特委、两支红军、两块根据地的领导，宣告了西北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在组织上、军事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刘志丹刚部署好反“围剿”的作战，各军正按《动员令》积极准备的时候，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谢子长于 2 月 21 日不幸去世。

刘志丹得知消息后，万分悲痛，立即前往向谢子长遗体告别。并向红军团以上干部指示：“谢子长的逝世绝对要保密，红军到了哪里，都要打出老谢的旗号，大张旗鼓地说，你们是谢子长领导的红军，是谢子长派你们来的。这样能给群众壮胆，使群众受到鼓舞；同时，敌人一听谢子长还活着、一定闻风丧胆。我们这么做，对革命有好处。”

刘志丹指示安葬了谢子长以后，接着到了安定县与安塞县交界处的白庙岔，宣布成立红 27 军 81 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参谋长朱子休。下属 3 个团，1 个少共营。第 1 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第 2 团团长任三、政委马万里；第 3 团团长王思恭、政委王国昌，全师共 1200 人。师部成立后，部队转移到北区的冯家梢嫣、李家窑湾一带。

国民党这次“围剿”的主力，是高桂滋的 84 师。高桂滋完全搬用了蒋介石“围剿”中央红军时的那一套军事策略：即修筑碉堡、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战术上，采取分进合击，并实行罪恶的“移民并村”政策，大搞烧、杀、抢，制造“无人区”，企图切断红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红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

敌 84 师的部署是以师部驻地绥德县城为大本营，除分兵驻守吴堡、延川、延长、延安各县城外，重点是兵分两路，进逼安定中心区域。一路由绥德出发，经田庄、淮宁湾、老君殿，直到安定县北区的南沟岔；另一路由绥德出发，至清涧县城，折而向西，经杨家园子到瓦窑堡，向东延伸到黄河边的高杰村。在沿途各点上修筑碉堡，组成在苏区内的包围圈。圈内还有“钉子”，即反动的地主武装。主要的地主武装不下六、七处。安定县北区石窑湾折科大部，安定县东区黄儿子部，安塞县薛生华部，延安境内蟠龙镇宋永昌部，绥德西区石湾镇薛应九部等。敌四面包围，主力突入中心区域，目的是企图堵截红军转到外线作战，或紧缩包围圈，集中兵力，在苏区内消灭红军。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刘志丹领导下，详尽地分析了敌情，精确地选择了战场和打击对象，周密地部署了作战计划，制定了集中红军

主力，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和消灭敌人的正确方针。

西北军委确定第二次反“围剿”战役的重点，是打高桂滋的 84 师。因为该部是敌之主力，其先头部队已突入中心区域，对红军威胁最大，首先打垮这股敌人，不仅解除了苏区的威胁，而且将牵动全局；高桂滋部到陕北，抢占了井岳秀的不少地盘，而且“得陇望蜀”，想取代井岳秀做“陕北王”。因此，高、井之间有矛盾，我打击高部，井岳秀可能会坐视不救，有利于各个击破；高部对红军的战术不甚了解，对陕北地形、民情又不熟悉，却依恃装备精良，轻视红军，暴露出的弱点较多，所以刘志丹决定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趁高桂滋部由西渡黄河不久，立足未稳，先打击其各点的突击部，然后向外线之敌出击。

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红四十二师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红一团在淳耀一带御敌，牵制六十一师；红二团在完成阻击三十五师的任务后，向环县三边发展，骑兵团相机东进宜川，积极向韩（城）合（阳）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苏区党政军机关转移到洛河川。

1 月 15 日，国民党三十五师由宁夏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经中卫、环县、曲子进抵悦乐一带，另一路经固原、西峰镇、庆阳，进驻柳村原一带，2 月 21 日，占领庆阳、新堡、悦乐、元城、柔远等地。敌人这次“围剿”采用堡垒战，到达苏区后，一面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建立所谓“战略村”，企图切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一面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修筑碉堡。仅在新堡、悦乐、五蛟、柔远、白豹等地，就修筑碉堡 25 座。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二团、二路游击队及赤卫军，采用疑兵之计，组织了有效的抵抗，在老爷岭的山头上搭了许多毛毡帐篷，密林中竖起许多红旗。白天，游击小组高举红旗四处游动，夜间，漫山遍野点燃篝火，并不断派出小股部队袭扰敌人，迫使敌大部队在老爷岭以西滞留达一月之久。

4 月 13 日，敌三十五师部队占领二将川、荔园堡及陕甘边区苏

维埃政府机关驻地寨子湾。并派 500 多人紧紧追剿转移中的特委、政府机关工作人员。4 月 16 日，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的张岔岭上，政府工作人员被包围，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奉命阻击。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仍坚持战斗，打退了敌 4 次冲锋，掩护同志们脱险。终因负重伤被俘，壮烈牺牲。

在敌“围剿”期间，苏区人民坚壁清野，将粮食、灶具埋藏，把牛羊赶进山林隐蔽起来，敌人找不到粮食，就到处搜山，烧山，向山林开炮，逼使一些群众不得不回到家中。敌人对群众严刑拷打，企图得到红军、游击队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去向。并贴出告示，宣称：抓到习仲勋“赏白洋 2000 块，马 2 匹”，抓到贾生秀“赏白洋 1000 块，马 1 匹”。苏区人民千方百计保护干部，使敌一无所获。敌为了彻底摧毁苏区，实行法西斯保甲制度，将南梁苏区中心区域的南梁、小河沟、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房屋全部烧毁，所有村庄变成一片废墟，还拉去壮丁 200 余名。反“围剿”开始，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等在五蛟魏家疙瘩消灭了谭世麟民团军的两个连。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等在黄大原田峪岭消灭三十五师骑兵团一个连。红三团、骑兵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在柳村原与三十五师一个团激战，从而阻滞了敌人前进。随后，红三团与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陕北红军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进行反“围剿”作战。红二团在桥河吴家窰子与三十五师骑兵打了一仗，北上三边地区活动，骑兵团则在长武战斗后到东区活动，红一团在南区击敌。红军部队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进攻。

在 1935 年春季开始的反“围剿”斗争中，红四十二师政委张秀山率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奉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的命令北上陕北，4 月中旬，在寺儿畔歼敌五一一团 1 个连。5 月 1 日，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会师，共同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前敌总指挥刘志丹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了一系列战斗。

1935 年 4 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八十六师（井岳秀部）各一部分别以营为单位向陕北苏区中心秀延、赤源县推

进，敌八十四师二五一旅五〇一团三营进驻杨家园，修寨筑堡，充当“围剿”驻军的急先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乘机歼灭该敌。5月7日拂晓，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分3路向杨家园驻敌发起进攻，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担任主攻，从黄家川、玉家湾出发，夺取墩儿山寨堡。当接近玉皇崩山寨时，发现寨墙很高，不易攀登，地形狭窄，兵力无法展开，遂决定撤退。驻敌见红军撤出战斗，分两路追击。陕北红一团撤退中，伏击并歼灭敌五〇〇团1个连，俘敌百余人。追敌到达吴家寨，受到陕北红一、二团的进攻，遂撤至白家园后山老虎嫣、圆岭等高地。为解吴家寨之危，驻守杨家园敌倾巢出动，红军乘虚占领杨家园，敌五〇一团三营处于被红军前后夹击、四面包围之中。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先敌抢占如天山、大小坞山制高点，从左右两翼向敌阵地老虎嫣发起钳形冲锋，陕北红一、三团从西南侧击敌后，经过五、六个小时激战，全歼敌于泥泞沟。一天之内打了两仗，歼敌1个营又1个连，毙敌50余人，俘敌450余人，缴枪500余支、轻机枪20余挺。

正当红军打扫战场，处理战后事务时，又获悉敌1个营护送五〇〇团400驮军用物资由清涧去瓦窑堡，被陕北游击九支队和赤卫军包围在马家坪一带。5月9日，红军主力兵团与游击队、赤卫军向马家坪敌人发起冲锋，不到两小时便结束战斗，毙敌40余人，俘敌400余人，消灭“铲共义勇队”百余人，缴获长短枪450支、轻机枪20余挺、八二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单军衣2000余套、数万银元以及大批医药器械。反“围剿”斗争首战胜利，红军主力兵团军威大振，士气高昂，弹药充足，装备更新，国民党当局受到极大震动，慌忙将五〇〇团驻安定老县城的第一营和延川永坪镇的第二营撤回瓦窑堡，安定县城获得解放，敌进犯秀延县、赤源县的计划宣告破产。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根据玉家湾会议精神，决定攻打延长县城。5月20日，红军主力兵团长途奔袭张家圪台，全歼敌八十四师四九九团1个连。敌驻苏家岩之营派1个连渡无定河来援，也大部被歼。战后，红军主力兵团移驻清涧店子沟地区，摆出攻打绥德、清涧的姿态，

敌八十四师慌忙进行拦截部署，红军则星夜秘密南下，到延长县大连沟一带隐蔽待机。

延长县城驻国民党八十四师直属骑兵连 100 余人，民团 200 余人，矿警队 80 余人，共计 400 余人。为诱敌出城，在运动中歼灭，陕北红一团三连和游击队到距城二、三十里的东原去打土豪、分财产，虚张声势。敌民团团总李鸣吾误认为东原是红军小股游击队，便于 27 日晚带 130 多人窜犯东原。三连和游击队边打边退，诱敌至距县城百余华里的茄子峪，正当敌得意之时，红军主力突于 29 日拂晓开始攻城，迅速占领县城，全歼守敌。及至李鸣吾发觉上当，返回县城时，被红军全歼于贺家峪。这一仗，生俘国民党延长县长和骑兵连长，毙伤俘敌 400 余人，缴长短枪 400 余支、轻机枪 15 挺、无线电台 1 部、战马 100 余匹。延长解放，打开了南进的门户，延川守敌惶恐不安，弃城逃往清涧。延川遂告解放。

延长、延川解放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集中兵力肃清西线之敌，首先攻取安塞县境各个敌人据点。6 月 10 日，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围攻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守敌 1 个连见红军攻势猛，趁夜弃城逃窜，红军活捉国民党安塞县两任县长及一些要职人员。与此同时，陕北红一团与陕北四支队攻取了高桥镇，并击溃增援的延安民团百余人，接着，红军主力兵团于 6 月 17 日经过 1 天的攻坚战斗，占领李家塌，消灭守敌 100 余人。至此，解放安塞全县，使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

解放安塞后，陕北红二团返回安定，保卫工委、军委机关，红二十六军二团加入主力兵团。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用 5 个团的兵力攻打靖边县城。靖边驻国民党八十六师五一三团 1 个营 400 余人及县警队、民团 200 人。8 月 28 日拂晓，红军发起总攻。红军攻势凶猛，守敌顽强抵抗，经过五六个小时激战，终于打垮守敌。敌营长曲子鹏见大势已去，便带几名马弁向宁条梁逃窜，被红军追击全歼。这一仗，毙伤俘敌 600 多人；缴获长短枪 500 余支、重机枪 2 挺、迫击炮 6 门。俘敌县长、民团总指挥等百余人，解放了靖边县城。保安县城守敌 1

个营也自知无力与红军抗衡，弃城逃跑，保安县城也获得解放。

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红二团与陕北红军组成的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刘志丹的直接指挥下，历经 2 个月，大小 10 余战，连战皆捷，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靖边、保安 6 座县城，在 20 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游击区扩大到 30 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 5000 人左右，地方游击队发展到 4000 人，把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为中共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准备了条件。

## (2)

1934 年 11 月 16 日夜，徐海东和整编后的红二十五的将士从大别山区的何家冲黯然西行。

尽管党中央的二月来信，要红二十五军向外发展。最近中央又派程子华来，要他们转移。

到什么地方落脚呢？

中央也心中无数，只是笼统地提出了四条原则：

一是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

二是群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

三是地形有利于作战的地区；

四是粮食和物资比较丰富的地区。

红二十五悄然离开大别山，尽管十分注意保密，但不久在越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时，蒋介石惊呼：“我们太大意”，急令豫鄂皖三省追剿队五支队、十六个团和东北军一一五师跟踪追击。

12 月 8 日，二千余人的徐海东部辗转豫陕边，攻破铁锁关进入陕南，开始酝酿创建鄂豫陕边区的问题。疲惫不堪的部队在酣睡中遭

敌人突袭，庾家河一战红军死亡二百多人，营以上干部大部分负伤，徐海东和程子华均负重伤……特别是一颗子弹从徐海东的左眼底下穿过，又从颈后飞出，失血过多生命垂危……

1935年1月中旬，蒋介石命令杨虎城指挥十一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

徐海东在大雪中，带伤参战，在葛牌镇诱敌深入，击溃敌四十二师刘云龙团，使红二十五军又一次转危为安。

4月20日，云集鄂豫陕边区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三个师，驻郑州九十五师入陕，会同四十军、四十四师和陕军一部，共三十多个团，由杨虎城统一指挥向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

5月中旬，省委在郧西地区召开了反“围剿”作战研究会，伤情未愈的徐海东毅然提出了“先疲后打”的作战方针。省委经过热烈讨论，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以游击队就地开展游击战，骚扰敌人，疲惫敌人，然后抓住有利战机，予以歼灭……

徐海东率部在陕南的崇山峻岭中，按照预定路线，先向北，又向东，再向南，拖着敌人绕圈子。

6月15日，冒充敌四十四师的部队，攻占鄂豫陕边界要地——紫荆关，歼敌二百多，缴获大批军需物资。

敌闻讯后，六十七军三个师、四十四师、警备一旅等部，气势汹汹地朝紫荆关包围过来。

徐海东牵着敌人鼻子在大山里绕来绕去二十多天，待敌疲劳时，在地势险要的桃花岭布下一个口袋阵。7月2日拂晓敌军大部进入口袋中，红军突攻，伏兵四起，弹雨如注，使敌大乱，黄埔军校毕业生旅长唐嗣桐被活捉，一千八百多人被全歼。顿时，陕南震动，东北军和西北军尽悉震惊。

为继续调动敌人，把敌人从陕南游击根据地拖出来，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于7月初北出终南山，前锋直逼西安。

7月中旬的一天，徐海东兵进距西安八公里的引驾回。在这里的区公所读到了一张《大公报》，报上赫然登载的一条红军主力的消息，让他欣喜异常——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军一、四方面军正向松潘方向流窜……

闻得此，徐海东和战友高兴的几天都难以入寐。中央红军的音讯已经中断两年多，红二十五一直是孤军奋战。半年前，在陕南华阳，曾闻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部队已经越过了大巴山，徐海东曾率先头团远赴城固小河附近接头，但知晓红四方面军早已折返川北，杳无音讯。没想到它却与中央红军在草地会师了。

7月15日省委代书记吴焕先在长安丰裕口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

这时，交通员又从上海送来中央文件，《大公报》上的消息被证实。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准备北上。

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等一个个红二十五军的将领潸然泪下。

会上，徐海东朗然说到：

“我们立即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红一、四方面军，就是我们三千多人全部牺牲，也要到党中央的身旁去！”

最后，省委会议决定，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继续领导陕南地区的游击战争。红二十五军立即进入甘肃境内，直捣敌人后方，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

第二天，即7月16日，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又踏上征途。

部队路经郿县、周至骆驼口，遇上连日的飘泼大雨和敌骑兵的尾追，也全然不顾，一直沿着秦岭北麓急行军，不停地向西挺进。

7月21日，他们抵达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双石铺附近，切断敌人宝鸡至汉中的公路要道，一举歼灭了胡宗南别动队四个连，并活捉一

名何姓的少将参议。

徐海东亲自审问，从俘虏口供中再次证实中央红军一、四方面军正越过草地北上。

据此，红二十五军当即决定加快行动，西出甘肃，袭击天水县城，威胁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兵力，打破堵截中央红军北上的企图，迎接党中央。

不久，战士又在7月16日和22日的《大公报》上发现：

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匪主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迅行……似进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

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迭声叫好，陷入持久的激动之中。

7月31日，打下双石铺，进行粮食弹药补充，做好出击甘肃的准备。

8月2日，部队经杨店，抵两当县灵官殿后，兵分南、北、中三路行军，进至两当县城附近祖师山、七里坪、西山堡一带，包围县城。

两当县城位于甘陕两省交界处，是由陕南进入甘肃的咽喉要道。当时城内驻有敌保安队等近百人，把守县城东、西山的四个碉堡，阻挡红军。

3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开始攻城，一时杀声震天，枪声大作，城里守敌慑于军威，尽皆弃堡而逃。

当晚8时，红军离开两当城，向天水进发。次日拂晓抵太阳寺、前川一带。

8月9日晚，红二十五军沿利桥、党川、麦积、甘泉、马跑泉一带，进逼陇南重镇——天水。

天水乃甘、陕、川的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也是陇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周代称戎邑，秦王朝置上郡县，之后曾设秦州、天水、清水、成纪等郡县，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红二十五军包围天水城后，发起攻城战斗。一举攻克北关，歼灭敌百余人。城内守敌一面报警告急，一面凭借牢固的工事负隅顽抗。红军几经突击，终未克城，遂退至城西十里铺小憩，准备再战。

这时，驻守甘谷、武山一带的敌第三军第十五师补充团闻讯后火速回援，驻守在清水的第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也星夜向天水进发。

红二十五军面对两面夹击的危险放弃攻天水，挥师渡过渭河，袭占秦安。

8月11日攻破仅有140多人驻守的秦安县城，处决一批地方恶霸，打开监狱释放百姓一百多人，并向参加群众大会的乡民散发饷洋。

此时，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已转战十天，但仍未探知中央红军的确切位置。省委负责人根据当时所处的情况，初步决定，如果联系不上中央红军，就进军陕北，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

8月12日晨，红二十五军继续北上，经通渭新景乡到达静宁王家堡一带，切断陕甘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公路。

8月15日，进驻隆德县的回民区兴隆镇、单家集一带，休整三日。

四处侦察仍无中央红军的消息，回返太难，省委研究决定到陕北与刘志丹会合。

8月17日下午，仅用一小时就攻占隆德县城，消灭敌第十一旅二团一营和保安团，活捉伪保安团长。

傍晚，敌毛炳文部第六师十七旅由兰州分乘七十余辆汽车，沿西兰公路赶赴隆德增援。

红二十五军与该敌激战数小时后主动撤出。敌人紧追不舍，红军边走边打，连夜翻越六盘山，甩掉追击的敌人。

18日，红二十五军进至瓦亭附近，与由固原赶来的堵击红军的第三十五师一〇五旅一部遭遇，遂被红军一举击溃，狼狈逃窜。战后，

红军沿西兰公路东进，逼近平凉县城。

盘踞平凉的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四处调兵增防，企图将红二十五军逐出陇东地区。

红军假意攻城，骚扰牵制敌人。待大军压境时，迅速消失，分两路会集湫坪沟门，渡泾河进入平凉四十里铺。

敌尾追而至，红军在平凉白水公路西面三公里的打虎沟，南面的漳沟河峡谷的大堡山设伏。

8月中旬，在大雨中，红二十五军将马鸿宾一〇二师马应图三个营全部歼灭，夜宿白水镇。

这时，敌三十五师的骑兵团及二〇八团数千人，突然从西峰方向猛扑过来，企图在泾河北岸歼灭红军。

于是，徐海东决定南渡汭河，佯作夺路入陕之状，把敌人从汭河沿岸调开，然后再乘机转向，渡汭河，挥戈北上。

渡汭河时，由于山洪暴发把部队一切两半，又遭敌二〇八团千余敌军的围攻，政委吴焕先饮弹身亡。

徐海东和战士们埋葬了战友后，继续西进、南下，在梁原镇、赤城镇一带游击。

中央红军依然音讯全无，敌军第六师十七旅又从兰州乘车到泾川，敌三十五师正向泾川一带调动，陕甘边的敌第五十一军一一师由凤翔、清水向北进至陇县，敌第三军十二师也由武山、甘谷朝华亭方向追来，对红军隐隐形成合围之势。

徐海东主持召开省委会，讨论今后的行动方向。

参会者一致同意：既然中央红军无法联系，敌人又大军合围，大雨滂沱难已长途跋涉，伤病员也难已安置，应该立即到陕北去，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会合。

9月7日，红军抵达庆阳县豹子川。鄂豫陕省委召开扩大会，参

加会议者有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赵凌波、张明先、田守尧、张希等。会议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代理省委书记，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

此后沿豹子川向陕北阔步挺进。

9月初，走出豹子川，翻越永宁山，终于进入陕北苏区。饱经战争忧患的红二十五军的战士们抚摸着苏区的一草一木都觉得分外亲切。

9月9日，徐海东他们在保安县永宁瓦子川见到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陕甘边军委主席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

徐海东见到习仲勋时，第一句话就说：“可找到你们了！”

他也终于从陕北红军中得知：中央红军正向陕北这边开来。

为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到来，刘志丹在玉家湾一带休整时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召开西北红军干部会议，讨论欢迎的有关事宜。他说：“红二十五军到陕甘根据地是一件大喜事，革命的力量更加强大……”

大家讨论了刘志丹的谈话，一致表示拥护。会后，各团连夜进行传达动员，并做好南下与红25军会师的各项准备工作。

9月中旬，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组织部《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

各级党部负责同志：

目前中国革命的发展，使西北在整个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占一最重要的地位。刚才接到陕甘边区的快信说，我红二十五军在中央指示下，由商洛出发，经过户县、周至、凤县，占领两当，包围天水，继续北上，攻克秦安、隆德两县，消灭新编十一旅1营，又威逼平凉，击溃三十五师1旅，消灭1团，并活捉敌团长马开基，从合水、庆阳现在已直抵我们陕甘边苏区，9日到永宁山。这一胜利的红二十五军、二

十六军、二十七军的汇合，是争取陕甘、川陕的联系及联系全国各苏区，在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下的一致行动，为苏维埃在整个西北及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的。这个伟大胜利消息，使我们西北劳苦群众听见了没有一个不手舞足蹈鼓掌欢迎与庆祝的。我们党应该抓住这千载一刻的机会，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苦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的汇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会与庆祝会，并鼓励红色战士的革命的积极性，他方面提高劳苦群众的革[命]情绪，趁着庆[祝]兴高彩[采]烈精神兴奋的时机，猛烈的扩大红军，以冲破摆在我们面前的三次“围剿”。[收]到这个紧急通知后，应该刻不容缓的执行下列的任务。

各级党部应立刻召集会议，讨论这个伟大胜利的意义与我们的战斗任务，要对此有准备的举行各[种]广大群众的会议，如欢迎会、庆祝会，散发传单，广贴标语，以各种[群]众团体的名义，发快邮代电，欢迎红二十五军，把全体群众战斗的动员起来，[努力]提高群众的最高度情绪与高度的革命斗争空气。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西北革命根据地》“革命历史文献选辑”第86页。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立即前往瓦子川热情迎接，9月10日在永宁山召开了热烈欢迎红25军的群众大会。在洛河川下寺湾休整待命的红26军第3团，也立即以政委黄罗斌等人为代表，前往刘家堡欢迎、慰问红25军的先头部队，向远道而来的战友介绍了敌情和西北根据地的情况。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亲自召集干部开会讨论了欢迎红25军的有关事宜，并组织工作组分赴根据地各县动员群众，热烈欢迎红25军战友。这样，红25军所到之处，根据地群众都像接待亲人一样，腾房让窑，磨面碾米，杀猪宰羊，捐献鞋袜，热情慰劳，并贴标语、散传单和召开群众大会热烈欢迎，到处洋溢着喜迎亲人的热烈气氛。

白坚在《陕甘革命军事斗争的回忆》中讲道：

“……接到信后，部队即进行了动员，战士们欢欣鼓舞，开了干部会议，并草拟发出了欢迎信，进行欢迎的准备工作。部队从冯家过崖出发，经过贺家湾、魏家岔等地到达永坪。此时由于东线击溃阎锡山部队的影响，加以红 25 军进到陕甘边区，我们扩大宣传欢迎红 25 军到陕北汇合。在 9 月初，瓦窑堡的敌人突围逃往绥德，县保安队和一些地方武装投降了我军。瓦窑堡解放后，李仲英领导的安定、延安游击队，加上敌人投降的县保安队等即编成了独立团。我主力部队到永坪后，即住在永坪下川的石窑沟、冯家坪一带，把永坪镇上好的房子和石油厂让给红 25 军住。红 25 军于 9 月 16 日、17 日到达永坪。‘九·一八’那天，在石油厂的广场上开了盛大的欢迎红 25 军的军民大会。在这个欢迎大会上，由红 25 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代表红 25 军讲了话，我代表陕甘红军讲了话。参加会议的军民合计约 10000 余人。”引自作家出版社出版乔盛著《战争岁月——白坚革命往事》第 269 页。

9 月 15 日，红 25 军在西北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的夹道欢迎下，到达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驻地延川永坪镇。次日，刘志丹率领红 26 军、红 27 军也抵达永坪镇，两支英勇善战的红军胜利会师。9 月 17 日，在朱理治、聂鸿钧等组成的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共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由中央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兼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王大成任组织部长，郭述申任宣传部长，戴纪英任政治保卫局长；改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聂鸿钧任主席，戴纪英兼任参谋长，白如冰任供给部长。9 月 18 日，在永坪镇油矿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联欢大会，庆祝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的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徐海东在《会师陕北和刘志丹》中回忆：

1935 年 9 月 18 日——“九·一八”事变 4 周年，我们在永坪西南一个干部学校门前操场上，举行了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两军合一，

7000 多人，真是人精马壮。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赶来参加了大会；会场上红旗飘扬，遮天蔽日，许许多多的大字标语贴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主席台的两旁贴着两张特别大的标语：

“两军亲密团结，携手作战！”

“迎接中央，迎接毛主席！”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革命回忆录选辑》第 350 页。

会上刘志丹、徐海东、郭述申、聂洪均、朱理治分别代表陕甘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红二十五军、西北军委、中共西北工委先后进行讲话，祝贺两军胜利会师，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坚决粉碎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而努力奋斗。

会上，宣布成立红 15 军团，下辖 3 个师，即红 25 军编为 75 师，师长张绍东（后叛变），政委赵林波（后叛变）；红 26 军编为 78 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后脱离革命）；红 27 军编为 81 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徐海东、刘志丹都在会上讲了话，号召两支红军亲密团结，互相学习，并肩战斗，以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新胜利，迎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长征的中央红军。

在这次会议中，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几个人，采取了组织上的变动，不公正地将刘志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同时安插执行“左”倾路线的人担任要职。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没有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一如既往，全力和徐海东、程子华等一起筹谋对敌人第三次“围剿”的反击。

这时，东北军的 7 个师，分两路向陕北进攻。110 师已进犯到延安，其余几个师也进犯到了洛川、富县、庆阳一带。经过红 15 军团分析研究，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于 9 月 29 日派出红 81 师的 1 个团佯攻甘泉城 110 师的 1 个营，诱延安的 110 师出动来援；其余大军蛰伏甘泉城北 15 公里的劳山地区隐蔽集结，等待歼灭来援之敌。

徐海东、刘志丹率红 15 军团绕过延安南下，经过 3 天急行军，到达甘泉以西王家坪一带，徐海东和刘志丹带领团以上干部到劳山附近观察地形。

这里地形特殊，一条公路直通甘泉和延安，相距 50 公里。公路两边是起伏绵延的山峦，森林密布，便于设伏。红军佯攻甘泉，在劳山布下口袋阵，驻扎延安的 110 师，果然中计，在师长何立中的率领下，钻进伏击圈。徐海东、刘志丹亲临前线指挥，激战 6 小时，全歼 110 师，击毙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以下千余人，俘敌 3 千，缴获长、短枪 5000 余支，轻重机枪 200 余挺，山炮、迫击炮 28 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劳山大捷。

战役结束后，红 15 军团在劳山休整，杨森率红 78 师（即原红 26 军）一支侦察部队，在阳泉塬又歼灭东北军 107 师 1 个营。迫使敌人改变战术，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推进”政策。

红军声威所及，井岳秀部驻守瓦窑堡的一个团立即弃城夜逃，安定县境内的敌军据点至此全部扫除。

10 月 5 日，中央驻西北代表团，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等领导机关，从永坪镇移驻瓦窑堡。

此后，徐海东又于 10 月 12 日在榆林向东北军 107 师 1 个团发起强攻，歼敌 4 个精锐营，生擒团长高福源，俘敌 1400 余人。至此，东北军精锐部队 67 军将近一半被歼，西北战场局势开始扭转。

### (3)

1935 年 5 月 10 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村召开常委会，对工委同志的工作进行调整，会上还对郭洪涛回陕北后的错误进行批评。会后，郭洪涛又向北方代表写秘密报告，说“……刘志丹包庇排斥的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陕北的对立，挑拨

红 26 军和红 27 军的对立。”

7 月 5 日，北方代表派原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朱理治来到中共西北工委驻地延川县永坪镇。

朱理治 1945 年 7 月 10 日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讲道：我到陕北后，首先开了一个永坪会议，我传达了中代几万字的指示，内容是夸夸其谈。那时正是三次“围剿”，做了一个反三次“围剿”的决议案。以后我在文安驿会议上也报告过，讲了两、三天。这些报告内容，是把中央代表的指示信具体化了，并且有个别的发展。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和刘志丹在路线上有很大的分歧，因此才有很多的斗争。首先，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我们是对立的。我们写了一个决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三次“围剿”的决议》。这个题目就不对。那时帝国主义就没有到陕北来，我们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混淆起来，连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家也不知道，而刘志丹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则认识清楚。他们对富农只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主张联合富农，把大地主小地主分别开。但是我们呢？对富农一定分坏地，对地主则肉体消灭，甚至将部队里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官兵都赶出部队。对白军，刘志丹他们不仅要争取兵，而且要争取军官，我们骂他们与杨虎城、孙殿英搞统一战线是“上层军官勾结”。对土匪、哥老会，他们采取争取的政策，我们骂他们是“土匪政策”。对外来知识分子，他们采取争取信任的态度，我们就说他们“忽视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其次，对形势的估计及对策略任务的规定，我们和刘志丹也是对立的。我们认为革命是一直向上发展的，如果有人说有高潮，有低潮，那就是机会主义，有人说江西苏区失败是低潮，我说恐怕是右派在搞鬼。同时无边际夸大自己的力量，根据王明在国际十三次全会上的报告，认为苏区人口占全国的六分之一，面积占全国四分之一。我们又认为，国民党的士兵都是动摇的，国民党财政上已经破产，兵源已经枯竭，广大人民已经认清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因此认为，阶级力量对比我们已占了绝对优势。我当时想，刘、高所以右倾，大概就是他们对形势估计太低的缘故，只要把形势估计

好些，他们也许不会犯右倾错误了吧。因此，竭力夸大革命有利形势。根据同一思想，我就反对陕甘特殊论。我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全国是一致的，南方北方是一致的。那时张秀山说：“陕北的群众好，经济条件好，群众开化，陕甘的人口少，经济文化落后。”我骂他是“特殊论”。直到后来，中央来了以后，我到陕甘任省委书记时，郭洪涛在陕北要我和他竞赛扩大红军，但我总赛不过他，我才认识了陕甘的确是特殊的，这里面积虽大，人口只有6万，而“柳拐子”就占了6千。交通困难，没有党和群众基础，工作只有先搞军队，再搞政权和群众工作，以后再建立地方党。这与陕北有26万人口，交通比较发达，原先有很好的党与群众基础的确是不同的。但是以前我们认为，说陕甘特殊，是蔡子伟等右派在搞鬼。由于我们对形势的估计错误，任务提的很大，要和全陕联系起来和川陕联系起来，军事方面提出打运动战，打正规战，后来又提出要全面出击，说要从什么地方发展到什么地方，又从什么地方发展到什么地方，把地方都没闹清楚，以致闹了一个笑话。

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在陕甘边区正面冲突起来了。我们派惠碧海到那里去分配土地，他到那里把富裕中农的地和粮也分配了。陕甘特委将他撤了职，并叫他在群众中承认错误。我听说这是张文华和李西萍等右派搞的鬼，很生气，就成立了一个代表团，想用代表团的名义压迫陕甘边执行我们的办法。这个代表团有马明方、郭洪涛、崔田夫、张胖子（张庆孚）和我5人。又派了一个小代表团去陕甘边，我们没有想到自己的路线有何错误，只想到有右派在那里搞鬼。所以就要来一个硬干。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西北革命根据地》中朱理治著《我到陕北后的错误》第430—433页。

8月中旬，聂洪钧根据北方局中央代表的决定，也由上海来到延川县永坪镇。聂后来说：他离开上海时，沪局同志和他谈话说：“北方局中央代表的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和陕北的对立，挑拨红26军和红27军的对立……刘志丹思想很右，要我们依靠郭洪涛来好好解决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问题。”

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西北革命根据地》中聂洪钧著《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第 434-436 页。

在劳山战役紧张地进行，红军浴血奋战的时候，那几个王明路线的执行人，却对红 26 军、红 27 军进行了错误的肃反。

1935 年 9 月朱理治在中共西北工委扩大会议上做了长篇报告，并形成《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执行扩大会议决议案》，认为“陕甘党过去没有充分的执行中代（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正确指示，妨害了工作的进展。”并号召展开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说：“暗藏在党内以蔡子伟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机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张实际是对党的路线的消极怠工，轻视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不信任群众的创造性，降低了党的政治任务。”“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使陕甘党完全站在布尔什维克道路上。”这个决议成为错误肃反的动员令。

红十五军团建立后，陕甘晋省委召开扩大的省委会议，会议提出开展反对右派反革命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扩大会议之后又召开了省委会议，确定了肃反的方针：肃清西安、太原等地来路不明的右派反革命分子，以及地主富农中的反革命分子。会议同时决定逮捕李西萍和从太原新近派来的张慕陶的一个交通员，以便追踪其他右派反革命。会后，我随部队开到前方，根据省委的交代，曾召开两次军团负责人会议，有徐海东、刘志丹、郭述申、高岗和我参加。会议决定：来一个深入反对右派的思想教育工作，揭穿右派的阴谋活动，严格注意来路不明的可疑分子，对其中确有破坏行为的人应予逮捕。

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收到省委的来信，说后方永坪镇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根据他们的口供，揭出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准备。省委指令我们在前方立即逮捕刘、高等人。对于省委来信所言，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但以事关重大，未敢马上逮捕。随即和徐海东、郭述申商量，我们感到：既然省委来信，就该执行，但考虑事态严重，“乱子”太大，不敢轻举。而且我们从缴获的敌人的文电中得知中央红军

已经到达秦州，为避免万一弄错，最好还是请中央来到后解决。送出报告后，省委紧急来信，强调指出：刘、高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与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结果来的不是郭洪涛而是程子华。

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分开刘志丹、高岗，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以防变乱，并便考查。不想，刘一到后方即遭逮捕。尔后，在省委的督促和指责之下，我和程子华等都感到，事已到此，刘既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有发生事故的危險。随即，按照后方提出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许多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此后人心惶惶，危險局面可以想见，陕北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就此铸成。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西北革命根据地》中聂洪钧著《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第 434-436 页。

肃反行动由中央代表团直接领导，执行机关是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后方由保卫局长戴季英负责，前方由军委主席聂洪钧负责，朱理治全盘总负责。

9 月末，在陕甘边就逮捕了黄子文、姜旭等人；在后方逮捕了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等人。戴季英完全照抄照搬张国焘、陈昌浩的《肃反》手册，采用他曾在鄂豫皖搞肃反的“逼供信”手段。

审者一逼，甚至实行肉刑；被审查者在无法忍受的痛苦中一供；而审者则有供必信。仅凭口供，不问事实，有供就抓。这就愈搞愈乱，越捕越多。

10 月初，张秀山、张庆孚被抓。稍后刘志丹、高岗、杨森、杨琪、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等全部身陷囹圄。至 10 月中旬，后方关押了三、四十人，主要是高级干部。前方不仅抓人，而且杀人，甘泉下寺湾先后被活埋者达 200 多人。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地方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难逃厄运……

习仲勋回忆肃反岁月：

——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土地和牛羊，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指责我们纠正一些人领导赤卫队侵犯贫、中农利益的违法乱纪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秘密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是“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蔑刘志丹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敌人乘机大举进攻，陕甘根据地日益缩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和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的群众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我被扣押了。起初关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人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人大搞逼供信，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看守人员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西北革命根据地》中习仲勋著《红日照陕甘》第415-416页。

赵启民回忆“肃反”：

——我当时任七十八师参谋主任，是杨森离开的第二天以开作战会议为名骗到军团部被捕的。我走进军团部被引进一个窑洞里时，突

然上来几个人缴了我的枪，接着搜身，并戴上一个布筒式的面罩（一个布套，只有两个眼睛洞），被送到另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窑洞。我一脚踩到高锦纯的身上（骑兵团政委）。他问了一声：“谁呀？”我说：“锦纯你早来了。”他说：“我也才来不久”。八十一师参谋主任任浪花赶紧说：“快坐下！不要说话。”因这几句对话，我们被抽了一顿鞭子，我才知道不准互相说话的“规矩”。我同高锦纯、任浪花由洛河川被押送到瓦窑堡途中，既不准我们互相讲话，更不准我们同群众讲话。押送的同志骂我们是“右派”、“反革命”。从骂声中才知道我们的“罪名”。他们对群众说我们是东北军的军官，我们穿的衣服是劳山战斗缴获东北军的军服（西北红军是缴获到什么就穿什么），头上戴的布筒式的面罩，群众真的把我们当成东北军军官看待，不时还有人向我们做宣传工作，搞得我们啼笑皆非。到了瓦窑堡关在监狱里，看管之严厉难以用笔墨形容，连站起来伸伸腰、睡觉时翻个身都要报告，否则就是一顿毒打，诬你“要逃跑”。至于审讯时的肉刑就更残酷了。当然这些责任不应归罪于看押的执行人员，这只能说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者在当时是何等的紧张和恐惧了。

肃反造成严重危机，不少地方干部不敢见省委的人，听说省委来，人就上山“打游击”，群众也跟着“跑反”。各处谣言四起，西北红军军心动荡。这个部队以前是没有开小差的，肃反的情况传开后，不仅战士跑，干部中也有开小差的，游击队有“反水”的。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西北革命根据地》中赵启民著《党中央毛主席纠正错误肃反》第423-424页。

张策回忆“肃反”：

——大约在午夜十二点，他们把那一伙人处理完毕了，就来逮捕我。李景林在外面喊：“老张在哪里？起来开会！”我立刻答应说：“在这里。”紧接着朱仰修进来了，他带了五、六个全副武装的战士，一下拥进我住的窑洞，先给我头上套了一个布口袋，把整个头严严实实地包了起来，然后用麻绳大捆大绑。

他们押着我过了洛河，把我送进一个关着十几个人的房间。因为房子很暗，我一下子还弄不清都是什么人，倒是有人先认出了我，说：“你怎么也给捕起来了呢？”仔细一看，原来就是我们刚刚开会欢迎的那些人。说到这里，不能不让人深感荒唐，这些人连人带枪前来投降我们，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应该消灭，如此对待他们，以后谁还敢来投降呢？另外，既然要消灭他们，就不应该开欢迎会，这样的做法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被捕的第二天下午，我就同这些人一起被押送到十五军团军团部所在地王家坪。令人担心的事终于在当天深夜发生了。第一次把五、六人押往相邻的窑洞里，大概是又脱衣服又捆绑，弄得声音很大，关在和我同一窑洞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其中一个拚命地向外冲，一下子抱住站在我旁边的站岗的，站岗的一喊，外面立即进来几个战士，朝那个人的头捅了几刺刀，那个人倒下去了，然后又拉到门外用大刀砍了。不一会儿，窑洞里就剩下我和任浪华。我被绑住两手，躺在锅台上，两手疼痛难忍。一个战士拿着手电筒照着我问：“你是什么人？”我说：“是苏维埃政府干部。”他一听就作罢了。过了两天，我就与高岗、黄罗斌、郭宝珊、任浪华、朱奎、孔令甫等十余名同志被押往瓦窑堡保卫局的监狱，沿途向群众宣传，说我们是被俘的白军军官。

保卫局的监狱设在瓦窑堡汇川通商号的一个四合院内，每间小房子都关着十几个人。每个人都带着脚镣，并有绳子捆着。当时天寒地冻，气温在摄氏零下二十多度，但地上仅放些谷草，无铺无盖，大多数人冻得睡不着觉。吃不饱不算，水也喝不上，病了也只好挺着。有个同志拉肚子，要去厕所也不允许，只好拉在睡觉的地方，弄得房子里气味难忍。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保卫局长戴季英多次提着鞭子毒打张庆孚同志（解放后担任过林业部副部长）。一次因套在我脖子上的绳子长满了虱子，我拿下来捉一捉虱子，不料被站岗的发现了，用刀背狠狠地砸了我一顿，打时还说：“我打你就和打蒋介石一样。”天越冷，人的小便越多，又不准出去，只好尿在自己身边的铺草中，

有的尿在自己吃饭的碗里，早晨放风时倒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监狱的后院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随时都可以无声无息地把我们这批人埋掉。引自改革出版社出版张策著《我的历史回顾》第61页。

——黄罗斌回忆“肃反”入狱始末：

记得中秋节前后，我俩从下寺湾动身，一天赶到安塞县城。晚上，我们正准备休息，突然闯进来几个人，我们的警卫员立即起而反抗，忽然发现他们都是军团部的警卫人员，过去我们彼此经常见面。他们不由分说，立即缴了我们的枪，并把我和杨森五花大绑，倒吊在房梁上。便命我们的警卫员携带马匹自行归队。次日，我们就被套上了人无法辨认的黑帽子，用麻绳拴住手臂连成一串，被牵着上路了。当晚到达蟠龙镇。第三天从蟠龙出发到达瓦窑堡，随即就关进了监狱。

在那“左”倾机会主义者设置的“红军牢笼”中，我们尝尽了人间非人的待遇。我们这些为革命忠心赤胆，在对敌斗争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勇士们，顷刻间变成了“罪犯”。伴之而来的是大声的斥责、严酷的逼供信和劈头盖脸的棍棒和皮鞭。随着“肃反”运动在前线和后方的全面展开，瓦窑堡的恐怖气氛也越来越浓，一批批革命干部陆续被捕入狱。在监狱中，我陆续见到了习仲勋、秦武山、刘景范、孔令甫、朱奎、郭宝珊、任浪花以及高岗等人。但始终未见刘志丹同志，后来听说他单独关在另一个地方。4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肃反”时期的悲惨境遇和非人的生活，都使我有一种悲愤交加和声泪俱下的情感。

我们被捕后，就与外界彻底隔绝了。与我关在一起的同志，虽然每天都可以见面（每天有两次“放风”时间），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接触和说话的权利。彼此见面只能微微地点点头，或者用无声的眼光互致问候，交流情感。在那冷风刺骨的日日夜夜里，我们穿着单薄的衣服，整日被捆绑着手脚。躺在彼此用石头砌成的隔墙的小巷中。我曾经抱着必死的念头，想了很多。回顾自己参加革命后走过的路径，有些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为什么革命队伍中这样残酷地对待自己的

同志?为什么投身革命出生入死,到头来竟变成了“反革命”而遭这样的厄运?我们究竟错在何处?甚至产生了“若能幸免,回家种田”的念头。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西北革命根据地》黄罗斌著《在肃反中的遭遇》第427-428页。

张秀山回忆:

——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震西直到死,也没有低头,没有诬陷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义勇军首领郭宝珊被审讯时反问:刘志丹是什么派?审讯者说:刘志丹是右派!郭宝珊坚定地回答: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86页。

逮捕刘志丹的经过就更富有戏剧性。

其时,刘志丹从敌人电文中得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已抵达甘宁。立即建议徐海东向庆阳、环县一带出击,迎接中央红军。徐海东将这一行动报告省委后,省委紧急来信。严令停止西行,并要前方立即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大家感到事关重大,未敢马上执行,以防肘变。后来,执“左”路线的人,又采取将刘、高分而治之的办法,急调刘志丹回后方主持军事工作,将刘、高分开,在前方逮捕高岗,后方逮捕刘志丹。

陕北10月的一天,刘志丹正和前线将士研究作战行动,突然接到要他去瓦窑堡的通知。他将战事逐一安排完毕后,就带着通讯员飞身上马,直奔瓦窑堡而来。

1935年的一个秋日,刘志丹纵马急驰。

当行至安塞县高桥川时,突然迎面一匹战马飞奔而来,打断了他的沉思。

马到跟前,来人翻身下马,向刘志丹敬过礼,便拿出一封信递上去,说:“这是给军团部的急件。”

刘志丹打开一看，原来是保卫局决定逮捕他的命令和一张名单，第一名就是他。刘志丹倏然一惊，思忖道：“怎么？他们要对我下手了？”

随即又冷静下来，将信塞进信封，封好，用手压了压，递给送信的同志，勉强的笑着说：“这是给军团部的，你送到军团部吧，就说我到瓦窑堡去了。”

等送信人策马远去后，刘志丹勒着马缰缓行了几步，转过头对通信员说：“我看你也回前线去吧，不必跟我去！”

通信员看着刘志丹紧锁的眉头和深邃的目光，知道情况有变化，就说：“那你一个人怎么去呢？”

刘志丹说：“多少次走南闯北，都是我一个人，怎么去不成？”说到这里，他又勉强一笑说：“你放心回去吧，跟上我没有什么好处。你回去后，告诉大家，一定要搞好和 25 军的团结，坚决服从徐海东军团长的领导，全力粉碎敌人的‘围剿’，千万要顾全大局，不能闹分裂。”

通信员望着神色凝重的刘志丹，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大事，不禁流下了眼泪，哽咽地说：“首长，你……不能一个人去！”

“要我开会，不去怎么行？”

“那我也跟你去！”

“不用去了，回去吧！回去狠狠打击进犯的敌人，保卫根据地。中央红军快上来了，我已派人到甘肃一带去接头，中央红军一来，形势就会好转。”刘志丹远眺西天无限深情地说。

通信员带着哭腔道：“不管有什么情况，回去跟同志们商量一下再去吧！”

“不用商量，你快回部队去。”刘志丹态度果敢地说，飞身跃马，向瓦窑堡疾驰而去。

通信员哭着追上去，“说什么我也得跟着你去……”

左倾分子原打算以调刘志丹回瓦窑堡主持后方军事为名，逮捕刘志丹，后又觉得在瓦窑堡逮捕影响太大，怕引起民愤，就下令给红15军团保卫处让他们在前线把刘志丹逮捕起来。可是，送信的人却不知道是逮捕刘志丹的命令，就把信送给刘志丹。

刘志丹的心里如同大海的怒涛，在翻滚激荡。此时，如果能像通信员说的那样，回去商量一下，形势一定会起变化，自己完全可避免被捕。但是，他考虑到党的利益，考虑到红军的团结，考虑到根据地军民反“围剿”的胜败和根据地存亡的大事，更不能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便不顾个人的安危，只带着一个通信员到了瓦窑堡。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二，对党的赤胆忠心。

刘志丹一到瓦窑堡，使推行“左”倾路线的那几个人十分惊慌，他们立即布置，四下出动，严密封锁刘志丹到瓦窑堡的消息。

刘志丹到了瓦窑堡后，面对随时被捕的危险，镇定自若，与“左”倾错误作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要那几个推行“左”倾路线的人立即改变他们的错误决定，停止肃反运动，并要求在击溃南线的敌军之后，西出环庆，打开通路，迎接中央红军。

后在“左”倾路线统治下，刘志丹被逮捕，备受折磨，撤销了刘志丹的一切职务，将刘志丹押进监狱，准备杀害。他们还怕刘志丹在瓦窑堡被捕的消息被群众知道，将刘志丹的战马也关了起来。

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无视刘志丹的赤胆忠心和大义凛然的行为，竟然信口雌黄说：“刘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并进一步错误地断定刘志丹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诬陷刘志丹率领红军打开县城消灭白军，纯系反革命欺骗群众的“花招”。

刘志丹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陕甘革命根据地，人们无不震惊，都纷纷要求去找“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当面讲理，要求去看望刘志丹。根据地的军民，对于那几个人混淆是非，倒行逆施，颠倒敌我，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人们都说：“老刘自

参加革命以来，东杀西战，领着大家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苦人民谋利益，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恨透了他，抄了他的家，挖了他的祖坟，并且到处悬赏捉拿他……这样的人怎么是‘反革命’呢？不行，我们得找那些扣押老刘的人去讲理，看到底谁是反革命！”人们不顾“左”倾错误执行者的多次禁令，纷纷来到瓦窑堡，要求看望自己的亲人刘志丹。人们都担心刘志丹的安全啊！

许多和刘志丹一起南征北战的红军干部，各县的军事部长，他们想念着刘志丹，担心着老刘的安全。他们不顾那几个人的禁令，赶到瓦窑堡，要求看望刘志丹。但是，那几个人不允许。见不到刘志丹，这些干部就不回去。不几天工夫，在瓦窑堡就聚集了几百名红军干部和各县的军事部长，他们开会联名上书，要求见刘志丹。那几个人看着愤怒的人们，很是害怕，怕闹出乱子来，只得从牢房里放出刘志丹接见他们。

一天早饭后，300多名红军干部排着队来到瓦窑堡城内的米粮山下，静静地等待着。不一会儿，刘志丹从山坡上的一孔土窑洞里出来了，他走到硷畔上，向山坡下的人群亲切地招着手，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一切都好，你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加强红军内部的团结，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用战斗的胜利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我们内部的事情，不要着急，中央来了就会得到解决的……”

大家听着刘志丹的话，都激动得流下热泪，都为刘志丹坚强的党性和无限忠诚革命的坚定信念所感动。人们都说：“老刘的党性坚如钢，度量如海。他站得高看得远，处处想的是党的事业啊！”

### 第十三章 三军会陕北

(1)

1933年夏，刘志丹率红26军南下，兵败终南山的时候，南方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在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干扰下遭到挫折。1933年夏，蒋介石分别对鄂豫皖、湘鄂西洪湖苏区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反革命“围剿”，鄂豫皖、湘鄂西洪湖的反“围剿”斗争失利，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被迫向川陕边的湘鄂川黔边转移。1933年10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历时一年的反“围剿”作战中，损失惨重，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之途，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会师。6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在何处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的战略方针》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新的根据地的选择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广，好机动；（二）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三）经济条件较好。结论是应该去“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会议通过了这个战略方针。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28日）第十册第516页。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已经约略了解到陕甘边红军及苏区的一点消息，并且在关注着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在长征过草地之前，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6日在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就曾提到，由于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sup>③</sup>引自《六大以来》上册第670页。《决议》还指出，为了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在“红军到达陕北后，则须更大地建

立与加强当地的工作。”<sup>③</sup>

当然这里所讲的“红军到达陕北后”，并不是指红军的落脚点已经放在陕北，而是为了达到开辟川陕甘苏区这一总的战略目的所采取的一个具体的行动方针。对此，中共中央在8月20日召开的毛儿盖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中讲得很清楚，如说：“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并给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与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之苏区及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为中国西北部以及全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红军到达陕北的目的，是为了将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苏区与川陕边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和通南巴游击队的活动联系起来，重点还是要创造川陕甘苏区。

中共中央在过草地前已经对陕甘边红军和苏区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但掌握的情况比较粗略陈旧。例如中共中央在沙窝会议决议中提到的发展活跃的陕南红二十九军就早已在两年前全军覆没，此时根本不复存在。由于消息的长期隔绝，此时在中央领导层的认识上，陕甘边红二十六军还仅仅像其他北方地区红军一样弱小、无法单纯担负开创长征落脚点的艰巨任务。因此，党中央还无法把陕甘边红二十六军、陕北红二十七军已经单独开创的广大的陕甘根据地作为长征的落脚点。

1935年9月，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关于北上开辟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逃跑，党中央毅然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点名批评张国焘分裂红军、退却逃跑的反党错误的同时，着重研究和讨论了北上红军的落脚点问题。会议决定放弃开辟川陕甘苏区的计划，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先去陇东或陕北会合红二十六军，随后以游击战争去打通国际路线，到苏联边界去。从俄界会议通过的决定中明显可以看出，此时党中央还是没有得到有关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发展的最新消息，不知道一个地域辽阔的广大的红色区域已经

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认为单凭中央红军一、三军团的力量创造陕甘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的中心，可能性较小，因而决定以游击战争的方式打到苏联边界去。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组成的陕甘支队继续北上。9月17日，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9月21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此时，毛泽东中央军委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中了解到一些陕甘边、陕北苏区和红军发展的新消息，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使中共领导层十分振奋，这促使中共中央下决心进一步研究和了解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新情况，因而对于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到苏联边界去的决定，对于形成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策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9月22日，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在哈达铺关帝庙举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领导人到会。毛泽东在会上大略地讲述了长征的经过。同时又说：“以前有不少同志问过我，我们走到哪里是个头？现在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条长征之路的尽头现在已经看见了，那就是陕北……”

毛泽东在结束讲话时说：“同志们，当前民族危机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一块不小的根据地。从现在这里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最后，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改编部队决定，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

会议上响起“到陕甘根据地去”“与刘志丹会合”的口号。

27日红军抵达榜罗镇，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负责人第一次从报上得知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以及其后日益恶化的华北形势，同时，也得到了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合的具体

情况。当晚，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战略方针。分析了报上提供的材料后，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方针，迅速赶往陕北苏区，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把陕北作为抗日根据地和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这次会议所作的重大决策，不仅为红军找到了一个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同时也确立了领导全国革命的根据地，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9月28日清晨五时，在榜罗镇一个空旷的打麦场上，召开整个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天下着濛濛细雨，身穿破衣单衫的红军干部们在露天场地里冷得抖抖索索，于是便紧紧偎着地上的麦草，增加温度。毛泽东在雨中主要讲了五个问题：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近况；三、陕北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要避免同国民党政府军作战，要迅速到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部队，吸收新战士。

他还说：“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同志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

1935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刊物《前进》第三期在榜罗镇出版，这期刊物上发表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文章《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中摘引了大量敌人报纸中所登载的有关陕甘苏区及红军最新动态。在关于西北红军的实力情况方面，张闻天摘录了的敌人报纸中有如下披露：

天津反动的《大公报》曾经这样的讲到陕西苏维埃革命运动。“徐向前朱毛之趋向，尚不尽明，今姑暂不论之，而专就陕事一言。第一，国人应注意者，现在不独陕北有匪，陕南亦然。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迄未扑灭，故论陕乱，不能专看北部。第二，过去所谓陕北，系指归榆林、绥德、延安属，近则韩城一带亦见匪踪，是由陕北而关中

矣。第三，就陕北言，兵队确不为多，就全陕论，则目下集中之军队，殆不下 10 师以上，而匪方总数，通南北计之，有械者当不过万余。由第一、二两点，可知陕乱之轮廓，由第三点，可知迄今为止，军事效率之不良，证明此后应努力之点，不仅军事上的问题而已也。”

“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确甚于陕南。陕南匪区小，为时亦暂，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之根据地故也。大体言之，陕北 23 县中，近唯井岳秀师担之归榆林府属 5 县及米脂县情形较安。绥德以南迄延安鄜州一带，七、八百里间，路早不通，多不可问。近月陷城之县有 6，即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高桂滋师驻绥德，目下可维持两、三县，余不可及。近时最危者，为延安城之运命，驻有井、高两师部队，已月余不通音耗，延安以南，情况更不可知，要之纵横数百里间，殆尽成赤化，较之赣事紧急时，其区域之广大相若。”引自 1935 年 7 月 29 日《大公报》社论《论陕乱》。

山西老军阀阎锡山于 7 月 20 日在绥靖公署及省府纪念周报告上也说：“陕北共匪甚为猖獗。全陕北 23 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 8 县，半赤化者 10 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 70 余万，编为赤卫队者 20 余万，赤军者 2 万。”引自 1935 年 7 月 23 日《大公报》。

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则说：“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其枪有万余。匪军长刘志丹辖 3 师，为匪主力部队，其下尚有 14 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则甚多，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 5 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靖边一度陷落，顷已收复。本自去岁开到陕北接防担任剿匪后，与匪大小战不下百余次，其后因扰乱绥远之杨猴小匪部窜至陕境，本人抽兵前往堵剿，同时冯钦哉部又调至陕南镇慑，以防范徐海东匪部，官兵之力量薄弱，匪军之防地乃愈扩大。当时所被占有 10 县之地，防线延长，交通不便，如是剿匪更为不易，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 20 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引自 1935 年 8 月 1 日《大公报》。

关于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该报同日有这样的记载：

“徐海东于7月中旬率悍匪3000余众，由商县雒南、镇安、柞水等县突围而去，是役追击徐匪之警备第一旅唐嗣桐旅有两团覆灭，唐旅长被俘，终以身殉。其后匪部即过兰田，出洛南山口，窜长安县境之引驾回镇，另有一股由子午口窜出，两地距省城均四、五十里之谱。”

据我们所知道的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二十五军以前曾占领甘南之两当、徽县，逼近天水，陷秦安，渡渭水，而至陕甘之交，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现在想来已与陕北之二十六军取得了联系。

从反动报纸上来看，甘南之东部也有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尤其在庆阳五属。“该地毗连陕西、宁夏边区，地面辽阔，人烟稀少，山脉起伏，槐林密茂，昔在升平之际，犹复跳梁出没，近年国家多故，共匪仍据险发展其意志。于是时而猖獗，时而敛迹，行动诡秘，声东击西，去冬攻曲子，陷长武，陇东震动。击此则彼窜，击彼则此逃。遇大军则化整为零，隐匿深山，遇小军则啸聚猛扑，施其淫威。”

从各种反动报纸上看来，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这种发展使所有反动统治的领袖张惶失措，拼着性命动员他们所有的力量来同苏维埃与红军做斗争。7月27日起在西安所召集的“西北剿匪会议”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然而一切这些是徒然的，响应着陕甘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活动，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了甘南的重要地区。这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8月20日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补充决定》）这将大大的推动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前进，发动千百万西北劳苦群众为苏维埃革命而斗争。引自张闻天著《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载《前进》第三期1935年9月28日出版。

30日下午，毛泽东在通渭县政府大厅里主持召开了领导干部会，

再次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了部队进入陕北苏区的注意事项。按照毛泽东讲话精神，政治部编写了《会合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在陕北创立根据地讨论大纲》，绘制了《陕甘苏区略图》，积极进行入陕前的动员准备工作。

10月14日至15日，正当陕甘支队即将离开环县的羊肠小道，到达陕西边界的时候，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看到了五个人骑着马朝他们奔驰过来。到了面前，急忙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陈昌奉问他们是谁，其中领头的一个人说：“老刘派我们来给毛泽东递交一封信。他在哪里？”

许多年后，世人才终于知道是刘志丹的胞弟刘景范领着人来给毛泽东送信。毛泽东热情会见了几位代表，然后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红军连队，大声告诉战士：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们即将进入陕北苏区了！

10月中旬，途经陕甘分水岭，毛泽东兴奋地对身边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过走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刘志丹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1935年10月19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

10月20日在吴起镇割尾巴战斗胜利后的第二天，刘志丹的少年同伴、保安游击队队长张明科在吴起镇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后哭着请求他们救救刘志丹……

陕甘边区二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地区和陕北苏区根据地的一般情况与红军的现状，也汇报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成立红十五军团的情况，同时还介绍了苏区周围的敌人态势。

毛泽东在获悉情况后，觉得事态非常严重，他忙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一起商量。

毛泽东说：“刘志丹被捕，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大部被抓，这是一个紧急情况，会影响到整个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队伍的。”

此外，龚逢春还向毛泽东汇报了当时陕北肃反的情况和刘志丹被捕的问题。他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意见，他认为刘志丹等同志不应逮捕，他说他的看法是，刘志丹等同志不是反革命。毛泽东非常关心陕北的肃反问题。

毛泽东曾亲切地对他说，中央红军和中央到了陕北以后，陕北的肃反问题，刘志丹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解决。周恩来接着说：“我刚才找几位地方同志了解情况，感到大家对刘志丹被抓情绪很大。国民党正对陕北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这么大的事，搞不好，会失去群众。”

张闻天忧虑地说：“刘志丹从 1925 年闹革命开始，领导陕北十年，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这件事的处理一定要慎重。”

毛泽东一边听大家议论，一边吐着烟雾沉思。这时，他站起来，决断地说：“事不宜迟，派上几个人，立即出发，寻找刘志丹！”

毛泽东“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刀下留人……”的一声断喝赢得了大家的赞成。于是组织部长李维汉、总政破坏部长贾拓夫及王首道、刘向三等人带上电台和一连战士作为先遣队，立即出发奔赴瓦窑堡寻找陕北红军和身陷囹圄的刘志丹……

天津《大公报》的著名记者范长江在毛泽东率陕甘支队进入陕北高原的二十天之后，1935 年 11 月 9 日发表了《刘志丹鼓动与民心背向》——

由于交通之隔塞，政治之黑暗，教育之落后，人民生计之困难，陕北、甘东接境地区之农民，已养成一种反对政府的心理，平日除有提款委员以鞭笞与他们间或相见外，其他可谓与政府无丝毫关系。狡黠者往往利用此种社会背景，啸集山林，一以抵抗官府之无厌征求，再以图一般有为分子之共同出路。故此地带素有绿林豪杰活动之区，驰名中国各省之樊钟秀，与曾在西北盛极一时的陈国璋，皆发祥于此等地区。即刘志丹亦曾在此一带作团旅长等职。不过在刘志丹以前，所有绿林运动，总不外以个人荣达为目的，以义气为互相结合之“水

门町”，尚无大的政治系统为背景，无与社会打成一片之政治组织，无一贯的社会政策，更无所谓政治目标。

然而刘志丹开始活动以后，情势大不相同。刘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他同时受过黄埔时代新的政治训练，并受过共产党组织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同一致的社会运动。他针对着政府的缺点，来宣传组织民众。分大地主的土地与羊子给一般农民，反对捐税，反对派款。因此在消极方面，取消了民众的负担，积极方面增加了民众的所有。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再加以刘志丹之组织，使民众更不得不为之用。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百里以内之民众。

此次毛泽东以不及万人之疲惫的徒步之师，截击与追击之者，不下数万人，如跟踪以入陕北，不但毛泽东一路将散亡大半，即刘志丹之老家，亦将大受影响。然而政府军追过环县以北后，此寥若晨星之民众，皆避不见面，使政府军之饮水粮秣，皆无法解决，道路亦无人引导，陷于进退失据之苦境中。彭德怀于洞悉此种情况后，乃集结其饥疲的红军约五千之众，于陕北边境上作猛烈反攻，追击军乃不得不相继退下，未敢再行深入。此种反攻之动作。或为“老毛不弱”的表示。而其反攻之可能，不能不归功于刘志丹之民众组织基础。

目前国民党政府在陇东北庆阳一带，针对着刘志丹的政治工作，作两种政治设施：第一、在消极方面，澄清吏治；其次、在积极方面，著力于交通、保甲、道路的举办，这是希望配合军队，对赤色运动加以制裁。

在这样闭塞的地方，仍然表示着中国政治的两大分歧：从现状中以求改进，与推翻现状以求进展。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

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引自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姜永明著《铁血岁月——毛泽东与刘志丹》第46—48页。

10月23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陕甘支队经保安县境到达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下寺湾。

10月29日，陕甘支队在下寺湾向红二十五、二十六军致公开信，内容如下：

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英勇的指战员：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经过了2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11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弟兄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

现在，我们已经胜利的完成了党给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到达了陕北苏区，与亲爱的弟兄们会见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任何阻止我们的企图完全失败了。我们久已听到了二十六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在鄂豫皖的英勇斗争和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于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更听到你们在合水会合的消息和夺取清涧、瓦窑〔窑〕堡消灭白军与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些使我们非常喜欢。今天我们来亲自和你们会面，和你们握手，这使我们更加兴奋。亲爱的同志们！记着！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

正因为陕甘革命运动的巨大发展，因为我们的会合震撼了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在准备用新的围剿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有着会合了的力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有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着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必定能够取得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亲爱〔窑〕的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

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联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手牵着手勇敢前进！伟大的胜利在前面。

苏维埃新中国万岁！引自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历史文献中第 295 页和 301 页。

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向甘泉下寺湾进发的时候，派人给徐海东、程子华送去一封信，内容为：

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同志：

你们辛苦啦！感谢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我们久日听到二十六军同志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在鄂豫皖英勇斗争的历史，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了群众对你们的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又听到你们会合后不断取得消灭白军、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使我们非常喜欢。

现在中央红军，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这三支部队会合了。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此致

敬礼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

抗日陕甘支队

司令员彭德怀

政治委员毛泽东

徐海东、程子华和十五军团的将士，传看着这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心头涌起一股暖流。

“毛主席来了！”

“打胜仗迎接中央！”

“打胜仗庆祝会师！”

……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主席聂洪钧关于陕甘根据地和红军情况的汇报。党中央分析了陕北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形势。

毛泽东说：“我们到陕北，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件紧迫的事。一件是要尽快打退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另一件就是要处理好陕甘晋省委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周恩来接上去说：“这两件事都很重要。一件是政治的，一件是军事的，哪一件处理不好，都会影响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落脚点站住脚！”

博古说：“肃反扩大化的事，情况恐怕比较复杂。要认真调查研究。”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不多，但我看这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高，懂很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很有战斗力，我相信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周恩来也说：“这块根据地能够坚持下来，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嘛。”

毛泽东又说：“当然处理这个问题要谨慎，要调查研究。杀人更要慎重。”他停了停，略显沉思，徐徐地吐出一口烟，不知是感慨，还是教训，说：“杀头可不象割韭菜，韭菜割了可以再长起来，人头落地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张闻天提议道：“现在情况紧急，中央是否可以分作两路行动，由主席和恩来各带一路？”

大家不吱声，把目光投向毛泽东。

毛泽东略作思考，说：“分两路行动好。恩来、德怀还是和我一起去对付国民党的‘围剿’；洛甫、博古、少奇同志率中央机关直接去瓦窑堡。”

大家表示同意。最后决定成立五人“党务委员会”，具体负责审查陕甘晋省委的肃反问题。董必武任党务委员会主任，成员有王首道、李维汉、张云逸、郭洪涛，博古代表中央随同前往，会议同时决定王首道和刘向三立即去瓦窑堡，接受陕甘晋省委保卫局的工作。

11月3日，毛泽东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目前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苏维埃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提出的名称问题，此时得到解决。

会议进行人员的分工：决定毛泽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的军事工作，目前先到前方工作。

陕甘支队至此，兵分两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军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洛甫、博古等人率中央机关继续辗转北上进入陕甘晋省委驻地。

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属红一军团（原第一、三军合编为第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命令，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建制。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十五军团；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约有15万人左右。

11月4日，毛泽东随中央直属队路经王坪过洛河从雷花峪翻山在桥庄夜宿。6日陕北大雪，下午2时许，毛泽东率军委直属纵队300余人抵达甘泉县南三十五华里的象鼻子湾。

随后，毛泽东驻宿史家湾，并在道佐铺十五军团司令部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徐、程二人分别向毛泽东汇报了红十五军团的建制和劳山、榆林桥战役等情况。

9日，毛泽东重返象鼻子湾在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包括十五军团干部）上，对长征的意义第三次进行回顾总结，同时具体研究和部署了直罗战役。毛泽东在象鼻子湾的讲话中提到：

……中国革命正在向高潮发展。第一、中国工农红军本身力量是强大的，我们的队伍更加纯洁。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贵州和湖南边界继续和敌人做斗争，他们也要北上和四方面军汇合；红四方面军将来也要北上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陕北已经建立了根据地，有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有在广大敌后坚持斗争的游击队等等。这几支部队互相支援、互相鼓励、遥相呼应，形成在中华大地上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

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我们要接受过去的严重教训，讲求团结。我们中央红军要做出团结的模范行动。只有加强了团结，才能有力量，才能完成党的任务。否则，就会给党和革命带来损失。现在，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闹磨擦，并逮捕了刘志丹等革命领导人。我们要多做工作，要团结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要做团结的模范，团结的核心；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遵守群众纪律。我们要给陕北人民、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送点礼物，打好直罗镇这一仗。我们一定能够取胜。

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会合，给敌人造成巨大威胁。“西北剿总”决定，以五个师的兵力，首先构成沿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郿县与延安之间的联系，构成沿洛河的南北封锁线；尔后采取南进北堵，逐渐向北压缩的方针，妄图消灭红军

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

11月18日，军委会在直罗镇以东的东村召开战略讨论会，毛泽东作了战略方针报告。他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根据上述任务，红军的战略方针应是攻势防御，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出中部、洛川，切断西安至延安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夺占甘泉、延安。

毛泽东又通知团以上干部到张家驿集合，亲自带干部到直罗镇西南面的小山头上察看地形。大家一致认为直罗镇像个口袋，是歼灭敌人的好地方。发现镇东土寨可能被敌人利用，彭德怀便命令徐海东派一个营兵力连夜拆除。

红一军团11月上旬由甘泉以西定边渠、下寺湾先后进至鄜县西北的老人仓、秋林子地区，红十五军团攻占直罗镇以西的张村驿、东村等敌据点，并以一部分兵力加强围攻甘泉以调动敌人东进。当时战役的打法是，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两个师，尔后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打破敌人之“围剿”，并向洛川、中部、宜君、宜川、韩城以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

11月19日，敌五十七军一个师留守太白镇，主力沿葫芦河向直罗镇、鄜县前进，其先头一〇九师进至黑水寺、安家川地区，军部及另两个师进至张家湾东西地区。

毛泽东决定，乘敌先头一〇九师突进的有利时机，首歼该敌于直罗镇。

直罗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南北群山绵延，是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鄜县大道上一个较大的集镇。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谷地，三面环山，仅有一条曲曲小路穿镇而过，地形犹如一个口袋，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

毛泽东身穿两件旧单衣，在寒风凛冽中进至张村驿西端的川口子指挥作战。突然从抓捕的俘虏口中获悉，11月20日清早，东北军五十七军的前锋一〇九师已从黑水寺出发，直扑直罗镇。毛泽东迅速捕

捉战机，当日 10 时许，急令红一军团由北，红十五军团由南迅速进入预定阵地，隐蔽待命，执行“21 日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一师至两师之任务”。

毛泽东作好部署后，从东村下塬到葫芦河川，沿河右岸北上。从北家砭上山，提前进入镇东北吴家台高地一棵粗壮的杜梨树下的指挥所。

果然，飞机声、枪炮声由远而近，在 6 架飞机的掩护下，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指挥六二七、六二六、六二五团于 11 月 20 日闯进直罗镇。

次日拂晓，直罗镇南北山头上，枪炮声如雷贯耳，喊杀声震天动地，红军总攻开始了。

激战三昼夜，打死打伤敌军官兵千余名，生俘 5300 余名，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缴获长短枪 3500 多支，轻机枪 170 多挺，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

毛泽东在繁忙的战争间隙，仍十分关心陕甘根据地的肃反情况。13 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联名致电洛甫、博古，指出：陕北肃反中“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应予以平反”。18 日又给洛甫、博古去电，提出纠正错误肃反中应注意的问题。一方面要纠正错捕，另一方面平反过去错误，要注意影响。

毛泽东时刻牵挂着刘志丹的命运、安危……

在直罗镇战役的祝捷声中，11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东村的天主教堂里，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他说：“如果没有直罗镇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中央领导我们，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2)

1935年冬某日凌晨，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正凑在昏黄如豆的煤油灯下给红军绵针密线地纳军鞋。徐海东的爱人周东屏急促地敲开门走进窑里，凑在她耳边悄悄地说：“刘嫂子，刘志丹军长被拘捕在瓦窑堡了……”

她一闻这消息，心急如焚，气愤地无法用语言表达。连夜草草收拾起针线包袱，背着年仅5岁的女儿贞娃(刘力贞)匆匆赶往瓦窑堡。

瓦窑堡里阴霾密布，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老百姓窃窃私语，认为红军不会抓红军，肯定是有坏人啦！说不定是白军的人……只身救夫的同桂荣刚入城就和女儿被管制起来，当成反革命编到劳改队。她白天干活，晚上以泪洗面，不住地长吁短叹：“这事怎么了结？”

一天，同桂荣母女在牢房外听到拷打人的呻吟声，心如刀搅，五内俱焚，不禁仰天长叹：刘志丹究竟有什么罪？闹革命闹得家破人亡。敌人抄了他的家，掘了他的祖坟，焚尸扬骨。他家的两个男孩，一个因避敌人无奶吃活活饿死在深山野洼，一个着凉发烧，服了从国民党部队俘来的军医的药死了，那个歹毒的军医也偷偷地溜走了，儿子的厄运传到劳山前线，刘志丹把难过咽在肚里，集中精力指挥战斗，取得歼敌一个师的胜利。

一连数日，同桂荣住在沙家巷大院冰锅冷灶，炊烟断绝，寝食难安。好心房东沙家老婆婆，郝明珠姨姨的母亲都悄悄地送来吃食，细声软语劝慰她：老刘要是反革命，怎么会有陕甘根据地？

刘志丹的战友白如冰也抽空来探望同桂荣，并留给她几块大洋补贴家用，安慰她：把心放的宽宽的，想来他们不会杀害老刘，你要保重，照看好孩子……

一次，同桂荣带着女儿上街，迎面过来一队被押着的囚犯，从头

上都戴着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布袋，老百姓看见，都默不作声地瞅着他们，其中有一个囚犯在经过同桂荣母女身边时故意重重地咳嗽了两声，似在向他们打招呼。

有一天，一位姨姨说监狱里站岗的是她亲戚，她已偷偷说好，让同桂荣带上孩子去看看老刘。

同桂荣听后，立即带上女儿去探监，只见院子的牢房窗子全用青砖密封了，仅留一个气眼。里面不断传出剧烈的咳嗽声，贞娃情不自禁地大声喊叫：“爸爸……爸爸……”

哨兵立即过来阻止，让她们赶快离开，同桂荣母女什么也没有见到，只好悻悻离开监狱。

身陷囹圄的刘志丹和战友们在狱中放风时发现，院子四周挖了许多大土坑，大伙都觉得非常蹊跷，就在心里暗自嘀咕：好端端的院子为什么要费心费力挖这么多的大坑……继而大家都默不吭声地打量着对方。

有人情急之中，失声叫到：“挖这些坑，看来是要活埋咱们……”

一语道破天机，刘志丹和他们的战友们不禁心里发噤，环顾壁垒。

毛泽东在直罗大捷之后，迅速折返瓦窑堡，全力以赴投入到解决陕甘根据地“肃反”这一敏感而又非常棘手的政治问题中。

其实早在一月前，王首道、刘向三就受中央指派，提前赶赴瓦窑堡，接收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工作。他一到瓦窑堡就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停止捕人和杀人。

当王首道来到陕甘晋省委保卫局的时候，那位以整人著称的局长立即搬出了一大摞一大摞的案卷，对王首道说：“我们捕人和处决人是很慎重的，这些都是确凿的证据。”

他又拣出一大堆材料，用手夸张地拍了拍，对王首道说：“这些都是刘志丹的材料，说他是右倾，一点也没有过份。”

王首道谨记毛泽东“要慎重处理”的叮咛，并不轻信那些案卷，不理睬保卫局长，只是淡淡地对他说：“你现在先把肃反的所有材料交给我，有事需要找你的时候，我们再派人去叫你。”

保卫局长怏怏不乐地走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调查、核实，在掌握了大量确凿事实之后，王首道当面向保卫局长戴季英提出质询：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

对于这一连串的诘问，保卫局长张口结舌都答不上来。

但他仍顽固地坚持和声称，有案卷、有口供为据。

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他们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地翻阅了那些案卷，发觉其中所列举刘志丹的“罪状”纯属子虚乌有，不能成立。令人难以置信。

——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

——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

——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注意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知名人士等等。

显而易见，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坚持了一条正确的路线。

王首道他们还陆续传讯了几名所谓的在押“犯人”，当这些受难的人知道王首道等人的真实身份后，就敢放胆讲真话了。

王首道他们经过再三审查，证明和发现所谓的“口供”，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的事实，蓄谋离间外，其余都是保卫局长采取高压

政策，进行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

王首道认为，同干部本人谈话，是了解干部的重要途径之一。刘志丹被捕时，保卫局长戴季英连一句辩解的话都没有让他说，就将他关押起来。

王首道等人亲自到狱中访问了刘志丹，并进行了长时间的面谈。

谈话时刘志丹仍然带着手铐，钉着脚镣。因为他是“首犯”，所以看管一直比较严密。

刘志丹得知王首道等人的来意后，仍然不卑不亢地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本人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

刘志丹在“左”倾主义者的残酷迫害下，身陷囹圄，镣铐加身，受尽折磨，仍然不计个人得失、安危，一心想着党的事业。刘志丹狱中的一席话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毛泽东到了瓦窑堡后，就和周恩来副主席听取了王首道等人关于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气愤地说：“逮捕刘志丹等人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周恩来不顾旅途征战的劳累，亲自带人到阴暗潮湿的监狱中给他打开脚镣，接他出狱。

周恩来在狱中见到刘志丹第一句话就说：“你受苦了，我们感谢你创建了这一块根据地，使中央有了落脚地。‘左’倾分子把全国其它地方的根据地都搞光了，还杀害了许多好同志。现在有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纠正‘左倾’，形势好了。”

刘志丹感喟地说：“中央不来，我们就见不上面了。感谢中央救了我。”

周副主席说：“是互救嘛！”说着他伸手要扶刘志丹挪动。

刘志丹说：“我能走，这不过吃了一点小亏。你在黄埔讲的话，我还记着：革命军人要经得起各种严峻的考验。”

周恩来副主席肯定地说：“你在陕甘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很有创造性。你时时受‘左’倾分子的打击，这次差点被杀头，但你总是忍辱负重，赤心一片，这甚至感动了一些斗过你的人，这一点很了不起……”

1935年岁尾的一天，瓦窑堡第二高等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几盆木炭火燃得正旺，党中央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正在举行。

这是一个党中央为陕北同志，为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专门召开的平反会议。

一排学生课桌拼起来放在屋子的正中，算是主席位，下面坐着一些被释放的人。会议由党的总书记张闻天亲自主持，博古、董必武、邓发、李维汉、张浩、贾拓夫、王首道、朱理治、郭洪涛、王达成、聂洪钧、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戴季英等参加会议。

张闻天首先讲话，说：“中央召开的这次活动分子会议，主要是解决原陕甘晋省委错误肃反问题。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现在请王首道同志把情况给大家讲一讲。”

张闻天说完，王首道不慌不忙地把手里的几张纸齐了齐，开始介绍错误肃反的经过和处理意见，他讲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大家听得十分认真，连咳嗽声都压得很低，几乎听不到音响。

王首道讲完，张闻天又对陕甘晋保卫局长戴季英说：“请你也谈谈你的意见和对错误的认识。”

保卫局长戴季英开始讲话。他说，他是依据证据办案的，刘志丹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他的材料足以说明问题……

戴季英顽固恶劣的态度，使会场引起不小的骚动，引起被平反人的极大愤慨，杨琪、杨森等纷纷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诉说自己和战友们所受的残酷迫害，说着说着语不成声，身体急剧地抽搐，嚤嚤痛

哭了起来。于是被平反的同志都流下了悲伤的眼泪，会场一片哭泣之声，气氛十分凝重，会议已经进行不下去了……

这时，刘志丹站起来发言，监狱生活使他更加消瘦清癯，头发很长。

大家见刘志丹要说话，这才停止了哭泣和说话声。

刘志丹说：“同志们，我们虽然受了委屈，但现在党中央到了陕北，正确处理了这件事情，弄清了问题，在今天这个会议上，我们要感谢党中央，我们应该高兴；现在中央到了陕北，要领导全国革命，我们要顾全大局，过去了的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处理决定……”

刘志丹的话讲完后，会场上的气氛才又安定下来。中央领导也都对刘志丹的觉悟和胸怀表示赞许。

张闻天又让保卫局长戴季英接着讲，如果态度不好，只能讲3分钟。

戴季英仍然坚持他的观点，死不认错。董必武、邓发、李维汉等立即高声叫道：“停止你的发言。”“让别的同志讲。”

会议继续进行。朱理治、郭洪涛等发了言，最后宣布了冤案的处理决定。

为了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戴季英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戴季英一再狡辩。

周恩来声色俱厉地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那是1935年隆冬的一个黑漆漆的深夜，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搂着年仅5岁的女儿贞娃，孤寂的蜷曲在瓦窑堡沙家巷一间冰冷的平房里。没有褥子，也没有枕头，母女俩躺在光席子上，盖着一块薄薄的

被子。

这已经比前些日子好多了。

她隐隐地听说刘志丹被党中央从狱中救出。她们娘儿俩也离开了管制队，可以自由行走，单另住宿，而且还多了一床薄被……

街上的狗突然“狺狺”地吠了起来。

女儿贞娃怕得将她娘抱得很紧，同桂荣的心“扑扑”直跳……

忽然间，手电的光在窗子上闪了几下，接着有人“笃笃……”地敲门。

哎，又出了什么事？同桂荣用颤动的手指将灯点亮，下炕去开门。

“啊——”她吃惊地半天合不拢大张着的嘴巴。

敲门人竟然是自己日思夜想的丈夫。

刘志丹回来了，带着累累狱伤出现在同桂荣母女面前。

女儿看见久别的父亲，一下子扑到刘志丹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并泣不成声地说：“爸爸，蛮娃吃药毒死了……我想弟弟呀！”

妻子同桂荣也禁不住内心悲伤，失声痛哭起来。

刘志丹坚毅地站在那里，一手抱着女儿，一手紧抓着炕棱，豆大的泪珠簌簌落下，顺着消瘦的面颊滴落在女儿稚嫩的脸上。

看着他像铁人一般擦干了泪水直直站立在脚地上，她才发现他满身伤痕，青中带紫，紫中泛青，脚腕被沉重的铁镣磨烂，伤至筋骨，两只袜子被磨成四节；手腕也被手镣磨烂；审讯时用细绳把两个大拇指勒得露出骨头……同桂荣再看看病中的爱女，想起自己早夭的两个儿子，不禁嚎啕大哭，两腿发软，一下跌倒在灶火圪。

刘志丹不顾狱中伤痛，急忙抢步上前把她扶上炕，并轻轻地给妻子拭泪。

同桂荣带着哭腔咒骂“左”倾分子太惨酷无情。

刘志丹一边耐心地劝慰妻子，一边说夜里哭外面有人听见影响不好。

他宽容地说这毕竟是党内矛盾，是内部问题，不是敌我矛盾。

同桂荣忿忿不平地说：“不是敌我矛盾，还把好人朝死处整哩，已经活埋和枪杀了一百多革命的同志！你有军队有刀有枪，为什么不和他们斗争！”

刘志丹心里倏的一惊，忙伸手按住妻子的嘴，神情严峻地说：“怎么能这样说。这是党内问题。我们红军不能自相残杀，我在劳山战斗中，从俘虏兵手中的敌人报纸上，获悉中央红军已到达甘肃境地。如果干起来，陕北这块革命根据地就完了，中央来了，我怎给领导交待，能说清楚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那你为甚不跑，偏来瓦窑堡，你坐牢不说，连你骑的马也关在牢院马棚里，我和贞娃夜里溜出管制房，偷偷蹲在牢外墙下，隐约听到你在里面惨受折磨的痛苦呻吟，受了那么大的劫难。”同桂荣流着泪说。

“坐牢毕竟是暂时的，痛苦都已经过去。你看党中央不是把我救出来了嘛！咱的红军不是还在吗？当时情况复杂，假如我带大队兵马离开，风声一漏，军心就会大乱。如果在军团部逮我，警卫员就会动武。所以我一人骑马离开部队来瓦窑堡与他们进行说理斗争。这就避免了党和军队的分裂，没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

刘志丹表情冷峻地说：“桂荣，你要想开些，干革命要舍得一切，要豁出自己的生命，包括亲人在内。只有站起来英勇奋斗，彻底消灭反动派，才能有我们的自由和幸福……”

刘志丹出狱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专门安排了接见。

那天，当刘志丹得信赶到毛泽东住处时，四周山野上正飘着雪花，但周恩来已在大门口等了多时。一见面，周恩来立即大步迎上去，紧紧握住刘志丹的手，长髯飘动，亲切地说：“呵，志丹同志，中央来晚了，陕北同志受苦了。”

刘志丹被周恩来的热情感动的双手颤动，他久久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您的学生，您还带我们打过仗。”

周恩来眨着湿润的眼睛，说：“我们是战友，你在陕北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你们工作的成绩很大，毛主席一到陕北就称赞过了你们。”

刘志丹跟着周恩来走进毛泽东住的砖窑院时，并不径直进屋，在门口叫道：“志丹同志来了。”

毛泽东已笑咪咪地迈大步从窑里走了出来，身着朴素的灰布军装，睿智的眼睛炯炯有神。周恩来紧走一步上前，指着毛泽东对刘志丹说：“这是毛主席！”

刘志丹向前走了一步，立正给毛泽东敬了军礼，说：“毛主席，您好！”毛泽东一把抓住刘志丹的手说：“我是来投奔你的呀！”

刘志丹忙说：“是你救了我。”毛泽东看着周恩来哈哈大笑说：“共产党里怪事不少，主人反被客人关起来了，歪人当道，好人受气呀！”

刘志丹看着毛泽东高大英武的身体，坚毅深邃的目光，打心眼里产生了对毛泽东信赖的感情。他激动地说：“主席，我们很久就盼望你，终于在陕北根据地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盼来了主席和党中央。是党中央和主席救了我们，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说：“是你们创造和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有了落脚点。不然的话，我们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落脚哩！”

他看着刘志丹瘦消单薄的身体，说：“冷吧！快回窑里坐，里面

有火。”

回到窑洞里，毛泽东让刘志丹和周恩来落座后，看着刘志丹诙谐地说：“刘志丹同志，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是一种考验，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休息嘛！”毛泽东用他所独有的思维方式，对问题进行阐发。

刘志丹也笑着说：“主席，我1931年已坐了一回国民党的牢，对我来说，坐牢不算什么。”

周恩来一面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一面风趣地说：“‘左’字号的监狱也厉害得很口罗！”三人都会心地笑了。

刘志丹释怀地说：“也没什么，我不是还好好的吗！”

周恩来指着刘志丹脚腕上因长时间戴脚镣而烙下的深深印痕，体贴地说：“还是吃了点亏。”

刘志丹望着毛泽东、周恩来因为经过长途行军跋涉加上工作繁忙，身子骨都很枯瘦，十分关心地说：“我挺好的。主席、副主席的身体都吃了很大亏，陕北的条件不好，而且又冷，真担心……”

毛泽东插话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嘛。”他扳起手指说：“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毛泽东说着，顺手去口袋里摸烟。

“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也好，闹革命是个好地方。”周恩来接着说。

刘志丹又说：“我们做的事太少了，开始走了不少弯路，失败了许多次，在有了许多教训的基础上，才做得好一些。”

接着，毛泽东、周恩来又详细询问了陕北工作的情况。刘志丹一一作了细致的汇报。

毛泽东赞许地说：“我正起草一个《告陕甘苏区工农书》，准备用你、我和彭德怀的名义发表。”

刘志丹点点头。毛泽东又说：“你创建陕甘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法子，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刘志丹说：“我们走的是井冈山道路。”

毛泽东深思远虑地说：“陕北穷苦偏僻，敌人看不上，是革命者用武之地；但最关键的是要取得人民的信任，我一到陕北就从群众口中知道你是他们敬爱的领袖。”

志丹忙说：“这我可不敢当，我只是人民的儿子。”

毛泽东还说：“今后的工作我还要多听听你的意见哩。”

刘志丹态度坚决地说：“中央来了，我们坚决听中央的，以后的事情就更好办了。”

临别时，周恩来对刘志丹说：“中央军委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地方，你搬过来住，还是先休息休息。”

毛泽东也说：“对，你先休息休息。”

刘志丹说：“不用了，我马上要工作。”他依依不舍地再一次握住毛泽东那温暖的大手，向毛泽东告别。临出门时，他才发现毛泽东脚上竟穿着一双单薄的布鞋，心里不禁感叹道：“毛主席啊，你为中国的革命，真是受尽了千辛万苦呀！”

走出毛泽东住的破窑院，刘志丹神情一振，觉得全身充满了神奇的力量，毛泽东、周恩来的音容笑貌在他的心头不断浮现。

1935年11月26日，中央作出的《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讲道：西北局详细的审查了陕甘区域内张慕陶反革命派案件之后，指出：

一、过去陕甘苏区存在着以黄子文、蔡子伟为首的反革命小组（他是直接受反革命的张慕陶指使的），假借着党与苏维埃公开的名义，戴着“红帽子”混入边区南区苏维埃政权和某些红色武装部队中，一方面夺取党与政权的领导机关，公开散布右派取消主义的主张和影响；

另一方面秘密的进行挑拨离间与一切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造成边区党与陕北党的对立，红 25 军与 26、27 军的猜疑，来破坏党的一致与削弱和瓦解革命力量的团结；尤其是利用党内存在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做他们的帮手，实行压制群众斗争，阻止分配土地，破坏扩大红军，取消党的领导，从各方面有计划的曲解党的路线，破坏苏维埃各种基本的政策与法令的执行，以致造成边区南区工作中严重的现象。

二、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 26 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不仅使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不能顺利的开展起来，反而混淆了斗争的目标，分散了斗争的力量；而肃反机关之薄弱，工作中之疏忽与粗鲁，轻信犯人的口供，更使情况恶化，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

三、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从各方面开展与右派和一切反革命的斗争，目前具体的工作应该是：

1 继续开展与深入反右派与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的思想斗争，在广大群众面前揭破他们的欺骗阴谋和散布在党内外的影响，组织群众的公审大会发动群众的斗争，提高群众反对反革命的仇恨，发扬群众的阶级警觉性与积极性。在这一群众动员的基础上，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最后的消灭右派与一切反动政治派别。

2 立即改组过去省保卫局，纠正肃反工作中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加强党对保卫局的领导，健全保卫局的组织与工作，调选政治立场坚定的从群众斗争中出来的干部，担任保卫局的负责工作。保卫局委员会须有同级党的书记政府的党团书记参加，这个委员会要经常检查与讨论保卫局工作，保障肃反工作中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的

执行。

3 深入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消灭一切反动政治派别的基础，这是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最基本方法。除保卫局应充分发扬与反革命斗争的作用外，党、团、政府、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都要加紧与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斗争，这种斗争应该同彻底分配土地、扩大红军、整理地方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等巩固与扩大苏区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

4 为着保障党的路线正确的执行，必须继续开展与深入两条战线斗争。为了团结反右倾的取消主义斗争的火力，必须不放松对左右倾向的斗争。思想斗争中的平均主义，把每个同志各种轻重不同的错误都认为右倾取消主义的倾向，应该立刻纠正。同时对于一切自由主义调和主义和地方观念，也必须予以打击。只有不调和的与一切不正确的倾向作斗争，才能集中斗争力量来顺利的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肃清反革命派在我们队伍中的一切影响。引自 1921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第 372—373 页。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认为这个错误肃反处理结论对初到陕北的中央来说，也许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尽管戴季英、聂洪均等受到处理，本人也勉强作了检查。但对“左”倾错误没有进行清算，陕甘边苏区的一大批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的干部的工作分配办法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

历史的老人最清楚地记得，对 1935 年错误肃反处理结论的争论断断续续，纠纠缠缠半个多世纪。1942 年在陕甘宁的高干会议中旧事重提，中共中央在延安于 1942 年 12 月 12 日，重新作出《中共中央关于 1935 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中央根据 10 月（1942 年）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于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 1935 年 9、10 月间×××、×××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 200 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

从陕北历史问题检讨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错误肃反开始之前，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另一方面是以×××、×××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在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的结果，由于×××、×××两同志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以及他们打击刘、×抬高自己预定的企图，就把党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性质，他们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压倒刘志丹、××等同志所执行的正确路线，并满足自己篡夺整个陕北党政军领导地位的目的，这样，就造成了当时杀害和逮捕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造成了极大的恶果。“假若不是中央到达陕北制止这一错误肃反，且断定这些被诬陷的同志并非反革命，则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险。”

×××同志是当时陕北党的最高负责者（代表团书记和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在 1935 年未到陕北前即抱着陕甘党内存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成见，来到陕北后便以钦差大臣的架子，不与刘志丹、××等同志作任何谈话，不作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只是片面听信×××同志关于苏区红军党和群众工作及干部等方面的情况报告（×是 1933 年底到达陕北，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打击过陕北特委重要负责同志马明方等，1934 年 7 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又打击过刘志丹、××，企图夺取红军及陕甘党的领导地位，但这种企图受到抵抗而未能成功），而×××同志所供给的报告材料基本上又是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性质，

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对陕甘边及廿六军的主要干部是右倾取消主义者和右派反革命的包庇者（其实刘、×曾对右派作过斗争的）的共同认识。在党的刊物上和会议上有意识的打击刘×张等主要干部，而且在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委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公开指出：“这种右倾取消主义者，他们企图阻止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事实上他们表现要取消阶级利益，他们是阶级的仇敌……动员全党同志一致的揭发这些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欺骗叛卖作用，只有坚决的斗争与驱逐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子……”

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作了“肃反”的准备，而红二十五军的到达陕北，其领导者又带有过去鄂豫皖张国焘时代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以及在陕南错误的处理张汉民问题的成见，因此他们的到达，对×××、×××实行错误肃反起了有力的支持作用，于是就促成了这一错误肃反的大暴发。张国焘时代鄂豫皖保卫局任过审讯科长的×××同志，被任为当时的保卫局长，他在这一错误肃反中起了积极赞助作用。×××同志当时任陕北军委会主席，他在前方主持这一肃反，部队中廿六军的干部被逮捕杀害者特别多。

当这一错误肃反开始进行时，正值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由甘肃南向陕北进发，后来××、×××同志（×是当时陕甘晋省委副书记），明知中央的红军到达陕北的地境，然而他们既拒绝了前方同志（当时刘、×都在前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提议，又不等待中央和中央红军到来或派人去与中央接洽之后来妥善处理这一重大问题，仍然逮捕了刘志丹、××等重要干部，这都是不可允许的 error 和罪恶。

×××、×××二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应该负最重要的责任。但他们在长期中不仅不愿意承认自己错误，反而颠倒是非，互相订立所谓“统一战线”掩盖真实情况，千方百计，企图欺瞒中央，×××同志自己也承认他在7年之间欺骗了党10次之多。他们在1935年中央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之后，仍然继续那一贯的错误思想与行为。×××同志当中央到达下寺湾制止了“肃反”、禁止再行逮捕时，而他还曾密令保卫局要拘捕4个同志……×××同志在1936、1937年

任陕西省委和边区党委书记时，对甘六军及陕甘边干部采取了宗派主义的压制政策，以后当他任山东分局书记时，对本地干部又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这种不正确的干部政策的结果，也促成了湖西肃反的错误，后来回到延安时，继续在干部中破坏××同志的威信，挑拨离间，造谣中伤，企图造成干部相互间、地方与中央间及中央内部的不团结。

在这次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上，×××、×××在到会高级干部严正批评揭发下，虽然在口头上一般的承认了应负错误肃反的主要责任，但对于自己错误之揭发仍然不是诚恳和坦白的，他们这种隐瞒事实和互相推诿责任的态度，证明至今尚无彻底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中央在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后，特作如下决定：

一、×××、×××二同志本应开除党籍，估计他们曾为党作过一些工作，本着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予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撤销×××同志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之职务，撤销×××同志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并限定×、×二同志在3年以内不能担负重要的党的工作。由中央组织部与西北局继续搜集材料，如果发现他们继续对党欺骗，而不认识改正他们的错误，党就必须重新讨论他们的党籍问题。

二、因为×××、×××二同志是当时“肃反”的坚决赞助者和执行者，而他们在高干会上对自己错误之承认也还是不坦白不诚恳的。现在中央认为中央（当时称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30日的决议。对于×××、×××二同志的处分（给×××同志以最后警告，给×××同志以严重警告）仍然是有效的。同时也应当指出：×××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也应负一些责任。

三、中央认为在1935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与×××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因此中央及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的决议除对×、×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如党务委员会决议中对于陕甘边和红廿六军领导者所执行的路线之估计，对陕北“肃反”之估计；和对刘志丹、××、张秀山等被诬害的同志之估计，说：“陕甘边区南区及廿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之错误，以致反革命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又说：“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又说：“把许多只犯错误而没有犯罪实据的同志逮捕起来”。这些估计现在证明都是错误的，应当指出：那时中央及党务委员会对于这次错误肃反的整个过程缺乏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客观的分析，以致未能发现×、×二同志的恶劣品质，以及这种品质对于这一错误肃反所造成的影响，是一种缺憾。尤其应当指出：当时中央党务委员会之所以作出这个错误的决定，其基本原因是在于那时中央还没有作出“遵义会议以前一个时期内在中国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这一决定的原故。×××、×××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这一错误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而其所造成的错误肃反则是这一路线的登峰造极的结果。

刘志丹、××等同志在 1934—1935 年间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时，在×××、×××两同志的高压和打击之下，依然坚持了自己的正确路线，并且当遭受了诬害和逮捕，以及后来一个时期，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的把握了应有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学习和效法的。

四、委托西北中央局负责向过去在错误肃反中被冤屈的同志解释×××、×××所主持的“肃反”的错误，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

中央引自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历史文献中第 295 页和 301 页。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高朗亭说：1965 年秋，他与另外两位写《西北红军战史》的编辑采访朱理治时，朱说，那次错误肃反，我与刘志丹等同志本来无冤

无仇……受骗上当，铸成大错。

高朗亭说：据程子华 80 年代对一位外国作家讲，陕北党里的布尔什维克竭尽全力批判刘志丹，并设法说服我们（指红 25 军的领导成员）相信刘志丹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他领导的红 26 军已被敌人渗透，于是部队内部的逮捕开始了。

一直到 1983 年，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以后，经过由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同原陕北有代表性的老干部研究、商讨，取得一致意见，作出中共中央 28 号文件，才最后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文件再一次褒扬：刘志丹同志是一个一向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

有一日，许多走出监狱的人都涌向刘志丹的窑门，院里站了一大群，杨森、杨琪、张秀山、高锦纯、贺晋年、黄罗斌、任浪花、郭宝珊、习仲勋、黄子文、汪峰、张策、高岗……还有伤口未愈的王世泰，大家嫌窑小太挤，都嘻嘻哈哈站在院子里说笑。

说笑了一阵，话又扯到正题上。大家七嘴八舌地说道：“要不是毛主席来，或是迟来一步，说不定我们这些人的脑瓜子早就搬了家！”

有几个人免不了发一些牢骚，高岗禁不住破口大骂道：“他妈的！说老子是反革命？中国多有几个像我这样的反革命，那就好了！”

志丹觉得这话有些刺耳，便用既是劝解又是批评的口吻说：“你们不要在这里乱说，影响不好，也不利于团结。党内斗争嘛，常常是人死了以后才能做出结论。现在党中央、毛主席来了，把我们已经放出来了，还有什么牢骚可发？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人家改正的机会，欢迎人家改正错误，和我们一道工作！党内的事情，中央会给我们作结论的，你们把心胸放开阔些，解开心里挽下的疙瘩，跟着毛主席，好好干！”

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亲自登门找刘志丹谈话，让他将西北革命情况和狱中情况写成书面材料，但是刘志丹因为饱受折磨，手指头有几

处裸露出骨头，弯不回去，同桂荣只好烧开水晾温，让刘志丹把手指浸在温热的水中等到泡软弯曲后，才在昏黄暗淡的油灯下伏案疾书。他夜以继日的工作，使许多人深受感动，同时也对他的身体健康深深担忧，周恩来知道后，曾多次指示，让同桂荣到部队去照顾刘志丹。

1936年初，中共西北局机关报《斗争》第八十二期发表了刘志丹写的《三边事变的经验与教训》，他讲道：那些犯肃反错误的人是“不相信从土地革命中生长出来的红军，不相信从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而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他常常说：党内历史问题不必急，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结论。他要习仲勋转告受过整的同志，过去了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服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积极工作。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同桂荣带着5岁的女儿从沙家巷平房搬到一孔窑洞里，附近的乡亲们借给她几件简单的锅碗瓢盆，刘志丹又在外边拣来了高粱杆，制了几双筷子。

在这样几近原始人的艰苦生活环境里，刘志丹没有想到自己，他想到了那次毛泽东接见他的时候还穿着一双单薄的布鞋，而1935年陕北的隆冬，天气又特别寒冷，气温总在零下三十度左右，主席穿这样的一双鞋怎么过冬呢？一天深夜，刘志丹冒着雪回到家里，同桂荣望着丈夫清瘦的面容说：这么晚才回来，都冻成这个样子，快到炕上来暖和暖和。紧接着又问：“老刘，最近一阵子你身子亏得厉害，能不能休息几天……”

刘志丹说：“毛主席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奔波，到陕北根据地后，日夜为中国革命操劳着，咱们这算个啥呢？”一说到主席，刘志丹的眼里就流露出无比钦佩和关切的样子，他对妻子说：“我想请你做一双棉窝窝鞋！”

同桂荣一听高兴地说：“这几天，我正思谋着给你做一双棉鞋穿，可就是没有东西，棉花、布什么也没有。”

刘志丹说：“没有东西不要紧，不过这鞋不是给我做的。”

同桂荣迷惑地瞪眼问：“不是给你做的，是给谁做的呢？”

刘志丹说：“给毛主席。”

同桂荣一下子惊喜而又紧张起来：“给毛主席做，那可就真害怕我做不好，毛主席会嫌弃吗？”

刘志丹笑着说：“不要怕，我给你当参谋。”

同桂荣高兴的连夜动手。她把全部家当都翻遍了，挑来挑去，只选出来几块能作鞋里子的白布。她想了一会，为难地说：“鞋面和棉花哪里去找呢？”

刘志丹想了一下，说：“明天我设法买鞋面，称几两棉花。”

第二天，院子里的老乡，听说刘志丹要给毛主席做棉鞋，就是没有鞋面和棉花，便你送来鞋面，她送来棉花，有的送来羊毛擀成的毡垫，大家都非常关心给毛主席做鞋！都说：“毛主席是南方人，咱北方天气寒冷，要把棉鞋做厚点，不要使他冻着啊。”

同桂荣经过忙碌，把做棉鞋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她要剪鞋样，但不知道毛主席脚的大小、肥瘦。这天晚上她一直等到半夜，刘志丹才从军委回来。他回到热乎乎的土窑洞里，看见女儿已经熟睡，同桂荣还在等着他，就笑着说：“你还没睡？”

“我等你回来，问毛主席的脚大小、肥瘦，好剪鞋样呀！”

“那天毛主席接见我的时候，也穿着单鞋，我心里就思谋着给他做一双棉鞋穿，当时我就记下了他的脚大小、肥瘦，你照我的鞋样剪，大上一寸，宽上五分！”

一会儿，同桂荣把鞋样剪出来了。刘志丹看了后，说：“这里还有点直，一定要把式样做得好看。”

在刘志丹指点下，同桂荣反复剪了几遍，终于把鞋样剪出来了。刘志丹看了又看满意地说：“照这个样子，一定能做好，这是我交给你的重要任务！”

同桂荣笑道：“哎，做双棉鞋还能算啥重要任务？”

刘志丹严肃地说：“那当然。这是给我们党的领袖做的棉鞋呀！”

同桂荣像一个战士接受任务似的问道：“完成这项任务有什么要求吗？”

刘志丹认真地说：“第一式样要好看，第二里子要软、邦子要深、鼻梁要高、底子要厚，第三要结实耐穿。”他看着同桂荣十分认真的态度，又说道：“你知道，毛主席走遍万水千山，要踢倒三大敌人，在冰雪风寒里指挥千军万马，创建一个新中国啊！”

两天后的晚上，一双按刘志丹的要求、式样美观大方，带有陕北特色的棉窝窝鞋做好了。

刘志丹从军委回来，高兴地拿着棉鞋看了又看，伸手到鞋里感到又软又暖，便乐呵呵地说：“这项任务你完成得好，我表扬你！”

同桂荣不好意思地说：“就怕毛主席嫌弃，没做好！”

刘志丹满意地说：“你放心，毛主席保证不嫌弃！”

第二天，同桂荣带着女儿亲自把鞋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穿上棉鞋，激动地说：“合适，很合适。”

毛泽东又说：“陕北的地方好，人也好。你的手巧得很，这双棉鞋穿上好暖和。你要关心志丹的身体。让他养好伤再工作。”

毛泽东还笑着对女儿贞娃说：“和志丹像极了，真漂亮，也是一表人才，来，来，来，让伯伯抱抱。”

最后又对同桂荣说：“你回去给志丹说一下，我给德怀、林老（林伯渠）、罗迈、首道好几位同志说了，他们会去看他的……”

## 第十四章 东征殒命

### (1)

1935年11月中旬，刘志丹出狱不久，就被中共中央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月底，在延长地区指挥陕北地方武装围攻延安等地，牵制和打击了东北军129师等部。

11月25日，关于动员新战士致电毛泽东、彭德怀：

彭、毛：

关于动员新战士问题，动员武装〔部〕已正式成立，他们决定三边及陕北完尾在瓦窑堡集中运送前方，陕甘省各地动员之新战士均在王家坪集中，直送前方。除动员加上负责领导动员外，希你们亦直接派员帮助及指导，如何？

刘志丹

二十五日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志丹纪念文集》第673—683页。

12月7日，刘志丹率无线电24分队抵达延川，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延安地区的敌情和晋绥军的动向。

12月8日，刘志丹与毛泽东、彭德怀联合署名发布《告陕甘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书》——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总不会忘记国民党统治下面所受的无比痛苦吧？那时军阀官僚怎样压迫我们来，出说不尽的捐款，催款的人像毒虫那样咬着我们，一次捐款还没付清，下次捐款又已派到。赶付不起

时就立即把我们捉去坐牢，或枪杀！——同志们，这些我们不能忘记！

记得豪绅地主怎样凶恶地天天上门来催我们的租，白（迫）逼我们的债，缴不出租债时，我们的牛羊牲口家里器具都被牵去拿去。甚至我们的儿女都被抢去卖掉。同志们，这些我们怎能忘记！

更伤心地，白军来时把我们的粮食、牛羊、鸡子、猪子一起吃光。把我们的牲口赶去抢去，把我们的房屋拆净烧毁，将我们的壮丁，拉去当兵，将我们的妇女轮奸奸死！同志们，这些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国民党军阀官僚豪绅地主是要使我们死亡！

我们忍受不了这样残酷的痛苦，我们勇敢的起来革命，推翻反革命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现在再没有人催我们捐款，迫我们租债了，我们分得土地房屋，我们获得了自由解放，现在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要以一切的牺牲，用一切的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土地和自由，来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

同志们，现在国民党军阀和豪绅地主，受着帝国主义指挥，向我们苏区残酷的进攻。国民党匪军到处乱抢乱捉，大烧大杀，豪绅地主要抢回我们所得土地，要我们加倍缴租还债，要剥夺我们一切革命利益。国民党匪军非但要恢复地主资本家统治，而且还引帝国主义进来屠杀我们。蒋介石正在把我们陕甘的土地人民，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要使我们做亡国奴，使我们受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宰割摧杀残，使我们灭族灭种。

同志们，我们难道能让国民党匪军和日本强盗来屠杀宰割我们吗？我们难道能受亡国灭种的痛苦吗？万万不能！

同志们，现在斗争是万分紧张了！我们前方英雄红军最近打了大胜仗，消灭敌人四团。我们红军需要更加扩大，来消灭更大批的敌人。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土地、财产，父母、妻子，我们一定要牺牲一切，消灭敌人进攻，来保卫我们神圣的苏区！我们不应该贪恋家产快乐，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当红军，到前方来和万恶敌人血战！

同志们，我们或是胜利，或是灭族灭种，我们要彻底解放，唯一的出路纸（只）有当红军！

亲爱的工农们，大家当红军，到前方来呵！

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志丹纪念文集》第 667 页。

十二月八日

同日，周恩来关于消灭延安地区之敌的部署问题致电刘志丹，并要求他暂留延安指挥。

12 月 9 日，关于通讯工作问题致电博古、彭德怀、毛泽东。

博、彭、毛：

一、北清涧南五里、宜川之各黄河渡口，均已责成请延水、延长县苏派专人建立侦探，但并未用一切关系派探去山西侦查匪情。传达消息，由递发站担任。

二、一切情报均经过延水、延长报告后方军委及我、周，佳县工作除黄河游击队担任外，并在各渡口用武装建守备队，群众经常用土枪外向〔将由〕山西来防〔犯〕敌击回。据探报，近日山西来〔敌〕并无变化，侦查及警戒工作已有于〔相〕当建立，延安残敌亦困守不动，我开无线电在这里无重要工作，架电任务〔应向〕何处行动，请示复知。

刘志丹②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志丹纪念文集》第 673—683 页。

九日

12 月 10 日，关于延安围城部队情况致电周恩来，同时电告彭德怀、毛泽东指示对黄河沿岸的考查情况结束，正在总结中。

周：（急）

一、补充团今午出发开回瓦窑堡，宜川独立营已回宜川，延安刻无靖匪。

二、已派传骑去延安与山西游击队、延安围城部队取联络，并传达来电，即示围城办法，我只根据实际情况给以简单指示。

三、彭、毛电令我考查黄河沿岸地形、道路、河水等，并制界图，送前方及后方，刻正在赶制中。

刘志丹②

十日

12月17日，刘志丹参加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聆听了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议结束的第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第15军团第78师和骑兵团等部组成北路军，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并令其率部北上，打击由横山地区进犯之国民党军井岳秀部第86师，以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之北线阵地。

12月28日，刘志丹以中国人民红军北路军政治部的名义，发布《告井岳秀部队书》，揭露井岳秀、高双成统治陕北20多年来的罪行。号召井部官兵弃暗投明，与红军一道抗日救国。

12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28军。任命刘志丹为军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唐延杰为参谋长，伍晋南为政治部主任，特派员裴周玉下辖3个团，以原独立第1团改编为第250团，团长黄光明，政委王再兴；独立第2团即原来西北游击队改编为第251团，团长于占彪，政委柴成俊，独立第4团即清涧红四团，改编为第252团，团长杨琪，政委陈仿仁，全军共1200余人。

刘志丹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革命者。经他多年苦心经营的红26军、红27军全部编入徐海东领导的红15军团。在组建红28军时，有些人建议，从红26、27军里抽调一些干部过来，他们对刘志丹说：“只要你提出来，毛泽东一定会同意的。”

刘志丹决不依从，他认为：“我们不能拆徐海东的台，更不能去干扰毛泽东的工作。”

当时，红 28 军刚刚组建，刘志丹对这支部队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都抓得特别紧。他亲自给部队上军事课。从制式训练到射击要领、投弹诀窍、地形地物的利用、战术基本训练，从头到尾耐心传授。对于各种姿势，他都逐一进行纠正。训练卧倒时，有的战士翘起屁股，他逐一用手压下；瞄准时，有的战士睁着两只眼，他摆着手叫闭上，有人就把两眼都闭上了，他再用手轻轻将右眼皮一捏，叫道：“用左眼看”，反复几次，都教会了。他时常对指战员们说：“我们红二十八军组建时间不长，各方面的基础都很差。所以，我们部队的组织建设，政治工作，战斗经验，都要向中央红军学习，使红 28 军迅速成长起来，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

1936 年 1 月，刘志丹关于游击队的发展及红军的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等。

彭、毛、并告徐、程、张参谋长：

一、我们与特委决定游击队向西南发展，求得与米西苏区联成一片，并以一游击支队东渡，在兴县沿河取坎尚，未过；以一游击〔支队〕派往府谷南行动。其次，决定扩红、土地〔改革〕、整理组织、肃反等工作。

二、我们及独立团目前扩大，在沙峁向北或西消灭敌人。

三、高家堡系敌主力，约两营；新寨子三连，神木城骑兵三连、步兵约连，府谷骑兵两排，步兵不详。以上各处均有堡垒。

四、葭芦河北二十里，沙湾、高家壕以北之干堡以南二百里，万芦峪之以西、高家堡之以东一百四十里均为苏区，除新寨子、安崖底外，中间无白色，群众情绪好，组织尚未恢复。粮食极困难，因为经济成问题。

五、游击队五个队三十人，枪十支上下。

六、船已造三只，原有两只，沙峁附近现正继续造中。

七、独立团袭万芦峪未奏效，已撤回。我们与独立团现集结沙峁镇二十里之骡家川。

八、我们在府、葭两县间沿河两岸行动，配合十五军团，能办。

刘宋

二十时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志丹纪念文集》第 673—683 页。

1 月 7 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刘志丹与宋任穷率红 28 军等部北上韩家岔、石牌子，打击来犯之敌。

1 月 9 日，与宋任穷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所部行动情况。

1 月 25 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志丹等 20 名红军高级将领联袂署名，发布《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张副司令于主席王军长何军长董军长万军长并转东北军各师团长及全体将士：

从“九一八”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在这四年中间，不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刀下鬼与俎上肉；而且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亦相继被占，整个的华北，快要变成“满洲国”第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事实上证明只是永久的不抵抗，蒋介石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要把整个中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军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之下放弃了你们自己的家乡与你们自己的土地财产，让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们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蹂躏压迫奸淫残杀。想起这些，好不伤心，好不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东北军不共戴天之仇，你们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收复我

们的东三省以及整个华北而奋斗！

因为东北军的将士们绝大多数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的。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和卖国头子蒋介石是不喜欢东北军的。自东北军退出东三省后，蒋介石总是不给东北军一个休息整理的地方与时间。他不要东北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却要东北军打红军。因为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卖国。他把东北军今天调到豫鄂皖边区打红军，明天又调到甘肃陕西来打红军。他要中国人与中国人自相残杀，他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同决心要抗日的红军打仗，教日本人欢喜，教东北军受牺牲受损失。你们想蒋介石卖国贼的毒计可恨不可恨？！

蒋介石不但要东北军打红军，而且处处压迫东北军。他不给东北军一块好地方，把东北军调到最穷苦的陕甘两省。就是这两省比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陕南他也是不肯给东北军的。对东北军官的待遇是极不平等的。东北军官兵的薪饷，哪里及得上蒋介石嫡系军队的一半？东北军官兵的生活，真是痛苦得很，贍家养子更是说不上。

蒋介石的毒计还不止此，他把他自己法西斯蒂的党羽派到东北军内，监视东北军官兵的行动，到处挑拨离间，威逼利诱，破坏东北军内部的团结，以瓦解东北军。人员的补充，武器弹药的补充，东北军从蒋介石那里是得不到的。

总之，蒋介石是要消灭东北军，使东北军官兵流离失散，冻死病死打死，好教日本帝国主义少一个敌人，好教蒋介石少一个对头。你们想东北军的前途危险不危险呢？东北军现在是在彷徨歧路上面，东北军现在是在困难的中间。东北军内部现在没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因此军心涣散，上下不团结。东北军长此下去，好不危险！

试想，东北军的出路在哪里呢！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不要认错了你们的冤家对头，不要把你们的朋友认作了你们的仇人。一错不能再错，一误岂堪再误？

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东北军中间哪一个爱国的军人，说起打日本帝国主义，打卖国贼，不摩拳擦掌，挺身而出，愿意为中国民族争一口气呢？哪一个东北人，不愿意为了收复东三省，收复华北各省而去赴汤蹈火呢？

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部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那时，哪一个中国人，不愿意拥护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哪一个有热血的爱国男儿不愿意投效东北军，共同杀贼，为中华民族伸义愤，争光荣！哪一个东北军将士，不将成为全中国的民族英雄，闻名全中国全世界，试问大丈夫立功救国，不当如是耶？

东北军在过去是有过抗日的光荣历史的。长城各口之战，声震华夏。使当日以东北军的全力，与全中国人民的拥护而抗战到底，那东三省是早已收复了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不会如此猖獗的。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重整旗鼓，发扬当时抗日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誓死不作亡国奴，是全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侵略的响亮的回答，也是东北军抗日的鲜明的口号。

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有抗日光荣历史的东北军是极端爱护的，对于它的发展的前途，是非常关心的。因此，我们不揣冒昧，敢为东北军的领导者与将士们贡献一点意见。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素闻东北军将士，均是深明大义的爱国的志士，定能抛开过去的一切疑虑误会，来首先响应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抗日号召。在四万万同胞中，甘心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甘心做亡国奴的，除了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外是没有的。只要我们来登高一呼，我们相信响应我们的不是十万百万的中国人，而是几千万几万万中国人。拿四万万中国同胞的人力、财力、武力、智力，是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无力抗日”，是蒋介石辈汉奸卖

国贼欺骗中国人民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口号，而不是我们有数千年历史的黄帝子孙的口号。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救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关于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请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一切愿意抗日的个人或代表，都是苏维埃红军的朋友，我们都欢迎他们到苏区来，并愿意竭诚招待。同时苏维埃制度是否适合于中国，亦请亲来考察，加以判断。

书不尽意，敬布腹心，望公等熟思之。顺致

民族革命敬礼！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杨尚昆

聂荣臻朱瑞程子华徐海东张云逸郭述申

刘志丹陈光刘亚楼彭雪枫肖华杨森

高岗阎红彦等同启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刘志丹纪念文集》第 669 页。

信中明确表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愿意首先同东北军共同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就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问题请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 (2)

1936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红军从陕北东渡黄河，东征山西。

2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东征宣言》。接着红军主力改编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挥戈东征，由毛

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总司令，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下辖 1 军团、15 军团、28 军、30 军。1 军团、15 军团，从清涧、绥德一带渡河；28 军的任务是进军神府，从佳县以北渡河，兵进晋西北，牵制和打击敌人。

为了配合主力东征，毛泽东、周恩来于 7 日电令刘志丹、宋任穷率红二十八军、红七十八师为使伏击敌众有广大回旋余地，同意我北征军改向韩家岔、石牌子行动。该处敌堡已完成大部。又指出：“围困敌堡城镇，必须断其交通，方易速敌增援。打援敌不论大小，必须以主力出动，实行两翼包围并切断敌人退路，以期一举消灭，务使漏网。”

2 月 10 日，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刘志丹、宋任穷，要红七十八师开始南移，归还主力，到达瓦窑堡附近集中待命，要红二十八军仍在北线行动，以消灭井岳秀小部队，并迷惑该敌，使其不知红七十八师行动目的。

2 月 12 日为红军主力东渡后巩固渡口问题，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指出：红一方面军东渡后，拟调红二十八军之第一团以刘志丹、宋任穷二人中一人指挥，由河东向军渡、柳林、中阳行动，阎红彦、蔡树藩所部巩固东岸沿河，以便主力向正东并以后转到东南作战。

2 月 18 日，毛泽东、彭德怀下达东征作战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是在黄河东岸造成临时作战的根据地。

2 月 19 日，刘志丹、宋任穷关于独立营及游击队行动部署问题致电周恩来。

周：

甲、我们拟以五天行程到达瓦窑堡。

乙、关于独立营及游击队的布置，我们意见米西独立营及第二支队十五日出横山与波罗之间行动，并散布谣言和察横山、波罗二处无

敌骑，该部即渡过无定河，在横山以北以西活动。如横山、波罗，在横山、波罗之间活动，再经横山以西向横山活动。第二支队在水地湾、周家砭、三皇峁一带活动。第三支队在武家坡一带活动。以上布置今晚电发，以便告诉米西县委。

刘宋

十九日②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志丹纪念文集》第 673—683 页。

2 月 20 日 20 时，抢渡黄河的战斗开始。一夜间，红 1 军团、红 15 军团分别从绥德沟口，清涧河口突破黄河天险。2 月 23 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人员及两个军团全部渡过黄河，阎锡山苦心经营多年的黄河防线全线崩溃。红军迅速占领了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及广大地区，取得东征战役的第一个胜利。刘志丹和宋任穷率红 28 军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坚持陕甘根据地的斗争。

是日 9 时，刘志丹、宋任穷关于独立一团活动问题电示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参谋长张云逸转告周恩来、彭德怀。

参谋长并转告周、彭：

据报高敌已集中六个营在高家堡、邱家岔滩、新寨子一带。有两个营系由吴堡北之熄峒峪、坑徽店调来。现葭东一带较为空虚。我们已令吴堡独立营在桃花峁一带活动。我急请令独立一团即经绥德北进，向米东、葭西一带积极活动。

刘宋

二十三日九时②

同日 20 时，刘志丹、宋任穷再次关于红三团的发展问题电示周恩来等人。

周并报张、毛、彭、西北中央局：

甲、据神府苏区派人来说，葭芦河北二十里之沙湾、高家堡、桑

春城以北均已恢复，为倾程南至北一百余里，东至西一百二十余里，我红三团正左右便有相当发展，收枪十余支。

乙、神木城驻杨年骑兵一团，神店井敌约两营，葭敌情不明。

丙、我们本日占领店头，同意并击溃由乌龙铺、五口店、头镇换防约两连，已至境。以上情形，为开辟米榆、葭西、神府，伴二十八军有后方的作战。我们意见兄要进至乌龙铺以北，在阎家坪附近行动，红三团在阎家坪以北行动，如何请即电示。

丁、中央联络独立营行动不明。

刘宋

二十三日二十时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志丹纪念文集》第673—683页。

2月24日，周恩来来到中央军委刘志丹的办公室，看见刘志丹正在聚精会神地草拟作战计划，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几张。周恩来笑着说：“志丹呀，这样没日没夜地工作，可别累坏了身体。”

志丹笑眯眯地说：“没事，别看我身子瘦些，可浑身充满了劲。”

顿了一会，周恩来说：“接主席电令，要二十八军主力移向吴堡附近。第一步乘李生达撤退，肃清吴堡、佳县、神木、府谷一带；第二步，配合沿河武装相继渡河，向柳林军渡以北山西地方发展苏区。若高、井两敌侵入，二十八军移对高、井。”

“我们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的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必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

刘志丹胸有成竹地说：“红二十八军是一支新军，大都是由当地游击队组合而成，一定要加强对战士们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技术的训练，使该军成为一支钢军、铁军。”

新的任务开始，二十八军也在瓦窑堡誓师起程。起程前召开了全军大会，刘志丹、宋任穷分别讲了话。

刘志丹说：“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明确决定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陕甘苏区。然而陕甘苏区面积窄小，仅有四万余平方公里，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粮食和工业品缺乏。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国民党连年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使陕北人民贫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无力保证红军队伍兵员的补充和军需供给，就连党和红军大批机关、部队人员的吃饭穿衣问题也很难满足。另一方面，我们虽然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但根据地周围仍是敌军云集，红军和根据地的处境甚险。如何巩固根据地，发展和壮大红军和抗日力量，选择红军的主攻方向，成为摆在党中央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

“党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渡河东征。首先，山西既屏障着党中央所在地，又是我军直接实现对日作战的必经之地，是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高潮的理想通道。其次，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经济处于复苏时期，便于红军扩充兵源，解决给养以及筹款和征集作战物资等。第三，东征山西，威胁其老巢，进巢苏区的5个旅就可退回，缓解陕北苏区的军事压力。第四，东征入晋可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作战，争取同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五，东征山西、开创吕梁山根据地，可与陕北苏区相互为依托，互为屏障。以此作为战略支点向外发展，向北可转进绥远，向东可开赴河北抗日前线。第六，可赢得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从而推动华北乃至全国各地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高潮。”

“目前，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率领下，已突破黄河天险，占领了三交、留誉、义牒镇，接着以神奇的速度向纵深发展，取得了蓬门、关上、水头战役的胜利。中央电令我们二十八军即速出发，向神府进军，打通陕北苏区与神府苏区。大家心里都明白，要到佳县以北渡河，必须进军神府。这一路约有五、六百里，从未打通过。敌人据点，密如蚁穴鼠洞，所以大家一定要用‘小老虎’的战斗精神同敌人作战，迅速进入神府，渡河东征，开辟新区。”

宋任穷政委说：“行动中，必须从各方面，用最大的努力来巩固

部队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各级指挥人员、政治工作人员要保持工作的不间断性、灵活性和机动性，严格注意纪律保障，更坚决、更勇敢、更机动地消灭敌人。”

刘志丹满怀信心地接着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打过黄河去，那里是我们的目的地，那里就是我们北上抗日的通途！”

刘志丹讲话时，会场上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拥护中央东征抗日的正确路线！”、“打通陕北与神府苏区！”、“打到山西去！”等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瓦窑堡上空。

刘志丹深知：中央虽然平凡了他“反革命”罪行，但由于中央刚到陕北，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澄清全部事实，仍然留有“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帽子。出发前，他回到了家，对妻子同桂荣说：“这次出征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考验，事实会证明一切的。如果我死了，是作为一个革命党人牺牲的。”停了一会，志丹语气平缓地对同桂荣说：“你要好好抚养孩子，让她将来好好念书，长大做一个有用的人，明天早上出发，你带上力贞来送送我。”

刘志丹多少次出征，这是第一次让妻子、女儿为他送行，他已经预感到此次东征任务的艰巨，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

2月下旬，刘志丹在清涧马灰坪接到彭德怀、毛泽东电报“二十八军明二十九日在义合镇待命”后，率红二十八军，顶着凛冽的寒风，大雪中向北挺进。

在东征路上的刘志丹，却只盖着一块黑底蓝花的粗布旧被子，这还是在陕北打土豪时同志们硬分给他的。大家多次要给他换一块新的，都被拒绝了。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即派通讯员给刘志丹送去一件灰色的棉布大衣，刘志丹十分感动，他十分珍惜这件大衣。白天行军打仗披着大衣，晚上睡觉时将大衣压在被子上面。

3月1日，红28军在郝家坪击溃高桂滋张家坑之敌两个连后，兵进义合镇东的思家沟。

3月2日，刘志丹关于过河开政治局会议及过河路线问题致电博古。

博古：

甲、为彻底讨论一次战争与战斗力问题，过河开政局会实有必要，我意还是代表过河为佳。

乙、你们最妥当走贸易局的路，四天直到马灰坪，令保卫队一排送。要何日动身望复，我好率警卫连在马灰坪等你们一同过河。

丙、骑兵团照原定任务出发，由我报前方。

志丹

二日二十一时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志丹纪念文集》第673—683页。

刘志丹率红28军，从思家沟向二郎山敌高桂滋部251旅501团梁青田营发起攻击，彻底打垮了敌人，随着占领了张家坑、土老地区，截断郝家坪、三十里铺的交通。

当红二十八军行军到米脂境内时，中央来电要周恩来速返瓦窑堡，和东北军密谈建立统一战线的事情。刘志丹依依不舍地将周恩来送了很远。几次吩咐护送的队伍，一定要保证周副主席的安全。

挥手诀别周恩来后，红二十八军继续北上，打通陕北苏区和神府苏区。红二十八军的指线员，心里都明白，要从佳县以北渡河，必须进军神木、府谷。这一行程约五、六百里之遥，从未打通过，特别是自去年秋末肃反之后，阎锡山又过河乘虚而入。井岳秀、高桂滋也都蠢蠢欲动，使苏区的许多地方又重新变成白区。红军路经的地方，还有许多敌人的据点。

3月8日，红28军驻宿韭园沟李家寨附近。刘志丹从群众口中得悉：李家寨属绥德北区，当时绥德南区的崔家湾、定仙至黄河畔一带，已经建立了红色根据地，东区的马家川、中角连同吴堡一带也成

了半白半红区域，西区局面已基本打开，唯有北区仍被敌人占领，成为切断南北红色通道，割裂绥、吴、米、佳南区的严重障碍。

刘志丹决定打开北区，打通绥、吴、米、佳苏区的红色通道，急忙赶回军部同宋任穷政委商讨行动计划。

志丹一进门，看见宋任穷政委正坐在炕尾整理文件，说：“宋政委，连日来行军作战，疲劳得很，还是先休息一会吧！”

宋任穷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腔说：“还不是一样，你不也是人不下鞍，马不停蹄，刚到李家寨，就到群众中去了。”

次日早晨，警卫员谢文祥端来一盆高粱钱钱饭，志丹、宋任穷政委刚端起碗，脸形端正、身材魁梧的唐延杰大步从门外进来，唐延杰参谋长打了招呼，便说：“发现敌人！”

刘志丹问：“在哪里？”

唐延杰说：“在西马家川，阎锡山的骑兵，还有史老咄的人，跟独立营已经接了火。”

志丹马上说：“三团速往东山移动，压住制高点大王庙，二团留守村内接应。”

刘志丹边吃饭边和宋任穷政委谈论敌情，不一会，唐延杰参谋长又进来说：“独立营营长薛英桂与政委张驾伍正率独立营与敌人争夺山头，敌人已接近大王庙，出门就能看见。”志丹丢下饭碗说：“出发！”

刘志丹、宋任穷、唐延杰，每人穿着一件黑布旧棉大衣，出门就往外走，后面跟着司号员、警卫员、通讯员。刘志丹、宋任穷一阵小跑，到山头一看，敌人离得已不远，直向大王庙冲击。本来，红军的主力是配制在义合镇附近，想把敌人诱到义合附近的满堂川、楼坪、龙豹山、马连沟一带消灭，可敌人也打得狡猾了，到处猜摸红军的意图，放弃义合之行，改向大王庙窜来。

这次阻击红军，敌人兵分两路，一路由 84 师 251 旅驻义合 501

团梁青田第二营及晋军 71 师 206 旅许三铭第一营直插李家寨村西山头设伏；另一路由驻满堂川的史老吆骑兵营绕道西马家川在李家寨东面山头设伏，并强占制高点大王庙。

刘志丹立即调整战斗部署，叫道：“高克恭，骑马去调红一团！”高克恭应声而去。

刘志丹转身对宋任穷政委说：“红一团大都是绥德本地人，熟悉地形，战斗力也很强，争夺大王庙战斗进行起来容易些。”

不一会，一团团长黄长明、政委王再兴听到命令，急忙赶了回来，爬上山头，来到军首长面前。刘志丹果断地说：“留守村内的二团已急速向山头运动，你们速带一团往山上冲去”。并告诫黄光明、王再兴：“这个庙一定要夺下来！庙上住的全是些婆姨娃娃，不打下来，这些婆姨娃娃了不得！”

10 时，三团在团长杨琪的率领下首先攻下东山头，并与史老吆骑兵营发生激战，争夺大王庙制高点。三十里铺驻防晋军 72 师 208 旅 415 团梁春溥部及马连沟 84 师骑兵连也拼命向大王庙冲锋，被红二团截击，压在山坡抬不起头来。

红一团政委王再兴接到刘志丹的命令后，立即带着部队拼命往大王庙上冲，红军冲，敌人也冲，双方争夺异常激烈。红三团团长杨琪扬鞭打马，冲上山坡，口中还高声叫着：“上！上！”红三团战士犹如猛虎扑食，奔向敌人，敌人拼命射击，子弹“嗖、嗖”乱飞。

志丹叫司号员“吹冲锋号”，命令“重机枪扫射”、“迫击炮上山”。

迫击炮正出沟，红三团团长杨琪冲劲过猛，暴露过高，被敌人子弹打中，从马上栽了下来，被战士们抬到沟里藏了起来。由于敌人火力过猛，我军伤亡不小，所以红军的反冲锋被敌人压了下来。

刘志丹用望远镜看到红军被压下来的场面，对宋任穷政委说：“史老吆是井岳秀收编的土匪，狡猾得很！马是专门训练的瘦马，专门适应于山战，部下全是洋烟鬼，每次战斗史老吆都以重赏洋烟为诱饵，

这伙亡命之徒，打起仗拼上命，为的就是吃点洋烟过瘾。”

宋任穷说：“那我们就用头天在绥德县委找到的定仙缴获的迫击炮狠狠打击敌人。”

志丹当即命令：“迫击炮射击！”

参谋长唐延杰曾在苏联学过炮兵，一马当先来到炮前，亲自射击，第一炮打到庙前炸了，又发出第三颗、第四颗全炸了。敌人吃了几炮，马上乱了阵脚，到处吼叫着“红军打炮了！红军打炮了！”敌人急用骑兵掩护撤退。唐延杰参谋长看在眼里，向敌马群打了仅剩的一发炮弹，炮弹在马群里炸了，马群乱蹿，把敌人冲得七零八落。红军战士喊声连天，奋勇追杀，消灭敌两个营，击溃两个营。

战斗结束后，刘志丹走下山头，高克恭报告说：“三团团长杨琪和一连连长陈文保牺牲了！”志丹几步扑向担架，蹲下身去摸杨琪，杨琪浑身冰凉，早已停止了呼吸。立时，志丹泪如泉涌，说：“老杨啊！老杨！你这位老黄牛、及时雨，作为一个老师长，你却硬要当团长，你的心中装着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战士们紧握钢枪，擦着眼泪誓死要为老团长报仇。

志丹擦干了眼泪，果断地说：“杨琪同志为了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了，我们要迅速掩埋他的遗体，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去战斗，去消灭敌人。”

大王庙战斗结束后，刘志丹率红 28 军，从李家寨出发，迅速北进，屡挫敌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先后在清涧、绥德、吴堡等十多个重要城镇打击了敌人，3 月 19 日胜利抵达神府苏区佳芦县中心地区麻堰沟村。

3 月 20 日，刘志丹率部继续向西北行军，10 时左右，接到周恩来的电报：

二十八军有恢复打通并扩大神府、佳苏区，消灭敌高双成一部的任务，其活动区域应首先在神南、佳北，求得消灭出击高敌或少数驻

扎的部队。时间暂以二十天为期，兵力在红三团取得联络及独一团北上后，该两团归刘宋指挥，以便与二十八军配合行动，求得集中最大力量消灭敌人，并增强自己的战斗力……刘宋与神府特区负责人会面后，并依实况给其它地方部队以具体部署并与其讨论地方工作布置……”

行军途中，军直属队与敌人一个运输粮食的排相遇山间，刘志丹命小杨、裴周玉组成突击队袭击运输队，仅用了不足两小时的时间，一举歼灭敌人 35 人，缴步枪 19 支，冲锋枪 3 支，轻机枪一挺，手枪 2 支，粮食 3000 余斤，毛驴 19 头。

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八军在迅速北进中，屡挫敌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先后在清涧、绥德、米脂、吴堡等十多个重要城镇打击了敌人，插入神府苏区腹地。

3 月 21 日的杨家战斗打得十分漂亮，旗开得胜，充分显示出刘志丹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这天，当红军兵进路家沟时，当地群众报告，敌军 86 师杨向之营正在前十里远的杨家抢劫粮食，奸淫妇女，祸害百姓。刘志丹向群众详细地了解了敌人的兵力和装备，摸清了杨家的民情和地形后当机立断，决定集中兵力消灭这股匪军。他作了周密部署：一团由北向南，正面主攻；二团绕道西侧山下，切断敌人退路，阻击西面来的增援之敌；三团在南山沟内埋伏，歼灭溃败之敌。刘志丹一声令下，冲锋号四起。一团率先发起冲锋。敌人竟无防备。顿时，胆战心寒，乱成一团。二团也相继在西山麓开火合击，敌人纷纷朝南山沟底溃逃。三团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敌人见走投无路，只好乖乖地缴械投降。这次战斗前后只用了 1 个多小时，就全歼敌人一个营。这一仗红二十八军打出了威风。附近几处的敌人闻风而遁，红军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了大片土地。

神府特委为了欢迎和慰劳二十八军，立即通知王兆相和特委、特区政府在外工作的领导同志回来开会，专门讨论当前的任务。张秀山、王兆相、乔钟灵、贾怀光等都回到了特委机关，讨论研究决定，动员

群众给红军送猪、送羊、送鞋、送袜等慰劳品，派出一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代表携带慰问品，慰问伤病员，加强边防和白区工作，乘胜扩大苏区，加强敌情侦察，掌握敌人动态，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

3月22日，神府特委在陈家坪举行盛大的欢迎祝捷大会，神府人民渴望的“刘志丹的红军”上来了，群众无不兴高采烈，扶老携幼纷纷赶来。有的手拿鸡蛋筐，有的手挎红枣篮，要送给亲爱的红军指战员，要亲眼看看人民的英雄刘志丹。有些老年人热泪盈眶地叫孩子们“喊红军叔叔！”“问刘志丹好！”祝捷大会时，红军战士穿着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新军装，扛着新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会场。陈家坪周围的乡亲们，奔走相告，穿着花花绿绿的节日服装来参加祝捷大会。光着屁股的娃娃们，欢蹦乱跳地看热闹，会场上“欢迎二十八军！”“欢迎刘志丹！”的口号此起彼伏。

祝捷大会由特委秘书长王恩惠主持，他代表神府党政军民讲话，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派红二十八军北上增援神府，欢迎红二十八军打破敌人的层层封锁，胜利到达神府，庆祝红二十八军在神府首战告捷，号召神府党政军民向红二十八军学习，更加团结战斗。

宋任穷政委讲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大好形势，他说：“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与陕甘红军胜利会师。击溃敌人三个骑兵团，斩掉了追击中央红军的这条‘大尾巴’，纠正了陕北肃反中的严重错误，歼灭东北军一〇九师和一〇六师六一七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1935年12月下旬，刘志丹率北路军，向进犯苏区的敌八十六师发起进攻，包围了横山县城。随后在宜川、洛川地区拨除了一部分民团所占据的山寨。1936年1月下旬，十五军团率七十五师在洛生镇附近击溃东北军两个团、八十六师一个团。红一军团第四师进击宜川、韩城、合阳、澄城、洛川等地，扩大苏区。中央红军经过同东北军六十七军的谈判，达成了联合抗日、互不侵犯的协议，解除了对甘泉的包围，并从宜川、洛川地区北撤，使苏区南部得到了巩固。”

刘志丹讲了陕北军事斗争的伟大胜利和北上神府的艰苦斗争，他说：“自 1935 年西北军委成立以来，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领导，红二十六军主力到陕北作战。5 月初，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汇合后组成了主力部队，在安定县的杨家园子一带歼灭了高桂滋的两个营又一个连；在张家圪台歼灭敌一个连，击溃敌援兵一个营，消灭一部；打开延长县城，消灭敌人 500 余名；打开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及李家塌寨子，消灭民团 600 余人；打开靖边县城消灭井岳秀一个营及民团 600 余人。在绥德西川击溃艾捷三团，消灭其一部，在吴堡、慕家塬歼敌 600 余人，慕家塬之战，震动了东北线。接着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在绥德定仙围点打援歼灭晋军一个团、一个旅部 2000 余人。到 8 月底共歼敌正规军 5000 余人，民团 3000 余人，缴获各种武器 2000 余件，及大批军用物资。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狠狠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苏区军民，壮大了红军力量，巩固了根据地。”

志丹越讲越激动，“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永坪镇会师后，10 月 1 日在劳山歼灭敌东北军一一〇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 3700 人，击毙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彩。10 月 25 日，在榆林桥歼敌东北军一〇七师一个加强团，活捉敌团长高福源。中央红军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后，于 11 月下旬，歼敌东北军一〇九师，击毙师长牛元峰，在追击中歼灭敌一〇六师一个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志丹顿了一下，激昂地说：“毛主席率领的主力红军东渡黄河以后，我二十八军奉中央命令，由吴堡北上向神木进发，与神府红军连接起来，巩固和扩大神府苏区，以牵制绥榆国民党二十二军和八十四师，策应主力红军东征，国民党驻陕北的高桂滋和姜梅生等部，得知二十八军北进的消息后，调集重兵，前堵后截，我军于 3 月中旬在绥德周家硷歼敌 500 余人。在绥德义合击溃敌人一个团，在米脂东阎家峁打垮姜梅生骑兵旅 5 个连及保甲 50 余人，收复了通秦寨和万户峪，在毛家湾歼灭井岳秀五一五团一部。昨天杨家一战，全歼杨向之营

300人，敌副营长也做了我们的俘虏，红三团团长杨琪同志就是在韭园沟李家寨附近的大王庙战斗中牺牲的。

“我们一定要为神府苏区除害，要把长期盘踞在榆林地区欺压人民群众的土皇帝井岳秀彻底推翻，要把井岳秀的脑袋示众！”

“感谢神府党政军与二十八军的配合，感谢神府人民对红军的支持！”

整个会场群情激奋，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欢迎红二十八军”、“欢迎刘志丹”的口号声，一阵一阵雷鸣般的鼓掌声淹没了刘志丹宏亮有力的声音……

3月23日，刘志丹、宋任穷关于苏区等问题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人。

张、毛、彭、周并告张参谋长：

甲、[在]神府与特委讨论一次苏区是在向西南发展，求米西苏区打成一片；其次是过黄河，向东发展。游击队主要布置在这两个方面。此外，决定了扩红、土地改革、整理党、发动群众生产、肃反等问题。

乙、吴堡独立营，令其即去乌龙铺以南桃花峁一带行动。

丙、我们决袭取沙峁镇，并相机派少数部队偷过黄河袭击，以精锐袭击黑峪口、罗峪口、高家堡。罗团已集中。在目前不能袭取神木城，敌情正在侦察中，完成第一步计划后准备迎击罗团的进攻。

刘宋

二十三日二时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志丹纪念文集》第673—683页。

3月下旬，神府特委和特区政府召开盛大的欢迎祝捷大会。当地群众兴高采烈，不少老百姓都从远道跋涉而来。拿着红枣馍馍、鸡蛋挂面，抱着又红又大的红南瓜，有的把供奉“神灵”做的供果之类的

东西都拿出来了。刘志丹不住地答谢乡亲们的慰问。有一天，部队正通过一个村子，忽然从欢迎的人群里发出来颤抖的声音：“你们闪开点，让我也看看老刘。”

大家一看，原来是村里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她已经 70 多岁了，满头白发如雪。她拄着柸子木拐棍，由小孙女搀扶着，颤颤巍巍地从人群走了进来，手里还提着一篮子大红枣。

大家都自动地闪开一条路，让大娘走进来。大家惊奇地问：“大娘，你看不见，怎么能看见老刘呀？”

大娘说：“我看不见，还不会摸吗？”说着就伸出枯瘦的手指，“咱们的老刘在哪里……咱们的老刘在哪里？快让我摸摸你呀！”

刘志丹见状忙趋步上前，双手扶住老大娘，亲切地说：“大娘，我在这里。”

大娘高兴地把那篮红枣费力地递到刘志丹面前，那双干枯的眼睛又似乎有些湿润，她深情无限地说：“老刘，你可是咱陕北穷人的主心骨啊，听说前些日子你被人害得不轻，我心里那个疼呀。好多个晚上都急的睡不着，多亏毛主席来了救了你。这是大娘叫孙女在枣树上一颗一颗挑选出来的好枣，红枣能补身子，你该好好补补，你看这手瘦的……”老大娘的手又摸到刘志丹的脸上，摸着刘志丹清瘦的面颊，边摸边不停地絮叨着：“你看，都瘦成这样了，你可是咱穷人的贴心人啊，枪林里来弹雨里去吃了多少苦啊。”

刘志丹也激动地眼里起雾，莹光闪闪：“大娘，这没啥，大家都很努力呀，只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切都会变好的，您岁数大了，也要好好注意身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今后会有您老人家的好日子过呀，红枣留给您自己吃吧，您更需要它呀。”

大娘满眼泪花，非让老刘把红枣儿收下不可，不然就不依，就不高兴了。刘志丹再三推辞，最后只好依从，把红枣收下。大娘高兴地合不拢干瘪的嘴唇，又从头顶摸到脚底，将刘志丹细细地摸了一遍，

然后紧紧地拉着刘志丹的手，舍不得放开。久久，久久，这种亲人般，母子般别离的场面，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潸然落泪。

周恩来知道这事后，十分高兴。他赞扬道：“刘志丹在陕甘人民中深得人心，确实是群众领袖。我们军队和群众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鱼水关系。”

晚饭后，刘志丹来到相距六、七华里的神府特委机关，召开了一次特委常委会议。他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形势，把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作了传达，他说：“继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是整个华北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灭亡华北，而且企图灭亡整个中国，独霸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将变成完全的殖民地，四万万中国同胞即将变成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亡国奴。目前，华北的情势，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南京政府组织华北傀儡政府冀察委员会，以过渡到直接武装占领华北的形势。

“在空前未有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前，蒋介石进一步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无耻地出卖中华民族利益，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条件，进行卖国的南京中日会议，逮捕枪杀爱国学生和爱国志士，封闭爱国报刊，破坏分裂爱国团体和阵线，调开华北武装军队去进攻唯一坚持抗日的红军。”

志丹停了一停，声音变得宏亮而高亢。

“最近，中央北方局受中国共产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委托，向全国同胞及所有武装部队长官士兵发布了宣言，愿意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反日、反奸、反卖国协定，一致去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组织抗日联军，建立国防政府。团结城乡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扶持一切知识分子，富农有与中农、贫农同等分得土地的权利。优待俘虏，一切同情于抗日的军官、士兵，都享有苏维埃政府的权利。联合各党各派，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一致抗日。”

目前的宣传口号是：“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一致团结起来；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奋起抗日，反对卖国；红军是人民的队伍；当兵就要当红军；抗日救国，世界大同等。”

接着刘志丹把红二十八军北上的战斗过程和任务作了介绍，并对神府的地方工作作了指示：“（一）目前，神府苏区局面基本打开，要趁机巩固和扩大苏维埃区域，抓好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扩大武装力量。要迅速使红三团的三个连扩大到四个连，红三支队在适当的时候，可扩建为红四团，王兆相同志可以不去红军大学学习，建立红四团时，让他当团长。（二）进一步开展白区工作，为扩大苏区做好准备。（三）要认真按政策办事，这是党的生命。”

他谈道：“人民军队走到哪里，应受哪里的党和政府领导，我们到神府就应受神府特委和特区政府的领导。”

常委们面带难色说：“你是我们的老上级，怎么能说领导呢？”

“这是组织原则，一定要这样办。”他语气非常肯定。

他以汇报的口气谈了部队的战斗和生活情况，并与常委们交流了攻战沙峁镇的打算。直到灯残油尽，他才回到了军部。

3月下旬，刘志丹与宋任穷率红28军聚歼敌第86师两个连，俘其营长。乘胜进入神木、府谷根据地，随即攻占神木沙峁镇。

接连攻克了神木县高家堡、沙峁镇等白军据点，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使神府红色区域和陕北大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将当地土匪高桂滋和晋军马延守旅打得落花流水。不日到达了黄河岸边的贺家川，开始作渡河的准备。

### (3)

1936年3月，将要进入“春风裂石的季节”。

在晋西北高原的老西北角上，黄水连着沙漠，春天来得和蒙古一样晚。连天的黄风飞旋，黄沙扑面迷人眼。刘志丹、宋任穷冒着大风，不分昼夜，在河岸检查渡河准备工作，研究渡河的有关问题。

河边狂风呼啸，飞沙漫天。一棵枣树下，刘志丹和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面对面蹲着交谈。老人把羊腿骨做成的旱烟管递给他，他很熟练地用火绳点着烟沫，一口一口地喷着烟云。老人很严肃地说：“黄河有三不过，春汛不过，夏汛不过，凌汛不过。眼下春汛快到了，虽说这里已提前解冻，可上面河套那里一解冻，房子大小的冰块顺着河水往下涌，那时节渡河，船一下水就会被撞坏。”

刘志丹“噢”了一声，果断地说：“那就抢在河套解冻之前打过河去！”他已下决心，要提早打过河去。

正说话间，机要员送来了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指示红二十八军，过河进入山西的兴县、临县，牵制阎锡山的主力部队。3 月 30 日晚，毛、彭再电刘志丹、宋任穷由南向北扫除堡垒，消灭守敌。与红十五军配合行动。发动民众，扩大红军，创建苏区，与神府、葭苏区打成一片。

刘志丹、宋任穷亲临修船现场，请水手们吃饭、干杯。刘志丹还不住地打探，渡船能否提前修好？这里的河水有多深？多长时间能摆渡过河？

一位 70 多岁的老船工见到刘志丹，顾不得回答他的问话，叫了一声“老刘”就扑上去向他哭诉起来。原来，这位老人家的船被敌人抢去，儿子也被敌人抓走好几个月了。他还解开衣服露出被敌人抽打下的伤痕，呜咽着说：“替我们报仇啊！”

刘志丹两眼喷射着怒火，发誓似地对老人家说：“你放心，我们要尽力为民除害，一定设法把你儿子和船从敌人手中夺回来。”

老船工揩干了眼泪，斩钉截铁地说：“老刘，拼了我这把老骨头，也要提前把船修好，我要亲自把红军送过河去！”

刘志丹带着水手几经侦察才选好渡口。这个渡口斜对着敌人的据点罗峪口。

罗峪口是山西临县、兴县和陕西神木地区的商业往来渡口，在军事上有重要地位。

傍黑时，全军将士齐集沙峁头，召开战前动员会。宋任穷政委讲：“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率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已渡过黄河，将进入抗日前线。蒋介石和阎锡山在调动兵力准备进攻我们抗日先锋队。我们北路红军马上就要东渡了，要同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协同作战，消灭敌人，创建新的苏区，为陕北红军争光，为刘军长争光……”

刘志丹慷慨陈辞，激昂地讲：“我主力红军在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的率领下，突破阎锡山苦心经营的黄河防线，连续取得了蓬门、关上两次大捷，歼灭和击溃晋绥军五个团，接着又在兑九峪重创敌军，击败了阎军的第一次反击。右路军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进占临汾、霍县、越城、洪洞、浮山、曲沃、侯马，切断了南同蒲铁路，扩红 5000 余人，筹集经费 7 万余元；左路军进攻介休义棠火车站，北进袭击文水县城，进抵太原晋祠袭击敌人，控制了汾阳到太原公路，已运动到晋西北的岚县、兴县地区；中路军包围了石楼县城，牵制敌人，控制了黄河渡口。然而，蒋介石、阎锡山调兵遣将，设重兵阻挡红军北上抗日。现在，中央指示我们迅速东渡，歼灭晋西北敌人，保证我主力红军能背靠老苏区。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毛主席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希望同志们能同仇敌忾，奋勇杀敌，为陕北红军争光，为陕北人民争光。”

刘志丹讲完，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战士群情激奋，振臂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阎老西！”

刘志丹下达了命令：“出发！”各团战士迅速秘密隐蔽在山坡村。

天黑以后，部队奉命快步轻捷地来到山坡村。这时，渡河的 4 只木船已一溜停放河边，一团三个连卧在天台山下山坡村边河岸。

渡河战斗是在拂晓前一个多钟头发起，参谋长唐延杰指挥着一团一连首先开船。仅有4条小船在黄河的波涛中顺流而下，颠颠簸簸，快抵达对岸时，敌人在探照灯的光柱里，仓惶射击。红军战士一边还击，一边跳水抢上岸去夺占滩头阵地。

刘志丹、宋任穷冒着枪林弹雨，一边组织火力向敌人射击，一边指挥后续部队渡河。当第三批船只在敌人的火力攒射下向对岸出发时，刘志丹、宋任穷也登上了木船，大声喊道：“前进，共产党员带头，坚决夺取阵地！”老水手脱下棉衣，划起浆，小船冒着弹火在波峰浪谷间前进。

刘志丹、宋任穷指挥部队突破了敌人的黄河防线，占领了对岸罗峪口背后的高山。刘志丹与宋任穷交换了一下意见，直捣敌渡口罗峪镇巢穴，敌人不久就土崩瓦解，守敌梁宏元营全部缴械。营长梁宏元当场毙命。

刘志丹没有忘记为那位老船工找儿子和心爱的船。他派人从俘虏中找到了老人的儿子，送还了老人。老人和儿子又找到了自己的船。

4月1日2时，彭德怀、毛泽东来电：“二十八军全部向黑峪口行动，不得分散……二十八军须在扫除封锁线任务完毕之时，才能说得到分配工作。”

刘志丹仔细研究电文后草拟回电：向彭毛汇报了作战情况与参战人员情况：

“——我们参加战斗的指战员六百四十名，新连一个在外，长短枪六百支，轻机枪六架，重机关枪二架，一切弹药均少。”

4月1日凌晨，王兆相率神木红三支队奉命渡黄河抵达罗峪口，王兆相命王道三率一个连驻守罗峪口，负责向陕北转运物资和伤员。王兆相与刘志丹在桑湾相聚。刘志丹对王兆相说：

罗峪口的敌人已经解决了。红二十八军现在奉命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你率三支队在罗峪口驻防，发动群众保护渡口。

后不久，阎锡山保德 4 个团推进至黑峪口北地的裴家川口一带，红三支队奉刘志丹命返回河西的神府根据地。

4 月 1 日下午，有红二十八军战士、红三支队、当地农民共一千多人参加了罗峪口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刘志丹在会上讲道：

“乡亲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是解放穷苦百姓，领导穷人闹翻身的队伍。乡亲们，不推翻这里黑暗的国民党统治，就没有咱穷人的好日子过，大家不要怕，只要大家团结起来，掌握枪杆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解放自己。现在罗峪口苏维埃政府已经成立了，希望大家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踊跃支前，积极参军，同自己的敌人去战斗！”

王兆相宣布苏维埃政府主席候选人王道三，农会候选人马康让、马恒仲，与会群众一致鼓掌通过。

刘志丹一再告诫苏维埃政府人员，这里是新区，一定要注意群众关系，注意工作方法和生活作风。

4 月 1 日夜，刘志丹召集团以上干部到军部开会。会上，刘志丹高兴地说：“我们这次渡河东征打了一个漂亮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声誉，筹集到了财物。彭德怀司令、毛泽东政委电令我二十八军全部向黑峪口行动，拆毁堡垒，破坏敌人沿河封锁线，消灭守敌。我们决定今天部队休整，明日凌晨出发……”

4 月 2 日凌晨，刘志丹、宋任穷率红十八军沿黄河北上，一路上攻无不克，连续消灭了刘家梁、牛家塔、赵家坪、滩头、张家湾、赵家川口、黄家凹、王家塔等沿河敌人，拆毁敌堡，兵进黑峪口。

黑峪口与陕西盘塘镇隔河相望，是秦晋之间的一个重要渡口，也是阎锡山封锁陕北的重要关口。

刘志丹观察完黑峪口用深沟高垒、堡垒构连的地形后，决定派特务连首先攻打东面的青龙山碉堡。红军战士几次出击均未奏效。最后刘志丹决定从百米外的一条小沟挖地道至碉堡底下，用炸药炸毁它。

经过战士的艰苦作业，又用 100 斤炸药，“轰”一声巨响，将青龙山敌堡炸毁，战士迅速占领制高点，黑峪口其它碉堡中的守敌大震，纷纷弃械逃命，黑峪口被红二十八军一举占领。

接着红二十八军派一支小分队沿汾河进军，佯攻兴县县城，其余部队直奔东南方的康宁镇一带。

东征左路军接中央军委指示后，迅速向白文镇进发，红二十八军得悉后也连夜向白文镇靠拢。途中，刘志丹知晋军已派兵在南线阻击，刘志丹迅速在曹家坡附近巧布口袋阵，单等敌人上钩。

4 月 3 日凌晨 2 时，刘志丹与宋任穷关于红二十八军部署问题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等人。

彭、毛、徐、程并报周：

甲、我们昨二日在赵家川口以南五里之吕成湾、石阴一带集结。

乙、今日仍在原地未动。

丙、我们今日的布置及工作如下：

除派侦察部队向兴县附近侦察敌情外，并派一个侦察班向曹家坡十五军团之警戒部队取联络，并以三团新兵连在黑峪口、沙湾拆堡垒，又派出地方工作组在黑峪口、赵家川口至大小善一带，进行扩军、筹款及统一群众、支部工作。

刘宋

三日二时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志丹纪念文集》第 673—683 页。

3 日 9 时左右，晋军温玉如部 600 余人陷入刘志丹在曹家坡布下的口袋阵。温玉如兵分四路进行突围，均遭到了红军的勇猛打击。最后温玉如换穿百姓服装乘乱逃出。曹家坡一战，600 余人被歼，缴获骡马 100 余匹，迫击炮两门，枪支 200 余支，轻重机枪 10 余挺，晋西北五百分之一军用地图一份。

4月3日黄昏，红二十八军从白文镇附近出发，拟经临县东部进至三交镇地区。由于晋军傅、苗二旅在临县城北的阻隔，红二十军决定晚10时经南庄走城庄，横扫设伏于万安坪一带的阎军方克猷旅，摧毁阎军布防于榆林沟的各个堡垒，直到方山石湾村的木瓜沟。

一夜的急行军，红二十八军的将士们摸黑穿行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不时遇雨，道路泥泞不堪，战士们浑身泥水，疲惫不堪。

4月4日上午八、九时，红二十八军进入圪洞镇，圪洞镇是北川河上的一个重镇，驻守着晋军李生达209旅的一个连。刘志丹不顾疲劳，随即下令：一部分从正面发起攻击，另一部分沿瓦窑河迂回到木瓜梁出其不意配合。经4小时战斗，全歼守军一个连。

红二十八军骑兵连歼灭了驻守在白文镇老爷庙晋军的一个连、一个营部后，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于4月4日晚进驻临县白文镇。

4月5日，红十五军团部从方山县故县村移驻白文镇，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八军会师。

白文镇官盐局门外的大场子上，用柳树杆搭起了一个临时演讲台，台上悬挂着一幅醒目的会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十五军团、二十八军会师大会，台上端坐着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副主任冯文彬、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伍晋南。

刘志丹向台下望去，只见十五军团、二十八军的战士们背着鬼头刀、钢枪，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会场中央。会场周围挤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刘志丹往台上一座，大声说：“同志们，乡亲们，会师大会开始了。”

刹时间，鞭炮声、锣鼓声齐鸣，掌声、欢呼声震天。

“向红十五军团学习，向十五军团致敬！”

“向二十八军学习，向二十八军致敬！”

台上，刘志丹举起右手，向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行了庄严的军礼。

台下更是热烈。军礼，鞠躬……鼓掌，鸣炮……整个会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十五军团渡河东征以来，长驱东进，接连取得了关上、蓬门大捷，于3月上旬与红一军团在孝义兑九峪会师，歼灭敌人两个半团。撤出战斗后，作为左路军在介休、灵石等地掩护右路军一军团突破同蒲铁路，挺进汾河流域后，即挥师北上，从孝义、介休、汾阳、平遥之间，直插文水、交城，前锋进至晋祠、古交。调动敌人任务完成后，兵锋一转，经静乐、娄烦转战到岚县、苛岚、兴县地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两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团。红十五军团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同志们，我们要向红十五军团学习。”

徐海东讲话，先是表示感谢，要十五军团的指战员向红十八军学习，最后说：“我们两路红军，一定要打个漂亮仗。”

刘志丹腰束皮带，挎着手枪，挥动着两手说：“两军会师，拧成一股劲，一定会无敌于天下，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第二天一早，张达志就急匆匆赶来看望他。“肃反”获释后，张达志被分配到十五军团部工作，至今还没有见过刘志丹哩。他来时，刘志丹正合衣躺在炕上睡着了。由于劫后他乡重逢，张达志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喊起来了。

刘志丹一见是张达志，战友相逢分外亲切，忙拉住他的手，说：“你来了？快上炕！”遂又问道：“部队都开到前线去啦？”

张达志忙道：“都去啦！杨森、晋年、罗斌、宝珊……他们正领兵在前头开路呢！这回你恐怕见不上啦！”

刘志丹笑着：“我很想念同志们，目前战斗很紧张，我恐怕见不上了。你如果见了同志们，代我一问好！并转告他们，要安心在十

五军团干，继续保持和发扬过去在陕甘时那种团结齐心，敢冲敢打的英雄气概，努力作战，奋勇向前，把我们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张达志一边听着他讲话，一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他觉得刘志丹更加清瘦了，不觉心头一热。显然，他出狱不久，身体仍未恢复过来，就又领兵打仗，渡河东征了。但他的精神非常好，眼睛里仍然闪烁着炯炯有神的目光，似乎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是疲倦。

张达志心有余悸地向刘志丹讲述了他被抓后，自己和贺晋年等人的不公遭遇，并气咻咻地斥骂“左倾分子。”

志丹宽容大度地劝慰着：陕北“肃反”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做出决定，人都放出来了，工作都分配了，我们就不要再做计较了。今后不要纠缠历史旧帐，要向前看，好好地工作，报答党和毛主席对咱们的恩情。路线问题，不能归咎于具体执行的那一个同志。当时没有电台，又没有报纸和通信，中央也不了解陕甘苏区的具体情况，不了解陕甘红军的性质。总之，以后什么话都别说了，从全局的革命利益出发，把目光放远大些，团结一致，好好工作，把革命搞成功，就是咱们唯一的奋斗目的了！除了这，还有什么呢？

张达志听了顿觉释怀，不住地点头，两人倾心交谈，说了半天话。谁料想，这竟成了他们最后的一次相见呢！红二十八军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亲切地拥抱在一起，又亲密无间地促膝交谈。

入夜。徐海东、程子华来到红二十八军军部，看望刘志丹、宋任穷。红二十八军刚刚进入白文镇，再忙也得跑一趟，问寒嘘暖。当他俩来到刘志丹、宋任穷的住处时，徐海东、程子华看了一会儿，似乎有点不解之谜。

随行的红二十八军通讯班长向徐海东、程子华介绍说：“炕头那边是刘军长睡的，过来是宋政委，再过来是唐参谋长。一路行军宿营，都是这样睡。刘军长身体不好，宋政委总把热炕头让给他。”

徐海东问：“刘军长的被子呢？”

通讯班长说：“刘军长没有被子。”

徐海东疑惑地又问：“为什么刘军长没有被子？”

刘志丹接过来来说：“是这么回事，过黄河以前，供给部送来条被子。过黄河时，饲养员给丢了。”

程子华问：“你黑夜睡觉盖啥？”

刘志丹说：“盖周副主席送来的那件棉大衣呀！”

那件棉大衣正在炕头放着。不见被子只见棉大衣，这正是徐海东和程子华心中的谜团。

徐海东和程子华都说：“这怎么能行？把我的被子送来。”

宋任穷说：“不要，不要。老刘每天睡觉，就只盖着那件随身披的棉大衣，大家看着心里过意不去，有的就把自己的被子让给他，可是说什么他也不肯要。还诙谐地说：我这两用的大衣，比被子好。白天穿，晚上盖，起来又不要打背包！唉，真拿他没法。”

在东征中，刘志丹给大家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崇敬。每当说到毛主席时，他总是虔诚地停停，仰起脸深思一下，在他那饱经战争风霜的脸上呈现出了那样动人的笑容。他常对大家说：“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有毛主席领导闹革命，革命一定胜利。”

一天早晨，刘志丹正和几个同志谈论着毛主席到达陕北后，革命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时，机要员送来毛泽东与彭德怀拍来的一封急电。刘志丹和军部的同志马上凑在一起，严肃地看着电文：

“为了配合南线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陕甘老苏区，命令 28 军即向离石以南之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相机攻占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

刘志丹拿着电报，心情特别激动。他对大家说：“我们越向南离

毛主席和中央红军越近了!我们全军一定要团结一心，英勇战斗坚决打好攻占中阳县三交镇这一仗，向毛主席献礼!”说着，他那饱经苍桑的脸上，又浮现了怡人的笑容。

军情更迫。刘志丹和宋任穷连忙围着地图，布置行军路线，率军整装出发。他们边走边打，迅速打到临县郊外，没有停脚，又打到临县的南沟。再斜转过去，直插离石。在离石稍稍小憩，又转战柳林。在柳林镇郊野，连夜召集团级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下达任务。

4月2日，毛、彭致电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宋任穷：注意找寻机会，以遭遇向后回击，或向前迎击，消灭敌人的小集团兵力；整个工作中，扩红列入第一位。

次日，刘志丹、宋任穷又接电：二十八军决令其随十五军团行动一时期，打些小仗，予以磨练，责其扩大至二千，尔后依河西需要令其西渡。

在一座宽敞的砖瓦房里，蜡烛的微光中，刘志丹、宋任穷和大家围坐在炕上，作战地动员：“……红军渡河东征，在山西的心脏活动。在这一带沿黄河边，几乎没多少部队，只有咱们二十八军，咱们一定要完成争夺渡口的任务。敌人企图从南北两线抢占黄河各个渡口，隔断我们和陕北苏区的通道，把红军歼灭在黄河以东……敌人约30万，我们总共不到两万人，要随时撤回，占领渡口是我们的头等任务。总部指示，一定要把三交镇这个要道打通，保证我军顺利回师。这一仗，关系全军的安危。各团回去，一定要作深入动员，保证胜利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宋任穷号召说：“……共产党员要拿出最大的毅力，不怕牺牲的精神，勇往直前，夺取三交镇，为我军顺利回师作出贡献!”

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刘志丹、宋任穷并告徐海东、程子华：红二十八军要逐步向南，而不是要你们一气走四、五天，走一、二天即展开工作，休息整理，发动民众，扩大红军，待敌接近，然后收齐队伍再跃进一步，再放开工作。

当晚，刘志丹、宋任穷又接电，规定“二十八军以后直属于本部指挥”。

4月10日，刘志丹、宋任穷接毛、彭来电：奉苏维埃中央办事处命令，委任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接着，各团进行动员，部队由金罗镇迅速向三交镇一带前进。

刘志丹和宋任穷都是初到这一带，对三交镇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详尽了解。他俩得知三交镇是山西中阳县紧靠黄河东岸的一个大集镇，东面依山，西傍黄河，道路狭窄，地势险要，是一条军事要道。

部队行进到三交镇东面的留誉镇、党家寨村。刚到宿营地，刘志丹、宋任穷就不顾征程的劳顿爬到山上，一面用望远镜观察敌军阵地，一面拿出地图查对方位。熟悉敌情，了然于胸。

刘志丹对各团负责人、军部工作人员发布命令。他说：“这次战斗十分重要，关系到全军的安危，关系到红军能不能顺利回师。每个指战员都要拿出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怕牺牲的决心，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接着，他又指着军用地图说：“翻过这个山，就是三交镇，从这里分左右两路，向三交镇猛攻，出敌不意，迅速歼灭敌人。战斗动作必须迅速、果敢、勇猛！如果迟疑、拖延，就会失去时机，陷于被动……”

侦察科长一字一顿地介绍敌情，刘志丹、宋任穷全神贯注地听着。为了打好这一仗，他一连几夜都没睡一个囫囵觉，双眼布满了血丝。警卫员焦心地几次送来饭菜，他都忘记了吃。当攻打三交镇作战布置全部就绪后，在沉沉暗夜，他轻舒腰肢，遥望南天深情地说：“我们快要见到毛主席了！”

4月13日，在刘志丹不幸牺牲的前一日，毛泽东同彭德怀移至隰县北部距石楼城一百四十里的康城镇西北。致电刘志丹、宋任穷：“二十八军有相机消灭三交镇、转角、辛关、义牒一带之敌，恢复黄河交通之任务。”

4月13日晚上，攻克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参谋长唐延杰对刘、宋二人说：“军长、政委、你们去休息一会儿吧，有事我叫你们。”

刘志丹笑了笑说：“我有一个老习惯，枪声一响，马上就没有了困意。”

宋任穷也附和着。

拂晓前，黄河两岸，寒风刺骨。刘志丹、宋任穷站在山头上，黄河的涛声清晰可闻。他俩的脚，冻得发疼、发麻。宋任穷拉刘志丹到避风处躲躲。刘志丹搓着手，挪着脚，借以驱寒。不一会，枪声渐起。

刘志丹侧耳谛听，一会儿后对宋任穷说：“这是一团方面的枪声，好像由近而远，杳不可闻。这显然是我军占领了敌前沿阵地，向三交镇发起了进攻。老宋，你在军部指挥，我去一团看看。”

宋任穷忙说：“我去，你留在军部。”

刘志丹说：“不要争了，就这样定了。”说着就拔脚向三交镇以南的东山上走去。

仲春季节的早上，天气还很冷。刘志丹双手都冻得裂出血纹，仍然俯在冰冷的山崖边纹丝不动地进行观察。呈现在他面前的是条小沟，沟里有小溪，汇入黄河，沟口就是三交镇。镇上的房屋巷道都尽摄眼底，敌人的来往活动也隐约可见。红军战士正在运动，接近敌人。刘志丹立刻命令一团用迫击炮、机关枪火力掩护，组织突击小组，向敌人碉堡逐个攻击。

刘志丹对一团团长黄光明说：“这次战斗与整个红军安危有关，要号召每个党员拿出最顽强的毅力，狠狠打击敌人。现在，三交镇周围大部分阵地已被我军占领，只剩下东北面那个主要山头，敌人集中力量拼命死守。二团那面攻击不易奏效，你们一定要很快攻入三交镇，夹击敌人。”

黄光明立即组织力量向三交镇猛攻，很快楔入镇中心，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

刘志丹也将指挥位置移至阵地最前沿的鳌子圪塔山上，与敌人负隅顽抗的大圪塔山头正好相对。中间仅隔一条窄窄的小河，距敌工事大约不足300米。

敌人居高临下，架有机枪小炮，拼命封锁二连战士前进的道路。而且这是红军大部队进入三交镇的必由之路。刘志丹来到这里，二连战士大部牺牲、只有不到一个班的战士在坚守阵地。双方枪声都减弱了，形成了对峙状态。刘志丹抬头望望，太阳快要当空，掏出怀表一看，已过了10点钟。刘志丹皱着眉头，思谋着如何重新调整部队，组织力量，向三交镇的敌人发起总攻。

战士们看见军长来到这里，纷纷劝阻说：“这里离敌人太近，地势又低，无法隐蔽，赶快离开这里吧！”

刘志丹镇静地说：“观察敌情要紧。你们赶快组织火力向敌人射击，以便弄清敌人的火力布置！”说完就趴在山顶聚精会神地观察起来。

战士们向敌人射击。敌人也进行还击。敌人的火力布置，刘志丹看得一清二楚。他兴奋地说：“这个小山头真是个理想的观察所啊！”

刘志丹迅速地拟定了进攻方案和实施办法，让通讯员转告黄光明，组织力量发起进攻。同时他又坐在地上拿出小本。把这里的情况，给宋任穷写了封短信，让通讯员跑步送回军部。并笑着嘱咐说：“你告诉宋政委，过中午，请他到三交镇喝胜利酒。”

黄光明率领战士继续向这个山头发起进攻。

敌人的一挺机枪封锁了红军部队前进的道路。刘志丹伏在一个棱坎后，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对身边的人说：“看见了吗？机枪是从小庙旁边那个碉堡里打出来的。等会儿冲上去一定把它缴过来，带给陕北老根据地人民作纪念。”他又把参谋叫到跟前，手指着对面说：“你去告诉黄团长，要他组织突击队消灭那个机枪火力点。另外，再组织几个战斗组，同时分别向敌人碉堡攻击，这样目标小，可以把敌

人各个击破。”

几个战斗组同时分路向敌人碉堡进攻。黄光明亲自带领一个排向敌人机枪的这座碉堡冲锋。

刘志丹情绪振奋，全身冒着热气，脸色泛红。他霍地站起来，发出冲锋讯号，一时枪声大作。刘志丹大叫道：“总攻开始了！”

刘志丹迎风站在高处，观察和谛听着周围的一切动静，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战斗的进展，并不时地从衣袋里掏出那块旧怀表看看，计算着部队运动的时间。他站在那里，眼下就是将要全部攻下的城镇，面前就是所要消灭的敌人，人们看着他那气势轩昂的表情，真像恨不得一口要把敌人吞下去似的。然而，他们这时既没有炮，也没有炸药，全靠战士们的英勇和指挥员的智慧来歼灭敌人，取得胜利。

刘志丹清楚地看到，红军战士已经一个一个地占领了敌人碉堡，大部队已经攻入三交镇，进行巷战的敌人且战且退，狼狈逃窜。

突然，又是那挺敌人的机枪，射来了一阵子弹。刘志丹踉跄着跌倒下去，周围人连忙把他抱住，急忙叫警卫员去找医生，把刘志丹抱放在隐蔽处。

刘志丹左胸被子弹穿过，不是一颗。子弹伤着了心脏，伤口处鲜血迸涌。他的面色立时变得枯黄，呼吸极度微弱。

大家都围了过来。

看到刘志丹嘴唇在微微蠕动，大家都停止了啜泣，听到了他微弱的声音：“总攻成功了！”“快报告宋政委，指挥部队……向毛主席献礼……”他眼皮微动，嘴角似笑非笑。

医生赶来了，但刘志丹的笑容永远凝固了。

人们都失声痛哭。

宋任穷听到这个惊人的噩耗，急忙赶来了。一层又一层的红军干部和战士，围拢在刘志丹的遗体旁，每个人都显出了无限的悲痛。宋

任穷含着眼泪，伏身蹴地，查看刘志丹的伤口。解开棉衣，露出那破烂的衬衣，心头顿时激荡发酸。他掩盖上刘志丹的胸膛，摸摸衣袋，一把抓净，只有半截铅笔、半盒火柴、几根破碎的烟头。一块怀表，还是参谋长的。宋任穷泪流满面：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全部所有！他活着时从不懂得索取，只知付出；到最后，把鲜血流在战火阵地，这就是他的一生！他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而献身！他活得正大无私，去得光明磊落！

宋任穷站起身来，庄重地站在自己亲密战士的遗体边，摘下军帽。战士们也都跟着宋任穷脱帽静默，向着自己最敬爱的亲人和首长作最后的告别。他们把刘志丹的遗体抬上担架。宋任穷从警卫员手里，拿过那件旧大衣，轻轻地盖在他身上。然后转身激昂地说：“继续战斗！”

大家迅速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向逃敌猛烈追击。那挺机枪的碉堡，也被手榴弹炸毁了。

## 结束语 民族英雄

一道噩耗传陕甘

三交镇牺牲刘志丹。

娃娃大人滚泪珠，

千人万人失声哭。

想老刘啊叫老刘，

就像挖去心上肉。

眼泪顺着脸蛋流，

世世代代想老刘……

东征前线的毛泽东拿着刘志丹牺牲的电报，手在抖，嘴角也不时

地抽动，他怔怔地望着电报，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突然，他眼圈一红，泪水一下子盈满眼眶，刚要张嘴，大颗大颗的泪珠便冲决眼帘滚落下来。他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想抑制泪水，可是不行，泪水已经流成串，他终于哭出声，那是一种竭力压抑着的沉重的抽泣声：“我初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献身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毛泽东呆立在那里，一边哭泣，一边诉说。

毛泽东对杨尚昆沉痛地说：“给恩来发报，志丹遗体运回瓦窑堡后，要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安排好后事。”

杨尚昆答应了一声，立即去安排向陕北发电报。

刘志丹在三交镇牺牲时，妻子同桂荣得了伤寒正身染沉痾住院诊治，中央决定暂不让她知道。4月24日，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在瓦窑堡举行隆重的刘志丹追悼大会。大会的前两天，周恩来副主席和妻子邓颖超亲自到医院告诉了她这个不幸的消息。同桂荣悲恸欲绝，泪如珠线，病床上起不来，没有参加追悼大会。周恩来夫妻一再劝她节哀顺变，保重身体。

壮烈的追悼大会在瓦窑堡南门外的广场举行。广场西边靠山根有座村民集会的戏台。戏台上扯起的白布横幅上赫然醒目地书写道：“刘志丹烈士追悼大会”。巨大的黑色帷幕上悬挂着刘志丹的遗像。戏台下面，黑匝匝聚集着密密的人群，万人一面地袒露着悲戚的面容。每一双痛苦的眼睛，都凝视着远处戏台上的那幅绽露笑容的遗像。

戏台上中央和陕西省委的负责人鱼贯而出。首先由后方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走到台前的桌子旁，嗓音低沉地宣布：“刘志丹烈士追悼大会开始。”

袁主任宣布：“首先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讲话。”

周恩来低着头，慢慢走到台前，站下来，转身对着刘志丹的遗像

摘下头上的军帽。台上的人也都纷纷起立，脱帽默念致哀。台下到会二、三千人都纷纷摘下帽子，抹下白羊肚子手巾学着周副主席的样子，向老刘默念致哀。

几分钟后，周恩来转过身用手绢擦拭着发红的眼睛，开始沉缓地讲话：“同志们，乡亲们，刘志丹同志在东征前线作战中光荣牺牲了。这是我们党、我们红军和我们中国革命的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西北人民失去了这样一位杰出的革命领袖，我们感到万分悲痛……”周副主席沉郁顿挫，一字一句地讲着，渐渐有些语涩。他停下来，再次掏手绢擦拭眼泪。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刘志丹的高度评价，使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深深的慰藉。

此外陕西省委书记郭洪涛报告了刘志丹的史略，中央政府办事处主席博古进行致词。

追悼会后进行遗体安葬。

突然间，几十支，上百支唢呐悲壮地朝天吹奏着陕北著名的曲牌《凤凤铃》。几名戎装整齐的战士抬着挽黑布花子的灵柩走在前面。周恩来亲自扶柩，悲痛已极。数千人自动列队相随，送葬的人们蜿蜒数里。卧病在床的同桂荣坚决要去送葬，经周恩来同意，并安排人用担架把她从医院里抬上，跟随在志丹的灵柩后面哭得死去活来，肝肠寸断。她的女儿也跟在身边呜呜咽咽地哭着，孤儿寡母的哭声令人心碎，感染了整个送葬的队伍。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晶莹的泪珠。

送葬的队伍跨过城南的小河，拐进另一条小沟。沟里有个村子叫刘家渠。刘志丹生前曾无数次率领红军从这里经过。如今中央决定将他秘密安葬在水沟坪山麓的一个果园。刘家渠水沟坪的乡亲们按照陕北的习俗把一只大红公鸡捉住杀了放在老刘的灵柩上做引魂鸡。灵柩落地后，同桂荣已经哭得嗓子喑哑说不出话来，身子俯在棺材上，紧紧抓住棺木恸哭抽搐，再三要求开棺看丈夫一眼。并语不成声地要跟丈夫同去。周恩来亲自弯腰用力将哀哀不止的同桂荣扶起劝慰道：

“刘嫂子，棺盖钉住了，你有病就别看了，见了会更难受……”

4月26日，《红色中华》第二版以《壮烈的追悼会》为题进行报道：

刘志丹同志的遗体于23日运到瓦窑[窑]堡市，驻瓦窑[窑]堡市的各机关团体、红军部队于24日在南门戏台举列[行]壮烈的追悼大会，到会者有二、三千人。在广大的人群心里沸腾着为刘志丹复仇的决心。首由后方政治部袁主任宣布开会默念志哀，继由郭洪涛同志报告刘志丹史略后，由军委会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中央政府办事处主席博古同志致词，致词完毕后，即举行送葬刘志丹同志的遗体，埋葬于瓦窑[窑]堡南门城外二、三里处。

刘志丹同志的牺牲是伟大的，是为中（华）民族解放，为抗日战争而牺牲的，我们对刘志丹同志的死，表示无限哀悼和敬意，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迹前进！打倒卖国贼，驱逐日本出中国，才能完成他的遗志呵！引自1936年4月26日《红色中华》第二版。

1936年5月，中共中央为了永远纪念人民英雄刘志丹，批准边区党委的提议，决定将刘志丹的故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成中共中央第一个以人名命名的县。

6月初的一个早上，毛泽东东征返回瓦窑堡后，和贺子珍请同桂荣吃饭。毛泽东一见同桂荣，就关切地问道：“刘嫂子，病好些了吧？”并让她先坐下才落座，要她注意身体，不要过分伤心。

“主席您的年龄比志丹和我的都大，我不敢当这个称呼，您再不能叫了……”同桂荣很不好意思地说。

“革命同志如同兄弟，大家都叫你刘嫂子，我怎不能叫呢？”毛泽东打着手势说：“没有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我们还没个落脚地哩！”

“如果主席不来的话，陕北革命也被肃反害了，志丹他们还不是主席救出来的吗？”同桂荣说到这里悲情难抑不由地流出眼泪。

毛泽东一边热情地给同桂荣母女挟菜，一边讲述红军东征抗日的重要意义，讲革命的大好形势，劝慰她要化悲痛为力量。

1936年7月，红大迁至保安新校舍寨子山下，建成开课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徐特立等中央领导来红大视察。毛泽东作重要讲话，莫文骅回忆：

毛泽东讲：“我们前一段时间，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也走了二万五千里。要是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红军从过去几十万减为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好这个落脚点，我们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不到外国去。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引自国防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军史》第24页。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用近三千字的篇幅描述了刘志丹的生平和功绩。他说：

——刘志丹是个现代罗宾汉，怀有山里人对富人的仇恨；在穷人中间，他成了救星；而在地主和放债者中间，他又是上天的神鞭。引自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162页。

斯诺夫人海伦·斯诺1937年春夏时间到延安访问对刘志丹的事迹进行了进一步的了解，并完成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的人物传记并收入《续西行漫记》。文中开篇这样写道：陕西，是中国文化的摇篮。最近，在陕西北部，又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然而，流传最盛的似乎要数刘志丹。文末他又给予刘志丹高度评价：“刘志丹和他的同志们创立的陕甘边、陕北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革命发展的出发点，对中国革命起了极大的作用……我没能见到刘志丹，但是，当我在延安同人们谈起他时，人们对他的崇敬和爱戴也深深地感动了我，他的确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也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成为共产党的政治家、军事家的一个典型。”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批示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兴建刘志丹烈士陵园。并由边区政府和志丹县委组成13人的修建委员会负责筹建。1941年初动工修建，选址县城北侧炮楼山下一座黄土高坡上，面城傍水，由钟敬之设计，工程技术负责人李传泾、路工程师。1941年3月20日《新中华报》第三版以纪念边区创造者建志丹灵堂为标题介绍了边区第一陵的动工情况：

为纪念陕甘宁边区创造者刘志丹，边区政府拨款万元，在志丹市（县）建筑灵堂一座。去年十月已开始准备，目前正动工兴修。志丹县各区民众为了表示对革命领袖的追念，各处均热烈进行普遍的志愿捐款运动，出力出钱，帮助政府完成修灵计划，各区民众及机关部队已将烧砖干柴十万斤送到志丹市（县）并仍在进行筹办中。

3月27日，边区政府民政厅作出《关于建立志丹陵捐助纪念决定——陕甘宁边区捐助建立志丹纪念陵办法》。

边区民政厅干部、建陵委员会主任王生华于1943年3月以《志丹陵三十二年（1941年4月——1943年1月）工程总结报告》向林（伯渠）、李（鼎铭）主席及边区政府详细汇报了工程建筑经过及经费粮食收支情形。志丹陵1941年4月奉命开工，1943年1月主要工程结束，2至4月进行零星的扫尾完善。工程历时两年多，陵园的建筑材料用安塞县高桥青石一千多方，用县区群众送柴七十八万多斤，烧砖三十四万块，石灰十万斤，用郝岔等地木料二百六十多方，群众投工两万多个，共计耗资二十六万余元，共计建有灵台一栋，纪念塔1座，箭头碑4座，石旗杆2根，中央领导人题词石碑32通，呈苏式建筑风格。

1943年4月上旬，边区政府和志丹县政府共同召开“志丹陵”落成典礼，边府主席林伯渠等讲了话。林主席说：党中央决定由边府负责，立即将志丹烈士遗体由子长运回，安放陵园内，永载史册。

1943年4月中旬，延属专区专员曹力如，副专员马豫章奉陕甘宁边区政府命全面负责刘志丹灵柩回老家安葬工作。刘志丹胞弟刘景

儒接到边区政府通知，急赴延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接见了她，决定让她随马豫章等一同赴瓦窑堡迁灵，并特派一个骑兵排作为护灵队伍。

4月15日，他们从延安动身，辗转东行，17日下午4时左右抵达瓦窑堡，住在“振兴隆”客栈，晚上子长县政府与迁灵人员一块研究了次日起灵，及举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宜。

4月18日，子长县委书记、县长和公安局长一千人等，率领警卫队战士及群众代表，和边区政府的迁灵人员一同来到水沟坪山麓举行了600余人参加的破土仪式。深挖5米左右，起出灵柩，面对志丹遗体，胞弟刘景儒心如刀绞，泫然涕下，在场的干部和群众都表情非常悲痛。下午2时许，灵柩被运回县城，安置在由350匹白布搭成的灵塔中。

4月19日，子长县在中山大操场举行“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会场布置的格外庄严肃穆，灵堂前的牌楼是由50匹白布和100匹蓝布扎成的花墙，灵堂中悬挂着烈士遗像，遗像两边各挂一面党旗，董必武题写“志士求仁飞渡黄河勤讨贼，丹心救国誓扫倭奴不顾身”的巨幅挽联悬挂在灵堂两侧。上午10时，公祭大会在悲壮的哀乐中开始，由中央军委代表介绍了刘志丹生平史略，然后子长县委书记、县长及烈士生前好友和亲属代表也分别讲了话，大会于下午2时方才结束。

据迎灵专员马豫章接受《解放日报》记者采访时讲述：

子长县19日祭时，与祭群众终日不绝，总数在9000人以上，有些长年闭门不出的乡下妇女也自发地纷纷前来参加公祭。

4月20日上午，迎灵者用两头骡子驮着内盛志丹烈士遗骨的精制柏木棺材，在骑兵排的护卫下从瓦窑堡动身，有各界人士、学生500余人送行，一直到城外5里的瓷窑沟，并举行别灵仪式。一些因战争断手折腿的原刘志丹的游击队员始终跟在灵柩之后，不忍遽去。沿途群众烧香致敬之事，更不胜数。路经子长中区、南区时，该区

乡民均自动以素酒白馍拦路祭奠。南区二乡杨家河杨老汉且当场发表演说，一再追念志丹同志生前领导人民，解放人民之英勇事迹；沿途民众除以麦馍招待护灵队外，并多贴祭幛于门首，表示悼念。

4月20日夜宿蟠龙，翌晨该区干部云集街道，率领民众举行路祭。未至青化砭时，该地人民即自动列队来迎，是夜抵川口，宿李家渠。昨晨延（安）县在此举行公祭，虽然这是一条荒沟，但到会群众即达300余人，民众并多组织自乐队护灵，近千人的自卫军更随队同行。当延安自卫军随灵抵达桥儿沟时，他们始终簇拥在灵柩周围，不肯稍离，虽然延安迎灵队负责人一再敦请众人回返，但他们还是坚恳送至专署灵堂后，始徘徊散去……

边区政府和延原分区早在延原专署的东关广场搭起了公祭刘志丹的素彩灵堂。并向延安市各界参加悼念的单位，发出了应注意有关事宜的通知，参加大会的单位及个人严令执行。公奠会布置的隆重庄严，灵塔上悬挂着“龙战当年巨湟遽阶天有情，鹤归何日忠骨长埋骨亦香”。横额：“创始者盖世事功。”同时，素包布上浓墨欲滴地书写着素色标语。

志丹同志永远是我们的模范！

志丹同志志气超群！道义超群！全党向您学习！

人民跟着前来，您是民族优秀的象征！是阶级解放的标贴！

誓死完成您未竟的事业！誓死学习您卓特的品能！

4月22日中午1时，边区政府和延安市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万余人聚集桥儿沟，列队迎灵。2时后，乐声骤响，幽幽咽咽，白幡素幛丛中，刘志丹的遗像灵柩缓缓呈现在延安市军民面前。朱德、任弼时、高岗、林伯渠、邓发、罗迈、贾拓夫、李木庵、崔田夫、甘泗淇、刘景范、唐洪澄、张邦英、曹力如、刘约三以及党中央各机关及边区一级的党政军负责者恭抬灵柩，慢慢移至素色的汽车中。

延安卫戍区司令王震亲任指挥事宜，宣布迎灵礼仪后，全场军民

肃立，奏乐。朱德、任弼时、高岗、林伯渠行礼如仪，亲自执紼，然后由王震指挥仪仗队，护灵卫戍骑兵队压道，10丈长的两匹白布，一头在灵柩上，一头由烈士遗女刘力贞、侄子刘军牵引着，全体迎灵者相随其后向灵堂进发，万余人排成四路纵队，绵绵延长达4里多，沿途群众伫足以迎者，途为之塞。

当志丹的灵柩与迎灵队渐渐汇拢时，天色深沉凝重，空气益增悲壮肃穆的氛围。高岗及贾拓夫、崔田夫、刘景范、张邦英、曹力如、刘约三诸人，看着灵柩热泪潸然，飘飘洒洒。四周的人海中有一位叫高德元的村民，他是子长县五乡人，默默地从子长跟着迁灵队伍辗转百余里，来到延安，他逢人就讲“是刘志丹给了庄户人幸福”。

延安县川口四乡五村的村民张德富对记者说：过去吃不饱，穿不暖，地种不上，还要受气，刘志丹领导我们闹革命。现在，咱们不仅有吃有穿有地种，而且有牛羊了。为了报答刘志丹，他们在庄子里，组织了吹鼓手，自发地加入迁灵队的行列中。

延县朱家沟卖炭的村民陈友良告诉记者：“哼！刘志丹，对咱们的好处可多的太呢！可是叫我从什么地方说起好呢？”于是他急忙指着身旁的毛驴说：“咱过去是没有这个的，可是现在咱有了……”

志丹殉身以求的，就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生活的改善，现在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乡亲们纷纷望着，指着志丹的遗像，互相传说着，讨论着：“你快看，刘志丹还是那个样！”

高山回答，大地回应：是的，刘志丹还是那样，刘志丹没有死。在他遗像的后面，高悬在车头上的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敬献的挽词——

志丹同志一生，对党无限忠诚，对敌斗争，沉着勇敢坚定，对中华民族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有高度信心。

志丹同志，是西北人民大众革命的旗帜，行动的指南针，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光荣。

全体党员，应该向志丹同志学习，争取革命最后胜利，以慰英灵！

还有西北局敬献的挽词是——

志丹同志献身革命，爱护人民，建设红军，创造边区，坚持党的路线，奋斗十余年，艰苦奋斗，至死不渝。

下午4时，志丹灵柩到达东关广场时，又由朱德、任弼时、高岗、林柏渠等人将灵柩抬入灵堂，在八路军乐队，民间乐队，鲁艺乐队三部合奏中，仍由林伯渠相偕行三鞠躬，礼毕散会，但附近居民，仍留连在灵堂周围。

刘志丹的孀妻同桂荣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丈夫是为革命牺牲的，是光荣的……”

志丹遗女刘力贞年已13岁，现在干部子弟学校就读，亦随队迎灵……

4月23日下午两点半，在延安专署广场举行了15000人参加的公祭大会。仍由延安卫戍司令王震担任大会指挥，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任司仪。朱德、任弼时、博古亲自到会。毛泽东、周恩来等赠送了白绸挽联。是时军民已密密匝匝地站满广场，成方形，秩序井然。在悲凉如水的静默中，鸣枪志哀，乐声倏起，军乐悲壮激昂，雅弦低回悠扬，全体肃立，会场气氛顿时陷入悲寂。许多人都热泪欲零，泫在泣下。主祭人高岗、林伯渠就立，陪祭人（各界代表）就位，家属就位，全体向志丹灵柩三鞠躬，静默3分钟，献花圈、进酒、进嚼后，边区参议会长谢觉哉宣读祭文——

呜呼！古圣贤豪杰多矣，有大同之理想且为理想实践奋斗，如我志丹者不多见！

古圣贤豪杰者亦多矣，与大众为一体，自以其血滋养大众之解放事业者更不多见！近百年来，世运剧变，华胄英俊，前仆后继。然而如我志丹同志奋起边地，百折不回，遂而缔造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人类解放之基地，陕北一隅，成为全国与全世界所展望。奇功伟绩，实罕其伦，呜呼！非常之时产生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而

未竟其业，隕于无情烽火之中，此则全国人民及全世界先进人士所同声痛哭者也，况在亲沐其光辉，受其领导之陕甘宁地区之人民乎。血不虚流，人在继起，自公死后，陕甘宁边区已成障洪流之砥柱。陕甘宁边区人民已成为四万万人之解放最先者。陕甘宁边区军政民之组织与发展，已成为全国之模范，陕甘宁边区之民主政治，正日新而日不同。抗战之年，愈战愈勇，困难虽多，成功已近；黑暗呈在，黎明已临。此皆我志丹同志之遗留而亦可以告慰我志丹同志在天之灵者。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受人民之付托，继承我志丹同志之事功，发扬人民意志，厉行施政纲领，教化日新，人才日起，经济发展，民主改良，为抗日军之巩固后方，奠新民主主义政治之伟大基础。兹当举安遗榭。万众悲歌，敢掬悃忱，敬告我志丹同志之灵，奋斗有人，光明在望，灵其鉴诸。

谢老含泪滴血读完祭文。高岗又报告了志丹同志的生平史略，他在深情地叙述刘志丹的种种事迹中，历数和归纳出志丹同志的几个特点：第一，对党无限忠诚；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第三，百折不回、从不消极的革命精神；第四，实事求是、不铺张、不夸夸其谈的工作作风；第五，善于独立决定方向；第六，战术、战略、政策机动灵活。高岗在结束语中说：志丹同志是陕甘宁边区的创造者，是西北人民的领袖，是党内布尔什维克的模范。十余年为党奋斗，始终不懈，赴汤蹈火，百折不回，虽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领会马列主义精髓，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虽受人诬陷，毫不失革命立场，其艰苦朴素，知有党不知有身的优良品质，是我们每个党员应该向他学习的。

高岗以沉痛的语调说：志丹同志是边区的唯一创造者，是西北人民的领袖，他的肉体虽死，精神不死，共产主义的精神不死！每个党员应该好好学习他的这些布尔什维克的品质。他的方向，就是毛主席的方向，就是党中央的方向。

“红军之父”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说道：刘志丹同志之死，使党损失一个好干部，凡我党员，应该学习志丹同志的模范榜样，来补偿党的损失，来纪念志丹同志。

朱总司令继续指出：志丹同志是边区红军的创造者，他自大革命起直至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就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因此，朱总司令评价刘志丹同志是创造红军的模范，并郑重号召全体党员，全体八路军向刘志丹同志学习。

林伯渠主席说，边区人民纪念刘志丹同志，因为志丹同志所做的事业，使边区人民翻了身。但是应该怎样来纪念他呢？

林主席认为：我们应该以建设边区的行动来纪念他，把边区建设得更好一些以争取民主主义的胜利。

谢觉哉代表边区参议员讲话，他认为志丹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模范的革命军人，号召全边区人民，学习他百折不回的精神，完成志丹同志未竟的事业。

吴玉章号召开会的同志，学习志丹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坚定的立场，不怕牺牲个人的革命品质。并指出这在今天尤有重要意义。

抗联会主任高长久以学习志丹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为群众利益奋斗的精神，勉励边区各级群众运动的工作者，并号召边区人民加紧生产教育来纪念志丹同志。

最后由家属志丹同志二弟刘景范致答词。他说志丹同志在家庭里是一位好教师，他对劳苦群众深具同情，把自己家里的雇工从雇佣的关系里解放出来，参加游击队。现在任某营营长张明科同志，就是他家十年前的雇工。刘景范陈述自己参加革命也是志丹同志不断家教的结果。他在答谢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及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举行这次公祭的盛意外，表示家属愿继承遗志，为革命事业奋斗

到底……

乐声又起，公祭随告礼成。4 时左右散会。

在延安公祭大会期间值得一提的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乐队承担了为移灵奏乐的任务。由马可、安波、张鲁、刘炽、关鹤童等人组成的音乐研究组，将大家熟悉的民间牌子曲、民歌《绣荷包》、《珍珠倒卷帘》等，加以改编让乐队演奏。为了适应当时的哀伤气氛和缓慢前进的步伐，他们将乐曲速度放慢了许多，在整个移灵过程中一路上用中、西乐器演奏。以后，这支哀乐逐渐流传开来，沿用至今。此外，《解放日报》4 月 23 日第一版头条发表了林伯渠撰写的“永恒的纪念”长文，第二版发表了刘志丹革命史略，三版发表了贺晋年的“刘志丹同志永远活在我心中”纪念文章，并报道了即日启程志丹安葬的消息。

当天晚上，毛泽东夜深难眠，不时走到院里，抬头遥望着天际的粲粲星辰，终于像每次大战前经过深思熟虑作出最后的决断一样，他突然大步返回窑洞，把肩头披的外衣往炕上用力一扔，端坐桌前，提起早已预备好的毛笔，在墨盒中蘸一蘸，凝神屏气挥毫泼洒，遥寄刘志丹烈士：“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志丹陵告竣后，定于“五·一”举行落成典礼，并举行安葬仪式。4 月下旬志丹同志的家族、亲友均已接获通知，纷纷筹备线幛及礼品，准备届时前往参加。《解放日报》记者在吴旗县府晤见一科科长刘志丹堂弟刘景瑞，获悉拟参加葬礼的亲属甚众，有从宁塞、可可、西川各地赶来者。志丹的严亲，也打算前往，抚见爱子灵柩，并作殡礼答谢……

4 月 24 日八时刘志丹烈士灵柩，在高岗、林柏渠和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西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警三旅副旅长吴岱峰、骑兵旅副旅长康天明、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王世泰、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延安行署主任曹力如、边区政府总务处长刘约三等人的陪同下，由延安启程向志丹进发。

灵柩前走着八路军乐队、鲁艺乐队和民间乐队，接着是全副武装的骑兵队伍，各机关领导人随着灵柩走在最后。当晚，夜宿安塞县高桥镇，沿途路经的村镇，干部、群众纷纷焚香烧纸争相祭奠。

4月25日，刘景范、曹力如等偕志丹灵柩从高桥出发，下午5点，抵达志丹县康家沟村。县委书记王耀华、县长李超早已在村头等候迎灵路祭。灵柩一到，护灵队三军乐声震响，五千多人纷纷跪迎，村主任李阳，村民沙海清、双代女等人烧香散食。有的人失声痛哭，捶胸恸足，有的人絮絮叨叨念着：“救命恩人，您回来了！”刘景范、曹力如进前扶起路祭的男女老幼，一同护灵回村，置放在沙海清家院子里。县委书记王耀华和县长李超连夜返回县城，布置第二天的迎灵事宜。

人乎归去，魂兮归来。刘志丹故乡的人们听到志丹灵柩于4月26日抵达县城的消息后，纷纷奔走相告。众乡亲阖家老小，倾城而出，在王耀华和李超的带领下，从县委大门外，徒步行走10余公里，在进士窑焦灼地等候灵柩的到来。日近午时，庞大的护灵队蜿蜒盘旋在起伏的周河川，静候多时的志丹干部群众远远望着渐渐逼近的灵柩，想起日思夜想的“老刘”，悲从中来，万箭攒心。顷刻间，吹鼓手鼓胀双腮，饱含热泪地吹起了“老刘”平日最喜爱听的曲子，道旁群众焚香化纸，悲声齐放，感天动地，沸沸扬扬，令人肝肠寸断。灵柩缓缓地驶进县城南关大街，伫立两旁的乡亲们个个含泪默哀，警卫战士频频鸣枪致敬，随着白色灵幡的迎风飘动，乐声、哭声不绝于耳，萦绕不断。灵柩停放在南关灵棚，四邻八乡的村民闻讯赶来焚香祭奠者络绎不绝。为了满足志丹故乡群众和远路家门户族的要求，遂决定将公葬仪式推迟到5月2日。此后数日间，日以万计的乡村和邻近县众乡民专程到志丹为烈士焚钱浇奠，倾诉无尽哀思。

有一名叫郭清秀的老汉天不亮就携全家从数十里外的地方动身，翻山越岭整整一天半，下午才赶到志丹县城，跪拜于志丹灵前，痛哭哀吊不已。在革命前他原是一个二流子，又爱抽几口大烟，革命时，经志丹苦口婆心的说服教育，才参加劳动，投身革命。土地革命后，

他从一贫如洗发展到富裕的中农，温饱盈余。所以，他终生都难以忘记志丹闹革命的好处，永远怀念老刘……

5月2日，志丹县万人公葬革命先烈刘志丹。

上午9时，高岗、林伯渠均在志丹灵前默默致祭，潸然泪下。10时许开始移灵，高岗、林伯渠亲自执绋，由十八名战士正步走将灵柩抬入志丹陵园，张秀山、吴岱峰、康天明、刘景范、曹力如等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代表，志丹县各机关干部和广大群众代表，以及烈士家属亲友等万余人参加公葬仪式。沿途哀乐缭绕，白幡招展，焚香祭奠者途为之塞，万头攒动，密不透风。

11时，灵柩到达志丹陵园，一身戎装的战士举空鸣枪致敬，军乐高扬，鲁艺乐队演奏国际歌，万众齐唱祭陵歌，全场当时肃穆悲壮

——  
奏起哀乐，  
来祭陵，  
志丹同志，  
你活在我们心中，  
你流尽了血，  
为国为民尽了忠，  
你的革命事业，  
我们来继承。  
你闭上了眼睛，  
听着我们脚步，  
胜利就在前头，  
我们正在奋斗。

公葬仪式由志丹县县长李超任司仪，高岗先向到会的党政军民报告了刘志丹的平生革命史略。高岗说：志丹同志是西北人民的救星，他一生艰苦奋斗，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打倒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敌人。而志丹县人民，正是从志丹同志手里得到解放的。因此，真正纪念志丹同志，不是哀哭，哀哭是没有用的。继续志丹同志的革命事业，在当前，即发展全边区生产建设，奖励劳动英雄，反对二流子怠惰者，巩固边区，建设边区，坚持抗战，坚持革命到最后胜利，这才是真正纪念志丹同志的最好礼物。接着由林伯渠主席讲话，除阐述志丹同志之布尔什维克的高尚品质外，并号召志丹县政府人民，为着完成志丹同志未竟事业，志丹县政府及人民要努力把志丹建设成为新志丹，发展生产，更加改善人民的生活。

继林伯渠之后依次还有张秀山、吴岱峰、曹力如、王耀华等人发言。然后有刘景范代表志丹家属向大会深致谢忱，并说：“志丹同志的死是光荣的，家属必秉承遗志，为中国革命斗争到底。”

最后曹力如恭读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祭文。

礼毕散会，《祭陵歌》徐徐飘起——

一滴眼泪一滴汗，一块石头一块砖。修起了志丹陵，志丹陵来百尺高。高不过志丹同志的大功劳！

为穷人吃来为穷人穿，千万穷人把身翻。纪念碑立在陵前，刻下了纪念。刻呀刻呀刻不完，刻在那千万人民的心中间！

送灵队低下了头，抬着灵柩慢慢走。往年咱跟刘志丹，咱是他的游击队员。陕甘宁到处都走遍，而今的路可比过去宽！

红旗蒙在灵柩上，百姓祭灵在路旁。千万人排成队，唱出的歌儿多悲壮。志丹同志没有死，志丹陵发出万丈光芒！

群众叨叨不绝地说：奉安志丹同志之灵位，革命后继有人，您在故乡的膏壤沃土中安歇吧……

公葬大会后，《解放日报》详实报道了公葬大会的情况，并发表

了林伯渠撰写的“永恒的纪念”和贺晋年“志丹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等纪念文章以及“刘志丹革命史略”。

在公葬刘志丹期间，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之墓；革命烈士纪念碑等4副题词。周恩来也题写了：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写了：红军模范；志丹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忠实英勇的红军领导，陕甘苏区的创造者。

此外，彭德怀、林彪、贺龙、徐向前、叶剑英、陈云、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李富春、蔡畅、高岗、邓发、罗迈（李维汉）、博古、凯丰、康生、王明、李鼎铭、肖劲光、贾拓夫、张秀山、贺晋年、阎红彦、南汉辰、曹力如、张邦英、王世泰、吴岱峰、习仲勋、刘景范等数百名中共中央党政军领导人写了题词，中央书记处、中宣部、社会部、中共西北局、西北党校、陕甘宁边区政府等数十个中央机关和地方政府都敬献了挽幛挽联。最后用爱国名士续范亭先生的挽诗做为结尾吧：

志丹城内志丹陵，  
创造边区第一人；  
不为权门称知己，  
只因穷汉是乡亲。  
无产阶级老同志，  
布尔什维一英雄；  
中华民族好儿女，  
轩辕黄帝好子孙。  
有志竟成千古业，  
丹心一片付工农。

多病未能亲执紼，  
西望云天吊将军。

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专门提到：

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引自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姜永明著《铁血岁月——毛泽东与刘志丹》。

1945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说：

有人说陕北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引自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姜永明著《铁血岁月——毛泽东与刘志丹》。

1970年3月26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代表时讲道：“刘志丹像赣东北的方志敏，海陆丰的澎湃、广西的韦拔群一样，在当地人民中具有崇高的声望和威信……对党忠贞不二。在黄埔的时候，刘志丹是黄埔四期的学员，我教过他，刘志丹在陕北人民中很得人心，确实是人民领袖。我和他东征到清涧时，群众听说刘志丹来了，都来看望他。其中有两个瞎子看不见，跑到窑洞里摸他的手。这一点，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志丹》。

1973年6月，周恩来陪越南领导人参观延安时讲道：“刘志丹是位好同志，陕北必须宣传刘志丹。”

1985年11月20日，邓小平题词：“渭华起义烈士永垂不朽”。

1986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纪念馆在荔园堡落成胡耀邦题写“革命烈士永垂不朽”。陈云题写馆名“南梁纪念馆”。

1986年，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出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在第二十七章“家”中详尽地描述了刘志丹的生平和事迹，他认为“刘志丹是位人民的英雄，人人都知道他，并传诵他的光辉事迹，亲昵地称他为‘老刘’。他们说，他把自己家的财产都没收了。他献身于追求真理和人民的解放”。引自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普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310页。

1993年2月20日，江泽民题词：学习刘志丹同志的革命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96年，刘志丹被中央军委批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并收入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2003年，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隆重纪念刘志丹诞辰100周年。

2009年，刘志丹被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2、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中共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3、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刘凤阁、任愚公主编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之二《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下）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版。

4、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丛书《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

5、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熊美杰、贾自新、王聚儒、任德存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丛书《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片。

6、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熊美杰、贾白新主编中共党史资料丛书《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版。

7、白黎著《刘志丹传》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9 月版。

8、曲涛著《红色足迹——陇东老区重大事件评述》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版。

9、郭林、李建社、李来存主编《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版。

10、渭华起义旧址文管所编陕西历史文物丛书《渭华起义》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8 年 5 月版。

12、白占全著《碧血丹心——东征中的刘志丹》中国文联出版 2001 年 8 月版。

13、姜永明编著《铁血岁月——毛泽东与刘志丹》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 年 8 月版。

14、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 3 月版。

15、张策著《我的历史回顾》改革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版。

16、小丽编著《刘志丹的故事》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版。

- 17、张俊彪著《血与火》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6 年 12 月版。
- 18、刘力贞、张光编《纪念同桂荣》陕内资图（2002）007 号。
- 19、刘文学编著《志丹吴起大刘氏族谱》（内部资料）。
- 20、《刘志丹家史》（内部资料）

## 后记

生息在黄河西岸迤迤起伏的黄土高原芸芸众生在中国 20 世纪的中后期都无法挣脱，也不可能挣脱与“志丹精神”的血脉联系。这种联系天长日久已浸入人们的血液骨髓，甚至生命的每一个毛孔，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意识到没意识到，它已融入这片土地、融入生命的血肉，融入人们的精神家园。

公元一九三六年初冬，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悼念鲁迅》中曾疾呼：“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生于将军故乡的后继晚辈，闻之心里感到震撼、惊竦、惶愧……历史的昭示，时代的召唤，我在将军诞辰 100 周年创作了《铁血岁月——毛泽东与刘志丹》。六年后又受命运的邀约，抱病完成《浴血高原——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想来甚慰。

在触摸涉猎刘志丹将军从生至死，西北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带着体温、浸着血泪的创世纪史，我不时地从发黄的史页间抬起头来，停下笔来，对历史深处的痛感暗自失声，泪流满面。毛泽东早在 1942 年延安整风时期就说过：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走过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所以，我在将军传记创作中始终遵循着两个原则：述而不论、论少而精；言必有据、据必作注；力求作到无一事无来历，无一字无出处。因为在将军的一生中苦难多于辉煌，荆棘多于鲜花，沼泽多于坦途，而且历史的内涵

太过于沉重，褒贬臧否，还尚待时日。我想起西方一句名言：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但 2009 年从春到夏，我在创作中的心情都在沉重、激越的漩涡中泅渡、搏击，激动尚可抑制，但沉重却日日加深，几近窒息，无法释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让我们在将军苦难与辉煌，残酷与光荣，情怀与黯淡的命运史中，回顾渐渐成为过去的 20 世纪中国风雨飘摇的历史、血泪、忧患、跋涉、创伤、悲壮，逼迫我们在精神分享、心灵承担、灵魂安妥的时候作将军那样的人，注入将军的阳刚和血性，长有将军的铮铮脊梁，在天地间立世和行走。

2009 年 8 月 24 日草

2010 年 3 月中旬改就峻